

金塔历史文化丛书

JINTA LISHI WENHUA CONGSHU

金塔简史

陶玉乐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金塔历史文化丛书

JINTA LISHI WENHUA CONGSHU

金塔简史

陶玉乐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塔简史 / 陶玉乐著.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8.7
（金塔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490-1588-7

Ⅰ. ①金… Ⅱ. ①陶… Ⅲ. ①金塔县－地方史 Ⅳ. ①K2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4484号

金塔简史

陶玉乐 | 著

责任编辑 | 房金蓉
封面设计 | 苗青青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酒泉市汇丰彩色印刷广告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 ×1092毫米　1/16
字　　数 | 373千
印　　张 | 19.5
版　　次 |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8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588-7
定　　价 | 4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举报电话：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金塔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名 誉 主 任：方学贵

主　　任：李学年　杨国文　鲍尔剑

副 主 任：白苍松　陶　渊　李玉明　王　彦　陈国材
　　许春梅　曹广成　吴兴保　李永林

副主任委员：肖占福　王治邦　许兆江　向国富　姜　琳
　　柴艳梅　王　军　赵百军　张想平　吴玉才
　　胡安俊　王发忠　张金兰　贺成荣　殷希奎

委　　员：马　忠　宋文鹏　李泽军　亢建新　葛万鹏
　　常国伟　吴占彪　魏全生　雍克明　刘中英
　　孙志宝　陶玉乐　李国民

《金塔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人员

陶玉乐　白彩云　丁建兰　王　兰　马芳芳　崔俊霞

序 一

金塔县地处河西走廊中段北侧，东连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南越夹山与高台县、肃州区、嘉峪关市毗邻，西邻玉门市，北与内蒙古额济纳旗接壤，总面积 1.88 万平方公里，辖 5 镇 5 乡、1 个城市社区管委会，总人口 15 万，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塔”命名的县。金塔县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和镇守边关的咽喉重镇，汉代的肩水金关依弱水雄踞而望，长城烽燧遍布全境，举世闻名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坐落境内，被誉为“汉简之乡”“航天摇篮”“戈壁明珠”。

早在 4000 年前，这里就有先民生息繁衍。秦以前为羌戎所居，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时设会水县，为酒泉郡所辖。后按照水系将县境东部并入张掖，西部并入酒泉。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虽名称有所变更，但建制一直沿袭。民国二年（1913 年），分置毛目县和金塔县，后将毛目县改为鼎新县。1956 年，金塔县、鼎新县合并为金塔县。

金塔历史文化，不仅表现在独树一帜的大漠风光、遍布城乡的古迹遗址、蕴含丰富的文物遗存、脍炙人口的特产佳肴、历代先辈的拓荒足迹等丰富多彩的物化形态上，还表现在灿烂悠久的青铜文化、博大精深的长城文化、震惊中外的居延文化、举世瞩目的航天文化、古朴通俗的乡土艺文、独具特色的方言俚语等门类齐全的人文形态上。

县境内的缸缸洼和火石梁等原始聚落及炉场遗址，向人们诉说着古老沧桑的历史，展示着令后世震惊的彩陶文化和青铜文化；汉武帝开疆辟土时遗留下的众多汉长城、烽燧遗址，肩水金关出土的大量汉简，会水城、西古城、西三角城等汉代修筑的城池，魏晋时期的王子庄、明清时期的威虏城等众多城址，守候和见证了金塔历史的变迁。这里有中国最早的青铜

冶炼厂遗址——火石梁遗址，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麻纸和毛刷、中国最多的汉代简牍……众多的“之最”，处处闪耀着金塔历史文化的熠熠星光。

颛顼巡狩居延地，大禹斧劈镇夷峡，王母坠玉鸳鸯池，骠骑西征过会水，李陵驻军营盘城，博德修筑居延泽，牧犍修筑王子庄，冯胜破虏石梯子，一贵修建金塔寺，乃雄招民垦荒芜，毛公开辟鸳鸯峡，仁卿请命建水库……这一个个传说和史实，记载着古代帝王将相和前辈先贤在这块热土上开拓、奋进的足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片历史厚重的沃土再次焕发了勃勃生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鸳鸯池水库、万亩胡杨林、红柳洼光电产业园等近现代建设成就谱写了一曲曲奋进的凯歌，彰显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和不畏艰险、自强不息、敢为人先、艰苦创业、勇于负重的金塔精神。

“三山夹绿洲，两河穿境过”，在黑河和讨赖河两条河流的哺育下，金塔独特的文化魅力得以充分展现。地方特产脍炙人口，既有锁阳、苁蓉、甘草等独特物种，又有黑醋、粉皮、蒸粉、酿皮等特产佳肴；方言俚语特色鲜明，通俗易懂，处处洋溢着金塔人民淳朴善良又豪爽大度的性格；地势地貌类型多样，祁连雪峰、黑河环流、瀚海绿洲、荒漠戈壁、金色胡杨、大漠落日等自然景观与史前聚落、关隘要塞、长城烽燧等众多人文景观交相辉映、融为一体，为金塔历史文化增添了无穷的内涵和魅力。

面对多姿多彩、浩瀚博大的金塔文化形态，我们深深感受到内在文化精神的律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金塔人民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与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看到了主体性的高扬和创造性的勃发。金塔历史文化，不仅是金塔人民的骄傲，也是千百年来曾在金塔这块热土上奋斗过的各族人民为人类留下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

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一座城市的文脉和灵魂，也是一个群体文化自信的根基和底气之所在。拂去历史的尘埃，让我们重新认识金塔历史文化，把握其沉雄的脉搏和奇异的风采，探求其至深至远的渊源，寻找重新喷涌的泉脉。

怀古以励志，掩卷当奋发。当前，在全县上下加快推进经济社会转型

提质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组织编纂出版这套《金塔历史文化丛书》，对于进一步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发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强县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进程，更好地宣传金塔、展示金塔，促进金塔对外合作交流，推动富裕和谐美丽活力幸福金塔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是为序。

中共金塔县委书记

中共金塔县委副书记、县长

序 二

高启安

金塔者，农耕牧业交错地带也；金塔者，沙漠绿洲相映奇趣之处也；金塔者，河西绿洲之襟带、丝绸之路之屏障也；自霍去病等驱逐匈奴，始入于中原政权版图。路博德等筑亭障直通玉门（汉代玉门关），汉代长城时而蛰伏、时而跃出沙漠，如同一条长龙，蜿蜒迤逦西向，卫戍、保障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金塔长城一线，功用在焉！然地接沙漠，风寒荒僻，不毛者居多。早期居民，大约戍边将士、罪犯、充发军家属。地土广袤、村落零散，人烟稀少，多集中于黑河两岸，从事着农耕、牧业，演绎着自己的历史。然而，从汉代开始，名字当中却有一个响亮而美好的字——“金”，境内的肩水金关，是汉代河西走廊最重要的关隘，是进出河西、交通南北的咽喉；是汉族与北方胡族交流的重要口岸，又是控扼匈奴要路，堵截北方胡族南下的险关隘口之一，故以“金关”来命名。[①] 近代以来，又由于境内有佛塔，金碧辉煌，遂以之为名，取名金塔县。

看惯了诸多溢美故乡的文章，我对“热土”“地灵人杰”这一类老生常谈的词就有些不屑。然而，就我所知的金塔，用“热土”“地灵人杰”来形容，恰如其分。何以如此认为呢？

金塔县今天的居民，多是清代以来从附近酒泉、高台一带迁来的。然而，金塔却是一块有着悠久古老历史的土地，全县面积多处在孕育河西文

① 李正宇、李树若：《玉门关名义新探——金关、玉门二名互匹说》，《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第122—127页：“‘金关’，即今编号‘EJ遗址’，在张掖西北、居延海南，控扼匈奴要路，置关以制匈奴之暴，故名‘金关’。”

明母亲河之一的黑河中下游，远古时期，就是古人生息繁衍的沃壤热土。在长达800余公里、全国内陆河流第二长的黑河流域，马家窑文化（马厂期）、齐家文化以及四坝文化遗址，灿若星辰。目前发现，在金塔境内，黑河沿岸就有二道梁、榆树井、缸缸洼、火石梁等遗址。这些遗址，是探讨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特别是研究中国早期冶金活动起源、发展与传播，早期农作物栽培及传播，早期动物驯化及传播以及早期欧亚大陆人群交流的关键区域。黑河流域，不仅是河西文明发育的摇篮，也是早期东西文明交流的关键区域之一。2013年8月，在“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与当时尚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沙武田先生一起，抽空考察了缸缸洼和火石梁遗址，被两个遗址上所散布的细石器、夹砂陶片、彩陶片、铜冶炼炉渣、残损骨器等所震惊。沙丘包围的两处遗址上，那些火红色的陶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反射着火焰一样的光芒……其中有目前在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冶炼遗址，在青铜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汉代，路博德等从今金塔东北部的肩水金关一带修筑长城至玉门，金塔一带成为抵御匈奴南下的重要防线，也是汉朝出击匈奴的前哨。李陵、窦宪等出击匈奴，数从此道。《汉书·李陵传》：“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①]《后汉书·窦宪传》：“明年，复遣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将兵击北虏于金微山，大破之，克获甚众。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②]《后汉书·耿弇列传》：“夔字定公。少有气决。永元初，为车骑将军窦宪假司马，北击匈奴，转骑都尉。三年，宪复出河西，以夔为大将军左校尉。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去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

①［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62年，第2450—2451页。

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65年，第918页。

未尝至也。”①

20 世纪在肩水金关、破城子等地出土的数万枚汉简，说明了这一带对保障河西走廊乃至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因此，金塔也被称作“汉简之乡”。

降至隋唐，今金塔一带，仍是防御北方突厥、薛延陀、回鹘等南下扼断河西通道的要害所在，因此，中原政权在此设重兵把守。据《新唐书》卷四十：“县三：有酒泉、威远二守捉城。”②

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谓：“威远城，在卫北。《唐志》：肃州有酒泉、威远二守捉城。”③则金塔自纳入汉朝版图、中原政权对此地实行有效管理以来，一直是重点防御的门户所在。不仅如此，丝路北线“灵州道”过黄河、涉流沙，经黑水城向西达甘州、肃州乃至更西，势必经过金塔地界。

据学者研究，敦煌文书 P.2748《大中四年状》，就是张议潮率众起义驱逐吐蕃统治者后，遣使唐王朝，因当时凉州尚为吐蕃占领，使节只得绕道漠北，循回鹘旧路到达天德军，然后南下灵州，继而到达长安。④而大中十年（856 年）唐王朝遣使赴安西册封，所行路线正是西逾沙碛，沿黑河到今金塔地界，再抵达甘州，经肃、瓜、沙一线而入西域。⑤

《史记·大宛列传》：“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⑥《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莽曰‘设屏’。应劭曰：‘张国臂掖，故曰张掖也。’”⑦

---

①《后汉书》卷十九，第 718—719 页。

②［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045 页。

③［清］顾祖禹著，贺次君等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三，中华书局，2005 年，第 2983 页。

④赵贞：《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 年第 4 期。

⑤孙楷第：《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原载《图书季刊》1936 年第 3 期。郑阿财、颜廷亮、伏俊琏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学卷（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年，第 86—91 页。

⑥［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1959 年，第 3176 页。

⑦［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613 页。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①]《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居延”条下，颜师古注曰：“阚骃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②]实则西汉王朝在河西的一系列战略举措，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凿通西域，张国右臂；二是隔绝羌胡。然世人皆知西汉王朝关于凿通西域“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对后一句“隔绝羌胡”则疏于关注。其实，“断匈奴右臂”和“隔绝羌胡”互为表里，事为两端，势则为一。《汉书》：“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③]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这项策略，终汉之世，一直是汉王朝的重大战略部署。河西走廊南有羌，北有胡，羌胡联络，则丝路隔断，河西不保；河西不保，则河东安定一带为羌胡南窥进犯前哨，则京畿长安一带安全形势骤然紧张。两千年来，关于河西对中原王朝的重要性，不止一次地引起历代战略家们的争论，而东汉末西羌反叛，西晋时鲜卑、羌人作乱，扰乱安定一带，印证了汉王朝“隔绝羌胡”战略决策的英明。

而汉王朝在黑河中下游设置居延都尉府、居延县、居延候官和遮虏障等多个行政、军事建制的治所，修长城至玉门关[④]，正是贯彻汉王朝这个战略的切实举动。“遮虏”“设屏”两词，最能恰当地说明今金塔对维护河西走廊安全、保障丝路畅通的重要性。

宋人王应麟解说“遮虏障”之战略地位重要性甚明：

> 《地理志》：张掖郡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师古注曰：阚骃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武纪元狩二年夏，将军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太初三年

①［汉］班固：《汉书》，第1644—1645页。

②［汉］班固：《汉书》，第1613页。

③［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第3928页。

④“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史记·大宛列传》，第3172页。

夏四月，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天汉二年夏五月，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注，师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韦昭以为张掖县，失之。张掖所置居延县以安处所获居延人而置此县。《李陵传》：天汉二年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注，师古曰：鄣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敌也，河西之未入汉也。霍去病欲攻小月氏，则先望居延而济，乃至天山。李陵欲涉单于庭，必先自居延北出，乃至浚稽，则知居延之出匈奴，乃其要路也。汉既全得月氏之地，立为四郡，则居延又为酒泉要路，故筑鄣其上，以扼其来，名以遮虏，可见其实也。《通典》既于张掖甘州著居延塞，又于酒泉、肃州著遮虏障者，甘州之西即肃州之东虏之来路亘乎两州之境故障塞之设亦亘两境。李陵之军自遮虏障北出，亦望遮虏障南入，可见虏路出入无不由此也。居延塞即遮虏障也。[①]

近期，“玉帛之路”考察团叶舒宪、易华、冯玉雷诸先生通过考察，认定金塔也是玉石进入中原的关口之一，马鬃山玉很可能通过金塔进入内地。考察队曾在金塔见到过出自马鬃山的古玉器。[②]而玉石收藏者也曾在金塔收得和田上好碧玉，印证了叶舒宪先生的判断。

那些裸露的彩陶、石器、铜渣作证，那些掩埋在沙尘废墟中的汉简作证，那些在疾风中岿然迎立的红柳枝干叠压成的长城作证，那些被风掠走沙尘露出的戍边将士的麻鞋残掌作证，那些在民间收藏的玉器作证，缓缓流淌的黑河作证……经历过数千年的金塔大地，不仅是一块维系河西走廊安全的屏障，保障丝路畅通的险关要隘，也是一条丝绸之路的支线，是东西文明交互影响的重要地区，是确确实实的一方热土！

对金塔的详细了解，始于我与敦煌研究院郜惠莉研究员校注的《肃镇华夷志》。三十多年前，我研究裕固族历史文化，无意中发现了极其珍贵的

①[宋]王应麟纂：《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联合影印出版，1987年，第491页。

②叶舒宪：《四坝文化玉器与马鬃山玉矿——第十三次玉帛之路考察（金塔）札记》，《丝绸之路》2018年第1期，第24—31页；易华：《寻玉访古到金塔》，《丝绸之路》2018年第1期，第32—35页。

被我称之为“裕固族专门史”的《肃镇华夷志》，其中不单有裕固族部落、人口等资料，许多迁徙安置恰与金塔有关。原来，明政府初始安置明代中叶东迁的关西诸卫残破各部，并非先安置在今祁连山，而是安置在今金塔县境内。在《肃镇华夷志》中，不仅多次出现“金塔寺”“威远堡”“威虏城”“王子庄”“革力哥失堡”“察黑包堡”等信息，还有“嘉靖二十八年，巡抚都御使杨博奏修筑肃州迤北百四五十里新旧城堡七处，徙环城诸夷于彼住牧”[①]的记载。近数年间，我几乎每年都去金塔，有时是一年两三趟。金塔吸引人的地方，不光是巍峨的卫星发射塔，更重要的是金塔的历史文化、历史遗迹、出土遗物和热情、豪放、自信的金塔人！

第一次与金塔亲密接触是在甘肃省图书馆文献部。当年研究裕固族历史文化，许多个周日，我骑着自行车从位于安宁的甘肃省委党校来到位于城关区的省图查阅资料，总见到一位同样查阅资料的中年男子，数日后搭讪，才知他是兰州大学的校友，在金塔县委工作，来此查阅金塔的相关资料。当时就有些肃然起敬，心目中荒僻的金塔，居然有此文史爱好者。多年过去了，连学兄姓甚名谁都忘记了，但这件事一直记得。

第一次去金塔，由酒泉工作的同学陪同，时任县史志办主任的桂发荣先生接待，领略了金塔人的热情豪爽，最让人感动的是，桂发荣先生赠送了数本有关金塔地方文史的书籍。回兰后仔细翻阅，彻底颠覆了我对金塔边远不毛的印象。

以后，去金塔的次数多了，与金塔县史志办、文物局、博物馆建立了热络的关系，所结识的数位朋友，皆是长于某方面、某领域的地方文史专家。桂发荣先生，有多种著作问世；李国民先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出版了多种金塔风光摄影集，文笔清丽；陶玉乐先生，熟悉金塔历史地理变迁、遗址分布，也有多种著作刊行；而金塔籍的酒泉市文物局局长杨永生先生，更是一位敬业且笔耕不辍的文化人。我曾不时电话向他们请教有关金塔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其间撰写过数篇关于裕固族东迁安置在金塔境内的

①［明］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校注：《肃镇华夷志·附内地住牧番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小文，多赖他们指教、陪同考察。

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涵养，影响、浸润着金塔人，他们演绎着金塔今天的历史，继续着金塔明天的文化事业。金塔虽地近沙漠，但并非文化沙漠，更像是沙漠中的胡杨林般，顽强地展示着盎然的生机和五彩的颜色。金塔县委、县政府的办公楼，在河西走廊可以说是最寒酸的。2013 年会议期间，我曾到过金塔县委书记的办公室，令我吃惊的是，其面积似乎还小于一个宾馆套间，里面摆放着一个两人的旧沙发，我们进去了三个人，有一人只好坐在一个凳子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塔除了别具藏品的县博物馆外，还有民俗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醋博物馆等，文化事业蒸蒸日上。民俗博物馆在一个乡下村委会的大院里，陈列室像模像样，展示有农耕特色、牧业特色以及其他民俗文物。这些，体现了金塔县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县城南郊路旁，有一片鱼鳞状太阳能电池板，在阳光下反射着深蓝色的光，旁边一排整齐的建筑，就是金塔县政府的文化产业区。这些年，金塔县每年举办“胡杨节”，现在，正在修建“两馆两中心”（图书馆 [含档案馆]、博物馆 [含科技馆]、文化活动中心、全民健身中心）。在前往金塔著名的沙漠胡杨林景区的路上，可看到左侧新建的金塔县博物馆、图书馆正在装修。不久的将来，河西地区又一特色鲜明、馆藏丰富的博物馆将出现在金塔县城。我曾亲至金塔著名书法家杨兴年先生墨斋，目睹其挥毫，其字远近闻名。因为研究饮食的缘故，我在金塔还认识了一位酒业公司的经理申青林，他不光是一个酒业老总，还办有一个丝路名酒文化博物馆，陈列有数千种不同时期、不同产地的酒，别具特色。他闲来也挥毫泼墨，练习书法。

地灵者人杰！以上种种，说明金塔虽然自明代闭关以来，作为丝绸之路交通关隘的重要性一度降低，成了边缘地带，但近代，由于巨量汉简的出土，航天城的建设，金塔，这块昔日辉煌的地区，又一次出现在人文历史的视线内，显示出了其悠久古老、底蕴深厚的内力。

这些年，由于薄涉丝绸之路饮食文化研究，我比较注意搜集丝路沿线各地的史料，包括地方志以及地方学者所编辑出版的著作。据我所知，金塔县地方人士出版的著作在全省虽不算最多，但名列河西走廊前茅无疑，这还

不包括许多研究汉简的专业论著。仅我的书架上，就有改革开放后金塔人编辑出版的书籍近 10 种。询诸陶玉乐先生，改革开放后，金塔地方文化人士撰写出版的书籍达到了二十多种。由此可见，金塔人对文化推崇之一斑。

陶玉乐先生，原任金塔县博物馆副馆长、文物局副局长，敏于行而讷于言，专注于文物保护、史志编修及河西历史文化研究，在省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2015 年，调任金塔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几年间，编辑出版了数种地方文史著作。此次，《金塔历史文化丛书》出版之际，征序于我。却之既不恭，应允实勉为。好在这些年对金塔历史、地理、人文稍有了解，聊作以上，不当序言，权充心得。

兰州财经大学教授、甘肃省敦煌学学会副会长、敦煌学博士　高启安

2017 年 12 月 25 日于蜗蛙居

前 言

金塔，历史悠久，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原始人类就在这块古老而神圣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居住在山洞或丛林中，靠狩猎、捕捞、采摘维持生计，并开始制作简单的打制石器、木器和骨角器，学会了火的使用和火种的保存。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境内的原始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到距今5000年左右，金塔先民普遍使用方形、圆形的半地下穴式房屋，开始出现了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制陶业开始萌芽，石器得到广泛使用。距今3900年左右，金塔先民进入青铜时期，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逐渐迈入文明的门槛。

夏、商、周时期，羌、戎、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在这块土地上交相开拓、耕耘，创造了灿烂的四坝、火烧沟等青铜文化，经济社会逐步发展。

秦汉之际，匈奴利用楚汉相争、中原内乱之机迅速发展壮大，逐走乌孙，打败月氏，占据河西一带。过着逐水草、住穹庐、食畜肉、饮奶酪、衣皮革、被毡裳的游牧生活。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兵河西，大败匈奴，占领河西走廊，“据两关设四郡”。元鼎六年（前111年）设立会水县，金塔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范围。为了保证河西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在会水县境内修筑军事设施，派遣重兵把守。为加强军事力量，在会水县内设东部都尉、北部都尉等军事机构，统辖境内各亭、障。此后，西汉王朝大举移民实边，迁中原数万人到会水和相邻的居延地区屯田，掀起了金塔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开发高潮。

西汉末年（8年），王莽篡汉自立，改为新朝（8—23年），历史上称为“新莽”，并进行改制。将会水县改为萧武县。

23年，王莽被杀，天下大乱。时局动荡，地方势力拥兵以求自保，乘

机割据称王，窦融保据河西。窦融统辖河西前后十多年，对金塔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金塔先后被曹魏、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统治。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人口流离失所，而河西一带虽被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交相占有，但总体局势却相对稳定，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繁荣的局面。北凉玄始十年（421年），北凉王子沮渠牧犍在金塔境内修建了土筑围墙，墙高丈余，建筑宏伟，占地百亩的牧庄，史称“王子庄”，促进了金塔经济社会的发展。

隋唐时期，金塔经济社会有了一定发展。“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攻陷甘州和肃州，金塔被吐蕃占领，长达84年。由于民族歧视和阶级剥削，加之吐蕃内部相互残杀，许多老百姓背井离乡，千里河西一片荒凉，金塔经济文化由盛到衰，民不聊生，人口急剧下降。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大败吐蕃，收复河西，举兵归唐，建立张氏归义军政权，金塔进入一个稳定发展时期。

五代及北宋、南宋时期，金塔相继为甘州回鹘政权和西夏政权统治。特别是西夏政权统治金塔长达191年，对金塔的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西夏宝义元年）五月，蒙古汗国军队攻占蕃和郡（肃州），六月攻占镇夷郡（甘州），金塔全境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范围。到1368年元朝灭亡，元政权对金塔统治长达142年。元世祖中统五年（1264年），置甘州路总管府（辖今金塔县东部鼎新片），驻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蒙古至元七年（1270年），置肃州路总管府（辖今金塔县西部王子庄片），驻肃州（今酒泉市肃州区）。元朝把“酒泉北境”（今金塔县境内）视作保障河西的重要军事重地，修城筑障，大力开展军民屯田，促进了金塔经济社会的发展。

明朝时，为了巩固边防，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王朝在金塔境内设立威虏卫和威远卫两个军事机构，并采取了修筑长城和墩台、修建城堡等措施加强防务。修葺金塔寺堡、威虏城、王子庄等城堡，安置从关外迁来的回回、撒里畏兀尔等少数民族。实施“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经

济政策，开展大规模军民屯田，金塔一带农业逐渐恢复，户口逐渐增多，大片荒芜的土地得到重新垦殖，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流通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出现了民族交融、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

清代前、中期，在今金塔县西部增设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分州，在今金塔县鼎新镇、航天镇一带设高台县毛目县丞（又称高台分县）。由于政府实行积极的经济政策和大规模移民屯田、兴修水利，农业开发达到了历史高峰。清代中、后期，采矿、金融开始发展，文学艺术、学校教育大力兴起，引发了金塔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清末，由于政治腐败，内战频繁，导致经济衰退，自然环境恶化，人民生活艰辛。

20 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金塔先后被北洋军阀、国民军和国民政府统治。1930 年，居延汉简的重大发现引起世界轰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加大对交通、农业、教育、能源等基础设施投资，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开始起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大肆抓兵征粮，强征苛捐杂税，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1949 年 9 月，金塔、鼎新两县相继解放。1956 年，金塔县与鼎新县合并为金塔县。从此，金塔县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金塔作为河西与北方少数民族交融的前沿阵地，各民族文化在这里汇聚，综观金塔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的史诗。远古至今，先后有羌、戎、月氏、乌孙、匈奴、突厥、回鹘、鲜卑、吐谷浑、吐蕃、党项、回、蒙古、撒里畏兀尔、满等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或战或守，或进或出，在这块古老而又广袤的土地上，留下了各自的足迹和不同文明的烙印。几千年来，狩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在这里交汇传承，居延文化、长城文化、边塞文化在这里相互激荡，创造了金塔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色，积淀下厚重的历史结晶，向世人昭示了金塔灿烂辉煌的悠久历史，更是我们了解和研究金塔社会发展、风土人情、文明进步的重要依据。

《金塔简史》采取存真求、详古察今、述而不论、以事记史的方法，记述了金塔自远古时期以来，特别是西汉置会水县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2000 多年以来金塔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历程。通过对金塔历代历史沿革

的更替、经济社会发展的兴衰的记录，去见证金塔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演变进程，揭开金塔多彩而又神秘的历史面纱。编著《金塔简史》，也是为了进一步发掘和传承金塔历史文化，展现金塔独特的历史风貌，弘扬金塔时代精神，为广大读者了解金塔，发掘、利用金塔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推动富裕和谐美丽活力幸福的金塔建设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但是，由于金塔地处边塞，历史上战乱纷争，统治政权更替频繁，地方建制变化无常，史料匮乏，考证困难，加之作者历史文化功底浅薄，学识有限，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各方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不吝赐教，并期待后来者弥补增章。

为了便于读者记忆，编者将金塔历史编写了一首三字歌谣，以飨读者：

金塔历史三字歌谣

金塔县，历史悠，四千年，文明久。新石器，先民居，兴农牧，制陶器，古遗址，星罗布。夏朝初，划九州，金塔地，属雍州。青铜业，萌芽起，羌戎族，居其地。经商周，得延续。战国时，乌孙领，秦统一，归月氏。

西汉初，匈奴据。汉武帝，遣骠骑，驱匈奴，到漠北，金塔地，归中原。公元前，一一一，置会水，筑长城，迁移民，垦田地，小绿洲，各业兴。王莽篡，改萧武，东汉初，复旧置。东晋时，又开发，沮渠氏，滋畜牧，王子庄，拔地起，民安定，牧业兴。南北朝（北魏时），会水废，前后历，五百载。

隋文帝，郡改州，金塔地，属甘州。隋炀帝，州改郡，张掖郡，辖其地。唐统一，又改州，金塔地，属肃州。唐广德，吐蕃占，唐后期，回鹘据。宋宝元，西夏立，金塔地，被割据。元朝初，属甘州，元后期，酒泉地。

明洪武，设卫所，威远卫，毛目驻，威虏卫，辖西境。清雍正，移民垦，毛凤仪，劈峡口，鸳鸯池，碧波流，灌田亩，兴农牧，金塔境，百业兴。王子庄，设州同，毛目城，设县丞，安肃道，领全境。乾隆朝，扩堡城，金塔城，始告竣，州同署，迁此处。同治时，修营尔，鼎新城，也告罄。

民国初，一三年，废州同，设县府，金塔县，始成立。鼎新片，设毛

目，二九年，鼎新立。四九年，得解放。五六年，建新置，两县府，二合一，古县城，展新姿。

勤习史，人睿智。史为鉴，知兴衰。祖先辈，奋斗史，后世人，不忘记。新一代，抖精神，弘扬好，老传统，勤俭朴，记心间，爱金塔，建家乡，筑和谐，奔小康。

编 者

2017 年 10 月

金塔县历史沿革表

时期		建制		隶属
		金塔	鼎新	
夏				羌、氐所居之地
商				羌、氐所居之地
周	西周			羌、氐所居之地
	东周			乌孙所居之地
秦				月氏所居之地
西汉		会水县（新莽时改称萧武县）		初，匈奴浑邪王领地
				酒泉郡
东汉		会水县		酒泉郡
三国（魏）		会水县		酒泉郡
西晋		会水县、禄福县		酒泉郡
东晋	前凉	会水县		酒泉郡
	前秦			
	后凉			
	西凉			
	北凉			

南北朝	北魏	并入酒泉	并入张掖	敦煌镇、瓜州、凉州
	西魏	属福禄县		酒泉郡
	北周	属福禄县		酒泉郡
隋		先属福禄县，后改为酒泉县		县隶肃州，后隶张掖郡
唐		属酒泉县	属福禄县	肃州
		实行部落制		766—851 年，吐蕃控制
		属酒泉县	属福禄县	851—911 年，张氏归义军政权控制
五代十国				911—1036 年，甘州回鹘政权控制
宋（西夏）		隶番禾郡	隶镇夷郡	西夏政权统治
元		隶肃州路总管府	隶甘州路总管府	甘肃行中书省
明		威虏卫，后裁卫，并入肃州卫	威远卫，后裁卫，并入镇夷千户所	陕西行都指挥使司
清		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分州（州同）	高台分县（毛目城屯田县丞）	肃州直隶州
中华民国		金塔县	毛目县、鼎新县	先后隶属安肃道、安肃行政区、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酒泉专员公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塔县	鼎新县	酒泉专区
		1956 年，金塔县与鼎新县合并为金塔县		张掖专区
		并入酒泉市（1959—1961 年）		直属甘肃省
		金塔县（1961—1978 年）		酒泉专员公署
		金塔县（1978—2002 年）		酒泉地区行政公署
		金塔县（2002 年至今）		属酒泉市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金塔

第一节 远古时期 2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 4
第三节 夏、商、西周时期 7
第四节 古老神话传说中的金塔 16
第五节 春秋、战国时期 22
第六节 金塔境内的古老民族 28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金塔

第一节 匈奴对金塔的统治 35
第二节 与金塔有关的汉匈战争 38
第三节 会水县的设立 41
第四节 西汉对金塔的设防 45
第五节 新莽时期的萧武县 47
第六节 东汉窦融经营河西时期的金塔 51
第七节 两汉时期的金塔人口 54
第八节 两汉时期的金塔经济 57
第九节 两汉时期的金塔教育文化 62
第十节 两汉时期的金塔生活习俗 68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塔

第一节　曹魏时期……74
第二节　晋与十六国时期……77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88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塔人口……92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塔经济社会状况……94
第六节　考古发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实物……98

第四章　隋唐时期的金塔

第一节　隋王朝统治下的金塔……103
第二节　唐王朝统治下的金塔……107
第三节　吐蕃占领时期的金塔……112
第四节　张氏归义军政权统治下的金塔……114

第五章　五代宋夏时期的金塔

第一节　甘州回鹘统治时期……118
第二节　西夏统治金塔……122

第六章　蒙元时期的金塔

第一节　蒙元政权占领金塔……127
第二节　元代的统治措施……131

第七章 明朝统辖时期

第一节 军政建制 137
第二节 明代在金塔的防务 139
第三节 关西诸卫部众在金塔的安置与流散 147
第四节 明代时金塔的民族与人口 153
第五节 明代金塔的经济与文化 156
第六节 明代金塔的宗教活动 164
第七节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与金塔 166

第八章 清代的金塔

第一节 清朝统辖金塔 171
第二节 清代对金塔的移民开发 177
第四节 清代金塔的水利开发 181
第五节 清代的金塔经济社会发展 186
第六节 清代金塔的宗教 199

第九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金塔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金塔 206
第二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209
第三节 国民党在金塔的统治措施 211
第四节 民国时期金塔的行政建制与党团组织 214
第五节 警政与民众武装 221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经济 223

第七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教育 234
第八节　民国时期金塔的文化 238
第九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人口 245
第十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宗教 247
第十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金塔的早期活动 250
第十二节　金塔、鼎新两县和平解放 253

金塔历史大事记 261
参考文献 281
后　记 283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金塔

金塔是中国最早的古生物繁衍生息和人类活动地区。在金塔北山地区，发现了大量古老的藻类化石和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侏罗纪化石以及中生代鸟类化石。距今约1万年前，金塔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学会了制造石器、木器和骨角器，学会了烧制陶器，知道保存火种，学会了用火烹煮食物、加工工具，开始筑房定居的群体生活。部落组织由母系氏族公社逐步进入父系氏族公社。这个时期相当于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的“三皇”时期。距今6000多年前，磨制石器大量出现，开始烧制红陶罐和彩陶罐，用兽毛或树叶、草藤、苇草和鸟的羽毛连缀在一起披在身上。距今3900年前后，金塔开始进入青铜时期，铜器大量出现，磨制石器更加精细，陶器纹饰更加精美，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升。

从公元前2070—前221年，中原地区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演化。金塔先民度过了漫长的19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早期青铜时代，氏族部落不断迁徙、发展、交融，氐族、羌族、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先后在这里生存、繁衍和发展。

第一节　远古时期

根据地质结构解剖分析，金塔境内北山一地的地层以中新生界为主，盆地四周边缘出露上古生界及元古界，地层发育由老至新出露有震旦纪中统、奥陶—志留纪、石炭纪下统—中统、二叠纪下统、三叠纪上—中—下统、侏罗纪中下统、白垩纪下统、第三纪上新统、第四纪。该区域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地质队、甘肃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等单位多次测量，采集有大量的古生物（包括古脊椎动物）化石，经北京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南京古生物研究所鉴定，该区域产极丰富的动植物化石50多个种属，动物化石有Carnosauriaindet食肉类恐龙、Coelurosauria indet虚骨龙类尾椎肋骨，Sauropoda rudet蜥脚类恐龙的尾椎，Ankylosauria indet甲龙类的趾骨、肱骨等。这充分说明，这一带的地层结构形成于距今8亿年左右的元古代震旦纪。这一时期陆地大部分被海洋占据，到了晚期，由于地壳运动剧烈，海陆逐渐分明，藻类生命已开始在海洋中发展。后来，随着大地构造性质不断发生变化，陆地面积不断扩大，生物开始繁盛起来，尤其是三叶虫特别密集。再后来脊椎动物、植物、虫类生物不断增多，呈现出多样性。

到了距今约2.5亿年至距今约6500万年，是地质年代的中生代。2002年甘肃省博物馆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金塔、玉门等地的中生代地质进行科学考察。在金塔县境内的白城子地区发现了十多具禽龙化石骨骼，最完整的一条保存了恐龙骨骼的70%以上，体长达9米多，是目前甘肃境内发现的最完整的一具恐龙化石骨架。同时与禽龙化石共同埋藏在一起的还有爬行动物龟类、软体动物螺类等。说明金塔在白垩纪早期埋藏的禽龙是生活在湖滨地带的。这一地区当时应该是植物茂盛，沼泽

森林遍布，恐龙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煤矿开始形成。白垩纪末期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导致恐龙大灭绝，大地陷入一片寂静。距今6500万年左右，进入地质历史上的新生代时期，其中包括第三纪和第四纪。这一时期，由于地壳不断运动，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海陆分布，植被带分化日趋明显，哺乳动物、鸟类、真骨鱼和昆虫一起统治了地球。

在距今1.2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末，金塔境内开始有人类活动，他们居住在山洞或丛林中，靠狩猎、捕捞、采摘维持生计，并开始制作简单的打制石器、木器和骨角器，学会了火的使用和火种的保存，产生了最早的人类社会组织——血缘家庭，语言开始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

距今1万年左右，金塔境内的原始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先民已开始磨制石器，形式多样，用途转移。很多石器钻孔安上木柄，制成复合工具，证明人们掌握了钻孔技术。距今5000年左右，金塔先民普遍使用方形、圆形的半地下穴式房屋，亦有挖基打墙的地面建筑。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器和墓葬中，发现粟粒等植物种子，说明金塔已有了原始的种植业。从古墓葬中，发现有大量羊头、羊骨等随葬品，并伴有猪骨、牛骨、马骨和狗骨，这说明人类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不断改进狩猎的工具和方法，捕获动物增多，开始了“拘兽以为畜”，并加以驯养的早期畜牧业。这一时期，多数遗址有陶窑，陪葬物中有大量的彩壶、瓮、罐、瓶、碗、盆、钵、盂等陶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胎薄面光，说明制陶业已趋于成熟。男性墓葬中多是石刀、石斧，女性墓葬中则多是纺轮，说明当时金塔境内的先民已出现了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

文化遗存

金塔境内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文化特征与整个甘肃地区的文化特征基本相同。从目前发掘情况看，金塔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是马家窑文化晚期马厂类型，距今4300—4000年。

马家窑文化遗存所展示的社会进步程度，达到了甘肃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之前的最高水平。综观马家窑文化遗存各方面情况，可以初步做出这样的判断：马家窑文化开始了母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至少发展到晚期，即马厂类型时，对偶家庭已相当稳固，父系氏族社会基本确立。以农业与畜牧

业相结合的经济形态为基础，又以灿烂的彩陶艺术为其文化特征，在跨时千年的演进历程中，分布地域日渐扩大，显示了甘肃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的趋同性。

金塔境内发现的马家窑文化均为马厂类型，代表性遗址有缸缸洼遗址、火石梁遗址（均包含有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因素）。马厂类型属于马家窑文化晚期，因最早发现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塬而得名，距今4350—4050年，分布范围向西发展到酒泉市肃州区、金塔县、玉门市、瓜州一带。其陶器纹饰较马家窑类型有所简化，数量减少，制作也逐渐粗糙，但种类则较前繁多，有的器物口沿上还钻有便于携带的小系孔，其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

在缸缸洼遗址和火石梁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磨制很精细的石刀、石斧、石镰、石锄、石凿等生产工具和刮削器及石片、石核等细石器，并有大量的绿松石、贝壳和铜器残片。在缸缸洼遗址内发现窑址4处，均已坍塌。四周遍布夹砂红陶罐和彩陶罐残片，部分陶器形状、花纹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社会组织形态

随着锄耕农业发展，人们开始逐渐定居。形成较大的村落，一般在河流中上游，离河岸较远、地势较高的台地上，水源便利，生产、生活方便，居住安全。住宅形式以半圆或方形半穴居比较盛行，房屋的功能也有初步区分，出现了较为大型的房屋，表明已经有较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场所。

新石器时代金塔境内原始居民的生产力水平已有较大提高，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增多，这使人们有剩余时间从事社会活动，因此有可能形成一定的社会组织。农业的初步发展，为原始人类提供了较为充足的食物，通过狩猎、捕鱼、采集等方式，也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这使原始人类能够在一定区域逐渐定居，形成聚落，开始出现简单的集体生活形式。

这时的社会组织以原始共产制为所有制形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组成氏族公社。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开始由氏族公社

向家族公社转变。随着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劳动效率提高，社会剩余产品逐渐增多，部落首领有了更大权力，产品分配不均衡现象开始出现，社会出现等级差别，开始向等级社会迈进，离文明时代越来越近。

社会经济状况

新石器时代末期，金塔境内的经济社会水平有了较大发展。农业开始发展起来，先民们在地势平坦、土质较好、水源充足、环境相对稳定的河谷冲积平原上，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用石锄翻土，播种庄稼，用石刀、石镰等收割庄稼，用石斧砍断树木，用石锤切断、打制石器，并经磨制等方法，对石器进行二次加工，制造精细的石器。

狩猎、采集、捕鱼作为农业的补充，依然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狩猎的手段，可能主要是用“石球”打击，在集体的配合下，猎取野鹿、野猪、野牛等动物。采集活动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春天采集野菜，秋天采集胡桃树上的胡桃和灌木林中的野果，或挖取可食的植物根茎。用这些采集到的东西补充食物和调剂饮食。

畜牧业开始萌芽，人们开始饲养家畜补充食物的不足。

由于定居和群聚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简单的陶器加工。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人们学会了磨制石器，制作更加精细。还有用鸟兽类骨头制成的骨器和蚌器，骨锥、骨针、骨凿、蚌刀等，制造劳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学会了烧制陶器和制作装饰品，一些先进的手工技艺不断被人们认识和掌握，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简单的纺织开始出现，如织渔网等。

人们利用自然洞穴的同时，学会了挖洞建造半穴居的房屋，用来遮风挡雨，抵御严寒，防止野兽袭击。新石器时代房屋建筑，经历了由半地穴或地穴到地面建筑的过程。

生产工具有很大改进，精细的磨制工具被大量生产和使用，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使人们能够获得相对充足的食物，在满足需要之外，还略有剩余，私有产品业开始出现，氏族聚落逐渐形成，进入氏族社会。

第三节　夏、商、西周时期

夏、商、西周三代，从公元前21世纪起到公元前8世纪，纵跨13个世纪。是中国奴隶社会形成、发展并走向鼎盛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明日臻繁盛，开始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价值取向和发展路径的历史时期。

历史沿革

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国家政权的朝代，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从夏禹开始到夏桀灭亡，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共传13世、16王，历时470年。我国最古老而又比较准确的地理书籍《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中有关夏朝“九州”的记载，可以得知金塔属当时的雍州。

公元前1600年左右，殷商灭夏之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商。商王朝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由汤至纣共传17世、31王，历时550多年。商朝以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甲骨文和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著称于世。商王朝所控制的地域，大体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商时，国家性能及形式有了很大的进步，除了狭义的“国”，即以都城为中心的王畿之外，封国属邦的治理体制，还是以传统的族权为基础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西部反商势力组成的联军，由孟津渡过黄河，直扑商都朝歌。纣王兵败后自焚而死，商王朝灭亡。

西周王朝的年代为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共传11世、12君，历时275年。其控制的地域范围西到陇山，北到今河北，东到大海，东南到淮河流域以南至长江下游，南到汉水、淮河流域。西周，也是我国奴隶

社会发展到极盛和开始衰落的转折时期。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封邦建国，家国同构，制礼作乐，首倡“明德、慎罚、保民”，创立了垂范华夏两三千年、影响远播域外的中华礼乐文明。

社会形态

夏、商、西周时期，金塔先民和中原地区一样，已基本结束野蛮时代，迈入人类文明的门槛，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后期则过渡到青铜时代。

夏代，金塔一带大体生活着两种部落和人群，即夏王朝所称的“氐、羌”。

氐人，即定居于河谷、平川等较低地带，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耕部落人群。他们以固定农业为主，兼营饲养业，也进行狩猎活动；他们继承了马家窑文化的冶炼技术，形成了冶炼和制造红铜、铅铜、青铜等多种铜制品的冶铜业，还有制陶业和家庭纺织业。他们的居址为方形或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使用白灰面装饰墙壁。他们实行土葬，有氏族公墓，葬式多样；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父权制发达，女性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贫富悬殊，私有制逐步确立，正向奴隶社会过渡。在社会组织上，由父权制大家族组成部落，为解决部落间的种种矛盾和必要时抵御外侮，逐渐形成由多个部落结成的部落联盟，既是政治联盟，又是军事联盟。

羌人，即在草原、山地以畜牧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游牧部落人群，包括与农耕部落接壤并实行定居的半牧半农人口。“羌”是甲骨文中唯一一个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是中国人类族号最早的记载。他们居无定所，以氏族部落为社会组织形式，逐水草而从事放牧羊、牛等牲畜的畜牧业生产，兼有狩猎、采集活动，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也从事简单的农业种植。他们与农耕部落的“氐”族相比，由于生活条件较为艰难，在整体素质上低于“氐人”。而且，由于他们长期与“氐人”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相互通婚，互相学习，互相渗透，开始酝酿创造与他们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化，并终于在夏代后期创造出了先进的酒泉火烧沟文化。《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火烧沟墓葬中出土的四羊头铜权杖杖柄、羊头柄彩陶方杯，尤其是随葬羊骨，都

体现出了典型的羊文化特点。

当时的金塔，社会发展阶段虽已出现奴隶制，但军事民主制仍占很大成分。社会组织结构较小，主要是核心家庭和血缘家庭。部落内部出现了阶级对立和斗争，出现了专职的军事首领，设立了由氏族部落首领、军事领袖、宗教祭司组成的管理机构，负责处理日常的事务，重大事件则由民众大会决定，还没有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机关。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产生了阶级压迫和剥削，进入了早期的阶级社会。在氏族中出现了氏族贵族和特权阶层，他们拥有着比一般氏族成员更多的财富和权力，这就为阶级和奴隶制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最初出现的阶级和剥削，是家长奴隶制或家内奴隶制。在铜石并用时代，由于人的劳动产生价值，开始把战俘、养子作为奴隶。不过家长奴隶制下的奴隶主和奴隶都是很少的，家长一般不脱离劳动，也不歧视劳动。奴隶往往被吸收到家庭中，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和其他成员一起劳动。最早被奴役的都是外部落、外氏族的人。随着氏族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才出现了奴役本氏族成员的现象。家长奴隶制是奴隶制的雏形，在阶级对立的程度上处于萌芽状态。奴隶已成为主人的私有财产，奴隶主不仅占有其劳动，还占有其人身。私有财产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扩大，同时奴隶主利用奴隶劳动也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人们对财富和奴隶的渴求也就愈来愈强烈。原始社会开始向阶级社会转化，迈入国家和文明的门槛。

综上所述，夏商周时代的金塔，由于地处偏僻，物质文化和生产活动受到影响，社会发展缓慢，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氏族部落和军事联盟是以分散无主导的自然发展形成，偏离了由多样性到统一性发展的进程。由于文化发展滞后，整个西北地区都没有形成以国家形态为特点的社会组织结构。

文化遗存

夏、商、西周时期，金塔境内孕育着特征明显、地域性较强的青铜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坝文化。

四坝文化因最先发现于山丹县四坝滩而得名。四坝文化的分布，主要

在河西走廊的中部和西部祁连山以北地区，东起山丹，西至新疆哈密盆地，北及黑河下游，南涉疏勒河中上游一带。考古资料表明，四坝文化晚于马厂类型文化，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当地文化的交融，并受到齐家文化和来自北方的某些文化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支青铜文化。

金塔境内四坝文化类型的古遗址迄今发现了十多处，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处：



缸缸洼遗址

缸缸洼遗址：位于金塔县大庄子乡永丰村东南7公里处的沙漠腹地。遗址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50米，面积约7.5万平方米。由居住区、制陶区、窖藏区、墓葬区4部分组成。遗址地表密布夹砂红陶片、彩陶片和破碎石器，并有少量灰陶残片。遗址东部为窖藏区，夹砂红陶、彩陶残片堆积如山，覆盖层厚度为0.3～0.9米。遗址中西部为制陶区，残存烧制陶器的窑址四座。一号窑长宽各1米；二号窑残底呈圆形，直径1.4米；三号窑长2米，宽1.5米，炉门南开，门口宽0.3米；四号窑仅存灰层，范围模糊，灰层中有木炭残块。遗址西部是墓葬区，多为竖穴土坑墓。198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和征集的文物有双耳彩陶罐、双耳盆、石刀、石斧、石纺轮等69件。陶罐壁薄而硬，造型美观，带有人字形或菱形黑色陶纹。石器通体磨光，多穿孔。从遗存的窑址和大量残陶片看，这是一处陶器烧制作坊，其文化类型主体属四坝文化，兼有少量马厂文化类型的遗物，距今约4100—3600年。自发现至今，共采集陶器22件、石器300余件、骨珠两串。2013年，缸缸洼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火石梁遗址：位于金塔县大庄子乡头墩村九组东北14公里处的戈壁沙漠中。遗址东西长350米，南北宽270米，面积约9.5万平方米，由制陶区、墓葬区和冶铜址3部分组成。地表遍布夹砂红陶片、彩陶片和少量细泥红陶片。远眺，整个遗址如烈火般通红，故名。遗址内发现和采集有陶器、石刀、

石勺等。石器通体磨光，制作精细，陶器类型多样，有精细的几何花纹，既有夹砂素面红陶片，又有细泥薄壁蛋壳陶、蓝纹陶片，其文化类型主体属青铜时期四坝文化，兼有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距今约4100—3600年。遗址内灰堆中有大量的炭结块、孔雀石和碎铜片，文化层厚度为0.3~2.2米，并出土有类似冶炼工具坩埚的两把石勺。这些充分证明，这是一处青铜时期的陶器烧制作坊和青铜冶炼场遗址。2013年，火石梁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道梁遗址：位于金塔县大庄子乡牛头湾村东北13.7千米处的沙漠中。遗址分布呈长方形，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00米，总面积6万平方米。地表散见有大量夹砂红陶片及少量红衣黑纹彩陶片，并暴露有刮削器、矿石、黑釉渣等物。遗址中心台地上有一南北宽2米、东西长4米的冶铜址，冶铜址东南10米处有一灰堆，呈圆形，直径3米，其东南20米处另有一处灰堆，呈圆形，直径10米，地表有铜锈块、炭烧结块等。采集有夹砂素面陶罐、夹砂彩陶罐、石器等遗物，根据采集标本的特征分析，为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遗存。2011年，二道梁遗址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山堂古铜矿遗址：位于金塔县白山堂铜矿（现名亚泰有色金属公司）西北2.2公里的低山丘陵地带。遗址南北长382米，东西宽185米，总面积27925平方米。在遗址中心位置遗存有原始矿坑一座，南北长19.7米，东西宽9.1米，深4.8米。矿坑壁面有原始工具凿挖的痕迹，四周散见铜矿石和磨制的开采用的硬石工具。石器通体磨光，制作精细，有石凿、石锤、石斧、石刀等。地表残留有极少量的红陶残片。在矿坑东南约200米处的一座丘陵山上，发现大量用于打制开矿石器的硬石块，虽已风化但石质坚硬，并在山坡地带发现已打制好的原始石器。据考古专家从遗物判断，属于骟马文化类型。这处古代铜矿遗址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以及文化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对探索中国冶金史和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2011年，白山堂古铜矿遗址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个地窝遗址：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270米，南北宽150米，总面积4.05万平方米。在遗址中心有一半地穴式房屋遗迹，呈正方形，边长4.5米，房

屋中心有一灶坑，呈圆形，直径1米，灶坑底部有红色烧结层。房屋东南6米处有一石块堆，中心有火烧迹象。遗址中心风蚀台地沟壑纵横，夹砂红陶片遍布，有少量红衣黑纹彩陶片，属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类型，它为研究金塔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的文化聚落分布提供了新的资料。

这些遗址均未经正式发掘，但其遗址内暴露有大量的陶器、细石器、打制及磨制石器、骨器以及碎铜块、铜矿石等，从这些遗物的特征看，它们的主体遗存都与四坝文化雷同，兼有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因素。

四坝文化的房址为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式两种：半地穴式均为长方形，地面经硬化处理，并有1个至数个烧烤坑和数个储藏坑；平地起建式房址较复杂，多为长方形。储藏坑和烧烤坑形制多样。陶窑为4座一组，窑室多呈圆形，这一点与在缸缸洼遗址内发现的4座陶窑相吻合。四坝文化的房屋遗迹，在金塔境内仅在一个地窝遗址内发现，为半地穴式，呈正方形，边长4.5米，因未经正式发掘，具体建筑结构不详。但房屋中心有一灶坑，呈圆形，直径1米，底部有红色烧结层，这很有可能就是烧烤坑。房屋东南6米处有一石块堆，中心有火烧迹象，推测可能是当时祭祀用的。

在缸缸洼遗址内发现有墓葬，暴露有人骨、兽骨、陶器残片、铜器、玉器残件和绿松石珠、玛瑙珠、贝蚌品等珍贵饰物。该遗址未经正式发掘，墓葬具体形制、葬制和随葬器物不清，但从与此文化类型相同的酒泉火烧沟、干骨崖等遗址清理和发掘的墓葬看，墓室常见的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竖穴偏洞墓或带龛墓。部分墓有木质葬具。葬式以仰身直肢单人葬为主，其次是二次扰乱葬，也有侧身屈肢葬与合葬。合葬墓人数2～6人不等，以成年男女二人合葬居多。此外也有一男二女或一女二男的合葬墓，和齐家文化墓葬情况类似，这应当是一夫一妻制形成过程中多种婚姻形态并存的现象。还有一些被认为是父子合葬墓，反映了父系家族制的存在。墓向无序，东西向和南北向都有，东北向与西北向的比例较大。随葬器物情况不尽相同，以陶器为主，数量相差悬殊，少者仅1件，多者达19件。少数墓的随葬品中含金、银、铜、玉器和绿松石珠、玛瑙珠、贝、蚌品等珍贵饰物。盛行以羊、猪、狗、牛、马等畜类为随葬品，尤其是羊和猪十分普遍。个别规模较大的墓葬存在人殉、人祭现象。墓葬中已有明显的贫富分化，成年男女二人合葬

墓的大量存在，表明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已相当稳固。人殉、人祭现象的存在，显示出贵族政治体制已露端倪。种种迹象说明，四坝文化时期社会已处于父权制下的军事民主阶段。

经济活动

夏、商、西周时期的金塔，农业生产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在金塔县境内，好多古遗址中，有大量堆积的陶器残片，并出土了许多陶器，这是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力佐证。因为在古代社会，农业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就无法保证大规模的制陶等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行。考古学资料表明，四坝文化中发现有一系列的石制农具，用于生产的各个阶段。在金塔境内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中，均发现有大量生产工具，其中既有石器、骨器、角器和陶器，也有铜器。生产工具的多样性，反映出夏商周时期，金塔农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在这一时期凸显出来。据兰州大学在缸缸洼遗址和火石梁遗址取样考古表明，至迟在距今 4000 年以前，即夏朝时期，金塔就种植有大麦、小麦、黑麦、粟、稷、高粱等多种农作物。还种植诸如核桃之类的果木和用于纺织的麻类作物。多种农作物的栽培种植，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为制陶、酿酒等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家庭饲养业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家畜品种主要有猪、狗、马、绵羊、山羊和家鸡。猪、狗与鸡的驯化和家养，说明这时的先民已定居。家庭饲养业的发展推动了畜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缸缸洼和火石梁遗址内发现死者殉牲的现象，种类有牛、羊、马、狗、猪，尤以羊骨发现为最。这一情况说明，当时金塔的畜牧业是相当发达的，而且是最主要的经济门类。各式骨镞、石镞、铜镞和箭杆、陶球、石球等器物的出土，又显示出狩猎仍是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

青铜冶炼和铸造

青铜器的发明和制造，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它直接导致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历史性飞跃，把人类由蛮荒时代推向文明时代。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我国青铜冶铸的起源地，而酒泉境内有色金属矿藏丰富，高度发达的制陶业又培育出了创造高温的方法，这是青铜冶铸较早兴起的物质和技术条件。

金塔在远古时代，山川秀丽，矿藏丰富，铜矿是先民们最先发现的宝藏。由于先民们有熟练的制陶技术，对火候的掌握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因此冶炼铜矿石已不成问题。起初，他们只能冶炼红铜，后来可以用这些红铜锻造各类小型的器物，但是要制作成生产工具，硬度还不够。在较长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对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在铜中加入一定含量的砒石，冶炼成砷铜，成为铜砷二元合金，或加入锡石，冶炼成锡青铜，或在铜中加入一定含量砒石、锡石，冶炼成铜砷锡三元合金。在制造铜器过程中，开始以锻造为主，在热锻后又进行冷锻加工，以后又有了用范模铸造或复合铸造等复杂工艺。尽管金塔处于河西走廊西段，与东部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但终究由荒蛮时代迈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铜石并用时代，铜器在金塔已开始使用，有青铜、砷铜和红铜制品，基本上以小件工具和装饰品为主，大型容器为数不多。到青铜时代，中原王朝（包括西北东部的关中地区）已经有了极为发达的青铜冶铸工艺，器型和种类繁多，工艺精湛，花纹精美，达到了青铜发展的巅峰时期；西部地区的金塔，金属冶铸的工艺水平也达到了当时西北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一是铜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除了小件铜工具和装饰品之外，也生产了铸造精美的铜器。二是在青铜器的制作方法上，除小件工具仍然使用锻打外，铜容器已使用了范铸，形制复杂的铜器还使用合范法铸造。

夏朝出现的四坝文化时期，青铜冶炼渐趋成熟。大量的青铜随葬和铜镞的出现是其主要表现，以铸造占主导，兼有热锻和冷加工工艺。生活在四坝文化时期的金塔先民在大量使用磨制石斧、石刀、石砍砸器、石刮削器、石锄、石凿、石磨棒等石器的同时，开始制造铜器。据考古发现，金塔先

民在距今4000年至3600年前（相当于夏朝时期）就已经熟练掌握冶炼技术。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金塔县境内发现了两处遗址，即火石梁遗址和缸缸洼遗址，并有大量的铜矿石、铜碎块、炭结块和孔雀石。这些文物证明，这是两处青铜时代的陶器烧制作坊和青铜器冶炼场遗址，属四坝文化类型，距今4100—3600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又在县境北山发现白山堂古铜矿遗址，遗址中心位置遗存有原始矿井一处，南北长19.7米，东西宽9.1米，深4.8米，矿井壁面有原始工具凿挖痕迹。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中科院的专家实地考察，该遗址属青铜器时代的四坝文化类型，距今4100年至3600年。前有冶炼遗址，后有铜矿遗址，专家分析认为，火石梁遗址和缸缸洼遗址的冶炼铜就来源于白山堂古铜矿。相隔20年的两次重大发现相互印证，不仅进一步表明金塔先民在距今约4100年至360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冶铜技术，同时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进入了铜石并用时期。古铜矿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北方古代铜矿开采、选矿、冶炼、铸造技术及发展水平提供了实物证据，同时也为研究古代冶铜业的萌芽和发展状况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由于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差距，西部地区错过了与中原地区相继进入文明社会的时机。中原地区建立起强大的中央王朝很久以后，金塔乃至西部地区仍处于众多民族迁移流动、未能形成文化趋同中心的落后状态。与这种缓慢发展的社会形态相对应，这一地区的青铜制造也进展缓慢，有些文化类型的青铜工艺较齐家文化有所进步，但终难跨过齐家文化所代表的那个青铜制作的低级阶段，产品仍以小件器物，如工具、武器、饰件等为主，极少发现青铜容器，更不用说成套的礼器了。青铜业只沿着制造兵器的方向发展，这也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水平。以畜牧业为主体的经济，无法形成大规模青铜冶铸的生产力，也很难培养出一批专门从事青铜制造的技艺精湛的工匠。而且，不存在以严整贵族体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环境，也就不可能产生对青铜容器和礼器的强烈需求。这种种因素都使得金塔土生土长的青铜冶铸业，在年幼期即陷入了停滞和枯萎。

第四节　古老神话传说中的金塔

关于颛顼巡狩居延的传说

颛顼是五帝之一。古代儒者对五帝的搭配，由于看法不一，搭配不尽相同。但是，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孔安国，也无论是郑玄还是皇甫谧，他们各自论述的五帝中，都有颛顼。这就是说，颛顼是大家公认的帝君。《史记·五帝本纪》称他为“帝颛顼”。

帝颛顼也代表一个时代。

帝颛顼是黄帝的孙子。黄帝正妃嫘祖，生有二子：嚣器与昌意。嚣器生娇极，昌意生颛顼；黄帝崩，孙子颛顼即位，这就是帝颛顼。

《史记·五帝本纪》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意思是说：颛顼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他沉静稳练而有机谋，通达而知事理。他养殖各种庄稼牲畜以充分利用地力，推算四时节令以顺应自然，依顺鬼神以制定礼义，理顺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民，洁净身心以祭祀鬼神。他往北到过幽陵，往南到过交阯，往西到过流沙，往东到过蟠木。各种动物植物，大神小神，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全都平定了，没有不归服的。

颛顼往西到过的流沙，《汉书·地理志》载“在张掖居延县”。唐《括地志》也载：“居延海南，甘州张掖县东北千六十四里是。”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古有居延泽，亦称居延海，在张掖汇聚了弱水（今山丹河）与羌谷水（今黑河）的河水流注此海。此海处于巴丹吉林沙漠西侧的沙漠中。

羌谷水（末段又称弱水）在沙漠流经处，形成了一条绿色长带。这条长带，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民族南下河西的通道，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居延道”。

古时的居延，包括金塔境内的鼎新一带。帝颛顼西至流沙，就是西到居延，也就是到了金塔。他不怕路途遥远，不顾仆仆风尘，到金塔，到居延，不是怀旧，而是辛劳地勤政，是对金塔的关怀，是对金塔枢纽地位的重视。

关于大禹治弱水的传说

大禹也叫夏禹，是“帝颛顼高阳”的孙子。《新语》中说：“大禹出于西羌”，是西部人。禹前之“大”，是后世人表示尊敬而加的。

相传，尧舜禹时期，弱水泛滥，洪水滔天，淹没庄稼，冲毁房屋，冲走牲畜。于是，大禹率众人治水，劈开合黎山，使洪水下泄，流经金塔鼎新绿洲后进入居延一带低洼地，形成居延海。并在弱水两岸，开沟疏导，使两岸大片土地变岁田。

弱水，就是今天的黑河，是河西地区最大的内流河，发源于祁连山走廊南山南坡甘、青省界附近的白沙沟脑海拔 4400 米处至海拔 1750 米处的鹰落峡口，中上游名甘州河或张掖河，进入张掖盆地称黑河。在走廊北部遇龙首山阻挡而转向西流，至高台镇夷峡出合黎山与金塔南山间的缺为下游，经金塔盆地至鼎新有讨赖河（又名北大河）自西向东汇入，称额济纳河。我国最早的地理文献《尚书·禹贡》篇，就有“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的记载。

合黎，就是今天甘肃省金塔县东部的合黎山，黑河北流遇龙首山阻拦而西流，到甘肃高台县镇夷峡出山进入金塔盆地。镇夷峡两岸峭壁高耸刀砍斧劈，相传为当年大禹所开，崖壁上似有斧凿痕迹。流沙即今天内蒙古西部与甘肃交界地区巴丹吉林沙漠，弱水末端即进入沙漠地带，居延海为黑河尾闾湖，分为东、西两个。因沿途筑坝拦水灌溉，下泄水量急剧减少，生态环境恶化，20 世纪 90 年代初，东、西居延海相继干涸。20 世纪 90 年末期开始，为拯救下游生态环境放水下泄，湖面部分恢复。

由此证明，在大禹时代，金塔一带的河谷绿洲上，早期先民们开始利用便利的水资源，开沟引水，灌溉农田，早期绿洲农业生产已具一定的规模。

周穆王西巡的传说

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曾经西巡到达昆仑山，会见西王母后西至塔里木河流域。据《晋书》记载，279 年，在汲县魏安襄王墓中出土《穆天子传》记述了周穆王（前 1001—前 947 年）“西征犬戎，国二十”，直到极西处会见西王母的传说故事。这个故事《竹书纪年》（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原本写在竹简上而得名。晋成宁五年即279年，一说太康元年或二年，280 年或 281 年，在战国汲县魏王墓中发现。共二篇，叙述夏、商、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和《史记》都加采录。《纪年》卷下周穆王条：“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史记·秦本纪》《史记·赵世家》记周朝第五代国主周穆王姬满，曾命御者造父，驾八骏，率六师，雄心勃勃，巡游西方，得见西王母。这些记载虽然带有传奇色彩，但是多少能反映出远在公元前 10 世纪黄河流域与中亚之间的某种联系，尤其是《穆天子传》一书如同旅行日记，行程日期、道路方向、山川地理、风土人情，逐一列数，记载清晰。

书中记载，周穆王自宗周（洛阳）启程后，先向北涉漳水，越轵山至河套以北，然后向西，绕道山西和陕西北部，向西南下到青海，经乐都、积石再向西，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循叶尔羌河、塔里木河到库车，再越天山，经特克斯河谷到伊犁河边。“乙亥，天子东归”，返伊犁，到焉耆，走的约是汉代丝绸之路北道。穆天子西巡，一去一回，基本循的是以后开通的丝绸之路南北大道。说明早在信史记载丝绸之路南北线路之前，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存在，它们的开辟和使用靠的是羌人、塞人、月氏、乌苏等一批又一批古代游牧民族。后来，西汉时的张骞通西域，大体上就是沿着周穆王所走的路线西进的，这条路被人们称为老北道。

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在《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一文中认为《穆天子传》第一卷主要记述周穆王十三年西巡黑河流域的情况。说周穆王于该

年三月二日进入“焉居、禺知之平”，岑仲勉认为焉居即义渠，禺知即月氏，义渠居于今武威一带，月氏居于今张掖、酒泉一带，“焉居、禺知之平”即甘、凉、肃三州富沃之平野。初四日到达河宗子孙蒯柏絫所居的蒯邦，蒯邦即在今张掖一带。十一日穆王继续西行，到达阳行之山河伯无夷的都城（约在今高台县境）。在河伯无夷的陪同下，继续向燕然之山（当指合黎山）进发。中途受到另一大首领河宗柏夭的迎接，柏夭向穆王敬献束帛与璧玉，然后一同到达柏夭所居的都城（当在今高台天城附近）。十六日这天，穆王在众人的陪同下，专程前往合黎山，“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观看了当年大禹开凿的峡口。回城后，穆王命井利、梁固二臣整饬随行的六师兵丁，亲自选择戊午吉日（二十一日）举行祭河大典。经过这次祭河大典，穆王才决定继续西行，以登昆仑之丘。第二天是二十二日，穆王大朝于黄之山（当是天城东面的黑山），观看了当年大禹“导弱水于合黎”的图册与有关记载。穆王还展出了带来的金、银、珠、玉等各种宝器，让人们观赏。这使河宗、河伯大开眼界，赞叹不已。

最后周穆王到了昆仑山的西王母之地。西王母听说周天子来作客，特地为他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仪式。会见时，穆王向西王母赠送织有花纹的绸缎一百匹、素色的绸缎三百匹。西王母高兴地收下了礼物，并邀请穆王参观了她的宫殿和花园。第二天，穆王临行前在瑶池举行了宴会。在宴会上，宾主频频举杯，作歌吟诗共叙友谊。

宴会结束后，西王母邀请穆王登上弇[yan]山，眺望山下美丽的景色。穆王在弇山顶上的大石头上，刻了“西王母之山”五个大字，还和西王母一起，种了一棵槐树，作为此行的纪念和东西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象征。穆王还访问西王母的属国和附近的许多国家，采集了许多当地的珍禽异兽。然后告别了西王母，满载着中亚和西北地区的特产和各族人民的深厚情意回到了镐京。

西王母是传说中的古昆仑丘国的君主，由于她建立的国家在中国的西方，所以又称西王母国。在我国古代民间传说中，有西方女儿国的故事，可能指的就是西王母国。不过当时并不一定是一个国家，可能正是处于母系社会鼎盛时期的一个氏族部落，西王母就是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

穆天子和西王母这次友好会见的场景，在酒泉西凉时期5号墓葬前室的东西壁画上，可以见到二人举杯互祝时的温馨画面。

《穆天子传》说明，在西周的前期，尽管酒泉尚未列入周朝的版图，但西周的国王已经知道酒泉，并与居住在酒泉的民族部落建立了友好关系。

虽然《穆天子传》的记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是，书中记述的有关西域的山川地理形势、物产、习俗、风情，基本与历史的实况相符，它记录了早在汉代以前，我国中原民族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

美好的神话传说，是远古西域先民与中原友好交往的见证，先民们用朴素的神话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也给后世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供人们参考，或有夸张的表述，但也折射出远古时期的风土民情，给人们无限的探索和想象空间。

由此或可推断，在周王朝时期，酒泉境内生活的先民们已经开始通过开始这条通道（周穆王西巡之路），与西域、中亚、西亚以至更远地方的人们进行贸易交流，通过这条通道，东西方文化也已经开始早期的交流。

关于弱水的传说

从金塔县境东北部流过的古弱水，是一条很古老的河，《尚书·禹贡》说到它，《山海经》提到它，《离骚》讴歌它，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也论及它。它不仅以古老而闻名，而且以神话传说的离奇而享誉，比如《玄中记》说它弱得“鸿毛不能起也”。（弱得连根鸟的绒都浮不住），《十洲记》也说是“鸿毛不浮”，比如《山海经》说它水中有吃人的窫窳（ya yu 芽遇），有蹚过弱水向西王母讨不死药的后羿，水上有空中大神上天下地的天梯，屈原的《离骚》还说弱水岸边有宓妃的住处，等等。

说到大神，在《山海经》中就是指天上的帝，不是地上的小神小将。弱水的大神，也是《山海经》中整个天帝系统的一部分。据统计，《山海经》说到帝有32处。这众多的帝，也有他们活动的场所。据徐旭生先生研究，天帝最喜欢活动的地方，有三处，一处在《山海经·中次七经》所云的泰室、少室（今河南嵩山——有名的“少林寺”所在地）一带，是群帝往来之处。

一处在《山海经·中次十一经》所云的“帝囷之山”（今河南南阳、镇平、南台一带），还有一处就在《山海经·西次三经》所云的“昆仑之丘”。


弱水流沙

昆仑山，魏晋时人（包括马岌）说在酒泉。一般人也都如此认为。山上有天帝住的“县圃”“阆风”。《山海经》认为它是群帝喜欢聚会的“下都”。因为群帝往来多，所以弱水上有“疾呼天响”“日中无影”的“建木”。研究神话的老专家袁珂先生在《神话研究》中说：这建木就是众帝所自上天下地的“天梯”。昆仑山上常露脸，也最为人熟悉的是“西王母”，她是母系社会的代表。传说弱水中吃人的窫窳，还是西王母的女儿收走交给西王母发落的。所以群帝所喜欢往来的“下都”，实也包括弱水流域（今金塔）在内的一大片地域。弱水流域的古老，由此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五节　春秋、战国时期

历史沿革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

西周末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犬戎强大，最后杀幽王而亡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继位后，将王都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开始了历史上的东周时期。东周分两个时期——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

从前周平王元年（770年）周室东迁洛邑，到前敬王四十四年（476年），这一阶段的历史大体与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年代（前722—前481年）相当，因而史学上称之为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甘肃东部为秦国占有，而中部和金塔所处的西部地区仍是牧猎部族的活动地域。随着秦国势力的不断壮大，到秦穆公之后，秦最终完成了对诸戎的征服与汉化，结束了西北地区长期存在的族帮割据局面。大部分戎族被纳入定居农业文化圈，既有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推动了中国走向大一统的步伐，加速了西北各族同华夏的交融，逐渐形成了西北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经济文化圈。

公元前475—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初期，许多原来的诸侯国开始陆续相互兼并，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称雄的局面，即所谓战国七雄。最终秦国灭亡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西北地区唯一的大国，不仅代表了西北地区先进的生产力，而且主导着西北地区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进程。甘肃东部广阔地域为秦的半壁江山；甘肃西部众

多的牧猎部族，均受其制约和影响。

社会形态

春秋时期，在金塔境内生活的人群，主要是西周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羌人或羌戎人。羌，属他称，是当时中原部落对西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民族的泛称。他们大多数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少数人半农半牧，或从事农耕业。他们以部落为社会基本组织单位，多个部落结成部落联盟，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如“妻后母，纳嫂”的婚姻习俗，“以战死为吉利，病死为不祥”的人生观，以及“自古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掠，以力为雄”（《后汉书·西羌传》）的社会政治组织体制，“多事羝羯神，人信巫觋”（《后汉书·西羌传序》）的鬼神观和逐渐形成的火葬风俗等，都与华夏人有所不同。《左传·襄公十四年》羌戎氏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执币不通，言语不达。”

春秋战国时期，地球进入地质史上的全新世晚期，温度开始波动式下降，北方的气候环境变得异常寒冷干燥。由于气温偏低，以种植粟类作物为支柱的农业生产所依赖的水、热气候条件已不复存在。大约从商代中期开始，境内以种植业农业为主的羌、氐等先民开始向中原地区迁徙，春秋时期达到高潮。

战国时期，秦国通过改革，完善了封建制度，强化了封建政权，充实了国力，逐渐征服了甘肃东部春秋时期保留下来的一些戎狄酋邦，将其完全控制，并对甘肃境内的羌人发动了无数征战性战争。战争的结果，有大量的羌戎人被驱逐出甘肃，融入华夏民族之中，或向其他地方迁徙流动，只有少数人仍留在本地，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使河西一带基本上形成了地理真空。由于祁连山下河西走廊广袤的草原吸引着游牧民族，于是，大量游牧民族乘机迁入河西走廊一带。在迁入人口中，数量最大的当属月氏、乌孙两个民族，留居此地的羌戎人逐渐与他们交融，成为当地民族。据《汉书》记载，月氏与乌孙“俱在敦煌、祁连间”。月氏人在酒泉至张掖一带

的祁连山下广阔的草原驻牧和从事农业生产，并在今张掖市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建立了王城——“昭武城”；乌孙人则在酒泉以西至敦煌间游牧。由于月氏强盛，乌孙为小国，受制于月氏，在秦始皇病死前后，月氏攻灭了乌孙，因此月氏控制着整个河西。据《括地志》云：“凉、甘、肃、延（应为瓜）、沙等州地，本月氏国”，从凉州（今武威）到沙洲（今敦煌）都在月氏人的控制之下。

月氏人有较为完备的五翎侯组织。《后汉书·西域传》载：“月氏为匈奴所灭，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顿、都密，凡五部翎侯。”公元前206—前203年前后离开河西，公元前160年前后辗转到了大夏，有五个氏族部落联盟，这五个翎侯都是各自联盟的首领。这种社会组织是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史记·大宛列传》载：“大月氏……控弦者一二十万。”有学者根据大月氏的兵力情况推算出月氏人有十万余户，四十余万人口，一二十万骑兵。要管理这样众多的人口和军队，没有较完备的社会组织是不可能的。月氏人按照种姓建立氏族部落联盟，他们将许多氏族联成部落，许多部落结成联盟，每个联盟都有首领，这些首领组成最高层，能力突出者为王。月氏人的这种部落联盟，已具有奴隶制国家性质。

古代游牧民族一般都分有游牧的地段，称之为“分地”，而月氏人也不例外。在河西境内他们以昭武为中心，东西又分了几个次中心，东面凉州以姑藏（今武威）为中心，民乐以月氏城（今民乐永固城）为中心，张掖以觻得城（今城西黑水国一带）为中心；西面酒泉以福禄为中心，瓜州以瓜州为中心，沙洲以敦煌为中心。每个中心都有大小不等的部落首领。这既是社会组织，也是生产组织，更是军事组织。月氏的人口和军队是紧密结合的，人口众，军队多。月氏的军队除了攻灭乌孙、归化西戎、西羌等氏族，就是对付匈奴了。匈奴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才转入奴隶氏族制，并逐渐强盛起来。在它强盛之前，月氏早已强盛。当时月氏威慑力很大，是西北方一个很强大的军事联盟或部落。匈奴头曼单于为了搞好和月氏的关系，只好将自己的太子冒顿送给月氏做人质，也可以说，在战国时期，月氏人凭着众多的人口和强大的军队，驰骋疆场，称雄河西，连匈奴人也难望其项背。这是月氏人在河西的全盛时期，也是月氏人在河西光辉灿烂的顶峰。

乌孙在金塔一带活动时，是一个以牧业为主兼营农业的民族。在西迁塞地后则成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汉书·西域传》）专事游牧畜牧业生产了。

乌孙的社会组织，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是宗法的氏族部落组织。战国时期，乌孙已进入阶级社会。《汉书·张骞传》就提到乌孙有布就翕侯。从《汉书·西域传·乌孙传》可以清楚地看到，乌孙社会实行昆弥（即国王）为首的专制统治。王位的继承，实行长子继承制。乌孙的政权组织比较简单，昆弥（王）是最高统治者，其下为大禄，相当于相。大禄之下，有左、右大将二人，这是王国最重要的军职。大将以下有“翕侯”，其地位、权势亦极重，大概是实际带兵管民的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高级负责人，也就是原来本部族的首领。乌孙的军事制度，实际是全民皆兵。在“十二万户”的乌孙居民中，有“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可见每户的丁兵均是胜兵。这与匈奴的制度是一样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亦侵伐，其天性也。”（《汉书·匈奴传》）可见，平常的生产组织与战时的军事组织是完全合一的。而组织形式，应该就是从氏族社会接收过来的氏族、部落的外壳。所以，翕侯既是原来的部落首领，又是现在新的军事、生产的领袖。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其富人有四五千匹马。”说明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是很明显的。

乌孙获取奴隶的手段，一方面是把民族内部成员变成奴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利用战争对四周地区的民族掳掠。

产业状况

春秋、战国时期，金塔境内的产业主要是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这一时期，农业仍在继续发展，但它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有下降和衰退之势，而畜牧业生产则在快速发展，与农业并驾齐驱，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之一，金塔由原始农业区转变为半农半牧。由于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游牧民族相继进入金塔，更使畜牧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渐突出，并

最终使金塔成为以游牧为主的畜牧业经济区。手工业则主要是金属冶炼、陶器制作、毛纺织、骨角器加工等。

月氏、乌孙都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祁连山下广阔的优质草场，为月氏、乌孙等民族从事畜牧业提供了优良条件。他们放牧的牲畜品种主要有牛、羊、马、驴、羸，还有駃騠和騊駼（古代良马名）等。羊是游牧民族主要衣食之源，月氏人不仅养羊数量大，而且养得好。郭璞注《山海经》云："月氏国有大尾羊，如驴，即羯（大也）羊也。"《太平御览》说："月氏国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寻生如故。"说月氏人养的羊有肥大的羊尾，像韭菜一样，割了能再生，这把月氏人养羊都神化了。牛也是主要的畜种之一，它是驮物的役力，也是食品——肉和乳的重要来源之一。马，更是重要的畜种，可以吃肉喝奶，可以代步驮物，打仗还可以冲锋陷阵，更代表一个民族的战斗力。同时，祁连山里有野驴，月氏人也有能力驯养它。月氏人牧养的牲畜品种多，不但能驯养野马、野驴，而且能使它们杂交，这说明他们的畜牧业很发达。

乌孙的牲畜种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主要有马、羊、牛、骆驼、驴等，而以马、羊为主。考古发掘中，曾发现马、羊、狗的骨架或部分骨骼，以马、羊骨居多。《汉书·匈奴传》说其"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

春秋时期，金塔境内的氏族部落都是兼营农业的游牧人群。月氏人的祖先本身就擅长农业，由于月氏人放牧的草场自然条件优越，既是天然草场，又适宜发展农业，久而久之，游动少了，相对固定了，月氏人又重新重视农业了。这从月氏人离开河西辗转到大夏，并很快适应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的事实也可以得到印证。他们较大规模的在河流两岸的低平地区开垦耕地，用各种木石骨蚌农具和青铜农具耕播。为了防洪排涝建立起农田沟洫体系。与此相联系，垄作、条播、中耕技术和选种、治虫、灌溉等技术亦已萌芽，休闲制逐步取代了撂荒制。为了掌握农时，人们已开始利用物候知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农业虽然还保留着原始农业的某些痕迹，但无论工具、技术、生产结构和布局都有很大进步和变化，精细耕作技术已在某些生产环节出现。

根据考古资料，在大约战国时期的乌孙墓葬中，开始发现有谷物和农

业劳动工具，如碾谷子用的石头碾子、磨盘、青铜镰刀，烧焦的谷物等。这说明，当时农业已在乌孙社会生产中出现，当然这时的农业生产规模仍然较小，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金塔手工业种类有冶炼、陶器制造、毛纺织、骨角器加工等。考古资料证明，战国时期匈奴手工业已相当发达，能制造各种铜器和铜武器，如铜镞、铜戈、铜剑、铜斧、铜盔等，此外还能制造陶器，加工毛皮和乳制品。当时的月氏势力比匈奴强大，其手工业的水平应当说与匈奴不相上下。

毛纺织业，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的手工业门类。毛纺织物是他们衣着的重要材料。他们用羊绒、羊毛加工、擀制的毛毡，建造穹隆形的毡幕，遮风避雨，易于搬迁，很符合游牧生产和生活的特点。毛布纺织，也是户户牧民家庭必须掌握的又一种技能，主要由妇女承担。

陶器制造、金属冶炼、纺织、玉石制造等工艺在当时金塔境内各游牧部落中已有较高水平。不过这时的手工业仍然处于家庭手工业阶段，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完全的独立部门。



第六节　金塔境内的古老民族

先秦时期金塔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这一时期金塔境内活动的主要是羌、氐、戎、月氏、乌孙等民族。他们交替占据，或各守其境，和平相处；或相互攻伐，兵戈相向。他们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创造了丰富的游牧文明。

羌族

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历史悠久、分布广阔、影响深远的民族。今天河西走廊沿祁连山一带是他们当时主要的活动场所之一。

从我国有文字记载开始，就出现羌人的名字和某些记事。甲骨文中最早的“羌”字是个独体象形字，为人戴羊角之象。孙海波《甲骨文编》“羌”字下注云：“此象人饰羊首之形，盖羌族人民之标识也。”这其实是羊图腾装扮在文字形体上的反映。《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许慎把羌族同“牧羊”联系起来，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以养羊业为主要生存形态的部族。

殷商卜辞中言及该族男性为羌，女性为姜。羌、姜初为同一族体，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羌族是参与创造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要部族。

《国语·晋语》中说，华夏族两大主干成分的黄、炎二族属同一族源，而炎帝即为羌族的始祖。

关于羌人的族源，古史学界的认识大体趋于一致，主张在甘肃中部和青海东部地区。

到了商代，金塔境内生活的羌人，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金

属冶铸业等，手工业比较发达，人口定居的时间很长，已进入青铜时代。至于民族属性，应是以崇拜羊的羌戎族成分为主。

西周时原有的甘肃羌人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羌人部落随其酋豪被周王分封于中原各地而整体迁入中原，与华夏人交融，到战国时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仍留居甘肃一带的羌人数量已大为减少，青海的部分羌人趁机迁入甘肃。当时生活在金塔一带的羌人，他们以氐族部落为社会组织形式，逐水草而居从事畜牧业生产，兼有狩猎、采集活动，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也兼行一些简单的农业种植。

西周以后，羌族几乎从文献记载中消失，根据学界研究，倾向于认为西周、春秋时期的西戎，多是由羌族演化而出，即西戎中包括了羌族诸部。只是由于不同时代人们记录民族活动的用语习惯不同，造成了羌族在文献中的消失。两汉时期活跃于甘、青地区的西羌，可能是西周、春秋时期西戎中某些族系的后裔，他们又沿用了“羌”的族称。

战国时，自公元前 7 世纪以后，由于秦国的强大，西部羌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向东方乃至中原地区频繁迁徙了，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原始的生产方式，向农耕兼畜牧的生产方式过渡。

氐族

氐族是早期金塔一带活动的少数民族之一。氐族是定居于河谷、平川等较低地带，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农耕部落人群。他们以固定农业为主兼发达的饲养业，也进行狩猎活动；他们继承了马家窑文化的冶铜技术，形成了能冶炼和制造红铜、铅铜、青铜等多种铜制品的冶铜业，还有制陶业和家庭纺织业。他们的居址为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使用白灰面装饰墙壁。

他们实行土葬，有氐族公墓，葬式多样；男女二人合葬已不鲜见，且男性仰身直肢，女性或左或右侧身屈肢；墓中殉葬品差别很大，等级明显。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父权制发达，女性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贫富悬殊，私有制逐步确立，正向奴隶社会过渡。在社会组织上，由父权制大

家族组成部落，为解决部落间的种种矛盾和必要时抵御外侮，逐渐形成多个部落结成的部落联盟，既是政治联盟，又是军事联盟，已由氏族社会进入了政治社会。

在河西地区，自东向西，均有氐人分布，并留下了许多与氐族有关的地名和水名，如氐池县、氐置水等。氐人有众多分支，各有称号。除了外徙的氐人逐渐被汉化外，留居原地的大多氐人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组织。

自夏商周开始，氐人与中原王朝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诗经·商颂》中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记载。《逸周书·王会篇》中也有周成王时“氐羌以鸾鸟县”而鸾鸟就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鸟“鸾凤”，同时也是神农炎帝氏族所奉的图腾。从中也可以看到黄帝族、炎帝族与氐族之间所存在的深厚的渊源关系。

戎族

戎族是早期活动在酒泉境内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戎族是氐羌族转化而来。

考古证明卡约文化、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是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落的遗存。在商代或商周之际，甘肃洮河辛店文化姬家川类型的一些部族曾大规模东徙，在陇东、陕西西部形成较大的部落联盟。

商代中晚期，商王朝多次征伐杀戮氐羌人，抓捕氐羌人做奴隶和祭祀、随葬的人牲，使氐羌人口大减（包括向各地逃跑的），力量削弱；后来又有许多氐羌人参加周人灭商的战争，并迁往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成为西周王朝的藩臣，使留在西部的氐羌力量进一步削弱。而这时，东夷族群的畎夷西迁，在陕甘地区扎根，逐渐与当地的羌氐戎人和北狄族群交融，发展成为当时西部最强大的部族——犬戎。那时，犬戎非常厉害，不仅征服了周围的氐羌戎狄人；攻占同族群西迁来的嬴秦人的据点西垂（在甘肃礼县），多次打败嬴秦的军队，杀死嬴秦的首领；屡屡侵犯周人的土地；甚至成为公元前771年攻杀周幽王、灭亡西周王朝的主力军，战功赫赫。

春秋战国时期，甘肃境内有西部诸戎。后来，周、秦多次对西戎作战，

特别是嬴秦人，长期征讨戎人，从公元前 9 世纪的秦庄公、襄公，到公元前 7 世纪的秦穆公，与戎人的战争不断，秦穆公时取得了对诸戎国的全面胜利，这就是《史记·秦本纪》记载的“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据《左传》记载，陆浑戎原居住于瓜州（今敦煌）。前 637 年，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做了俘虏，归国时诱陆浑戎东迁伊川。东迁的陆浑戎受到晋国的安置，成为其附庸，并分为两支。一支居西称“姜氏之戎”，另一支居东称“允姓之戎”。到了晋平公时期晋国霸业衰落，陆浑戎便叛晋归楚。前 525 年，晋卿荀吴灭掉了陆浑之戎。

当时，在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古称河西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带，居住着许多游牧部族，其中见诸古代典籍的就有允姓之戎、陆浑之戎、大夏等。

这些当时北方的游牧部落很早就活动在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和北方草原上，他们依靠强弓劲马，在这一带纵横驰奔，经常与河东之地的定居人民发生冲突。至秦穆公时，为了彻底解决来自河西地区游牧部族的侵扰，用谋士由余的良策，在公元前 623 年，派兵攻打戎王，占领了许多游牧部落的地区，最终导致了这些被打败的部落向北和西方迁徙。至公元前 7 世纪末，这些人开始出现在塞地，即伊犁河和楚河流域。

月氏

月氏是自春秋以来就活动于酒泉至敦煌广大地区的古老民族。关于月氏的情况，古代史料中多有记载。《史记·大宛列传》云：

>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疆，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在战国末期到秦时，月氏强盛，匈奴曾一度受其控制；曾打败过匈奴，迫使匈奴头曼单于降服，把儿子冒顿送到月氏作为人质；又击溃了同在敦煌、祁连间游牧的乌孙，杀死乌孙王难兜靡，夺其地盘，迫使乌孙人亡走匈奴。冒顿单于时代，匈奴强大起来，与月氏展开了对河西地区的争夺，最后月氏被打败，大部分月氏人被迫西迁，离开酒泉，沿着天山北部，到达原为塞族人居住的伊犁河流域，史称大月氏；后来，又被乌孙王昆莫借匈奴兵打败，月氏与当地的塞人一起再西迁中亚阿姆河流域，并攻占原希腊人统治，后已分裂的“大夏”国地（今俄罗斯南部和阿富汗等地）。公元1世纪，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国，成为公元1世纪至3世纪时中亚地区的强大国家，并创造了犍陀罗佛像艺术，使佛教迅速向外传播，声威远播。而留居于张掖、酒泉一带祁连山南部的一部分月氏人，依附羌人，散居于羌族地区，史称小月氏。后来因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小月氏中的多数人迁到甘、青间的河湟地区，包括令居（今永登），称为“湟中月氏胡”；少部分留在张掖地区，与汉族杂居，依附汉朝，称为“义从胡”，后来分别交融于羌、汉等民族。

月氏是游牧民族，随畜移徙，盛产马匹。溯其族源，月氏族应为夏王朝灭亡时有虞氏西逃的一支。

月氏和大夏一样，虽然起源于中原，但却都属于欧罗巴种的塞族。月氏语言亦属印欧语系。

乌孙

关于乌孙的历史，《汉书·西域传》记载：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悍，贪狠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　羁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

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乌孙原本和月氏族一样在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河西地区，是一支规模不大的游牧部族。分居于河西走廊的东西两端，西为乌孙，东为月氏，大致以今张掖之山丹县为界。后来乌孙被月氏攻灭，首领难兜靡被杀，部分依附于匈奴。难兜靡之子昆莫长大后，在匈奴的帮助下打败了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再度远徙至大夏国境。胜利后的乌孙人遂留居于原大月氏占据的塞族故地，势力逐渐强盛，最终脱离了匈奴的控制。

关于乌孙人的族源，学术界也众说纷纭，即有匈奴说、突厥说、西戎说、塞种说等。就目前所能检索到的资料立论，谓乌孙属吐火罗族的意见，在诸说中比较可取。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金塔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秦朝。当时金塔所在的河西一带还为匈奴所占据。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二月，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西汉初，金塔仍为匈奴所统治。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兵河西，击败匈奴，金塔及河西走廊地区正式纳入西汉王朝版图。随后，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移民实边，开渠屯田，掀起了金塔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高潮，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王莽及东汉前期，窦融保据河西，金塔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东汉中后期，由于社会动荡，金塔经济发展缓慢。

第一节　匈奴对金塔的统治

匈奴族的崛起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剪灭六国，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但当时秦王朝的疆域还没有到达河西走廊一带。这时乌孙被月氏打败迁出河西，月氏控制着整个河西走廊。公元前 206—前 203 年，匈奴打败月氏占领河西，金塔一带遂成为匈奴的驻牧地。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是以北方一个强大部落为主，吸收了鬼方、獯鬻（xūnyù）、猃狁、戎、氐等许多部落和由中原北上的一部分华夏人而形成的。

公元前 3 世纪前后，匈奴逐渐进入强盛时期，占有北方广阔的领地。公元前 209 年，冒顿杀父夺权，自立为单于（前 209—前 174 年），并加强政权建设，使匈奴迅速壮大起来。

西汉初期，匈奴实力空前强大，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控弦士卒约 30 万，不断侵扰邻族。他们利用楚汉相争、中原内乱之机南越长城，袭扰掠夺今河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

在“大破灭东胡”以后，又乘胜西进，于公元前 203 年以前，命军进入河西地区，打败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月氏大部分退出河西走廊，只有小部分留居原地。在经历了冒顿、老上、君臣三个单于统治时期（前 209—前 126 年）的扩张，匈奴达到了鼎盛时期，控制着北到贝加尔湖、南到河套、东到辽河、西到葱岭的广大地区，建立起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

社会形态

早期匈奴民族的经济以游牧为主，已经开始使用金属兵器，尚无农耕、城堡。氏族、部落是基本的社会组织，也是生产、军事、政权合一的组织。实行原始的氏族族外婚，保持神秘的收继婚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没有文字和国家法律。生活用品多是畜产品。死后土葬，有棺椁、人殉、坟墓，没有坟堆。

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匈奴的国家机构也日益完善。匈奴的贵族奴隶制政权的形式和军事组织是合二为一的。单于是最高统帅，管辖地区在其辖境中部；其下是左右屠耆（匈奴语，贤之意）王，即汉人常说的左右贤王，分别统领左右二部。左贤王庭，管辖的地区在其辖境东部；右贤王庭，管辖的地区在其辖境西部，包括金塔。左贤王相当于汉族政权的太子。再下是左右谷蠡王，和左右贤王合称“四角”。左右日逐王，左右温禺鞮王，左右渐将王，合称“六角”，他们都是单于的子弟。“四角”或“六角”，有继承单于的权利。

匈奴部落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事单位。将所有够年龄的壮丁“尽为甲骑”，统统编为骑兵，由大将、大都尉、大当户、骨都侯等 24 将分别统领。各部族的首领充当政权的各级官吏，各级官吏又都是各级的军事首领。从单于至大当户，都统兵打仗。多者统领万骑，少者统领数千骑，下设都尉、千长、百长、什长等官，逐级指挥。这些职位都由贵族世袭。

匈奴人打败月氏后，河西走廊为右贤王辖区，其下又设昆（浑）邪王和休屠王，分领原属乌孙和月氏在河西的牧地。休屠王部驻牧武威、民勤，浑邪王部驻牧东到番禾，西到盐泽，南界祁连，北连居延，即今张掖、酒泉、额济纳旗一带。因此金塔属浑邪王驻牧地。浑邪王为右贤王统属，地位虽不低，但不是“四角”或“六角”。

匈奴各王有自己的封地，可在自己的封地内组织政权和军队，进行统治。在浑邪王的政权和军队内，封有许多王，有的王可占地，如幔得王；更多的王，如单恒王、酋涂王、五王等，以他们的部众多少，决定在政权和军

队中所占的位置。浑邪王政权和军事的统一形式，正是匈奴政军统一形式的基层化和具体化。

经济形态

匈奴占据金塔后，利用天然丰富的草场，从事畜牧业生产，这是游牧民族的特性，也是他们的主业。匈奴人畜养最多的是马、牛、羊。它们的多少象征财富的多寡，尤其是马，不仅是运载和代步工具，更主要的是作战的战斗力，在冷兵器时代，标志着一个民族兴旺的程度。当他们有了自己的驻牧地，相对稳定后，开始发展农业。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增多，逐渐接受汉人文化习俗，开始发展农业。他们除了种植黍、稷、麦、粟等粮食作物外，还种植桑、麻、枣、韭、瓜、葵等经济作物和菜蔬，开始使用铁制农具，生产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匈奴的手工业比较发达，主要有制乳业、制皮毛业、制陶业、制铁业和冶铜业。制乳业和制皮毛业是游牧民族最基本的手工业。匈奴制作箭镞，还有铁制农具，说明其已使用铁，并产生了冶铁业。但由于其流动性，冶炼技术的发展比较缓慢。同时，与中原王朝的贸易往来也逐步频繁，以牲畜和皮毛交换汉人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商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第二节　与金塔有关的汉匈战争

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统治是随着征讨匈奴的胜利而实现的。西汉王朝建立后，与匈奴一直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和亲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汉匈之间的矛盾。西汉初期经过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已具备了抗击匈奴的实力。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兵河西，击败匈奴，将河西走廊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范围。但匈奴并没有因河西之战的失利而放弃对汉王朝的进攻，汉匈战争一直持续到东汉王朝的结束。其中较为著名的，也是与金塔有关的两次战争。

河西之战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万余骑兵出击河西匈奴军。

霍去病（前140—前117），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西汉名将。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在长安病逝，年仅23岁。汉武帝特命陪葬茂陵（汉武帝陵），把他的墓冢建成巍峨的祁连山形状，墓前陈列“马踏匈奴”等大型原雕石刻，以表彰他远征匈奴的丰功伟绩，并谥予他景桓侯的封号。霍去病作战勇猛，是一位军事天才。汉武帝曾劝他学习孙吴兵法，他回答说：“为将须随时运谋，何必定拘古法呢？”汉武帝为奖励他的军功给他建造了豪华的宅第，他却说“匈奴不灭，无以为家也”。后人对霍去病备极推崇，李白《胡无人》诗云：“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

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

汉军从陇西出塞，6天之内，过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令居（今甘肃永登西），越乌鞘岭，穿过匈奴5个部落王国，沿途消灭抵抗者，安抚降服者。然后继续西进，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亦称燕支山）1000余里，与河西匈奴军主力接战，杀其折兰王、卢胡王（一作卢侯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官，歼灭匈奴军8900多人，并且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浑邪王、休屠王战败逃走。这一仗，汉军深入匈奴境内2000余里，几乎贯穿整个河西走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给河西匈奴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采取正面平推式进攻，未能聚歼其主力，且使其易有所准备，汉军虽取胜，自己也损失了7000余人。霍去病班师后，汉武帝下诏，益封二千户给霍去病，以表彰他首次独立出征建立的功勋。

汉军取得第一次河西之战胜利后，为保证作战突然性，稍事休整，于同年夏，汉武帝命令霍去病第二次率军出击河西地区。霍去病吸取了第一次出击河西的教训，采取迂回包抄式进攻，先由今宁夏灵武渡过黄河，向北越过贺兰山，涉过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绕道居延海（今内蒙古西北），转而由北向南，沿弱水而进，经小月氏（未西徙的月氏人，今甘肃酒泉一带），再由西北转向东南，深入匈奴境内2000余里，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弱水上游地区，从浑邪王、休屠王军侧背发起猛攻。匈奴军仓促应战。经过激烈的战斗，汉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歼敌3万余人，迫降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俘虏5王及5王母、单于阏氏、王子59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63人。汉军仅伤亡3000余人。浑邪王、休屠王率残军逃走。

汉武帝对霍去病大加赞赏，益封其食邑五千户，其手下部将也多因功封侯。

浑邪王攻杀休屠王，收编其部众降汉。汉武帝封浑邪王为漯阳侯，将其部众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5郡之边。为了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西汉政府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4郡，从内地迁移大量人口到这里戍边、生产。

河西之战是汉武帝继河南、漠南作战胜利后对匈奴所采取的又一次重

大战略行动，也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最重大的三次战役之一。这次战役的胜利，使西汉王朝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地区，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为日后向漠北的匈奴单于主力发动进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李陵攻匈奴大战

天汉二年（前99年）九月，汉武帝派李陵率步兵5000人，从酒泉出发，经金塔，出居延千余里，攻打匈奴。李陵到达浚稽山（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部），与匈奴骑兵3万余人大战，虽然取得胜利，斩获匈奴万余级，但终因军队粮草不济，不得不南撤。匈奴兵8万多骑追击，李陵且退且战，伤亡很大。快退到遮虏障时，单于怀疑有伏兵，欲退兵，适获汉军降卒，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单于遂遮道急攻李陵军。陵军力战，终不能突围，于是投降匈奴。



第三节　会水县的设立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打败了河西一带的匈奴，河西大片地区划入西汉王朝版图。西汉王朝掌控河西走廊之后，即在这一带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和封建政权制度，以保证中央政府对其有效管辖。前期主要是耕战结合的军事性屯田，随着边疆地区进一步开发，开始大规模移民实边，建立编户齐民的民屯组织，开展大规模屯垦。修筑塞障城郭，隔离游牧区域与农耕区域，为开发河西第一步。第二步便是在新开拓边疆地区建立郡县，实行有效统治，组织军事性质屯垦，保障边境地区军用民需供给。

行政建制

为了巩固反击匈奴战争胜利的成果，经营西域，西汉王朝在河西先后设立了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和武威郡，史称“河西四郡”。“河西四郡”的建立，为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辟中西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河西四郡的设置时间，《史记》《汉书·武帝纪》《汉书·地理志》中的三种说法不一致，尚无定论。本人倾向于以下说法：酒泉郡设置时间为元鼎六年（前111年）；张掖郡设置时间为或与酒泉郡同年稍后，或为元封元年（前110年）左右；敦煌郡设置时间不当晚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或元封五六年之间（前106—前105年）；武威郡设置时间为地节三年（前67年）。

当时的酒泉郡包括今肃州区、金塔县、玉门县和瓜州县的一部分。辖禄福、表是、乐涫、会水、玉门、延寿、沙头（一作池头）、安弥、乾齐九县。其中会水县辖今金塔县全境及东南至高台罗城乡镇夷峡。

汉代会水县的境域范围大致为：东南沿羌谷水至罗城，与表氏县（今高台县）接壤；正南与安弥县（今高台双井 、盐池以南）为邻；西南与禄福县（今酒泉市肃州区）接连；西与延寿县（今玉门市）遥相连接；北面以古汉长城与匈奴相隔。县境东西总长 360 里，南北宽约 240 里，总面积约 21600 平方公里，是酒泉郡所领九县中面积最大的一个。

汉代初置时的会水县居民，绝大多数是移民。它的社会组织，基本框架和内地一样，即中央——郡——县——乡——里的五级制。上面由中央——郡逐级管理，下面设有乡和里两级。郡有太守，西汉时还曾叫使君，下面有属官。县有大小，万户以上称大县，叫县令；万户以下称小县，叫县长。河西四郡下属的基本都是小县，会水县也不例外。乡是很重要的一级行政机构，《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乡的权力较大，一切政策法令都是通过乡政府下达的。西汉末年全国有乡 6622 个，有县邑 1314 个，有郡国 103 个。大郡辖县 20~51 个，中等郡 10~18 个，小郡 3~10 个。居延汉简中有张掖郡的县 9、乡 3、里 167。根据史料记载的汉代乡名称，分别为东乡、西乡、北乡、都乡、中乡和曲乡等。除未发现南乡外，东西北都有。都乡和中乡是一个意思，都是处于中心位置的乡，曲乡，可能是该县的政治中心，以原名命名。鉴于此，似乎西汉的乡是统一按方位命名的，每县 5 乡。

乡的下面是里。里是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大致相当于今日农村的村委会或城市的街道办事处），从中央发布的诏令及一切行政法规，都由里去组织实施，在群众中贯彻执行。里在我国存在得很早，商周时已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记载，是 25 家为一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战国时以"五十家为里"。长沙马王堆 3 号墓出土的地图上，标有里和住户数：大里百余户，中里 50~60 户，小里 10 余户。各地里的户数不同。从汉简中发现的汉代里名，以嘉名为多，如万年、万岁、长乐、千秋、安汉、富贵等。肩水金关汉简中记载的会水县的里有两个：延年里、未央里，就属嘉名里；还有的里前面冠以方位，如东阳里、东乐里、西成里、北阳里等；还有的里以姓氏为里名而聚族而居，如有高里、蒲里、候里等。会水县的里应属中小里，每里约以 25 户计算，则各乡有 20 个里，全县有近百个里。这样推算，

会水县当时约有 2500 户，1 万人左右。

当时会水县社会基层里的基本状况是：里有里主——管理祭祀、丧葬、户口；里正、里胥——管理生产、收赋、催税、判案等；里魁、假士——管理治安与征兵；监门——负责居住区的安全警卫。二十几户人家的一个里，竟有如此繁多的事情，繁忙的工作。

里中的居民，集中住在一起。这集中住的地方是按规定统一建的。287・13 简载："觻得安定里方子惠所，舍上中门第二里三门东入。"282・5 简载："觻得富里张公子所，舍在里中二门东入。任者，同里徐广君。"340・33 简载："包，自有舍，入里五门东入。"上面列举的是贵卖贵买契文中留下的家庭地址。这样的地址，正好说明西汉时的里，正是居民集中居住区。它的大小视居民的多寡而定，一般是外围筑有高高的围墙，四面开门，门有编号。里面整齐地分布房舍，房舍间大一些的叫道，小一些的叫巷。每个里都编号。这里与门结合，就可指出某家在某处了。会水地处边塞，且黄土较多，里的围墙都是土筑的，像一座座城堡。平时可防盗、防风沙；战时进可攻，退可守。后来的坞壁，实源于古老的坞，后发展为城堡式的里。现在金塔东沙窝一带尚能见到几座汉代的小城堡遗址，即坞壁，就是这种城堡式的里的再发展。

里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登记户口，抽调兵役。会水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市场繁荣，是敌人容易进攻之处，也是汉朝出击和防守的基地。

会水县名称的由来和具体位置

关于会水县名称的由来，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众水所会，故曰会水。"《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在肃州东北一百四十里，其北有白亭，古曰白亭海。"《重修肃州新志》则云："众羌水会张掖河。"可知"众水"又称"众羌水"，点明了会水县在众羌水汇张掖河的地方。所谓"众羌水"即发源于祁连山之南（古称"羌中"之地）而向山北流之诸水，即今山丹河、张掖河与酒泉讨赖河三条河流。先有山丹河源起，西北流一百一十公里汇张掖河，又西北流四百里（称羌谷水）至鼎新大汇水口。酒泉讨赖河自西

南来又名白水，东北流至暗门与红水河会，又稍北流，纳清水河（古亦称墨水），经鸳鸯池，过夹山，又东北一百八十里至会水口与张掖河会。真是“众水所汇”。


会水县遗址

汉代会水县的县治，据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李并成教授考证，为位于金塔镇五星村2组西部耕地边缘的西古城（《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

《汉书·地理志》酒泉郡会水县条：“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说明北大河（呼蚕水）汇入黑河（羌谷水）一带为汉代会水县之地。《史记·夏本纪》索隐曰：“《水经》云弱水出张掖删丹县西北，至酒泉会水县，入合黎山腹。”合黎山为河西走廊北山之中段，今临泽、高台、酒泉、金塔等县以北延伸的剥蚀残山属之。《水经注》卷40：“合离（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标明了会水县与合黎山的相对位置。金塔县天仓乡以北10千米许黑河右岸的大湾城（汉肩水都尉府遗址）所出汉简曰：“出钱千三百四十七，赋就人，会水宜禄里兰子房，一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506.27）；“口廪会水”，(514.47)；“到会水而不交难亭留待难”（出土地不详，甲附4）。盖肩水与会水相邻，故有会水县的就（僦）人佣人。由此可见，今天沙浪滚滚满目龙荒的东沙窝，昔日曾是会水县绿洲的所在。依据上述等史料曾考得，西古城即汉会水县城。该城西汉始置，北魏废弃，北魏以后其地归属酒泉。


会水县遗址

第四节　西汉对金塔的设防

修筑边塞

自汉武帝开疆拓土以来，先后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夺回河南地，元狩二年（前121年）攻占河西走廊，元鼎六年（前111年）又攻占河湟地区，以及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统领西域的日逐王降汉，西域地区也归属汉朝，汉朝西北边疆大大拓展。西汉王朝控制河西后，为巩固疆域，保障边郡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从汉武帝时期起，开始大规模经营西域，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在西北边郡设烽燧、置亭障、屯戍卒、修武备，构筑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防御体系。汉代军事防御体系是一个以长城为主干，包括长城、关隘、亭障、烽燧等设施组成的多层次国防工程体系。

会水县地处河西走廊中段之北部咽喉。境内有沿黑河通向南北的必经之道，东为合黎山天然屏障，北为狼心山和孤红山自成锁钥，具有近屏河西、远控天山和黄河之势，乃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的地方。为了保证河西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在会水县境内修筑军事设施，派遣重兵把守。为加强军事力量，在会水县内设肩水都尉、东部都尉和北部都尉等军事机构，统辖境内各亭、障。《汉书·地理志》酒泉郡会水县本注曰："北部都尉治偃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汉武帝元封二年至三年（前109—前108年），西汉王朝修筑了从会水县北部（黑河西）至玉门直到敦煌玉门关和阳关的塞垣（即现今所叫的长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或稍后，又修筑了从镇夷峡沿合黎山至狼心山北折向西行，达哈密北山的一段塞垣（当时叫遮虏障）。并在金塔境内黑河合黎山和北山的最狭窄处设立了河西走廊北部的唯一关口——肩水金关，堵死了匈奴南下入侵的通道。肩水金关的设立，为安定西域、保卫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金塔县境内汉长城总长约 320 公里，是甘肃省单县汉长城历程最长的县。长城沿线又设立烽燧、亭、障，戍卒守卫在长城沿线，负有耕田生产、打仗卫边的双重任务。西汉王朝大量从内地移民到会水县屯垦戍守（垦田、守边），并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农业和经济的大发展。

完善边塞管理制度

汉代北方与西北边塞是一个整体，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但是中央政府没有明确的统一管理机构，而是由各郡县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合适的管理制度与规范，管理边塞事宜。

凡有汉塞的边郡，具体管理者就是部都尉。部都尉秩比两千石，官有丞、候、千人、司马都尉丞与都尉同在都尉府，候、千人、司马各以候官、千人官、司马官为其治所。候与其所属的部候、燧在塞上，专司候望与烽火，自成系一统。千人与司马应为边屯中的步兵、骑兵的首长。候、千人、司马除职司不同外，可能有等级的高低。

汉长城遗存

据 21 世纪初开展的长城调查结果显示，现金塔境内保存有 3 道汉长城，依次为东部塞（即居延塞的一部分。总体走向为由东南向西北，自高台县进入鼎新镇双树村，沿黑河东岸先后经过鼎新镇双树村、茂茂村、上元村、东明村、友好村、永联村、航天镇东岔村，止于肩水金关遗址。）、西部塞（总体走向为由北向南，起于航天镇大湾村东北的肩水金关对面，沿黑河西岸，穿过航天镇大湾村、二杰村、天仓村，止于航天镇营盘村东北的营盘堡。）和北部塞（总体走向为由东向西，起于航天镇营盘村东北的营盘堡，经航天镇营盘村、大庄子乡双新村、古城乡下东沟村、西坝乡西移村后，穿过沙枣园子自然保护区和沙漠后进入玉门境内。），总长约 306.1 千米，是甘肃境内单县汉长城里程最长的县。现遗存有汉长城墙体 85 段，共计 261.2 千米；壕堑 23 段，共计 44.9 千米；关堡 14 座，烽火台 83 座。

第五节　新莽时期的萧武县

王莽改制

西汉末年（8年），身为西汉大司马，录尚书事的王莽，取代汉朝，改为新朝（8—23年），历史上称为“新莽”，并进行改制，将会水县改为萧武县。

新朝建立后，王莽针对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地起义不断的实际情况，意图通过改制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始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托古改制”，史称“王莽改制”，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郡县名改革。

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恢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

王莽的这种改制，也影响到了地处偏远的会水县的社会和经济。

首先，县名变了。金塔一带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会水县后，县名一直沿用到王莽篡汉时。王莽为内外改革的需要，曾不断改郡县名，有的郡反复改五次，使送诏书的人不知送往何处。会水也被改为萧武县。拿改动较大的张掖郡来看，张掖郡改为设屏郡，觻得改为官式，昭武改为渠武，删丹改为贯虏，氐池改为否武，屋兰改为传武，日勒改为勤治，鞮靬改为揭虏，番和改为罗虏，居延改为居成。从这些改的县名中，好多带有“武”“虏”

等字。从这些改的名字中，可以看出王莽对少数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以来建立的平等友好关系，妄自尊大，对少数民族采取歧视、打压的政策。这样的思想态度，最终导致了民族间的不和与战争，加速了新朝的灭亡，实是咎由自取。

王莽的这种大范围的频繁对郡县名的改动，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连官吏也弄不清楚，所以王莽在后来的诏令中提到某地时也只好注明故地。

其次，政府机构和官职的名称变了。为了表示改朝换代，革汉立新，废刘兴王，王莽根据儒家经典，将一大批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官职。王莽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还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其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因此，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在各级官吏中层出不穷。至于那些清正一些的受封爵者则穷困潦倒，甚至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生活。

第三，土地政策变了。王莽掌权后，根据古书上记载的井田制度，于公元九年颁布诏令，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一家有男丁八口，可受田一井，即九百亩；一家男丁不足八口，而土地超过九百亩者，须将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原来没有土地者，按上述制度受田。并将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诏令还规定，如果有人敢于攻击井田制度，煽动人破坏法令，则将其流放至边境地区。

第四，市场经营管理的政策变了。始建国二年(10年)，建兴帝王莽下令“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

“赊贷”，就是由政府办理贷款。具体办法是：如果百姓办理祭祀、丧葬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以向政府借贷。祭祀借贷须在十天内归还，丧事借贷须在三个月内归还，以上两项借贷不收取利息；工商贷款每年交纳不超过所借数额十分之一的利息。

“五均”的主要内容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令、长皆兼司市，

称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五均官的任务一是按工商各业的经营情况征收税款；二是管理市场的物价，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市平”。如果物价高于“市平”，政府就将控制的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以平抑物价；市场价格低于“市平”，则听任百姓自由买卖。

在实行五均和赊贷的同时，王莽还设六筦之令。“筦”即“管”，就是由政府管理六种经济事业，即酒、盐、铁由国家专卖，铸钱由国家专营；向取利于名山大泽的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医生、巫、卜、樵夫、渔民、猎户及商贩征收山泽税；加上五均赊贷，合称为“六筦”。

第五，使用的货币变了。王莽废除通行已久的五铢钱，别造货币6类28种（其中包括铜制的“泉货”6种）。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因此流通非常不便。而且这些币制改革，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然后又以更劣的货币代替原来铸造的货币，每更换一次货币，百姓就要遭受一次盘剥。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王莽施行货币改革期间，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十分混乱，黎民百姓深受其害，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不少人甚至在市场上痛哭。

第六，老百姓的日子更苦了。王莽推行五均、赊贷及六筦等措施，其目的在于利用政府力量控制经济事业，平抑物价，限制商人囤积居奇，使贫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这些措施，无论从减轻普通百姓的经济负担，还是加强封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进而加强中央集权，都是有利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实际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延续。但是，推行这些政策大多是依靠一些富商大贾，他们利用特权同官僚、地主互相勾结，肥己营私，囤积居奇。原来为平抑物价防止商人渔利的五均，也变成官吏贱买贵卖从中谋利的机构。那些身穿官服的商人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结果给普通百姓带来更大的痛苦。

在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以来建立的平等友好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恶化，直至爆发连年战争，终于导致了全国此伏彼起的暴动和起义浪潮。

“新莽”政权的衰亡

王莽的改制终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腐不合实情，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各阶层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到了天凤四年(17年)，全国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公元23年10月6日，起义军攻入常安(即长安)，王莽在乱军中被杀，新朝灭亡。



第六节　东汉窦融经营河西时期的金塔

窦融保据河西

公元23年，王莽被杀，天下大乱。时局动荡，地方势力拥兵以求自保，乘机割据称王，窦融保据河西。窦融统辖河西前后十多年，对金塔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窦融（前16—62年），东汉初大臣。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为汉文帝窦皇后之弟窦广国的七世孙，累世据官河西。王莽政权被推翻前夕，他率先投降了更始政权，被推荐为钜鹿太守。但他审时度势，不愿前去赴任。于是他辞去钜鹿太守之职，请求前往河西。更始帝任命窦融为张掖属国都尉。

新地皇四年（23年）夏，窦融到达河西。他凭借其累世在河西为官的声望，广泛结交地方官员、豪杰，很快赢得了政治资本与群众基础，成为河西地区的实际领袖。河西五郡太守梁统（武威）、厍均（金城）、史苞（张掖）、竺曾（酒泉）、辛肜（敦煌）等人推举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建立起河西割据政权，但他始终奉更始政权为正朔。更始三年（25年）九月，赤眉军入长安，更始政权灭亡。窦融召集河西各郡长官及各州郡的豪杰集会，联合起兵自保，正式建立了河西自保政权。

统治措施

为据境自保，窦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他首先团结各地豪杰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对下层人民，“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

将绝大部分罪犯都赦免了，还下令保护少数民族百姓的生产活动。同时他还整顿吏治，对下级官吏中不称职、空缺以及犯科的人员也做了相应的补迁；设置别驾、治等从事史，巡查州郡官吏，管理户籍文书，主持军事训练；对官吏实行全谷俸禄制度。

在军事方面，窦融整顿军队，严肃军纪，加强对张掖属国精骑的军事训练，以提高其战斗力；严格烽燧制度和武器管理制度；颁布奖赏令，激励士兵勇敢作战。

在经济方面，一是在农业生产上，继承了西汉的屯田制度。窦融把地方郡县和军队分为两个管理系统。一方面为解决军粮和军队里的其他需要，实行“军屯”，具体屯垦事务由军事长官兼理；另一方面还实行了“民屯”，在地方郡一级设“农都尉”，县一级设“田吏”，组织百姓开垦荒地，并由这些农官具体负责农耕事务。屯田所需的耕牛、农具和种子都由官府供给。居延汉简中记述了许多有关当时屯田的情况，涉及范围很广，如田官的组织、田卒人数、垦田数量、谷物种类、收获量、粮价、田仓、田卒给养、农亭、积谷内运、大司农调拨钱以及私田等，这些都反映出窦融时期在居延屯田的规模和效果。当时河西地区所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二十多个，大体可分为麦、米、谷、豆四大类，其情况可与农业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并驾齐驱。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为了发展五郡畜牧业，大将军府曾设置了“牧师苑”，专门负责畜牧事务，同时又颁布了禁杀马牛的政令，用来保护役畜。在建武十二年 (36 年)，当窦融等前往洛阳晋见光武帝时，在路上所驱赶的马、牛、羊就多得满山遍野，而仅用来拉车的马就有四千多匹。三是大力发展水利事业。设置了主管水利的官员，专门负责农田灌溉。组织并鼓励老百姓修建农渠，引水灌溉。四是保护生态环境。河西五郡地区，自古林木稀少，天然绿洲常常遭受沙尘暴侵袭，植被保护问题当时就已受到人们的重视。窦融时期，曾通过采取严令“吏民毋得伐树木”的措施来保护环境。五是整顿钱币，稳定市场。禁止官吏铸钱、经商。

窦融的上述措施，起到了缓和矛盾、稳定秩序的作用，在当时全国很多地区战争频繁、五谷无收、民众相食的时候，造就了河西这一片相对安定富裕的“世外乐土”。因此，天下名士如班彪、孔奋等和安定、北地、

上郡等地的流民，纷纷投奔河西。窦融对这些名人贤士以礼相待，推诚结交，并根据各自的才干给其安排适宜的位置，从而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精干的谋事集团和官吏集团，使河西日益繁荣富裕，兵强马壮。

窦融经营河西期间，文化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当时中原地区的一些名士和官宦之家为躲避战祸，纷纷来到河西。其中有许多文化素养很高的“儒雅之士”，他们徙居河西，著书立说，开办学校，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朝野上下不再将河西视为荒蛮落后的“化外”之地，而是与“中国”一体的臂腋所在。

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五月，刘秀任命窦融为凉州牧，梁统为宣德将军。建武八年（32年）夏，窦融受诏与五郡太守到洛阳奏事。建武十三年（37年）四月，任窦融为冀州牧，十余日后，又迁为大司空。永平二年（59年），窦融从兄子窦林因罪处死，汉明帝刘庄诏令窦融归第养病。岁余，上交卫尉印绶。不久，病逝于洛阳，终年78岁，谥为戴侯。



东汉建武五年官府文书

第七节　两汉时期的金塔人口

西汉时的人口

汉武帝元狩二年（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大败匈奴，斩首4万余级，降汉4万余人。说明当时河西至少有8万人。后汉武帝将匈奴浑邪王及其所率的4万余众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五原、西河五郡，置“五属国”以处之，河西地区出现了“空无人”的局面。为了巩固河西边防，有效地将新开之地迅速纳入郡县统治体系之下，汉武帝在河西“设四郡、据两关”的同时，开始向河西地区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并逐步建立完善县乡里基层组织。

关于向河西的移民数量，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史记·匈奴列传》：“是后匈奴远循，而漠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汉书·平准传》：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但这次屯田实边的60万人不只到河西。“河西则指武帝所设四郡，即使以四个地域平均分配，河西亦应有田卒15万人”。

《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从上面三次有数字记载的移民来看，“西汉前期向河西的移民不下40万”，而酒泉一带至少也有10万移民，会水的移民应该在1万人左右。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此次移民虽未提及河西，但有研究表明，这时原“会

稽”二字系衍文，而移民地区则包括河西在内。

此后，汉朝又陆续向河西移民。当时迁往河西者，“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汉代河西的编户，基本上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史载，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将作大匠解万年因“妄为巧诈”，奏建昌陵未成获罪；故关内侯陈汤既与谋其事，又妄言惑众，“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这些获罪的官员，往往是举家甚至举族迁徙而来的。

招徕流民到河西安置的情况在居延汉简中也有反映。如：

简15. 言流民三月三日发觻得，至表　E.P.T59:623

本简出土于汉甲渠侯官遗址破城子，上下均残缺。从简文看应是甲渠候官的中呈文书，大意是说某年三月三日有一批从觻得到表是的流民经过。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到流民出发的时间、地点和目的地，可见他们不是漫无目的四处漂泊的流民，而是政府有计划招徕或强制迁往河西的。此外，新出居延汉简中还有“三千四百八十五人敦煌郡”的残简（E.P.T65:450），与其同出的纪年简绝大部分集中在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至新莽时期，故本简或亦属西汉后期。简中前往敦煌郡的“三千四百八十五人”可能也是发配到该地的“徙民”。

汉简中还有很多押送囚徒到河西某地的记载。如居延汉简有：“山觻得二人送囚昭武，四月旦见徒复作三百七十九人……”（H34.9+H34.8），可见囚徒之多。敦煌马圈湾汉简有“送囚效谷”(D118A)、“富昌队长宋恭，送囚龙勒”(D266)、“送囚诣官”(D1626)等。这些刑徒或驰刑徒，除了戍守边塞外，还被广泛用于筑城、屯田、修桥、治道、伐茭、运输、日迹、候望、投递邮书和其他各种劳役，而且数量很大。

经过汉武帝对河西的大规模经营，有大量内地移民迁入，许多退役的戍卒也携家带口留居河西，从而使会水人口迅速增加，会水一带地广人稀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善。《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全国103个郡国的户口，其中包括酒泉郡人口数的记载。《汉书·地理志》载：武威郡户17581，口76419；张掖郡户24352，口88731；酒泉郡户18137，口76726；敦煌郡户

11200，口 38335。当时河西共有人口 280210。这是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2 年）的人口数。颜师古注："汉之户口，当元始时最为殷盛，故志举以为数也。"可以看出，当时酒泉郡在西汉末户口"最为殷盛"之时，人口达到 11 万多，按当时的九县平均，每县 1.2 万余人。酒泉郡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 1 人。这个人口密度在当时全国属最低，真可称得上是"地广民稀"了。

王莽时期，甘肃人口大幅下降。因改制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混乱以及官僚、地主、豪商"缘而为奸"，肆意剥削、压迫人民，"使农商失业，食货阻废，民人到涕泣于市道"，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使人口不断下降。

东汉时的人口

东汉窦融时期，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二年 (25—36 年)，甘肃人口呈下降趋势，但河西人口却呈恢复趋势。会水在窦融的经营下，"民俗质朴，而融军政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社会安定殷富，人口自然增长；外来人口的迁入又使人口不断增加，使会水的人口呈恢复性发展趋势。

东汉后期，会水人口曲折发展。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永和五年（140 年）酒泉郡 9 城，户 12706，口缺。张掖居延属国，户 1560，口 4733。酒泉郡按当时凉州口户比 4.67 计算，人口为 59337 人，人口密度 0.78/平方公里。按当时的九县平均，每县 6593 人。从公元 168 年开始，鲜卑民族开始寇抄甘肃边境，有时一年达数十次，深入到酒泉郡的福禄、会水等县，"杀略不可胜数"。加之甘肃羌人起义，东汉政府进行镇压，使甘肃人口下降。到建宁二年（169 年），甘肃人口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会水人口也相对减少。公元 184 年黄巾起义后，河西各郡守拥兵自立，相互残灭，军民死伤，人口继续下降。可以说，整个东汉时期，会水人口乃至酒泉、甘肃就没有出现过峰值期。人口发展最好的时期就是窦融保据河西时期，人口发展平稳，当时人口应该高于汉平帝元始二年（2 年）的水平。

第八节　两汉时期的金塔经济

两汉时期是金塔历史上第一个大开拓与开发时期，也是金塔地方经济由畜牧业经济向农牧业经济转变，进而逐渐转变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时期。

农业

徙民实边，是汉武帝的一大国策。西汉王朝采取“移民实边”的重大战略举措，迁中原大批戍卒和劳力来居延及金塔屯田开发，这就是当时最有名的居延屯田。居延汉简记载，在居延地区除居延农都尉外，还设有肩水农都尉，是区域屯田管理机构，规模很大，包括两个屯区，北部以甲渠塞、卅井塞和居延泽包围的居延屯田区和南部以肩水东西两塞保卫的驷马屯田区。其中驷马屯田区就位于现金塔县鼎新镇和航天镇一带。通过兴修水利，鼓励农耕，保护耕畜，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发展畜牧业，形成农业与畜牧业并存的经济模式，带动了金塔地方手工业的发展。丝绸之路畅通，使西域与中原地区商业贸易往来频繁。中原与西域各国的使团往来，汉官胡商交流，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和各种农作物新品种，促进了金塔经济社会的发展。

东汉时期继续推行屯垦制度，采取了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释放奴婢，减轻刑罚；减免租赋，安置流民；减罪戍边，充实边郡；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更新、选用优良农作物品种；鼓励发展畜牧业和商业贸易，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各种手工业等，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两汉时期，由于政府采取徙民实边的政策，大量迁徙中原农业发达地区居民到会水及其周边地区屯田垦殖，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以及众多的农作物新品种，在会水得到大力推广，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

汉代铁制农具已在金塔及酒泉、居延一带广泛使用。金塔县境内发现有汉代的犁、锸、铧、镰、锛、铲、刀等铁制生产工具，肩水金关遗址中也发现有铁镰、铁锄、铁锸等农具和刀、锛、凿等其他铁器。新式农具有耧车等。

两汉时期，大量农作物种子从中原和西域引进金塔、居延一带，大大丰富了农作物品种结构。居延汉简中有许多关于粮食、蔬菜等农作物的记载，反映了该地区农业生产状况。居延汉简中记录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粟类和麦类两大类作物。粟类作物，这类作物在广义上指我国北方统称的谷子，最常见的是黍和米（即黄米、小米）。麦类作物，居延汉简中关于麦的记录简文很多，名称也不一，分别为：麦、大麦、小麦、穬麦等。还有“葱”“枲”等蔬菜类经济作物。饲草作物有茭、苇和藁等。

根据居延汉简简文资料显示，当时的农作物品种主要有胡麻、粱米、黄谷、土麦、稗稷、白米、矿麦、黍米、黄米、白粟、胡豆、秣、糜、柘、荠、秣、谷、菽、麦、鞠、耩、米、姜等20多种，大多属麦、米、谷三大类。此外，在肩水金关汉代遗址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小麦、大麦、糜、谷、青稞、麻籽、豌豆、大蒜等实物，并有核桃、胡桃和杏核等水果核出现，说明这一时期金塔还种植蔬菜和果类等其他作物。

随着河西地区屯田的发展，中原先进的耕作方法在金塔所在的酒泉得到大力推广。当时，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耕作方法——代田法，在酒泉及西北其他边郡也有大范围推广，选种和施肥技术也有所发展。

西汉中后期，西北地区农业发展成绩显著。在武帝末期的数十年再次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河西及其他边郡地区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粮食丰收。大司农耿寿昌建议，在边郡地区修筑粮仓，积储粮食，谷贱时提高价格收购，保护农民利益，谷贵时减价出售，是为常平仓，民众得到很多便利和实惠。边郡农业丰收，保证了国防巩固和边境安宁，又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畜牧业

在畜牧业发展上两汉统治者采取设立马政，鼓励发展家庭养殖业，保护耕畜等措施推动了金塔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养殖品种主要是牛、马、羊、驼等。此外，还有鸡、狗、兔等。东汉时期河西及整个西北地区畜牧业都很发达。史书记载，东汉西北“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后汉书·西羌传》）建武初年（25年），窦融击败金城郡的先零羌封何种，获牛马羊万头，谷数万斛。后窦融等河西五郡太守上奏归附朝廷，除官僚宾客相随外，还有“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后汉书·窦融列传》），足见当时河西畜牧业的发达。

手工业

两汉时期，金塔境内的工业主要是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小手工业。这些行业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并且能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主要有铁器加工、毛、麻纺织与编织、草编制品、皮革毡毯制品、木器加工、烧砖制陶、食品酿造等。

居延肩水金关出土了西汉昭、宣、元、成时期的遗物2300多件，其中包括金属器、竹木器、丝、麻、毛织品、皮革制品、陶器、漆器和货币、残刀剑、箭、转射、积薪、铁工具、铁农具、笔、砚、渔网等物。在金塔汉代遗址中还出土了陶纺轮等纺织工具，说明汉代会水纺织业已普及。麻布则是当时常见的衣物原料，汉简中麻布及其制品的记载很多，在金塔肩水金关遗址发现了很多麻布及用麻布制作的鞋、袜、帽和铠甲衬里等。

金塔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木器，大致可分为生产工具（如锸、泥抹和木钻杆等）、生活用具（如木塞、木锥、木匙、木梳、袜板、楦头等）、



木匙



转射

房舍配件（如户牡、木拉手等）、守御器（如转射）和书写材料（如木牍、觚、两行等）。

草编用品在金塔境内许多汉代遗址、墓葬中，都有发现。其中席又有“苇席”“蒲席”和“纰席”之分。“苇席”与“蒲席”指所用材料有别，苇席用芦苇，蒲席用蒲草，“纰席”当即衽席，它与苇席、蒲席之别，即在于材料质量的高下。

汉代随着西域地区开发与经营，军民屯垦规模扩大，因官衙民宅建设需要，会水烧砖、制陶业发展较快，并具有一定规模。在金塔现存的许多汉代遗址、墓葬和边塞沿线，都发现有大量汉代制陶窑址和残陶片、砖块等实物。在许多汉代遗址和墓葬中都出土了很多陶制的釜、罐、盆、壶、甑、仓、井、灶和牛、羊、猪等动物偶像以及轺车等，多为泥质灰陶，也有极少数砂质红褐陶。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汉代会水烧制陶器已很普遍了。

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金塔境内已有了酿酒行业。西汉时酿的酒，不是现在经过蒸馏的烧酒，而是未经过蒸馏、提纯的水酒。肩水金关汉简中还有关于豉、酱的记载，说明这时人们已掌握了制作豉、酱的技艺。此外，汉简中还多见有“麴”字，“麴”（同“曲”）可酿酒，也可酿醋、酱等调味食品。

商业贸易

汉代时，金塔一带的商业贸易逐渐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后，丝绸之路得以畅通，随着中西间频繁的贸易往来，两汉时期的商业经济也开始活跃起来。由于会水地处丝绸之路和“草原丝路”南北连接的孔道，加之，会水是北通居延的必经之路，东西、南北商业贸易的繁荣毫无疑问带动了会水商业贸易的繁荣。

当时金塔的市场大致可分为设在乡村地区的基层市场（集市）和郡县治所市场两类。不仅在乡、里设有乡村集市，而且在邮驿机构所在的交通要道和人口聚居的大坞壁也设有集市。不论官私用度，都可到市场购买。汉代市场上买东西，除了现钱交易，还有赁买（即赊买）和赁卖（即赊卖）。但这种赁买或赁卖要立契约，契约要有“旁人”（即中人）和“任人”（保人）。旁人是见证人，保人是担保者。

此外，还有“私市”，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当时百姓或由内地到边郡的生意人所进行的商品贸易活动，二是现役屯戍吏卒的“私市”贸易活动。这两类情况均得到官府的许可和承认，因而是合法的。这些“私市”贸易人，对汉简中边塞地区的经济生活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

汉代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各类商品繁多。既有米、麦、姜、韭、葱等和鱼及各种肉类，也有牛、马、羊、鸡等家畜家禽；既有布币、衣物、鞋帽，也有工具、车辆、茭草；既有刀剑兵器和药材，也有奴婢、田宅及其他杂物。这些商品除金属器和布帛等物是从外地转运而来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本地所产。

汉代为加强市场秩序管理，在京师及各郡县市场都设有市令、长、丞和市掾、市啬夫等，有时也笼统地称为“市吏”。

汉代向商人征的税，分关税和市租两类，前者称“过往税”，后者称“收益税”或“交易税”。

赀算，是汉代一项重要经济制度。两汉时算赋时有修改，但总的看来，大同小异。西汉的财产税以十万为计算标准，不够十万，免税，十万以上每“万钱算百二十七钱”，也就是每万钱交百二十七钱。算是计算单位，百二十钱为一算。

第九节　两汉时期的金塔教育文化

两汉时期，一方面随着金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金塔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中原文化与边塞文化、西域文化在这里交锋与碰撞，形成了新的地域文化。会水的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宗教、司法等有了显著的进步。

教育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确立的时期，这一时期官学和私学都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初步形成了封建社会的学制系统。

西汉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定学制系统。官学分为五级，即太学、学、校、庠、序五级，其中太学为中央官学，为国家最高学府和全国学校的典范，属大学性质；学和校分别设在郡国和县一级，属中学性质；庠和序分别设在乡和里，大致可算小学性质。每个学、校各置经师一人，每个庠、序各置《孝经》师一人，地方官学都是学习儒经的。

西汉文教兴盛以后，私学也发展了起来，包括经师收徒讲学和初级的蒙学。西汉末年，中原动荡，不少士人避居河西。先后迁往酒泉、敦煌的名门望族有索、张、曹等大姓，他们除拥有雄厚的财富外，还有深厚的儒学渊源，他们带来许多文化典籍、著作和儒学知识。他们在当地建立学馆，著书立说，授徒讲学，传授儒家经典，把源于中原地区的儒学传播到河西，极大地促进了酒泉文化教育的发展。

与此同时，初级蒙学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居延汉简可知，与会水相邻的居延地区当时已有了蒙学书籍和习字、小九九的文字记载。

科学技术

两汉时期，农学、天文学、数学、医学等达到了新的水平，造纸、印刷等技术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农学方面，汉代，由于居延大规模的屯田和移民实边，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促进了会水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中原地区发明的耧车和代田法，也在会水得以推广，因“用力少而得谷多”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

西汉成帝时著名农学氾家胜之著的《氾胜之书》也称《农书》。《农书》总结了农业生产的六个基本环节的理论和技术问题，并总结了禾（谷子）、黍、麦、豆、麻和桑等十多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对指导当时农业生产、发展本地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造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金塔肩水金关遗址发现的汉代纸张，在我国造纸史上占有突出位置。1973 年，考古工作者在肩水金关遗址的发掘中，发现麻纸两张。一张与宣帝甘露二年（前 52 年）木简共存，出土时团成一团，经修复展开，长宽为 21×19 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显微观察和化学鉴定表明，它是由本色废旧麻絮、绳头、布料等制成，以苧麻为主要成分，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另一张出土于汉平帝以前的地层，长宽为 11.5×9 厘米，暗黄色，尚含麻筋，线头和碎布头，结构显得较为松弛。这表明至迟于公元前 1 世纪中叶，在遥远的边塞已有了质量较高的纸。

两汉时期的天文历法已经渐趋成熟。汉代的历法研究和运用，从居延汉简的年历表中，可以发现当时的律历水平已经很高了。罗振玉、王国维把这些记载有日月干支的简牍定名为“历谱”，如“元康三年历谱”“永光三年历谱”等。这些历谱可谓我国最古老的日历之一。

居延汉简中发现了大量的“医简”，居延医简称得上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病历。这说明汉代居延地区，中医、中药已得到普遍应用，不论是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还是丸、散、丹、剂等治疗药物配剂，都能在出土汉简中查到实例。

文学

秦汉时期，金塔境内的文学艺术尚处于开创阶段，形式主要有文学、史学等，表现手法简单，艺术风格古拙质朴，带有更多原始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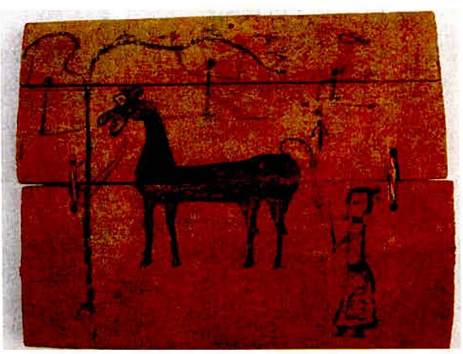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学从自发向自觉过渡的重要阶段，涌现了众多的文学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地处西北边陲的金塔，随着移民屯田的推进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原地区的史传、诗歌等文学也在金塔境内的会水、居延等地兴起和传播。

1973年在肩水金关出土的一枚汉简中写有“谨奉以琅玕一 ，致问春君，幸毋相忘”。这是居延汉简中记载的一位戍边军人写给心爱的名叫春君姑娘的未及发出的书信，堪称穿越千年的“不朽的情书”，也是发现的当时最短的四言诗。

绘画

秦汉时期的绘画艺术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岩画、墓葬壁画、砖石画、木版画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古拙自然、生动质朴，表现手法简练而朴素，具有明显的早期艺术特征。

金塔境内没有发现早期岩画，也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壁画。1973年，金塔境内的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木版画一幅，属昭、宣时期。画面高20厘米，宽25厘米。有两块木版组成，中间两侧用细麻绳连缀。画面以纯黑绘制，右边一棵大树，树下系一匹黑马。画法先以黑线勾勒出马的轮廓，再以黑色填充。马昂首嘶鸣，尾巴上翘。马后方站立一人，侧面，略有胡须，结成发髻，着长袍，束腰带。树上攀缘两人，双手紧握树干。左边一人在奔跑，天空中有五只小鸟飞向



汉木版画

大树。这幅画可能是当时戍边士卒所画，线条古拙简练，形象生动。

书法

汉代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极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书法由篆变隶，由隶变为章草、行书，至汉末，中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笔法不但日臻成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

金塔境内出土的肩水金关汉简，为研究汉字形体的演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肩水金关汉简立足于汉代文化生态，书体多姿多彩，不仅有正规的隶书，也有介于隶楷之间的行书或称新隶书，不仅有近于楷体的字体，还有类似于现今美术字的字体，草书更为发达。汉简中篆、隶、草、行并存。从字形上看，有的字形工整，结体严谨，有史晨之韵；有的轻灵飘逸，烂漫多姿，似为《乙瑛》之教本；有的敦厚朴茂，端庄古雅，颇似后来《张迁》的风格：包容性极强。反映出汉字发展过程中的很多现象，为研究汉字结构发展提供了大量墨宝真迹。

音乐　舞蹈

秦代和汉初金塔境内生活的羌、匈奴等游牧民族，能歌善舞，音乐舞蹈已成为当时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其乐器有胡笳、琵琶、鼙鼓、胡篪等，还有笛，此后又有羌笛，吹出悠扬婉转的乐曲，引起古代无数文人墨客遐想。1974 年居延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一件竹质单管乐器，通长约 24 厘米，管口直径约 1.5 厘米，三面开七孔。据专家考证，认为这是当时俗称的横吹乐器。横吹就是笛的别名，演奏时一鼓和角相伴。

当时流行的少数民族舞蹈为胡舞。《后汉书・五行志一》记载：“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竞为之。”特别是胡人进退有序的舞蹈风采，作为异域文化的象征，引发了汉代人们对其的关注。匈奴人还有走马、摔跤、斗骆驼等娱乐活动。

肩水金关汉简

简牍，是我国优秀的古文化遗存物。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汉简称肩水金关汉简，是众多简牍中璀璨夺目的明珠之冠，多年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与关注。

肩水金关汉简，是指出土于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的肩水金关遗址及其附近的地湾城（肩水侯官所）和大湾城（肩水都尉府城）遗址，总计17000余枚，属居延汉简的一部分。

肩水金关汉简绝大多数是木制的，只有极少数是竹简。就形制而言，有牒、检、板、檄、椠、简、两行、觚、册、符、传、过所、削衣等分类。

通常完整的简牍每枚长23厘米左右（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尺牍），最长达88.2厘米，最短的仅3.8厘米。其中纪年简的上限始于西汉昭帝始元时期，下限至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其中西汉武帝时期和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以后的简数量极少。昭帝至新莽时期的年号简基本上是连续的，属于宣帝时期的最多。

肩水金关汉简内容包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文物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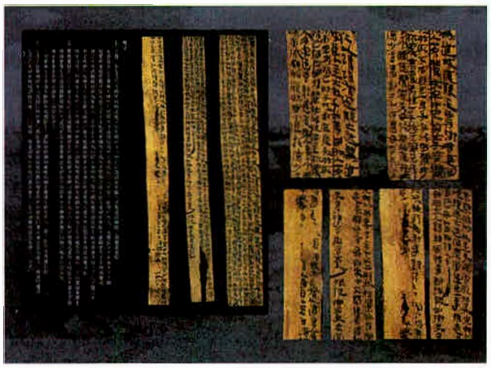
政治方面包括汉代的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等内容；经济方面有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储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其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军事方面，肩水金关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障的文书档案，文中所记载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见的为弩；科技文化方面，肩水金关汉简中记载有《九九表》，同时，居延纪年简多载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这无疑是研究两汉朔、闵排列的第一手资料。

汉律与司法

居延汉简中涉及汉代司法程序的事例较多，从中可以看出汉代司法程

序大体分为事由、举劾、验问、无以证、送证人、鞫系书、劾 、遣书、诏所名捕、狱证、送囚、捕亡、刑名等几大类。

汉代的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徙边、罚金、禁锢、赎刑、族刑连坐等八大类。汉简中对汉代的刑罚也有记载，可补正史之不足。汉代的诉讼程序规定，除一般民事和轻微的刑事纠纷强调“以道譬之”，即按封建伦理道德，晓以道理进行调解外，其他程序均应按《囚律》《捕律》《令》《狱令》执行。



西汉·丞相御史律令

宗教

秦汉之际，匈奴人占据金塔。在宗教信仰上，匈奴人拜天地日月，祭祀祖先，敬畏鬼神，有巫师占卜施法，这是一种较原始的萨满教。

汉代在我国宗教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外来宗教——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西汉时，佛教已传至我国龟兹、于阗等地。汉通西域以后，佛教开始从塔里木盆地经酒泉，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

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汉平帝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御道以南立白马寺，这是中国境内由官方资助建立的第一所有文献可考的佛寺。

大约到公元2世纪晚期，东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时，由于桓帝笃好佛教，民间建祠、造像、礼佛之风的盛况空前。同时也出现和培养了一批略识梵文、粗通胡语，且可与西僧共事翻译佛经的中国沙门和信士者。于是，有规模地翻译佛经正式开始，胡僧传法布教事业也从此正式开始。佛教由仅知顶礼膜拜偶像“神明之耶”的简单宗教仪法，进入输入佛典、探索义理而加以弘扬阐发的新阶段。

第十节　两汉时期的金塔生活习俗

两汉时期的金塔，政治高度统一，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逐渐形成了在住宅、用具、服饰、饮食、婚丧嫁娶等方面丰富多彩的生活习俗。

住宅

两汉时期，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建筑技术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居住条件也有一定的改善。

金塔一带的房屋大多为长方形，大体为基座、屋身、屋顶三段。房屋墙壁有的用木柱为架，中夹秸秆，内外涂抹草泥；有的为夯土版筑而成；少量用砖砌成。屋顶用椽，椽上苫草，或加枝条涂泥，少数也有盖瓦的。农民使用农具、耕畜、车辆等生产资料，庄院需要宽敞。这种宽敞大院，俗称“庄子”。建造时先打一个圈墙叫“打庄子”，是用竖立的架杆夹上墙版，放上湿土，一层一层筑成。这种墙叫“打墙”，用土坯砌成的叫“扎墙”，庄子的大小有 24 丈至 64 丈不等，是指庄墙的周长。庄子由车门、车院、里院（家院）与夹道四部分组成。

生活用具

两汉时期的家庭用具，主要有席、几、床等家具，灶、釜、碗、盘、杯、勺、壶等餐饮用具，炉、灯、罐、桶等生活用具。

两汉时，上自天子，下至黎民百姓，坐卧起居都用席。席一般以草或

竹篾编制而成。座席有一定的讲究，家庭中长辈专席。《后汉书·邓训列传》记载："于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温色。"

几，大多为长方形，矮足，是炕上用的桌子。

床，又称榻，是睡卧的家具。尊者也以床作为坐具。两汉时的床一般为木制，较矮，大多没有栏杆。东汉末，还有一种叫胡床的坐具从西域传入内地。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小用具，和现在家庭使用的马扎相似。

家庭加工食物的用具，主要有灶、锅，还有碗、盘、杯、勺、壶等餐饮用具。这些用具在金塔出土的文物中出现较多。一般的餐饮用具多为灰陶制品，极少施釉，十分简陋。当时使用的灯，有陶质和铜质的，也有木质的，都是燃油的，一般灯的底座较高。金塔县东沙窝汉墓就出土有多种形状的灯。罐、瓶、桶等家庭用具，在金塔的汉墓中都有出土。还有当时人们梳头用的梳及篦，也是汉代酒泉居民梳妆打扮的必备之物。"梳言其齿疏也，篦言其细相枇也"。梳篦在金塔的汉代遗址中也有实物出土。



汉木篦

交通工具

汉代的河西地区因畜牧业发达，人们多以牲畜代步。汉代河西最常见的代步乘用车是马拉的轺车。

除乘人的马车以外，载货运输的牛车数量也大量增加。因其车厢宽大，又称大车、方厢车。汉代金塔民间最常用的运输工具也主要是牛车。

服饰

两汉时期，会水的纺纱业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织物的品质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服饰的样式和品种增多，图案和佩饰也越来越华美。

两汉时期的金塔游牧民族主要是以皮毛为衣。另外还利用动物的毛碾压为毡或编织加工为衣来穿。匈奴人的服饰称为胡服。王国维《观堂集林·胡服考》说，匈奴服饰最大的特点是附蝉为文，貂尾为饰。其冠系以貂尾为饰。

秦汉时老百姓日常生活所穿的服装叫“常服”。常服分为长袍和短衣两大类。长袍源于先秦的深衣，深是把着于上身的“衣”和服于下身的“裳”（约同于裙）缝合到一起的衣服。秦汉时期的袍服分为禅衣、襜褕、腹袍，它们厚薄宽窄不同，因而可以在不同的季节穿。内衣的代表是衫和褲。无袖之衫称为汗衣，样式与现代的马甲相似；褲是夹内衣。上短衣的代表是襦和袭。襦是一种及于膝上的绵夹衣，只能作短衣外用。女子经常穿的往往是上襦下裙。穷苦平民穿麻布短襦挎，衣着窄小，头戴斗笠或小帽。受游牧民族利于骑射的短服影响，袭是没有续棉絮的短上衣，又称褶。两汉时期的鞋称为履。富人多穿丝鞋，贫民则多着草屦、麻鞋。汉代的袜子，有用布帛做的，也有用皮革做的。汉代肩水金关和长城烽燧旁出土文物中，有皮革和麻布类鞋，其中就有大人和小孩子的鞋、鞋垫、袜子等，说明这样的服饰在当时会水已经很盛行。

饮食

随着秦汉生产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肉食的比重增加，烹饪技术有所改进。

在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农作物有大麦、粟、糜、豆、苜蓿、大蒜、核桃、胡桃、杏核等，另有大量家畜骨骼，如马、牛、羊、鸡、狗、兔、骆驼等，其中以马、牛、鸡的骨骼居多。马、牛、骆驼主要用于役力，苜蓿为牲畜饲料，其他都可以看作人们的食品。

面食一般称为“饼”，当时还不会发酵技术。所谓饼，有死面的蒸饼、烙烤的炉饼和水煮的汤饼，汤饼就是今天的揪面片。还有一种由西域传来的胡饼，就是现在我们常见的烧饼。

秦汉时金塔的老百姓主要食品有麦饭和麦粥。麦饭是把麦子蒸熟后晒干而成的食品，能够长期储存而不坏，是人们旅行的必备食品。麦粥在汉代也称麦饭，是用未去皮的麦子煮成粥，是营养价值较高的一种流食。当

部落间或同部落通婚，也实行收继婚。

丧葬习俗

秦汉时期，金塔在丧葬习俗方面除了具备中原地区的一般特点外，还有自己的特殊之处。

一般来说，丧葬之礼以葬礼为中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葬前的丧礼。包括招魂、哭丧、停尸等内容。第二阶段：葬礼。这是丧葬礼仪中最为隆重的环节，这一环节包括三个内容——告别祭奠、送葬、尸体处理。第三阶段：葬后服丧之礼。

会水的丧葬方式大多为土葬。土葬除了受观念和信仰的影响外，其原始的起因也直接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为了防止野兽及鸟类的侵害，为了防止尸体的腐臭及对环境的污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泥土掩埋，掘坑深藏，成为历代相沿的丧葬制度。敦煌从有文字记载的丧葬方式就是土葬。后汉时的敦煌太守仓慈卒于沙州，“千人负土，筑坟于此”(P.3636)。坟墓的形制大多采用封丘式坟。坟的高度是以等级、身份为依据的。封土为坟的作用一是作为墓的标志，二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封丘式的坟形状作圆锥形，这种形制的坟一直沿用至今天。王公贵族则采用墓葬形制。墓葬形制在建筑结构上有砖室和土洞之分。在平面布局上有双室、单室区别。从金塔出土的汉墓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在金塔也盛行厚葬。随葬品除一些明器，如陶俑、木车、彩釉碉楼、井、灶、壶、仓、厕、耳杯、钱币外，还有死者生前用过的一些物品，展现墓主人生前的日常生活。

金塔当时的少数民族葬俗不尽相同。匈奴人是土葬，但没有封堆，而且实行以人殉葬和厚葬制度，“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羌人对死的认识和纪念死者的方法很特别，史载，羌人“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则以刃自刺”。“其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邓）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遂家家为训立祠，每有疾病，辄此请祷求福”。羌族也实行火葬，“羌人死，燔而扬其灰”。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塔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地方割据势力崛起，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十月，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国号魏，史称曹魏。曹魏黄初二年（221年）四月，刘备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曹魏黄初三年（222年）十月，孙权称王，国号吴，史称东吴。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史称三国时期，金塔属曹魏政权统治的酒泉郡管辖。

曹魏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取代魏元帝曹奂建立西晋，于西晋咸宁六年（280年）灭东吴，统一全国。西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匈奴人刘曜攻入长安，西晋灭亡。建兴五年（317年），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在豪族世家支持下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建立偏安政权，史称东晋。

西晋灭亡后，整个北方进入大分裂时代。北方草原民族乘机西进南下，建立割据政权，黄河流域形成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即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分裂割据的局面。其间，金塔先后为前凉（汉族）、前秦（氐族）、后凉（氐族）、西凉（汉族）、北凉（匈奴族）等割据政权所统治。

东晋太元十一年（368年），鲜卑族建立北魏政权并逐步统一北方（后又分裂为西魏、东魏，后又被北齐、北周所代替），史称北朝。

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年），北魏占据酒泉。此后，金塔相继为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统治。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将金塔纳入其统治之下。589年，隋朝灭陈统一全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结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金塔民族冲突的交锋时期，也是民族文化的交融时期。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西来的域外文明在这里交汇，呈现出鲜明的多民族风格与地域特征。

第一节　曹魏时期

曹魏政权的建立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金塔属曹魏统治。

早在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为巩固后方，命钟繇率大将夏侯渊等由洛阳向关中、陇右推进，并亲临前线指挥。曹操利用韩遂、马超之间的矛盾和相互猜忌的弱点，一举击溃关中陇右联军。建安十八年（213年）春，“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6，《汉纪》57，汉献帝建安十八年条），酒泉郡并入雍州。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魏黄初元年）初，曹操死。十月，曹丕废汉自立，国号魏，史称曹魏。曹丕委派安定太守邹岐任凉州刺史，准备经略河西。河西诸郡势力纷起反抗。汉献帝元康元年（220年）五月，西平麴演联合张掖张进、酒泉黄华等周围各郡共同对抗邹岐，武威也发生三种胡叛乱。曹魏黄初二年（221年），汉军先后降服三种胡叛乱，斩杀西平麴演，攻占张掖。敦煌代理长史张恭在派兵攻取沙头、乾齐（均在今玉门市境内）二县的同时，派遣铁骑二百，沿着酒泉北塞从金塔进入张掖，杀死张进。黄华投降，张恭出黑河北段，迎接曹魏新任的敦煌太守尹奉。曹魏黄初三年（222年），曹丕下诏对张恭护境平乱的功绩予以表彰，赐爵关内侯，拜西域戊己校尉，进驻西域。至此，河西地方豪强割据势力被镇压。

统治措施

曹魏政权统治时期，沿用东汉建制，地方行政体制为州、郡、县三级制。

金塔县当时仍叫会水县，隶酒泉郡，属凉州。县以下，也沿袭汉制，设乡、里、亭。

曹魏政权控制金塔后，通过整治吏治，实行屯田等措施，加强对金塔及河西地区的控制。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张既、徐邈等历史上有名的廉吏。他们在各自任职期间，安定民生，改善民族关系，扩大商业贸易，为会水及河西开发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既（170—223年），字德容，冯翊高陵（今西安市高陵县）人。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张既出任雍州刺史。曹魏黄初元年（220年），张既因平定河西之乱晋爵都乡侯。不久，凉州发生羌胡叛乱，曹丕任命张既为凉州刺史。张既平息河西叛乱后曹丕封张既为西乡侯。曹魏黄初四年(223年)，张既病故。

张既先后治理凉州20年，政绩卓著，据《三国志》卷15《魏书·张既传》记载，魏文帝曹丕在诏书中赞曰："故凉州刺史张既，能容民畜众，使群羌归土，可谓国之良臣。"他"治左城，筑障塞，置烽堠、邸阁以备胡"，同时注意妥善处理纷杂的民族关系，使"群羌归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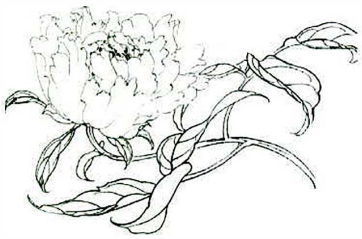
徐邈是曹魏时期治理河西最有成效的官吏。魏明帝太和三年（228年），朝廷特委派护军大将军徐邈任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坐镇姑臧经略河西。

徐邈针对当时河西降水偏少的实际，广开水田，发展灌溉，招募当地无地贫民佃耕。利用当地资源，开挖酒泉、金塔等地的盐池。抑制豪强，解除豪强的私人武装，限制豪强兼并土地。鼓励少数民族开荒，加强中西交流。金塔的社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溢"的富足盛况。在此基础上，他将军费结余部分用于购买西域珍奇之物和马匹等物资，以支持中央政权之用。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徐邈豁达大度，尊重羌胡首领，在羌胡中树立了威信。他用儒家思想教化民众，兴办学校，实行仁义，"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改进民俗民风，割除陈规陋习。于是，境内"风化大行，百姓归心"，得到河西各族民众的拥护。

正始元年（240年），徐邈调任大司农，后转任司隶校尉。他刚正威严，满朝官吏敬畏。正始六年（245年），徐邈病死于洛阳，曹魏政权以公侯之

礼安葬。

曹魏政权为发展河西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在酒泉、敦煌一带大力发展屯田。屯田的形式既有军屯，也有民屯。军屯属于驻防军队的且耕且守，由各地驻军长官所领，司农校尉管理。民屯则多是招募农户和迁徙百姓，由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及典农中郎将等屯田官员进行管理。屯田农户所缴纳的地租实行“分田之术”，用官牛者，官六民四，用私牛者，五五对分。屯田者还享有不服军役的优惠待遇。



时的会水还食用粟，将粟饭暴干而成干糒。秦汉时，人们的副食主要是蔬菜和肉食两类。葵、韭和葱是常见的蔬菜。此外还有菠菜、葫芦、黄瓜、豆芽、蒜等，吃法与今天相同。肉食品可分为家养和野生的两大类。畜禽中以羊、猪、狗、鸡为主。羊肉在人们的饮食中占重要比例。

酒是两汉时人们常见的一种饮料。会水饮酒风气盛行，连屯戍的官兵也喝酒。

两汉时一般人习惯于一日两餐，极少三餐。居延汉简中有“朝三升，暮三升”的记载，说明即使费体力的军人也是朝暮两餐。

婚姻习俗

两汉时期，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巩固发展，婚姻家庭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会水的婚姻习俗与内地习俗略有不同。汉代夫妇双方比较平等。聘娶一般都要有媒人沟通，但也有自由婚、指定婚、抢夺婚等。

东汉时，迁徙至河西地区的妇女，不得因故逃至内地与人结婚，否则会被遣送回边。当时也有不同民族通婚的情况。

汉代法定的结婚年龄，据《白虎通义·嫁娶》所说，是“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都属早婚。

汉代婚嫁的程序还是沿用秦以前的礼仪。聘娶先由媒氏沟通，然后行纳采（向女方家送礼求亲）、问名（询问女子的名字与生辰）、纳吉（卜得吉兆后到女家报喜、送礼、订婚）、纳征（订婚后给女家送重礼）、请期（先定完婚吉日，向女家征求意见）、亲迎（新郎到女家迎亲）等“六礼”。结婚时，就要用一根丝绳束发，成婚后，新郎亲手将丝绳从新娘头上解下，这就是所谓的结发。婚后如果妻子有不生育、淫乱、不敬公婆、吵架、盗窃、忌妒、恶疾七种情况，丈夫可以将其离弃，称为“七出”。如果女子结婚后对丈夫不满意，可以离去改嫁。

金塔一带的少数民族的婚俗与汉族不同。匈奴、乌孙等实行的是收继婚制。《汉书·匈奴传》记载：“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嫁于匈奴的王昭君和嫁于乌孙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都有这样的经历。据说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住家族的财产不至于散落。羌族既实行贵族多妻制、

第二节　晋与十六国时期

曹魏咸熙二年（265年，西晋泰始元年），曹魏大臣司马懿之孙司马炎（史称晋武帝）逼迫魏元帝曹奂让位，建立西晋王朝，定都洛阳。金塔归于西晋政权统治。

西晋时期

西晋统一后，全国设十九州、一百七十三郡。在西北地区，西晋仍沿用汉制，西域长史府统辖西域各国，北边是匈奴，南边是鲜卑。今甘肃一带，有凉、秦、雍三州。河西地区属凉州，凉州刺史部统辖八郡，仍领戊己校尉。酒泉境内设酒泉、敦煌两郡。酒泉郡领禄福、会水、安弥、乐涫、骍马、表氏、延寿、玉门、沙头九县。今金塔县东部属会水县，西部属禄福县。西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改禄福县为福禄县。

西晋政权建立后，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安定民生，发展生产，特别是晋武帝时期，改革行政区划，调整经济政策，减免赋税，发展商品贸易，任用清廉官吏，整顿地方秩序，使社会经济有较大恢复和发展。

西晋建立后，地方豪强势力受到王权势力庇护，得到进一步发展，以致“门阀世族”和“豪门著姓”几乎垄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当时，选官要看家族，取士要看阀阅，以致形成尊贵者永远尊贵，而卑贱者永远卑贱的社会现象，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卷45《刘毅传》）。

这一时期，金塔周边的敦煌兴起了索、氾、宋、阴、张等豪门望族，

或以家学成就影响当世，或在割据政权中留下事迹，尤以出自“累世官族”的敦煌大族索氏最有影响，其中以索靖、索紾父子最为著名。还有索袭、索纮两位著名学者，在通晓经纬阴阳占卜术数方面表现的更加突出。西晋时期敦煌令狐氏势力发展也很快，一度成为地方领袖，割据一方。

酒泉也兴起了一些著姓家族，同样家大业大，门生、宾客众多。如氾腾，他施舍家族一次就散去合钱50万的家产。另如宋纤，仅门下弟子就有三千人。

这一时期门阀著姓统治社会，地方封建势力明显加重，成为地主经济制度的食利者。门阀著姓发展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可以做到“闭门为士”（《晋书》卷26《食货志》）。一旦有战乱发生，庄园主可以利用庄园内坚固的城堡和依附于自己的劳动者组织部曲和家兵，内守外攻。后来庄园功能发生变化，出现了“垒”“堡壁”“坞堡”“坞壁”等称谓。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统一全国后颁布“占田令”，规定官吏可按照官品占有10~50顷的田地，同时拥有1~50户的劳动者作佃客，这个法令为豪强庄园发展提供了保证。此后北方战乱不断，大批流民为酒泉乃至河西一带的豪强地主庄园所收容，许多官僚、大姓也带领宗族、宾客涌入，以寻找新的庄园基地。由于金塔一带土地肥沃，宜农宜牧，也成为豪强地主争相占有的对象。金塔境内现在还遗存的许多坞壁遗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一时期，金塔一带畜牧业所占比重较大，畜牧产品数量多。与畜牧业有关的肉、奶、皮、角、骨、毡毯等畜产品加工，是庄园的主要手工业生产类型。

西晋末至东晋，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兴起，纷纷进入中原建立割据政权。河西的汉、鲜卑、氐、羌、匈奴等民族杂居相处日久，势力日强，趁西晋和东晋王朝无暇西顾之际，也先后拥兵割据，建立了前凉、后凉、北凉、西凉政权。此外，前秦和后秦也一度控制过河西，形成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

前凉时期

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张轨被任命为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统辖河西地区，前凉政权由此肇基。东晋元帝大兴三年（320年，前凉永宁元

年）张茂继位，称凉王，前凉政权进入割据时期。至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前秦建元十二年）前凉灭亡，历9主，共76年。

张轨到达凉州后，在“尊晋攘夷”与“保宁域内”的政治方针指导下，整顿吏治，重建秩序，尊奖晋室，收拢民心，建立制度，发展经济，“兴农修武，保卫州境”“辟土设郡，安置流民，徙石为田，运土植谷”，振兴文化，倡导教化，传授儒学，培育人才，稳定了张氏集团在河西的统治。

西晋建兴二年（314年），张轨病逝于凉州，终年60岁。

张轨死后，其子张寔及其弟张茂先后摄理州事，继续强化张氏家族在河西的势力和地位，巩固其家族统治，割据局面正式形成。

前凉政权经过张轨奠基及张寔、张茂经营治理后，逐渐形成割据局面。东晋太宁二年（324年，前凉太元元年），张茂病死，张骏以张寔世子名分继位，时年18岁。张骏以自己的智慧和魄力，把前凉割据政权不断推向强盛。

东晋永和二年（346年，前凉太元二十三年），西域诸国朝觐张骏，结束晋初以来西域与内地阻隔的局面，前凉割据政权开始运用行政手段管理西域。之后，张骏重新划定疆域，将凉州划分为凉、河、沙三州建制。即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合十一郡为凉州；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威、汉中为河州；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都护三郡三营为沙洲。张骏假凉州都督，摄三州。前凉在诸凉政权中疆域最大，略有今甘肃河西地区、宁夏西部，青海东北部及新疆大部。

永和二年（346年，前凉太元二十三年）五月，张骏亡，张重华继位假凉王。张重华即位后，积极采取措施革新政治，减去民众负担，安定民生，并采取“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圃，以恤贫穷”（《晋书》卷86《张重华传》）的措施，努力发展经济，使前凉政权走向强盛。

东晋永和五年（349年，前凉永乐四年），凉州官吏推张重华为丞相、凉王、秦雍凉三州牧。此时，前凉疆域达到最大，“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到居延”，相当于今甘肃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部和青海、宁夏、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

张重华时期，前凉出了一名能臣谢艾。谢艾，敦煌人，生卒年不详。

担任主簿。此人虽是一名文官，但却善于用兵。张重华的对外措施主要是抵御后赵进攻。东晋永和二年（346年，前凉太元二十三年），后赵兵分两路进攻前凉河州和金城，武街（今甘肃岷县西南）、金城相继失陷，直接危及前凉政权的大本营——凉州，此时凉州司马张耽力荐谢艾出战，张重华破例启用谢艾为中坚将军，配步骑五千与后赵麻秋决战，谢艾大获全胜。东晋永和三年（347年），后赵再次进攻凉州，又被谢艾击败。随后，谢艾又在神鸟（今武威市凉州区以南）打败麻秋军的前锋，迫使后赵退回到黄河以南。至此，谢艾的军事生涯达到顶峰。后，谢艾得到张重华重用，却被张祚与内侍赵长陷害，被迁任酒泉太守。谢艾在酒泉太守任上功绩卓著，曾主持修建酒泉旧城，晋城门（当时的南门）、鼓楼（当时的东门）至今仍保存完整。谢艾著有《谢艾集》，共8卷。谢艾在酒泉8年，加强城区防务，对地方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张祚篡位称王后，谢艾被张祚诱杀。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前凉永乐八年），张重华病死，时年27岁，年仅10岁的儿子张曜灵继位，张祚辅政。张祚废张曜灵自立，荒淫残暴，不但不听从属下劝其施行仁政、保境安民的建议，反而滥杀无辜，罢免贤臣，猜忌群臣，导致人心离散，政权日渐没落。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前凉太清十四年）八月，前秦军攻入姑臧，后主张天锡投降，前凉灭亡。

前秦时期

东晋永和七年（351年，前秦皇始元年），氐人苻健建立前秦政权。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前秦太初九年），前秦被羌人姚氏后秦政权所灭，历六主，共44年。这一时期，金塔属于前秦统治。

前秦建立后，势力扩张至今河南一带，接着苻健平定关中地区。东晋永和十一年（355年，前秦寿光元年）六月，苻健病死，其子苻生继位。苻生生性暴虐，滥杀朝臣，引起不满，人人自危。东晋升平元年（357年）六月，清河王苻法、东海王苻坚联合梁平老、强汪、吕婆楼等发动政变，杀死苻生，立苻坚为大秦天王。

苻坚灭前凉后，在酒泉境内设酒泉、晋昌、敦煌三郡，隶属凉州。太

元七年（382年）苻坚命氐族贵族吕光西征西域，西域诸国皆入贡前秦。至此，前秦统一了北方。统辖版图“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成为十六国中疆域最大的国家。略有今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九省区，四川东部、内蒙古南部、江苏、安徽、湖北北部，以及今蒙古国全境。

苻坚即位后，重用王猛，拜王猛为中书侍郎。推行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严禁奢侈、惩罚豪强、广兴学校、招揽人才等政策，境内百姓安乐，国力大增，使前秦成为当时北中国最强大的政权。

前秦时期佛教文化广为传播。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敦煌莫高窟开始开凿。当时有许多僧人来往于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敦煌、酒泉、姑臧、长安之间。使敦煌、酒泉成为西域佛教文化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中心，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中继站。

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前秦建元十九年）八月，苻坚亲率戎卒60余万、骑兵27万攻伐东晋，被东晋谢石、谢玄率领的八万晋军在淝水打败。淝水一战后，前秦国力一蹶不振，地方势力纷纷起兵反叛，前政权迅速瓦解。当时，关中地区有鲜卑贵族慕容泓起兵反秦。吕光在征服西域之后东返途中得到苻坚战败消息后，统领七万五千兵马急速东进，收复沿途各郡，夺取姑臧，建立后凉政权，金塔一带遂归入后凉统治。

后凉时期

后凉吕氏政权是由前秦政权派生出来的地方割据政权。东晋太元十年（386年）为吕光所建，元兴二年（403年，后凉神鼎三年）为后秦姚氏政权所灭。后凉历四主，共18年。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前秦建元十九年），吕光率兵从长安出发西征西域。一路高奏凯歌，击败西域诸国，小国纷纷投降，一举平定西域。太元十年（385年，前秦太安元年）三月，吕光率部东返。至高昌时传来淝水之战中苻坚战败的消息，吕光以“赴难”名义号召将士急速东进。一路上高昌太守杨翰、敦煌太守姚静和晋昌太守李纯相继投降。九月，吕光大

军经玉门关进入酒泉境内。将到玉门市，凉州刺史梁熙才组织抵抗。吕光急速进兵，在安弥（今酒泉市肃州区东）击败并活捉梁熙之子梁胤。十月，武威太守氐人彭济俘获梁熙，开城投降，吕光顺利进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次年十一月，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羌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十二月，吕光攻克张掖城。随后在凉兴（今瓜州县南部）平定王穆叛乱。吕光遂在酒泉一带设酒泉、晋昌、凉兴、敦煌诸郡。至此，凉州及河西大部地区均为吕光占据。太元十四年（389年）二月，吕光改元麟嘉，在姑臧（治今武威市凉州区）南郊即三河王位，正式建立割据政权，史称“后凉”。

吕光统治时迷信武力，不修德政，一味采取军事高压政策，导致域内人心离散，经济凋敝。在政治方面，吕光采用严刑峻法进行高压统治，杀戮凉州豪族大姓，不断激化民族矛盾，失去河西世族和民众支持，境内各民族势力不断反抗，使境内动荡不安。加之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残杀，内部臣僚多有叛乱，政权危机四伏。在经济方面，吕光不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强征赋税、掠夺粮食，大量粮食囤积在姑臧城中，而河西却出现谷价暴涨，甚至人吃人的困难局面。吕光在位七八年时间，没有出台过任何有关农业生产的法令。为掳掠人口，吕光盲目地将西海郡（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人口强迫迁徙到河西各郡，使居延屯田彻底遭到破坏。在文化方面，吕光自幼“不乐读书，唯好鹰马”，不重视文化发展。早在入姑臧之初，他就杀了凉州名士十余人，导致群贤离心。吕光不敢任用前凉留下的士人，最终被西凉和北凉政权所网罗。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后凉龙飞四年）十二月，吕光病死。临终前，他把政权交给儿子吕绍、吕纂、吕弘三兄弟。此时，后凉内部矛盾重重，后凉政权已经岌岌可危。而兄弟三人也为争夺政权而互相残杀，加速了后凉的灭亡。东晋隆安五年（401年，后凉神鼎元年），吕光之侄吕隆在内外交困之中被后秦姚硕德围困，不得已向后秦请降纳贡，苟延残喘两年后，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后凉神鼎三年）八月，吕隆在南凉与北凉夹击下，彻底投降后秦，将吕氏家族、官僚旧臣及民户一万余户迁至长安，后凉政权灭亡。

西凉时期

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后凉咸宁二年），段业和沮渠蒙逊矛盾激化，晋昌（今瓜州东南锁阳城）太守唐瑶出面联合周围六郡士人共推李暠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建都敦煌（后迁都酒泉），建年为庚子，大肆册封勋望，西凉政权正式建立。西凉政权历三主，存在22年，是历史上唯一在酒泉建都的政权。

西凉政权建立的政治基础是河陇大姓集团联合，担任要职的多数为陇西大姓豪族与敦煌名门望族，其政权一大特色是著姓政治。李暠册封的官吏中，宋、索、氾、阴、令狐、张氏等家族的人数最多，敦煌大姓和名门之后占其中大半，并将前凉名士和贵族后裔网罗到政权集团中。李暠与这些著姓大户通过联姻互为依存，盘根错节，形成了一股足以左右当地形势的强大政治势力。李暠重用河西汉族大姓创建西凉的政策确实起到了号召作用，得到了河西大姓豪族的拥戴，为建立和巩固西凉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推行著姓政治的同时，李暠尊奉东晋为正朔，得到东晋政权的认可，并实施“东伐”“西固”战略。西凉建立之初，仅占有敦煌、凉兴、晋昌、酒泉四郡之地，“地狭民稀”，实力不足。为改变这种形势，创造与北凉抗衡的条件，李暠积极偃文修武，积累物资，扩充地盘，兴办屯田，“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西凉建初元年（405年），李暠开始实施“东伐”战略，决定先迁都酒泉。春夏之交，李暠委任张体顺为宁远将军和建康（治今高台县骆驼城）太守，镇守乐涫（今酒泉市下河清乡皇城遗址）；以宋繇为右将军，领敦煌护军，协同其子李让镇守敦煌；任命其子李翻为酒泉太守。李暠率文武官员迁都酒泉。

李暠迁都酒泉后，逼近北凉辖境，与北凉冲突逐渐加剧，双方形成对峙之势。当初李暠迁都打算“渐逼寇穴”，以求主动，待时机成熟便可直捣张掖，一统河西，成就霸业。但是，事实却是西凉反被北凉所逼。为防范敦煌以北鲜卑和以南羌人部落对敦煌的侵扰，李暠陆续整理敦煌城防，修筑围墙，加强防守。李暠经营酒泉和充实敦煌，为的是攻守有据。在和

北凉的较量中，他不敢轻举妄动。虽有壮志，但面临四面受敌的严峻形势，使他不得不采取战略守势以自保。

经过李暠多年的励精图治，西凉逐渐呈现繁荣局面。西凉强盛时，其疆域北起西海郡（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海西南），南达祁连山，东至今张掖临泽一带，西抵高昌郡（今新疆吐鲁番、哈密一带）。

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西凉建初十三年），李暠在酒泉病逝，终年67岁。李暠共在位十八年（400—417年）。西凉国人将李暠谥号武昭王，墓地称建世陵（位于酒泉城西十五里），庙号太祖。李暠在酒泉的十三年，是西凉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李暠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到唐代武德年间，唐高祖李渊尊其父李昞（李暠的六世孙）为“元皇帝”，追尊其祖父李虎（李暠的五世孙）为“景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亲撰《凉武昭王传》，并收入房玄龄主编的《晋书》。唐天宝二年（743年）三月，唐玄宗李隆基把李暠追尊为“兴圣皇帝”。李暠成为李氏家族史上建国称王的第一人，也是“五胡十六国”国王群体中唯一得到后世皇室追赠“皇帝”称号的国王。

李暠死后，次子李歆被幕僚奉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凉州牧护羌校尉，并大赦境内，改元嘉兴。李歆即位后，逐渐改变了李暠审慎用兵、保境安民的策略，实行严刑峻法，频繁对外发动战争，并大兴土木，使西凉国力虚耗最终走向灭亡。

东晋元熙二年（420年，西凉永建元年）七月，沮渠蒙逊引诱李歆出兵，兵败于蓼泉（今张掖市临泽县境内），被北凉军队杀死。李歆战死后，北凉军队乘胜追击，迫使李歆的几个弟弟酒泉太守李翻、新城太守李预、御林右监李密、左将军李眺、右将军李亮等放弃酒泉，逃往敦煌。沮渠蒙逊统领大军占领酒泉城。

北凉时期

北凉是张掖卢水胡沮渠蒙逊在河西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公元397年建立，公元439年为北魏所灭，历五主，共43年。

沮渠蒙逊（368—433年），卢水胡酋长，世代居住在临松郡（今肃南

裕固族自治县东南马蹄乡）。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北凉神玺元年），沮渠蒙逊借两位叔父因战败被吕光杀害一事，起兵反抗吕光，很快进驻乐涫（今酒泉市肃州区下河清皇城），攻取酒泉。后又包围建康郡（今高台骆驼城），并遣使劝建康太守段业共谋大计。段业被沮渠蒙逊和沮渠男成推为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北凉政权初步形成。

沮渠蒙逊“有勇略，多计谋”，投奔段业后不断建立功业。东晋隆安二年（398年，北凉神玺二年）六月，段业由建康迁入张掖。东晋隆安五年（401年，北凉永安元年）开始，沮渠蒙逊利用各种手段削弱段业势力，并率军围攻张掖，段业被沮渠蒙逊所杀。六月，梁中庸等人共同推举沮渠蒙逊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定都张掖。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北凉永安十一年），沮渠蒙逊占领姑臧。次年，沮渠蒙逊迁都姑臧。同年冬，沮渠蒙逊在谦光殿自称河西王，改元玄始，仿吕光称三河王旧例，设置百官，修缮宫殿，建城门及诸多庙宇殿阁。至此，北凉开始王权统治。

北凉政权建立后，凉州境内四凉一秦五个政权并立。北凉东与建都于姑臧的氐族后凉政权为邻，南与建都于乐都（今青海省乐都县）的鲜卑秃发氏南凉政权抗衡，西与建都于酒泉的汉人李氏西凉政权接壤。建都于苑川（今甘肃省榆中县境内）的鲜卑乞伏氏西秦政权势力强大，经常干预河西事务。沮渠蒙逊不断巩固内部政权，稳定周边形势，采取示外以弱，结好邻邦、驱逐南凉，迁都姑臧、严明纪律，统一法度、休养生息，减轻徭役、推崇儒学，广揽人才等一系列稳定政局、发展经济文化的积极政策，使北凉逐渐强大。

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北凉玄始二年），南凉乐都被西秦攻占，南梁灭亡。沮渠蒙逊开始集中力量西进，准备统一河西走廊。

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北凉玄始九年），沮渠蒙逊对西凉发动全面进攻。采用声东击西、诱敌深入的战术，在蓼泉设伏兵打败西凉军队，李歆被杀死。七月，北凉军队攻占酒泉。421年初，沮渠蒙逊攻入敦煌城，杀死李恂，西凉灭亡。北凉尽得酒泉、敦煌等地。

元嘉十九年（442年），北凉又向西掠取鄯善、高昌等地，西域36国称臣。至此，沮渠蒙逊统一河西走廊。据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记载，北凉盛时，

置3州、统14郡、领57县。其中凉州治福禄（今酒泉市肃州区），统张掖、临池、西郡、临松4郡，领12县；沙州治敦煌，统敦煌、酒泉、建康、凉兴、晋昌5郡，领23县；秦州治姑臧，统武威、昌松、番禾、广武、金城5郡（秦州为北凉后期所置），领22县。金塔仍为会水县，隶酒泉郡。

沮渠蒙逊是个开明的君主。他推崇儒学，重视选用儒家知识分子，是北凉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对“凉之旧臣，有才望者，咸礼而用之”（《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敦煌士人张穆和以儒学著称的刘昞被沮渠蒙逊提拔为中书侍郎和秘书郎，得到重用。北凉还集中了阚骃、张湛、索敞、阴兴、宗钦、程骏、程弘、宋繇等一大批儒学硕士，这对北凉进一步汉化起到促进作用。沮渠蒙逊善于招揽人才，鼓励臣下直言献策，广泛听取臣僚建议。沮渠蒙逊对持不同政见者也能包容，并一视同仁。

东晋隆安五年（401年，北凉永安元年），沮渠蒙逊下达劝课农桑的教令，要求各级官吏明于督察、增加生产，制定典章制度，保证农业生产。沮渠蒙逊深知经济发展与政治密切相关，同时他注重反躬自省，不断调整政策，实行仁政，让利于民。



北凉王子沮渠牧犍放牧图（油画）

沮渠蒙逊对金塔当时最大的贡献是修建了“王子庄”。北凉玄始十年（421年）沮渠蒙逊西巡酒泉北过夹山，见此处土地辽阔，气候适宜，杂草丛生，薪林遍地，实为天然草场，放牧佳地。于是决定让其子沮渠牧犍任酒泉太守，带领部分胡人留驻此地，放牧牲畜。沮渠牧犍留此之后，辗转数十里率众放牧。一天，沮渠牧犍发现一处地方小溪遍地，流水潺潺，水清草茂，绿树成荫，便产生了在此兴建庄园、定居放牧的想法。北凉玄始十一年三月，沮渠牧犍开始抽调人力，筹集材料，选定吉日，动工兴建。历时数月，一座崭新的庄院落成。庄园以土筑围墙，墙高丈余，建筑宏伟，占地百亩。此庄建成之后，游牧众人安居其地，白天外出放牧、夜晚回庄安宿。“不牧畜夜遁，

不惧寒风凛冽”。几年间，这儿便牛羊成群，秩序安定，牧民富庶。夏日，更是一派明媚景象：“野芳发幽香，水草嫩且租，小憩藉草坐，小鸟啼啁啁。握竿欲垂钓，溪水碧波流。”北凉永和元年（433年），沮渠蒙逊病逝，沮渠牧犍离此继任河西王位。



王子庄风情

此后，人们便把此地称作“王子庄”，其遗址位于今金塔县中东镇、古城乡一带。

北凉永和元年（433年），沮渠蒙逊病死，其子沮渠牧犍即位。沮渠牧犍即位后纵情享乐，沉湎酒色，荒殆政事。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夏，被拓跋焘围困于姑臧，在兄弟投降、外无援兵的困境下，沮渠牧犍只得率文武5000余人面缚而降，北凉政权灭亡。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

从公元420年至589年间的16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南朝为宋、齐、梁、陈；北朝为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又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替）。

北魏时期

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前秦太初元年）正月，鲜卑族首领拓跋珪称王建国，北魏政权建立。北魏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灭北凉统一北方，金塔开始归属北魏统治。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为西魏和东魏，金塔归属西魏统治。北魏历14帝，共149年。

拓跋珪建立北魏之初，东征西讨，征服周围部落，不断扩大地盘，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政权。他通过“息众课农”“计口授田”“离散诸郡，分土定居”等政策，巩固北魏政权，加速了北魏封建化进程，为拓跋氏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拓跋珪之后的继任者明元帝，继承了他的政策，发展农业，休养生息，任用贤能，整饬吏治，使北魏政权进一步巩固。

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明元帝去世，拓跋焘继位，为太武帝。他积极向西拓展，击败占据关中的大夏赫连氏政权，元嘉八年（431年），攻占关中，驱逐大夏。元嘉十三年（436年），北魏攻灭北燕，占领辽西。元嘉十六年（439年），北魏灭北凉，占据河西走廊，其势力开始向西域地区深入。

当时酒泉、敦煌分别为北凉余部沮渠无讳、沮渠唐儿占据。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二年（441年），北魏进攻酒泉、敦煌。次年，沮渠无讳、沮渠

唐儿放弃酒泉、敦煌，率领万余人，投奔西域宗室兄弟沮渠安周。酒泉遂被北魏占领。北魏灭北凉后，依例在河西地区建立军政制度，在酒泉境内设敦煌镇（后改瓜州），治敦煌县，辖酒泉军、晋昌戍、乐涫戍等。

至此，从公元4世纪开始的北方分裂局面，重新归于统一。中国进入北方北魏政权与南方刘宋政权相对立的南北朝时期。

北魏在西北地区的行政建制，基本沿袭魏晋以来的州郡制度。据《魏书·地形志》所录，北魏在西北地区设立二十一州、七十六郡。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罢敦煌镇置瓜州，辖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效谷、寿昌七郡，州刺史驻敦煌。至此，北魏在今甘肃境内设置8州，统45郡，领113县。孝昌二年（526年），废会水县，按水系将县境西部（王子庄）并入酒泉，东部（毛目）并入张掖。

北魏是北方游牧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的政权，在西进、南下过程中，吸收了多个民族。北魏政权建立后，民族矛盾尖锐，各地方政权之间相互攻伐和兼并，连年战争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社会衰败。为巩固政权，北魏统治者采取因地制宜、胡汉分治，迁移人口、充实内地，减免徭役、赈恤灾荒，重视农业、发展经济，推崇儒学、兴办教育等一系列政策，缓和民族矛盾，发展经济，重新建立社会秩序。

北魏拓跋珪称帝后，注意劝课农桑，积极制定赋税制度。北魏统一河西后，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行屯田，并广泛推行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颁布三长制（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均田令。实行后，国家直接控制的自耕农民大量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相应增加，农民赋税负担也有所减轻，使北魏社会经济得到明显恢复和发展。北魏的三长制后来成为北齐、隋、唐时期乡里组织的基础。

北魏统治后期，鲜卑贵族生活日趋腐化奢靡，官吏贪婪残暴，百姓兵役、徭役、赋税负担日趋沉重。境内各种矛盾逐渐尖锐并不断激化，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各地起义风起云涌，来势凶猛。在外部民众起义打击之下，内部变乱也不断发生，权臣之间的争夺也更加激烈，他们争权夺利，相互攻杀，北魏统治大权旁落，难以为继。北魏永熙三年（534年）七月，高欢攻破洛阳，孝武帝西奔关中投靠宇文泰。十月，高欢拥立11岁的清河王元亶世子

元善为帝，是为孝静帝。后移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史称东魏。孝武帝西奔关中后，宇文泰迎接到长安，建立西魏政权。至此，北魏分裂为西魏和东魏。此时，金塔归属西魏统治。

西魏时期

西魏是从北魏政权中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都城在长安。其统治时间为（535—556年），历3帝，共22年。

西魏政权的建立者是宇文泰。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年），割据关中的宇文泰立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史称西魏。

西魏在今甘肃境内置20州，统46郡、领99县。今金塔县属福禄县，隶酒泉郡。

西魏建立之初，宇文泰为保证政权的稳固，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发展经济，改革兵制，国力不断增强，最终统一北方。

在政治方面，西魏建立之初，宇文泰即颁布新制，施行六条诏书，即：一先治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罢除门阀制度，“唯才得人”。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尽地利、均赋役两条。尽地利的中心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强调令民废农者，是则绝民之命；抓农时应同抗洪救灾、打击盗贼一样紧急。均赋役，重点是强调不优容豪强，不压抑贫弱，不放纵奸巧。西魏继承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西魏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如天子亲耕籍田、下劝农诏、灾年开仓济贫以及各种类型的赈灾，罢苑弛禁等措施。在军事方面，宇文泰实行府兵制。设立之初，府兵大多是“六镇”的鲜卑族。后来随着战争扩大，开始招募汉人从军。通过官制和兵制改革，加强了统治集团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宇文泰的改革使西魏不断强大。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十月，宇文泰病死，临终前将权力交给宇文护。同年底，宇文护逼迫恭帝让位，立宇文泰长子宇文觉为天王（即北周孝闵帝），西魏灭亡。

北周时期

公元 557 年，西魏权臣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皇帝宝炬，自立为帝，建立北周。公元 581 年，北周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北周灭亡。北周历 5 帝，共 25 年。

北周建立后，宇文护为大司马，掌军政大权。北周闵帝元年（557 年）九月，宇文觉称天王不到一年，被宇文护杀死，年仅 16 岁。宇文护立宇文泰庶长子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三年（559 年），宇文护杀明帝，另立宇文泰四子宇文邕为帝，改元保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武帝。周武帝通过改革使北周很快强大，最终统一北方。

北周在今甘肃境内置 17 州，统 37 郡、领 72 县。今酒泉境内设酒泉、敦煌、常乐三郡，分别隶属甘州、瓜州统辖。今金塔县地属福禄县，隶酒泉郡。

北周政权建立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巩固政权，以加强统治。北周武帝大力推行改革，在政治上，推行六官制，削弱大臣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军事上，继续实行北魏以来推行的府兵制，并有所改革，加强了皇帝对禁军的统领。在文化上，崇尚儒术，设立学校，并下诏灭佛，将百万僧侣转为国家编户和均田农民，使北周劳动力增加，国家财力得到增强。在经济上，通过实行汉化政策，擢贤才，提倡廉政，利用地利发展农业，使北周很快强大，最终攻灭北齐，统一整个北方地区，为隋朝统一全国奠定基础。

周武帝死后，长子宇文赟即位，史称宣帝。周宣帝纵情声色，不恤政事，致使朝政昏乱不堪。北周大象二年（580 年），即位不到两年的周宣帝病死。其长子宇文阐即位，年仅 8 岁，史称周静帝。静帝年幼，由宣帝嫡妻天元太皇后杨氏的父亲杨坚任假黄钺、左大丞相，掌握朝廷大权。杨坚抓住时机，剪除宇文氏诸王势力，平定诸路反抗势力。北周大定元年（581 年，隋开皇元年）二月，杨坚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史称隋文帝，北周灭亡。宇文阐也在禅位后次年五月，被杨坚所杀。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塔人口

曹魏初期，河西地区战事不断。社会的动荡，造成会水“民夷流散”“户口损耗”的局面。曹魏平定动乱后，采取安抚、招怀各族流民、推广农业技术等措施，发展河西经济。随着经济的繁荣，金塔人口得到了恢复性发展。

西晋时期金塔境内相对安定，大批流民迁入，人口稳步发展。《晋书·地理志》记载：“酒泉郡县九，户四千四百。”按当时西晋全国户均6.57人计算，则酒泉有28908人，按九县平均，会水县有489户，3212人。

十六国初期中原战乱不断，河西地区相对稳定，中原大批人口因避难而迁入河西，促使会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

前秦灭前凉后，前秦将东南所掠得人户迁到酒泉等地。前秦建元末（385年），又从中原迁入七千余户。这两次使酒泉人口猛增。酒泉郡人口增加为3.07万户，122800人，按九县平均，会水县3411户，13644人。

西凉政权曾采取设置侨郡县的有效措施，集中安置江汉及中原地区移民，通过劳动力综合开发及利用，促进河西经济开发与发展。李暠所安置的人口，江汉人口一万余户，中州人口七千多户，武威东部人口数千户，按照当时每户平均五六口人的基数计算，总计有近两万户十余万人口。这些人口最初安排在敦煌、晋昌二郡。李暠东迁酒泉后，这些人口又向酒泉等地迁移。并在各郡县间迁徙，使酒泉各县人口分布渐渐趋于合理，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据《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载，随同李暠迁出的敦煌人户达23000，按每户4口的规模推算，约有92000人迁入酒泉。加上原有人口，使酒泉成为当时河西人口密集的地区。

北凉攻灭西凉后，在会水建设牧庄（后称王子庄），迁徙部分牧民在此放牧，使会水人口得到增长。



会水城遗址

北魏攻灭北凉以后，河西境内人口被大批迁往平城，又有大批人口外逃，造成河西人口数量的骤减。北魏统一北方后，十六国时期从中原和关中逃往、迁移到会水的人口，部分自发地回迁。人口大量外徙，加上北魏征服过程中的人口伤亡，导致会水境内人口下降。这一时期会水县建置也被撤销，将会水并入酒泉就是人口减少的很好证明。

西魏、北周时期，酒泉一带实行均田制，并且与“记账制度”和“户籍制度”相结合，重视农村劳动力的利用，这些措施既有利于农业发展，也有利于人口发展。因此，西魏、北周时期金塔人口较北魏时期有较大发展。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塔经济社会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百年间，群雄逐鹿中原，战乱频繁，百姓流离失所，而河西地区相对安定。中原大批硕学宿儒和百姓纷纷背井离乡，逃往河西避难，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金塔虽然经历了好几个民族政权的交替统治，有多次民族的交锋与冲突，但与战火频繁的中原地区相比，总体来说还是相对稳定。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中原文明和西域文明在这里交汇，呈现出了鲜明的多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

这一时期，酒泉作为丝路重镇，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和经济基础。而当时的会水县（今金塔县）作为酒泉面积最大的县和离酒泉最近的县，一度还并入酒泉和福禄县（今肃州区），在酒泉的带动下，其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经济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历代政权多采取大兴屯田、劝课农桑、奖励农耕的政策，使金塔农业得到了较快发展。金塔完全摆脱纯自然状态的生产境况而进入有计划的开发阶段，开始步入农业文明的新时期。中原新型生产技术马拉牛耕和生产工具铁犁木耧的不断引进，灌溉方法的改进，使农作物品种增多，亩产量提高，农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农牧业互补的格局基本形成，出现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溢”的盛况。

曹魏时期，入居河西地区的鲜卑部落，在金塔、居延一带开辟出新的畜牧基地，形成新的生产潜力。加之曹魏政权对羌胡部众采取怀柔政策，鼓励发展畜牧业，有效促进了金塔一带畜牧业的发展。此后，占据金塔的

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均重视畜牧业发展。到北魏灭北凉前，北魏军队追击柔然，至张掖水（弱水）后折向北，在金塔、居延等地所见牛马漫山遍野，返回时，光马就带回 100 多万匹，杂畜则不计其数。可见当时金塔畜牧业发展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金塔境内以皮袄、皮靴、皮帽、车饰、挽具等为主的皮革加工业，以制作刀、矛、箭、弓、弩、甲等兵器和刀、斧、锯、锸、剪、犁、锄、镰、铲、锛等农牧业生产工具为主的冶炼加工业，以加工耧车、犁、耙、耱、牛车、连枷、木锸、叉和犊车、辎车、安车的木器制作业，以酿酒、做醋为主的食品酿造业，桑产业、制盐业都有较快发展。金塔境内遗存有大量的魏晋时期的墓葬，很多墓葬是砖室结构，大量的墓砖说明了当时烧砖业的发达。从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来看，仅陶器一类，就有陶罐、陶盆、陶壶、陶仓、陶井、陶炉、陶楼、陶灶、陶樽、陶碗、陶钵、陶盘、陶案、陶俑、陶牛、陶羊、陶鸡、陶车等数十种，上百件。这些物品说了陶器制作的发展盛况。



铜玉人灯



陶壶



陶盘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由于战争影响而时断时通，但各个地方割据政权建立以后，都很重视与周边地区发展贸易。由于金塔地处酒泉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战略孔道，商业贸易得到了一定发展。魏晋时期，中亚、西域各国商人经丝绸之路西段进入酒泉后，有一部分经金塔县出居延、越河套，进入中原地区的长安、洛阳等地。西域和欧洲商人用玉石、各种毛制品、马、骆驼、棉布等与内地的锦、绢、纱、绮、罗、刺绣等丝织品，以及铁器、漆器、铜镜等物品进行交换，还用粮食交换内地的食盐。当时，在交通要道上的一些中心城市形成了都市贸易集散地，如酒泉，由于客商

云集，货品聚集，商业贸易非常繁华，逐渐形成商业中心。在县城治所，是各族群众进行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当地农牧民、小手工业者在此交易，也有专业从事商贸活动的行商坐贾，还有沿丝绸之路到中原贸易的西域胡商。他们的交易行为受到当地政府的管理和保护。在农村人口相对密集的乡里已经出现集市。各族小商贩、农牧民用皮毛、粮食、牲畜、农具等手工产品，到集市上换取生产生活必需品，或赚取有限零售利润。

文化　科技　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金塔文化呈现出南北交流、东西交融的特点，儒学、文化、艺术、科学相互影响和促进，金塔文化一度呈现出繁荣景象。

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各个割据政权出于安定邦域、维护统治的需要都提倡儒学，并积极开办了一些公私学校，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任用，尤其是西凉国主李暠，注重教育，兴办学校，继承西汉以来实行的州选秀才，郡举孝廉的政策，增设秀孝之科，重视从儒生中选拔士人，不断充实统治机构。他们还重视汉文经籍的典校和编著，促进儒家经典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各地方割据政权均比较重视史书编著，尤其是注重自身历史的总结和记载。仅曹魏时期完成的著作就有十余部。敦煌人阴澹、刘昞都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著述颇丰。

魏晋南北朝时期，酒泉、敦煌一带文学昌盛，诗歌、散文不乏力作，尤其是西凉国主李暠所做的《述志赋》，是存留至今的五凉乃至整个十六国时期唯一完整的赋作。全赋九百二十余字，共分六段，波澜起伏，跌宕回环，古奥典雅，情笃意切，非常感人，是南北朝文学中难得的佳作。

魏晋时期，《博物记》记载了酒泉延寿县（今甘肃玉门市），西域龟兹发现石油。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博物学家、辞赋家对天然气燃烧的壮观和瑰丽景象都做过记载。

造纸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最终完成了由简到纸的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自觉的一个时期，也是书法由隶书向楷书

转变的重要时期，章草也逐渐演变为今草，行书和楷书也趋于成熟，孕育了钟繇、索靖、陆机、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等举世闻名的书法家，并且以“二王”书法为代表的“晋韵”书风也随之确立。从现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碑、贴及传世墨迹来看，真、行、草、隶、篆众体皆备，丰富多彩，灿若群星，在书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宗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空前社会动荡与民族交融。多民族间冲突加剧，政权更替频繁，战争不断，人民饱尝战争疾苦，希望得到神灵保佑，消灾免祸，祈求平安，佛教信众日益增多。地方割据政权的君主，也亟须为自己寻找精神支柱，希望利用佛教来惩恶扬善，缓和民族矛盾，并借宗教维护统治。因此，佛教在北方广为流行。据《首楞严经》后记中记载：癸酉年（373年）凉州刺史张天锡，请月氏优婆塞支仑在州内正厅堂、湛露轩下，出《首楞严经》《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日未经》4种，由龟兹（新疆库车）王世子帛延翻译。译经时，在场的有会水（今金塔县）县令马奕，可见当时会水一带信佛的程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窟造塔盛行，墓室壁画，雕塑彩绘艺术发展到又一个高峰。敦煌莫高窟的许多洞窟开凿于这一时期，壁画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西域风格、敦煌本土风格和南朝风格的壁画在交融中不断发展。酒泉、嘉峪关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大量壁画墓，记录和反映了当时境内各民族生产生活、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民族风情、文化发展、人文景观、文化交流等情况，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研究美术史和魏晋民间绘画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

由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及西域游牧文化在此时期得到空前广泛交流，促进了文化的全面发展与繁荣，音乐、舞蹈、百戏艺术有了飞速发展。仅酒泉出土的魏晋墓室壁画描绘记载的乐器就有箜篌、琵琶、阮、秦筝、洞箫和长笛、手铃等；百戏艺术形式有角抵、扛鼎、筋斗、骑射、走索、眩人、幻术、弄丸、扭腰伎、东海黄公、鱼龙曼延、吞刀吐火等。

第六节　考古发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实物

魏晋衣物疏

2011 年 4 月，在金塔县板滩墓群内的一座魏晋墓葬中出土的一件“衣物疏”。该衣物疏为一长方形木牍，已残断为 3 块，右侧完整，上、下两端均有缺损，左上侧缺损严重。残长 15 厘米，下宽 6.5 厘米，上宽 4.3 厘米，厚 0.4 ~ 0.6 厘米。木质已严重腐朽，多数字迹模糊不清。所书文字从木牍右上角起头竖写，残存八行。释文如下：第一行：“故布衫一领故□□□二量□□□□故□□”；第二行：“□二□故纚群（裙）二领故布群（裙）三领故□□”；第三行：“□□故□一具□□明器一口故□□□”；第四行：“故□履一量故□履一量故□□”；第五行：上部三分之一缺失，缺失部分下有“二双”二字，以下空白，最下面有“故□□”三字；第六行：上半部分缺失，缺失部分下有“双”字，以下空白，最下面有“采带□”三字；第七行：上部三分之二缺失，缺失部分下有“杂衣物五十六种□”；第八行：上部三分之二缺失，缺失部分下有五字，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据此推断，这可能是墓主人随葬物品的清单，即“衣物疏”。此衣物疏在金塔汉晋墓葬中首次发现，实属罕见。（附照片）


魏晋衣物疏

衣物疏，是古人放置于墓葬中的随葬物品清单。墓中随葬物品清单的

习俗，在华夏文明中由来已久。衣物疏，是从遣册发展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遣策的一种。遣策是战国时期先秦古人在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以简牍为主要书写材料。到了汉朝初年，古墓中又出现了一种不同于“遣策”的简牍，学者或称之为“告墓牍”，或名之曰“告地下官吏文”，有的学者也叫“告地策”。“告墓牍”实际上被当作一种冥界凭证，用以保障亡灵在冥界正当通行、居留和占有财物的权利。这一时期，在记录随葬物品内容颇为广泛的“赙方”与“遣策”的基础上，专门的“衣物疏”“物疏”“小物疏”等出现。约从东汉开始，又流行一种在墓中放置“墓莂”（俗称“买地券”）的习俗，就是模拟人间土地买卖的契券格式，虚构向神灵购买坟墓地权的契券，这种契约多数是刻在长方形的铅板上，也有的刻在玉板或书写在铁板、陶柱、青砖和石等物之上。待到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在墓中放置一种陶质的“镇墓瓶”，瓶内有时还盛放朱砂、雄黄、水晶等物，瓶上有朱书文字和附录，当代学者称这种文书为“镇墓文”或“镇墓解除文”。

魏晋时期，“告墓牍”与“镇墓文”渐行消失，“衣物疏”继承了两汉时期的定式。

此衣物疏在金塔首次发现，实属罕见，一方面填补了金塔衣物疏的空白，另一方面，为研究金塔魏晋历史和这一时期的民俗及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佐证。同时，也为考证魏晋衣物疏的书写格式和用词规范以及魏晋时期的书法艺术和汉字演变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魏晋时期是中国汉字书法趋于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件衣物疏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时期书法的活标本。更重要的是这件衣物疏的记载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服饰文化。从这件随葬衣物疏清单内容看，当时活着的人们希望死者在冥世继续生活，所以为他们陪葬了日常生活中所能用到的一切物品，上至冠帽，下至鞋袜，春夏秋冬、里里外外应有尽有，如衣、裙、裤、面衣、鞋、袜、枕、被、褥、糸（丝）带等日常生活用品和饰品，再现了当时这一地区居民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

魏晋伏羲女娲棺板画


伏羲女娲棺画

2007年7月，金塔县博物馆对大坡梁墓群内一座因受雨水侵蚀和车辆碾压而塌陷的古墓葬进行清理，墓室为单室土洞结构，东西长2.8米，南北宽1.4米，高1.6米，内有棺木两副，为双人合葬墓。经现场清理，棺木木质为西北特有的沙枣木，左边棺木和尸骨已腐烂，右边的棺木保存较好，在长2.5米，宽0.6米，厚0.05米的棺盖内侧绘制有彩画。据考为女娲与伏羲人首蛇身画像，伏羲头戴山字形官帽，左手托日，右手持矩；女娲头盘发髻，右手托月，左手持规，象征天地方圆。两人身为蛇身，缠绕交错。画幅上下以墨线勾绘日月星辰，象征整个宇宙。画像描绘手法古朴自然，形象生动，线条流畅，色泽艳丽。

魏晋木牌楼


木牌楼

2011年4月，金塔县板滩墓群内一座魏晋墓葬内出土了木牌楼1个，上下共有三层，6幅画面，内容为人物和松鹤；木版画11块，画面内容以人物和松鹤为主，一块木版用白、黑、黄三色画一白虎形象，昂首张口。这些木版有的有明显的焚烧痕迹，残缺不全，但从它们的结构看，当时应该是组合在一起的。其中一块保存较好的木版，画面中为一老者坐在凉亭里乘凉喝茶，面前一童子正在烧水。画面形象鲜活，用笔简洁，构图质朴，体现出了当时

的艺术风格和绘画思想。

此外，金塔博物馆还收藏有许多出土于本县魏晋墓的陶器随葬器物，既有日常生活用品，如陶罐、陶樽、陶仓等，还有一件陶灶，质地为灰陶，整体平面呈三角形，上呈三角形分布有三个圆形火口，前侧有长方形的灶门，也有交通工具，如魏晋陶轺车，质地为灰陶，形似推车，双轮，双辕。车轮与车厢可以分离。轺车造型逼真，线条粗犷有力，表现力强，质地坚硬。并有大量动物画像，如褐陶牛，呈颔首站立状，两眼直视前方，四肢粗壮有力，形态逼真；陶卧羊，质地为灰陶，呈俯卧状，羊角转向，嘴微张。该藏品制作的泥坯略显粗糙，但刻画手法新颖独特，用寥寥几刀就雕刻出栩栩如生的羊形象，实为随葬器皿中的精品；陶鸡，质地为灰陶，鸡头、腹、尾全，形似啄食。该藏品捏塑而成，手法简单，形象逼真，虽属随葬器皿，但也不乏艺术观赏性。这些随葬明器，既体现了当时手工业水平的高低，也为研究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和丧葬习俗提供了实物依据。



轺车



陶灶



陶羊



陶鸡

第四章　隋唐时期的金塔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后，金塔纳入其统治范围。唐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武德二年（619年），收复河西走廊，金塔纳入唐朝版图。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西部边塞防务空虚，吐蕃趁机向唐朝发起进攻。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吐蕃攻陷金塔所在的肃州。唐玄宗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人张议潮起兵反抗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十一州。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建立归义军割据政权，归附唐朝。此后至五代、北宋前期，金塔一直为归义军政权所统治。

第一节　隋王朝统治下的金塔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周静帝宇文阐年幼，隋国公杨坚辅政。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杨坚自立为帝，国号隋，并改大定元年为开皇元年。杨坚称帝后。于开皇七年（587年）灭梁，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380余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

行政建制

隋初地方建制沿袭州、郡、县三级，后来，隋文帝、隋炀帝父子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废酒泉郡，置酒泉镇，镇设都大将，隶甘州。仁寿二年（602年），酒泉镇从甘州分出，设肃州，州置总管，领福禄县（包括金塔县）。酒泉称肃州由此开始。隋大业元年（605年），罢肃州，福禄县归张掖郡管辖。大业十三年（617年），改福禄县为酒泉县（包括金塔县）。

隋初，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是5家为保，5保为里，4里为党，皆置“正”，以相检察。开皇九年（589年），又改百家为里，置长1人；500家为乡，置正1人，处理本乡诉讼争议。后来，以乡正处理诉讼不公，遂罢之。设坊对州县城郭进行管理，每坊置坊主1人、佐3人，以与乡里行政组织相区别。

统治措施

杨坚在位进行了很多改革。他对边疆尤其是河西，采用了特殊政策。这些政策对于稳定边疆局势，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隋立国仅38年，而与突厥的战争则从开皇元年（581年）到大业三年（607

年），持续了26年之久，可以说隋与突厥的战争贯穿整个隋朝历史。这对地处战争前沿的金塔产生了巨大影响。隋朝初年，突厥多次寇掠河西一带。金塔是突厥进攻河西的前沿，经常受到袭扰。隋文帝在边境修堡障、竣长城、屯聚重兵，以防御突厥进攻。同时，采取远交近攻、离间强部、扶助弱部和以谋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战略，施用反间计，分化瓦解突厥，削弱其势力。直到开皇十九年（599年）将其彻底消灭，从此，突厥在历史上消失。

隋文帝实行“正长制”，即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里，设里正，四里为党，设党长，这是基层的政权组织形式，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查户口。当时金塔所在的张掖郡有三个县：张掖、山丹、福禄（包括金塔县），即现在的张掖市和酒泉市肃州区、金塔县，总共只有6126户。若按县平均，每县只有2042户。这与《地理志》等书籍的记载相一致。查实户口的目的是为了实行均田。隋朝规定，男女3岁以下为黄，10岁以下为小，17岁以下为中，18岁以上为丁。丁从课役，60岁为老，乃免。从诸王以下至民众，都给永业田。最多的给100顷，一般民众男丁80亩，女丁只有40亩。河西地旷人稀，一般平民夫妻可分140亩永业田。均田使民众有了自己的土地可种，荫户有了独立的门户，提高了民众农桑生产的积极性，使社会财富增加，这对巩固边防、安定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隋文帝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文帝颁诏书：“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一改过去军士在地方无户籍的规定，将户籍定在州郡，在均田中亦可分到土地，兵和农就完全合一了。实行府兵制，农业生产有劳动力，副业生产也有劳动力，生产得到了发展。保卫边境安全有府兵，府兵中又有乡兵。乡兵又叫部曲，大部分时间在坞壁中。有如此兵农合一的府兵，外有将士卫边，内有部曲防盗治安，为发展生产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这是隋文帝对凉州镇将子干的诏命，也是对河西的基本政策。由于河西走廊一带经常遭到吐谷浑和突厥的寇扰，从西汉后期、东汉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河西一带坞堡（亦称坞壁）林立。

充分利用和加强这些坞壁，不失为因地制宜的好办法。它在平时既可生产粮食，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还可积累一些，以防备战乱和灾荒；敌方来了，也不易被劫掠，适当时候还可出击敌人。由于坞壁经济的不断发展，隋代自立国近二十年后，河西一带，尤其是张掖已成为当时西部的国际贸易市场，裴矩专管市场的“交市”。

隋代还鼓励将生产的粮食储存起来，在内地设有大仓，在州郡县也设有仓库，各地还设有义仓。义仓又叫社仓。这种义仓本是民间的自助储备，但朝廷却分上、中、下三等纳税。并将义仓归州郡管理，对旱俭之年实行救助。

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隋朝建立之初，将国子监从太常寺独立出来专管教育，这是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国子监和国子祭体制的设置，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使学校教育有了社会组织保证，促进了学校的兴盛。

隋文帝“雅好符瑞”，非常佞佛，尊佛教为国教。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登基后，即令境内之民听任出家，在河西营窟造寺。杨坚还多次下诏保护佛教造像，提倡佛教事业，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当时佛教及相关文化事业的发展，仅敦煌莫高窟现存的开凿于隋朝的洞窟就有94个。

裴矩与《西域图记》

隋大业元年（605年），为了发展西域的商路交通，隋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矩驻张掖，隋大业元年至九年间（605—614年），裴矩往来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之间，主持与西域各民族和西方各国贸易及交流等事宜。裴矩利用和胡商接触的便利条件，倾心结交西域各国官吏、商人等，注重了解西域各国的山川地势、风土人情、服饰物产等，尽力搜集西域各国山川险易、君长姓族、风土物产等资料，用彩色绘画各国王公庶人服饰仪形，将所记、所画的撰写成《西域图记》三卷，成为一部有丹青绘像、有地图、有记述的相当完整的地理学著作。《西域图记》详细总结记录了当时从敦煌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即北道（又叫新北道）、中道（即汉代的北道）和南道。对西域丝路完全明确化，为中原与西域的交往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隋炀帝西巡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为了拓通丝绸之路，经营西域商贸“互市”，保证长治久安，决定西巡。

大业五年（609年）正月二十日，隋炀帝一行离开东都洛阳，于二月十一日到达西京长安，三月二日离开长安后溯渭河西上，经武功、扶风（今陕西凤翔县）、至天水，经陇西（今甘肃陇西、渭源一带）、狄道（今甘肃临洮），出临津关（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黄河南岸）渡黄河，到达西平（隋西平郡治，在今青海乐都），陈兵讲武，演习军事。入长宁谷（今青海西宁市北川河谷地），过星岭（今青海大通县北），十九日宴群臣于金山之上（今青海门源县南达坂山）。二十一日过浩门河（今青海门源县境内的大通河）。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七日派遣诸将围困吐谷浑主于覆袁川（黑河上游，青海祁连县一带），吐谷浑的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六月八日经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县扁都口），十一日至张掖。

在张掖期间，隋炀帝登山丹焉支山，参禅天地。六月二十一日，在张掖举行盛会，谒见西域各国君主及使臣，举行盛大的商品交易会，史称“万国博览会”。高昌王、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隋炀帝随即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且末（今新疆且末县）四郡。这次“万国博览会”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人数之多，耗资之巨，堪称史无前例。六月二十三日，隋炀帝大赦天下，然后车驾东还。

隋炀帝西巡，历时近10个月。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巡幸河西的中原王朝帝王。此次西巡，行程数千公里，途经今陕西、甘肃、青海等部分地区。隋炀帝西巡和对吐谷浑征伐的胜利，彻底解除了丝绸之路上的威胁，隋的力量一直推进到且末、鄯善、伊吾等广大地区。中原与西域、西亚交往的所有道路全部畅通，南北门户洞开，为后来丝绸之路贸易的更加繁荣奠定了基础。至此，隋朝在西北的开拓事业达到了顶点，其地“东南皆至于海，西北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隋书·地理志》）

第二节　唐王朝统治下的金塔

唐朝的建立

隋末，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遍及全国。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六月，太原太守李渊传檄诸郡，起兵反隋。河西五郡被李轨的大凉政权控制。

隋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隋炀帝之孙杨侑禅位于太原太守李渊，李渊称帝，建国号为唐，建元武德。

唐武德二年（619年），秦王李世民率兵进军陇右。李渊在遣使与李轨结好遭拒后，李渊遣安心贵发动少数民族兵马包围了凉州城，将李轨擒获。李渊委派在张掖当过太守的杨恭仁出任凉州总管，河西从此归属唐朝。随后，唐朝又平定了窦建德、王世充、萧锐等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行政建制

唐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有道、州（郡）、府、县等机构。唐代州（郡）或府，均管辖县。县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所谓赤县，指京都所在的县；畿县，是京畿地区的县；望县和紧县，都是繁盛紧要地方的县；至于上、中、下县的区分，则以户口为标准。《唐会要》记载："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这是就中原地区说的。在边远地区，户口数在"五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而"赤、畿、望、紧等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

县设县令1员。上县为从六品上，中县为正七品上，下县为从七品下。县令之下设县丞、主簿和县尉三种佐属。县丞是县令的副职；主簿主管文

书簿籍，领导县署各工作部门；县尉主管治安。上县设县丞1员，从八品下；主簿1员，正九品下；县尉2员，从九品上。中县设县丞1员，从八品下；主簿1员，从九品上；县尉1员，从九品下。

县下面的基层行政组织是乡、里。唐代对广大农村的管理，是4家为邻，5邻为保，5保为里，5里为乡。唐初乡置乡长、乡佐，但不久即废；乡只设耆老，掌教化之事，没有管理行政的人员。里设里正，主要负责核查户口，收授土地，督催赋税，摊派徭役，维护社会治安等。里正待遇，是免除其本身课役。对州县城郭的管理，除了设里、里正外，城内则设坊。坊置坊正，掌管管钥，督察奸宄；郭外设村，村置村正。坊正、村正地位较里正为低，由居民推荐。

唐武德二年（619年），河西设凉州总管府，辖凉、甘、瓜、肃4州。肃州领酒泉（含金塔西部）、福禄（含高台、毛目）、玉门3县。武德七年（624年），凉州总管府改为都督府，辖凉、肃、甘、沙、瓜、伊、芳、文等8州。武德八年（625年）置肃州都督府（领肃州、瓜州、西沙州）。

唐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肃州属陇右道，节度使驻鄯州（今青海乐都）。据贞观十三年（639年）统计，全国有358州，到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全国有328州。当时酒泉有肃州、瓜州、沙州3州，属河西道。金塔地方分属肃州所辖的酒泉县（包括金塔西部）、福禄县（含金塔东部的毛目一带）。天宝元年（742年），改肃州为酒泉郡；乾元元年（758年），又改为肃州。

唐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河西节度使治，在凉州，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匹。"在金塔境内的军事机构有威远守捉（一说为金塔境内东古城遗址），所领兵员及马匹不详。

唐王朝对河西的经营

唐朝统一河西后，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手段和休养生息的政策。

首先是开拓西域，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唐朝开始进军西域。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灭高昌国。九月，在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遗址）置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攻占龟兹国后，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史称“安西四镇”。贤庆二年（657年），唐朝消灭西域最大的敌对势力西突厥，西域诸国纷纷归附。武则天时期，又在天山以北设置北庭都护府，以巩固边防，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唐景云元年（710年）置河西节度使，领凉州、肃州、甘州、瓜州、沙州、伊州（哈密）、西州（吐鲁番）七州，节度使驻凉州，这是唐朝所设的第一个节度使。军事防卫力量的逐步加强，为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证。

其次是推行均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唐王朝采取休养生息和鼓励农耕的政策，继续推行均田制。按《田令》规定：丁男18岁以上的中男给田一顷，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60岁以上老男，患有疾病或残疾的人，各给口分田40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30亩。所受之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再收回；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准许其出售永业田。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执行“租、庸、调”的赋役制度。《赋役令》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租粟2石，叫作租；每年交纳绢2丈或绵3两，叫作调，不产丝绵的地方则纳布2.5丈，麻3斤；每丁每年服徭役20天，如无徭役，则要纳绢布代替，每天折合布3尺，叫作庸。由于《田令》和《赋役令》的配套执行，造就了大批自耕农，以庸代役，有利于农业生产。政府还注意兵役、徭役不夺农时，多在冬季进行。这些措施，发展了生产，安定了民生。

随着农业的发展，唐代农作物的种类逐渐增多。除传统的农作物，如粟、麦、大麦（亦名扛麦，又写作杭麦），稂麦、黍、谷、稷、稗穈（粱）、糜、徐（稻）、苴蘼（蘼籽）等外，还有豆（即黄豆），江豆（即豇豆），菉豆（即绿豆），黑豆、豌豆（因其颗粒大，又称大豆），荜豆（又写作苍豆），麻子、菜籽、苏子等。经济作物有萝卜、椒、姜、苁蓉、草豉、生菜、菌子、葫芦、韭、葱、桃、李、梨、红蓝（又称洪蓝，即红花）等。

唐代还十分重视屯田。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唐政府在河西“营田积谷”“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新唐书食货志》）。唐玄宗时，屯田进一步发展。《唐六典》载：肃州有屯田7屯。唐朝在河西实行和籴，每年运大量的匹绢到河西，当粮食价格便宜时，用高于时价的价格购买大批粮食储存起来。一方面保护了农业生产，不致“谷贱伤农”；另一方面，政府储存了大量的军粮，满足了军需。到天宝年间，河西道的和籴仓储量达到全国的32.6%。农业的发展，使河西以粮食贸易为基础、以丝绸贸易为基本内容的民间贸易和官方贸易兴旺起来，凉、甘、瓜、沙、肃州成为经济贸易中心。经济的发展，为人口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商人和域外商人，大批的流动人口成为唐代酒泉的一大景观。随之，音乐、舞蹈、佛教文化等高度发展，又吸引来天下的文人墨客和宗教信徒，进一步促进了金塔经济、文化和人口的发展。

唐代，金塔的水利建设也发展较快，政府对汉晋以来的渠坝进行整修利用，并开挖新的渠坝用以灌溉。民间则有渠人社组织管理农田灌溉和修渠筑坝。

第三是劝勉嫁娶，恢复和发展人口。唐初，河西“州县萧条，户口鲜少”。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肃州辖三县，1731户，7118口，人口密度为0.08/平方公里。唐王朝为改变河西“田地极宽，百姓太少”的现状，通过劝勉嫁娶等有利于人口增殖的政策，恢复和发展河西人口。贞观元年（627年）二月，诏令“其庶人男女无家室者，并仰州县，以礼聘取，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者，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命其好合。若贫窶之徒，将迎匮乏者，仰于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衰多益寡，使得资送”。（《新唐书·食货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诏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旧唐书·太宗本纪（上）》）武德九年（626年），将掖庭宫女三千余人放出。唐朝统治者还重视减苛法重刑，多次诏令，凡死刑须经多次奏请而判定，除叛逆罪之外，常多赦免，以致在贞观初年全国一年才判决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同时，还赎还逃亡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奴婢。还有把户

口的增减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人口内附等政策，促进了人口的发展。到唐朝开元元年（713年），肃州有2253户，13022人，比贞观十四年（641年）增加522户5904人，分别增长30%和83%。

第四是兴办教育，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唐朝自建立开始就下诏兴学，封建官学制度日臻完善。唐代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中央官学有国子学、大学、四门学，还有专门的律学，书学和算数学校，都直属国子监。中央旁系学校有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医学、小学分归不同的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地方政府机构设立的学校也分为直系和旁系两类。政府直属的学校有府学、州学、县学；县内又有乡里坊社之学。统由长史直接掌管，直隶于国子监。唐武德七年二月（624年），唐高宗下诏曰“州县及乡皆置学”，从此，金塔县城及主要乡都设立了学校，当时分别称为县学、道学及乡里学。除官学之外，还有私学，主要有家学和义学两种形式。家学是经济实力雄厚的世家大族，在本地或邻州的家族中为其子弟选择博学之士授业，义学则是百姓设立的学校。同时，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发展，文学逐渐成熟，种类和内容逐渐丰富，小说、诗歌、散文、变文诸体兼备，不乏众多传世佳品，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民俗、语言状况、自然景物、宗教生活，以及民族关系、阶级状况和政治关系，音乐、舞蹈、绘画、书法艺术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

第五是重视佛教，促进宗教事业发展。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唐初，朝廷两次下诏各地普度僧民，设僧官掌僧民事务。唐太宗还亲自颁发《佛遗教经》，令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人手一卷。沙州、凉州刺史直接主持石窟寺的开凿和寺庙的修建。贞观年间的玄奘取经对当时的宗教发展普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武初元年（689年），武则天敕令各地修建大云寺，至唐代中期，寺院佛塔遍及河西各地，佛教广泛传播。仅莫高窟开凿的石窟就有126个。

唐玄宗开元末年，全国有寺院5358所，平均每州16所，每具三四寺，这个数成为“开元定数”。可见当时佛教的发展盛况。

第三节　吐蕃占领时期的金塔

吐蕃占领河西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曾与唐朝在西域长期争雄的吐蕃统治者看到西部边塞防务空虚，便向唐朝发起进攻。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吐蕃攻陷甘州和肃州，金塔被吐蕃占领。至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敦煌人张议潮将吐蕃赶出河西，占领河西、陇右十一州，金塔被吐蕃统治长达84年。

统治措施

吐蕃占领金塔初期，实行奴隶制统治。吐蕃军队焚荡庐舍，践踏庄稼，屠掠民众，进行大规模的野蛮破坏，而且把大半汉族人民掠为奴隶，替吐蕃奴隶主耕田放牧。在行政管理上废掉了唐代原有的州、县、乡、里制度，而实行本民族的军部落、民部落和通颊部落的部落制。吐蕃占领河西后，首先建立军事管制政权，在河西设置武威及敦煌两个军镇，金塔所在的肃州属敦煌军镇。并在河陇一带先后设置了青海、鄯州、河州、凉州、瓜州五节度使，设节儿，并利用各族上层进行间接统治，吐蕃只派大臣、将领监督和镇守。千户是吐蕃（奴隶主）统治下的奴隶制部落中最基本的单位，千户为部落长。千户下设小千户，为管理五百户人家的组织。小千户以下有百户，设“将”一人，相当于百户长（吐蕃成作勒曲堪）。百户下设十户长（吐蕃称作勒堪）。在经济上实行计口授田、按户纳突和服役的“突田制”（一突相当于现在的十亩）。土地都成了吐蕃的王田，通过部落的形式按人口授田，组织生产，

征收税赋。畜牧业经济较为活跃，其畜产品品种包括牛、犬、名马、氆氇和骆驼、驴等。在民族政策上实行民族同化，强迫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民众穿吐蕃衣服、学说吐蕃语，左衽而服、辫发文身。由于民族歧视和阶级剥削，许多老百姓背井离乡，千里河西一片荒凉，金塔经济文化由盛到衰，民不聊生，人口急剧下降。

吐蕃占领河西后，十分重视佛教发展，寺院出现寺户制度，每个寺院都拥有大量土地，并有专门从事手工业和畜牧业的人员，为寺院创造更多的财富。寺院的发展促进了寺学的快速发展，成为吐蕃统治时期河西教育的突出现象，寺学在吐蕃占领时期曾经对培养人才（译师）创造汇集藏汉历史文化典籍、发展文化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州县学废止后酒泉一带教育的空缺。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磨遇刺身亡，国内大乱。河陇边将论恐热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相攻不已，“杀其丁壮，剔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庐室”，多年混战使其两败俱伤。《资治通鉴》记载这场混战的结果是“二千里间，寂无人烟”“赤地殆尽”。这一地区内的各族人民，遭到长达20余年之久的深重灾难，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反抗风起云涌，吐蕃局势一时大乱，其在河西的势力逐渐衰败。

第四节　张氏归义军政权统治下的金塔

张氏归义军政权的建立

张氏归义军政权自唐大中五年（851年）建立，至后梁乾化四年（914年）为曹氏政权取代，前后经历了63年时间，其中除唐末五代之交曾一度出现西汉金山国（906—914年）外，一直是一个以节度使为最高统治者的地方割据政权。

唐大中二年（848年），沙州人张议潮趁吐蕃内讧和汉族人民反蕃情绪高涨之时，结合沙州豪杰，联络粟特和退浑人，组成反抗吐蕃同盟军，一举驱逐了吐蕃驻敦煌行政军事长官节儿，并出兵夺取了吐蕃瓜州节度使治所晋昌，取得疏勒河流域。张议潮以瓜州、沙州为根据地，治兵修甲，扩充队伍。从大中四年（850年）开始，张议潮率军向吐蕃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相继攻克伊州（今新疆哈密）、肃州、甘州、兰州、廓州（今青海化隆）、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岷州（今甘肃岷县）。大中五年（851年）八月，张议潮派遣他的哥哥张议潭带着天宝年间河西、陇右11州（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等州）地图、簿籍献给唐朝。同年十一月，唐朝在沙州设立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兼11州营田处置观察使，全权负责河西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攻克吐蕃控制的河西重镇凉州。

张议潮统治时期，金塔属肃州管辖，县境东部毛目一带属福禄县，西部王子庄一带属酒泉县。县下设乡，乡下设里。金塔当时所设的乡里已无从考证。

唐咸通八年（867年）张议潮入朝，归义军政权由其侄张淮深执掌。张

淮深继任后，面对反对势力和不利形势，沉着应对，在直接压制打击反对派的同时，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和权威。

统治措施

张议潮收复河西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政治局面，发展经济。他的继任者也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对促进河西地区的稳定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恢复唐制。吐蕃统治者被逐出后，归义军政权废弃了大部分吐蕃的军民部落，重建唐前期实行的州县乡里制度。原河西城郭凡未经吐蕃彻底破坏者，这时也按中原的城坊制度，恢复了坊巷的称谓。同时，归义军本身的军政机构，也按唐朝藩镇的体制，设立了与内地藩镇一样的文武官吏，并恢复文书、行政制度和被吐蕃禁止的唐朝服装，推广汉语，把汉语作为通用语言。二是实行新户籍和土地制度。张议潮在政权建立初期就废除了吐蕃统治时期的突田制，按照唐制，重新登记人口，编制户籍，并进行土地的调查、登记、分配工作。实行“请授”“请射”“博地”等土地政策，在将土地分配给百姓耕种的同时，还专门设立了营田使等官职，具体负责管理授田事宜。对百姓间自愿的对换土地、调整土地位置等事宜，官府一般亦予批准，加速了土地私有化进程，极大地调动了农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三是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赋税的名目主要有地子、官布、柴草三项，各项要分别登记。另外，也征收部分户税和商税。四是实行灵活而宽松的民族政策。在归义军政权辖区内有吐蕃、回鹘、退浑、粟特、龙家等少数民族，张议潮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了不同的管理办法，对吐蕃统治以前已开始汉化的西域各少数民族，如粟特、龙家，大多编入乡里，与汉人百姓同居。对于吐蕃化较深的退浑和通颊人，则部分继承吐蕃旧制，仍用部落的形式统治。这些措施行之有效，使当地少数民族心悦口服，对归义军政权的发展壮大起了重大作用。

归义军时期十分重视教育发展，官学种类不仅完全恢复了唐前期的州学、县学，而且新增了州阴阳学，技术院。技术院相当于现在的专门学校。此外，还有乡里坊巷学。地方官学严格执行中央政府的规定，以儒家经典

为主要教学内容。

张氏归义军政权的灭亡

唐大顺元年（890年）至乾宁三年(896年)，归义军内部接连发生政变，给活动在其周边和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甘州、肃州、凉州相继脱离了归义军的控制。至9世纪末10世纪初时，归义军实际控制的仅有瓜、沙二州了。张承奉于开平四年(910年)建立了“西汉金山国”。开平五年（911年），张承奉被甘州回鹘击败，被迫认回鹘可汗为父，成为甘州回鹘政权的附庸，并割让甘州、肃州给回鹘。此后不久，“西汉金山国”被逼降为“敦煌国”。到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十月，张承奉去世，“敦煌国”也随之灭亡。



第五章　五代宋夏时期的金塔

唐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全忠自立为帝，建立后梁。自此，中国北方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同时，南方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十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时期。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东南部）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宋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被金国所灭，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建炎，史称南宋，占据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五代两宋时期，中国北方先后出现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政权（916年），党项人李元昊建立的西夏政权（1038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政权（1115年）和蒙古人铁木真建立的蒙古政权（1206年）等与两宋并存的政权。

北宋、南宋时期，金塔相继为甘州回鹘政权和西夏政权统治，其中，后梁乾化元年（911年）至宋景祐三年（1036年），被甘州回鹘政权占据；宋景祐三年（1036年）至宋宝庆二年（1226年），为西夏政权所统治，宋王朝未能对其进行有效管辖。西夏政权统治金塔191年，对金塔的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节　甘州回鹘统治时期

甘州回鹘占据河西

回鹘，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他们起源于娑陵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和温昆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一带。唐贞观时，回纥酋长吐迷度在独乐水（今蒙古国图拉河）建立回纥汗国。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顿莫贺可汗以自己骏健如鹘，请求唐朝改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此后，回鹘与唐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早在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回鹘人就陆续迁入河西，被安置在甘、凉之间。从公元9世纪30年代起，回鹘由于内乱外患，政局动荡，可汗频繁更换，又因连年灾荒，国势日益衰微，纷纷西迁。其中有一支就迁入河西走廊，与先期居留此地的族人汇合分布于河西一带。唐僖宗咸通十三年（872年），回鹘控制甘州。唐光化三年（900年），回鹘设立牙帐，正式建立甘州回鹘政权。唐开平五年（911年），回鹘打败“西汉金山国”，西汉金山国与回鹘订立了割地求和的城下之盟，将甘州、肃州割让给回鹘，还被迫尊称回鹘可汗为父。至此，金塔被回鹘政权占据。

甘州回鹘先后接受唐、五代、北宋的册封，并遣使朝贡，回鹘首领被后唐册封为英义可汗。甘州回鹘在可汗之下设各级官吏，官号有突厥民族的，也有借自中原王朝的，如都督、宰相、枢密使等职官名。各部落也有自己的首领，《西夏纪》卷3记载：“各立君长，分领族帐”。他们一直称唐朝为舅，自称外甥。至北宋时期，仍保持这种甥舅关系。此后，河西走廊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历史时期。

统治措施

甘州回鹘政权控制酒泉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首先，甘州回鹘西迁河西后，进入半定居、半游牧状态，他们利用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汉人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了农业生产。河西地区土地肥沃，水利灌溉便利，良好的自然条件给回鹘畜牧业、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这里除种植小麦、大麦、青稞、稻谷、芝麻、粟、豆、黍、棉、麻、桑等外，还适宜种植各种蔬菜、瓜果。用骆驼代替人力耕种，用水碾代替人力杵臼。史载甘州回鹘统治区内农牧兼宜，物产丰富，并在原有农业基础上取得新的进展，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回鹘本就是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甘州回鹘的畜牧业以牧马和骆驼为主。回鹘生产的大量马匹，除自己食用外，还用于与周边民族的交换。安史之乱之后，回鹘每年向唐朝输入的马匹不下 10 万匹，用于交换中原的丝绢和茶叶。甘州回鹘的畜牧业产品还有牦牛、绿野马、白貂鼠、羚羊角、騊駼革、腽肭脐等。第三，甘州回鹘的手工业很发达，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多，甘州回鹘手工业门类繁多，从制麻布、麻鞋的麻手工业，到制陶、制革、绒毛纺织、缝纫；从铁木用具到造砖制瓦、镔铁剑甲；从金银铜器的制作，到车马挽具的配备、玉器的雕琢，都有涉及；二是巧，手工产品中，很多都很精巧，如甘州回鹘制造的兵器质量高而精巧，以致对缴获的西夏兵甲不屑一顾，认为质量太差，全部付之一炬。再如甘州回鹘制造的木楼、木桥精巧耐用，其工艺堪称一绝。甘州回鹘制造的金银首饰和用五色线织成的克丝袍更是精巧华丽，招人喜爱。甘州回鹘还设计制作了城市自动的供水和排水设施，试想，若工艺水平不高，焉能及此？

甘州回鹘统治时期，河西是中原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等荟萃聚集之地，对回鹘文化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对汉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从敦煌、吐鲁番、龟兹、北庭、哈密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化遗物，如文书、历法、石窟壁画、雕塑、钱币、丝绸、宗教作品中都可得到体现。

西迁前回鹘文化是单一的突厥文化，随着摩尼教的传入开始与来自波

斯的粟特文化有了接触，并接受其文字，据以创制了回鹘文。回鹘文字的广泛使用，佛教、景教的流行，音乐、舞蹈和石窟艺术的高度发展，文学的繁荣昌盛，以及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都是随着回鹘西迁，其生产、生活方式由草原型向农业型转化而实现的。回鹘文化在保留部分旧有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由草原型向农业型转化。这种文化类型的转化与共存，反映了回鹘文化的特质。

回鹘文化兼有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这两种文化类型，使其显得丰富多彩，回鹘文化中吸收了来自中原的农耕文明、来自西藏的游牧文化，以及来自印度、波斯、中亚的各种文化。兼容了多种文化因素的回鹘文化比起汉文化来，更容易为北方草原民族所接受，这就是西夏、蒙古在立国之初都重用回鹘人的基本原因。自宋至元，回鹘人长期充当着汉文化向北方民族传播的媒介。

回鹘文是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突厥语族诸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来源于中亚流行的粟特文，创制于8世纪后期，但在漠北回鹘汗国并不流行。公元840年回鹘西迁河西以后，回鹘文被广泛使用。

西夏蕃字院所掌管的文字中，既有藏文（西蕃），也有回鹘文，与二者并列还出现有“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张掖是甘州回鹘的国都，交河指的则是高昌回鹘的国都。回鹘文是高昌回鹘最流行的文字，同样也是张掖地区的流行文字。

关于甘州回鹘人的服饰，宋人洪皓《松漠纪闻》记载：“妇人类男人，白皙，着青衣，如中国道服。然以薄青纱幂首而见其面。”这种服饰，在河西回鹘中比较流行。回鹘装略似男子的长袍，基本特点是翻领，袖子窄小而衣身宽大，下长曳地，材料大多用质地厚实的织锦，领袖均镶有宽阔的织锦花边。身着这种服装者通常都将头发挽成椎状的髻式，时称“回鹘髻”。髻上戴有缀满宝石和簪钗的金饰冠，冠尖如角，似桃形。

甘州回鹘迁居河西之后，在宗教信仰上，原来被奉为国教的摩尼教虽继续流行，但势力越来越弱，佛教由此取代摩尼教而成为甘州回鹘国最为流行的宗教。同时，萨满教遗俗继续存在。佛教势力的迅猛发展直接影响到回鹘王室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政策。甘州回鹘可汗常以佛僧为使出使沙洲，

其中不少都在敦煌莫高窟从事佛事活动。敦煌石窟中留有不少与瓜沙曹氏联姻的甘州回鹘公主像，甘州回鹘重佛可见一斑。

公元10至11世纪，我国北方的契丹族、党项族相继兴起，势力逐渐强大。甘州回鹘遭到辽和西夏的多次进攻，国力日衰。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西夏进攻河西，占领凉州。次年，辽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率大军再攻河西，破肃州。随着辽、西夏的频繁进攻，甘州回鹘穷于应付，自顾不暇，各地不同种族的离心倾向日益滋长。天圣六年（1028年），西夏李元昊率精兵袭破甘州，甘州回鹘政权灭亡。



第二节　西夏统治金塔

西夏政权的建立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割据政权。党项族是中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历史悠久，长期生活在西到青藏高原、天山，南到云贵，东到关中地区，北到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

隋末唐初，党项族开始强盛。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后，党项族各部落相继归附唐朝。唐王朝将他们安置在今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的地域内。唐末，党项族最强的一支——拓跋部，其首领拓跋思恭率军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夏州节度使，赐“定难军”称号，晋爵夏国公，赐姓李，遂占领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五代时，拓跋部以夏州为中心，成为一方割据势力。宋朝初年，首领李彝兴死，宋追封其为夏王。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辽以玉册金印册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李德明以怀远镇改名为兴州（今银川市），建为大夏国都。

宋天圣六年（1028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攻陷甘州（包括今金塔县鼎新片），党项的势力已经扩大到了凉州、甘州一带。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宋仁宗加封李德明为夏王。同年十月，李德明病死，李元昊继位。宋景祐三年（1036年），元昊引军西进，攻占肃州（包括今金塔县金塔片），金塔被西夏政权纳入统治范围。

宋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正式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建国初，拥有19州，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

青海东北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旗，金塔所在的肃州属黑水镇燕军司管辖。西夏政权最强盛时，其地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玉门关），南接萧关（宁夏同心县南），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行政建制

西夏的地方行政设置基本采用州（府、军）、县（城、堡、砦）两级建制，州设刺史和通判，县设县令等官。府、州是同级的，郡为蕃夷聚居地区的特别建制，类似于州，还设有监军司和经略司，以加强对所统治地域的有效管辖与治理。监军司主要是军事性质的，经略司是中央派出机构。西夏占据甘州和肃州后，分别于宋景祐二年（1035年），改甘州为镇夷郡（辖今金塔县鼎新片），宋景祐三年（1036年），改肃州为番禾郡（辖今金塔县金塔片）。

西夏的基层组织因受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别于传统的汉地模式。西夏基层社会中有唐宋基层社会中的乡里制度，即在基层设有“乡”或“村社”组织，保留了北宋的保甲制度。以十户为一甲，五甲为一小监，两小监为一迁溜。溜实际上相当于西夏的部落兵组织（种落之兵），由酋长（首领）统帅，迁溜所管辖的民户大多为党项族。西夏除了存在着汉式“乡里”制的基层组织外，还存在着与吐蕃相似的部落制度。首领在西夏社会中普遍存在，首领有数量不等的人口。

统治措施

西夏建立后，其土地制度、军事制度、行政建制、礼乐和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并在其统治范围内广泛推广，西夏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保证了经济稳定发展，有效巩固了政权基础。首先，建立完善的土地制度，西夏土地所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制、贵族大土地占有制、寺院土地占有制和小土地占有制四种形式。其次，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党项族传统上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党项西迁西北地区后受汉族文化影响，逐渐开始

发展农业。西夏占领河西后，农业成为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西夏统治者鼓励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并给予法律保证，《天圣改旧新定律令》明确规定新开荒地三年内免交地租，土地还可永远占用，有权买卖。这些措施的实施充分调动了老百姓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这一时期，金塔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荞麦、糜子、稻、大豆、小豆、豌豆、荜豆、黑豆等；蔬菜作物有苦苣、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菠菜、胡萝卜、葱、蒜、椒、冬瓜、南瓜、韭菜等；水果有桃、李、杏、梨、枣、葡萄等。第三，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财政管理制度。西夏的财政收入主要是赋税收入、国有牧场收入、官营采造收入、对外贸易收入和其他收入。赋税收入包括田赋、摊派与和买、牲畜税和商税等。第四，积极推行法制，加速了法制的“汉化”进程。西夏建立前没有法律制度。元昊建立西夏后，积极推行法制，加速了法制的“汉化”进程，将唐宋法制与现实情况相结合，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保证了统治的稳定，也保证了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西夏对旧的法典重新修改增补，汇编成《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是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颁行的比较系统、完备的少数民族执政的封建法典。该法典共20卷，分147门，共1463条。它以刑为主，诸法并存，在承袭唐宋法典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编纂体例和条文德内容方面都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五，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军事制度。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元昊定兵制，基本以黄河为界，分左右二厢，河东为左厢，河西为右厢，设十二个监军司，每厢各领六个。每个监军司设两名正监军、一名副监军、两名通判和三名习判。金塔属黑水镇燕军司（驻威远城，今金塔县境东北部）管辖。河西诸军司的职责是保证其后方的安定和绿洲开发的顺利进行，同时十余万兵员也是西夏开发河西的重要力量。第六，实行羁縻政策。西夏占领河西后，民族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敏感的问题。西夏统治者采取羁縻怀柔政策，在服从党项统治的前提下，允许保留各民族自治，拥有部分权力。第七，大力发展文化教育。西夏政权建立后，李元昊命令大臣野利仁荣搜集、整理、加工民间流传的文字，参照汉字形体创制了西夏文字，也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方块字，笔画非常均匀规

范，严谨而美观。中国中古时期流行的几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西夏文文献从种类到数量都是最多的一种，主要有对汉文书籍的翻译文献、译经和对语言文字方面研究的论著。西夏的文字主要是诗歌、碑碣铭留世较多，西夏文学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在中央先后建立了蕃学、汉学、国学、太学、小学、内学；在地方建立了州、县汉学校和州、县蕃学校，教学内容以传授汉文化为主，所用教材多是汉族文化典籍，包括经、史、子、医、兵、文等。西夏还逐步建立了以科目取士的科举制度，在官学学习的学子，根据对学习成效的考核来授予不同官职，极大地激发了蕃汉子弟学习的积极性，由于统治者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推广，蕃汉文化共同传播，促进了金塔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与发展。第八，利用宗教统治。西夏统治者还重视宗教，尤其是非常崇奉佛教，以对其境内的各民族进行思想统治，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中有许多西夏时期开凿的洞窟。2004 年，今瓜州县境内发现西夏时期密宗佛教遗址——坛城，这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坛城之一，也是我国佛教最大的室外坛城，人们将其称之为“佛门第一坛”。

宋庆历八年（1048 年，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正月初二李元昊死去。元昊死后，由于国相专权，内部发生宫廷政变，政治腐败。宋宝庆三年 (1227 年，西夏宝义二年）七月，蒙古军攻陷中兴府，李睍投降蒙古，蒙古统治者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将其杀死，西夏灭亡。

西夏自公元 1038 年元昊建国，历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佑、安全、遵顼、德旺、睍，共 10 帝，计 190 年，如再向上追溯到公元 982 年李继迁叛宋自立，经李德明，共十二帝，计 245 年。

西夏统治河西地区近 200 年间，统治阶级把河西作为其与宋、辽、金各国对抗周旋的基地，十分重视河西地区的开发经营。迁徙、安置大量人口，驻防屯垦，鼓励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使用先进生产工具，减免税赋，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河西各民族采取羁縻怀柔政策，各民族地位基本平等，吸收汉、吐蕃、回鹘等各族文化，境内民族关系较为融洽。当时金塔一带处于南北交互的扼要地段，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有所发展。

第六章　蒙元时期的金塔

13 世纪初，蒙古汗国建立时，金塔、酒泉及河西一带仍属西夏统治。南宋宝庆二年（1226 年，西夏宝义元年）五月，蒙古汗国军队攻占蕃和郡（肃州），六月攻占镇夷郡（甘州），金塔全境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范围。1368 年元朝灭亡，结束了蒙元政权对金塔 142 年的统治。

第一节　蒙元政权占领金塔

蒙元政权的建立

蒙古族是游牧在中亚大草原到蒙古高原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其祖先可追溯到西汉时的匈奴族。蒙古汗国由蒙古族首领铁木真建立。铁木真（1162—1227年），孛儿只斤乞颜氏，后被称为成吉思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西夏乾祐十五年），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可汗。铁木真等人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在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蒙古太祖元年）春建立了大蒙古国——“也克·忙豁勒·兀鲁思”。铁木真及蒙古贵族们在斡难河举行仪式，建九脚白旌纛，即蒙古国大汗位，尊号成吉思汗，意思是“拥有四海的强大者”。

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西夏宝仪元年）五月，阿答赤率领蒙古西路军开始围攻蕃和郡（肃州）。由于城中军民奋力反抗，久攻不下。当时西夏蕃和郡的守将昔里都水想秘密献城归附蒙古汗国。后因事情败露被杀害。蒙古军队攻破蕃和郡后，成吉思汗下旨屠杀全城百姓。念其有献城之举，其亲戚奴婢等“得免死者百有六户，归其田业”。而且，还将昔里都水之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达鲁花赤（即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蒙古军攻占蕃和郡后，现金塔县西部的王子庄一带即归蒙古管辖。同年六月，成吉思汗挥师向东攻破镇夷郡（甘州），今金塔县东部的鼎新一带随即被蒙古军占领，至此，现金塔县全境归入蒙古汗国版图。

蒙古汗国占据酒泉后，改蕃和郡为肃州，并按照蒙古族传统的领户分封制，将土地和人口赐给蒙古宗室及诸王作为封地。当时，酒泉区域内的下河清皇城、文殊山、金塔王子庄、玉门赤斤、布隆吉尔、沙州等处都成

为元朝大小诸王的封地。同时，肃州也是成吉思汗派驻的达鲁花赤辖区。

宝庆三年（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故于六盘山南的清水县（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临死前遗言秘不发丧。一个月后，西夏国主南平王投降，西夏灭亡。

1219—1260年，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经过三次大规模西征，先后灭西辽、战花剌子模等中亚、西亚政权。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蒙古汗国灭西夏，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太宗六年）灭金。至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宪宗九年），蒙古汗国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和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

元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十五日，忽必烈发布建国号诏，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曰“大元”，定都燕京（今北京市），改名大都。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灭亡南宋，完成全国统一。

元朝疆域

元朝疆域分为元帝国本部和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及伊儿汗国等中亚四大汗国两部分。

元朝本部疆域，北到蒙古、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以北的今俄罗斯境内的东西伯利亚高原、鄂霍次克海。元朝本部又分为三个区：一为腹地，即京师之地；二为岭北，为蒙古族发祥之地；三为中国本部地方，共设有十个行中书省（以下简称行省）和宣政院辖区。

四大汗国中，钦察汗国，元朝西北宗藩国，亦称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思。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封地，主要辖区是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多瑙河，南起高加索山的地区。1236—1240年，术赤第二子拔都征服了乌拉尔河以西伏尔加河流域钦察、不里阿耳等部族，并征服了斡罗思，迫使斡罗思各公国称藩纳贡。1243年，拔都结束西征回到伏尔加河上，建立了东起也儿的石河，西到斡罗思，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到北极圈附近的辽阔广大的钦察汗国。对于东欧各公国享有宗主权，包含罗斯公国（罗斯公

国是俄罗斯国家的雏形）；察合台汗国，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封地，主要辖区在天山南北；窝阔台汗国，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封地，领有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建都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伊儿汗国，又称伊尔汗国或伊利汗国，成吉思汗孙子旭烈兀西征后建立，是东滨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界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的大国。四大汗国曾是蒙古政权统一管辖的藩属，后来为争夺领地相互攻伐，所领属地疆域变化较大，以至于逐步脱离了元朝中央政府的掌控。

行政建制

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受中国先进政治文明的直接影响，也全面推行传统的中央集权管理模式。元代在甘肃设置的行政机构既与全国相一致，又凸显了甘肃地域、民族的特点。甘肃行省设置始于蒙古中统二年（1261年），初称西夏中兴行省，省治设在中兴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至元元年（1264年），置甘肃路总管府（辖今金塔县东部鼎新片），驻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至元八年（1271年），改为甘州路总管府。蒙古至元七年（1270年），置肃州路总管府（辖今金塔县西部王子庄片），驻肃州（今酒泉市肃州区）。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政府正式设置甘肃行中书省（简称甘肃行省，其全称为“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统辖整个河西走廊以及银川平原和湟水谷底的广大区域，相当于今甘肃省的河西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的一部分。甘肃行省省治甘州路，这是以“甘肃”为地方政区名称的开始。元代甘肃行省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有路、直隶州、属州共14处，金塔所在的甘州路、肃州路均属于路一级的建制。其中肃州路无辖州县，辖区相当于今酒泉市肃州区、金塔县西部、玉门市、嘉峪关市、青海省祁连县一部及讨赖河和疏勒河上游地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筑毛目城。

户籍制度

元代的户籍制度，是把全国居民按照不同职业以及其他某些条件（如民

族）划分成若干户计，统称诸色户计。他们所承担的封建义务有所不同，隶属和管理系统也不尽相同，而且一经入籍，就不许随意更动，往往世代相守。诸色户计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军户、站户、民户、匠户、儒户、医卜户、阴阳户、僧户、道户、也里可温户、达失蛮户、斡脱户、商贾户、盐户、窑冶户、船户、海道梢水户、弓手户、急递铺户、打捕鹰房户等。其中军户、站户、民户、匠户为四种基本户籍类型，这四种类型包括各族人民，遍布各地。

西夏末期，西夏人遭到蒙古军的残酷屠杀，人口损失严重。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每次吃饭时就说，要把西夏人赶尽杀绝。因此，蒙古军进攻河西时战争异常猛烈：破黑水城，杀蕃部数万；破肃州，幸存下来的只有106户；甘州、沙州等役亦十分激烈，军民死亡惨重。蒙古军占据河西后，一些地方被赐作诸王驸马分地，在土地被肢解的同时，人口一部分被诸王将领瓜分，沦为蒙古贵族的属民、驱口，一部分逃奔他乡，其余的或入国家编户，或被登记为军户，编入蒙古军籍，从征作战。据《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甘州路户1550，口23987；肃州路户1262，口8679。这里面还包括了元代初年强行从瓜、沙凉州迁徙而来的人口。甘州路、肃州路在吸收了瓜、沙等路的人口后一共只有2812户，32666人。从当时肃州路无辖州县的情况看，肃州路的人口应该主要集中在今肃州区、金塔县一带。

第二节　元代的统治措施

实行民族分化政策

元朝政府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人为的民族分化政策，把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享有许多政治与经济特权，充任各级政府的首脑；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以至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也称汉儿、乞塔札忽歹，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也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民族人民。这四等人的界限是森严的，重要的官职、军职均由蒙古人充任，不足时则用色目人。元代等级制的划分是一种以维护蒙古贵族统治为中心的民族政策，实质上反映了其在政治、法律 、文化等各个方面优待蒙古贵族，而对其他各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强化国土防卫政策

元朝在国土防卫上，把北方作为边疆防御重点，尤其在东北、西北地区更是用重兵把守，形成了一条从西南斜向东北的屏蔽中原的防线。元朝建立后，将河西主要城镇和农牧地分封给蒙古各王和大将，金塔的王子庄一带也是蒙古王的封地，以加强对国土的有效控制。元朝历代皇帝，不断对边疆防卫部署进行调整，以防止周边藩国独立，同时便于镇压人民起义。元朝更是把“酒泉北境”（今金塔县境内）视作保障河西的重要军事重地。元代中后期，西部地区（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各少数民族往返京城大都（今北京市），只允许沿汉代边塞古长城以北的北大路通行，前沿指挥

中心为威虏城（位于今金塔县古城乡移庆村）。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元朝政府在今金塔县北部修筑毛目城、天仓堡、平朔城（双城）和威虏城，驻军防守。并派重兵防守于狼心山（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孤红山（今金塔县境内）一线，以确保河西走廊地区的安全。

缓和民族矛盾

忽必烈即位后，采取拉拢北方汉族士大夫的策略，在刘秉忠、赵璧、姚枢、许衡、窦默等人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元史·许衡传》）的道理。元初，统治者还采取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的政策，设立管军万户府、屯储万户府等专门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大力开展军民屯田，为了管理边防，垦殖金塔境内大片荒芜的土地，元朝政府修筑毛目城、天仓堡、平朔城（双城）和威虏城，派军队驻守，随营立屯，且耕且战；召集逃亡民户，鼓励开荒；从省内外迁入大量移民，开展屯垦；健全农村村社基层组织，兴修水利，免除苛捐杂税；禁止诸王将校因狩猎而践踏田亩；禁止改农田为牧场；重农桑、宽赋敛，省徭役；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等。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农作物品种更加丰富。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青稞、荞麦、高粱、谷子、黍、豌豆等。经济作物有苜蓿、大麻、芝麻、棉花、西瓜、红花、蚕豆、亚麻等。重用汉族官员，对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元代金塔境内，在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中，各民族相互交融，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汉、吐蕃、畏兀儿、唐兀（党项）、蒙古等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

重视驿道建设

元代十分重视河西地区的道路开辟，除了纵贯酒泉东西的丝绸之路外，因军事防御需要，开辟出了途经金塔的纳怜站道，这条道路是元大都（今北京市）沟通察合台汗国与拔都兀鲁斯联系的军用道路，其走向以大都为起点，经纳怜，过额济纳旗到今金塔县，抵肃州，再经瓜州、沙州进入新疆地区。

其中，额济纳旗道酒泉段所属线路（即今金塔县境内），基本与汉代居延道相重合，元代又称“甘漠大道”，是丝绸之路又一条重要交通要道。

为了保证道路畅通和驿运所需，在道路沿途设立驿站（蒙古语称为站赤）。据《永乐大典·站赤》记载：“纳怜站道设23站。”纳怜站道在金塔境内的东大湾城、威虏城等处设有重要的军用驿站。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元朝政府在甘州置八剌哈孙驿。八剌哈孙，蒙古语即“城”。此甘州八剌哈孙驿即《大元马政记》中的“甘州察罕八剌哈孙”，即白城站（今金塔境内东大湾城遗址）。白城子离肃州二百余里，北通亦集乃路、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地处元代交通要道。

发展手工业

元朝政府十分重视手工业的发展。早在征服战争中，他们每攻取一个地方，首先要搜罗技艺百工之人。元朝建立后，更是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了专门机构对手工业进行管理。朝廷颁布了一系列发展手工业的政策和法令，加之匠籍制度的确立以及大批专业工匠的存在，客观上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当时金塔境内的民间手工业主要有毛皮加工业、棉织业和麻织业，其余像制盐业、制瓷业、砖瓦制作、农具锻造等也有一定发展。

促进商业贸易

元朝统一全国后，金塔成为其军事上控扼西北诸蒙古宗王的军事重镇，又由于是元大都（今北京市）沟通察合台汉国与拔都兀鲁斯联系的军用道路纳怜站道的必经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联系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元代主要的商业政策有：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等。在这些积极开明的商业政策推动下，金塔众多的农牧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进程加快。当时，金塔地域内的商业贸易形式主要有官民贸易、民间贸易及中外贸易。

重视文化建设

元代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碰撞和中西方各种文化的交汇构成了元代文化的显著特色。金塔作为河西与北方少数民族交融的前沿阵地，各民族文化也在这里交融。

元朝建立后，在文化上实行两重性的政策。一方面，为了巩固自身统治，推行“汉法”（即中原传统的各种制度），尊崇孔子和儒术，兴办儒学，推行了科举取士制度。另一方面，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将人按民族（也是按接受统治的先后）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给予不同的社会待遇。就文化而言，在学校教育、科举考试、语言文字使用等方面，民族歧视均有明显表现。元代实行的国子学试贡法，汉人考试内容最难、要求最严，蒙古、色目人要求宽松，内容简单，但授官等级却高于汉人，蒙古、色目和汉人出身的学官待遇也不相同，蒙古字学教授比儒学教授例高一等。科举考试，也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榜，汉人、南人分为一榜。两榜考试内容不同，南人汉人考试内容较难，蒙古、色目人考试内容容易。蒙古、色目人愿试南人、汉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元代中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拓展，肃州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双向交流得到加强，文化政策也显得相对宽松。金塔处在肃州的这种大背景下，文化也有了宽松的发展环境。

兴办学校教育

元代学校教育制度大体承袭了唐、宋的教育传统，借鉴了辽、金的办学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制度，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元代中央政府设置集贤院，统管全国的学校教育，学校体制分为官学和民间办学两大类别，其中由政府管理的官学又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元代官学体制自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已基本建立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汉文进行教学的儒学教育机构——国子学；二是以少数民族文字进行教学的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

三是专业技术教育机构，如司天监、太医院等政府专职机构下属的专业学校。元代统治者推行汉化，崇儒重教，对地方儒学十分重视，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元代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立了相应的儒学，路有路学，府有府学，州、县有州、县学，内附设小学。至元六年（1269 年）十一月，元世祖诏令各路设立提举学校及教授官，负责地方官学的管理工作。至元九年（1272 年），各地儒学相继建立，路学规定设置教授、学正、学录等学官各 1 人，府学以上、中州学设教授 1 人，下州学设学正 1 人，县学设教谕 1 人，担任各级儒学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后建立儒学提举司的地方学校管理机构，直接对朝廷负责，这种地方教育行政体制延续到明清两代。延祐三年（1316 年），陕西五路行省甘肃儒学提举司建立，标志着元朝对肃州地方的教育施行了直接有效的管理。元代地方儒学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朱熹的注疏，除《诗》《书》《礼》《易》《春秋》外，还须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元代金塔除由政府直接管辖的官学外，民间办学形式还有书院、社学和私学等。

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对于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其宗教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双重特点。虽然蒙古萨满教在蒙古宫廷和民间仍占支配地位，但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可以自由传教，僧人、道士、伊斯兰教答失蛮 、也里可温（基督教）大师同样享受免除赋役的特权。加之，元政府在中央和地方相继设立了专管宗教事务的管理机构，对宗教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优惠政策，从而促进了宗教的广泛传播和各种教派的蓬勃发展。因此，有元一代，各种宗教相互交叉，各民族文化相互冲击、交融，构成了元代的多元文化奇观。

第七章　明朝统辖时期

明朝建于1368年，亡于1644年，历经276年，传16帝。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权臣部将的劝进下，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后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命徐达、常遇春等将北伐，攻占大都（即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命征西将军冯胜西出金城（兰州），进军河西走廊，六月明军攻克肃州，七月，师抵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故元守将伯颜帖木儿举城降，继败元军于别笃山口（地址不详），至此，金塔全境正式纳入明朝统治范围。明代疆域囊括汉地，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后缩为辽河流域；北达戈壁沙漠一带，后撤至明长城；西北至新疆哈密，后退守嘉峪关；西南临孟加拉湾，后折回约今云南境；并在青藏地区设有羁縻卫所，还曾收复安南，明代极盛时国土面积约达一千万平方公里。

第一节　军政建制

明朝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靠近少数民族边疆地区推行军政合一的镇、卫、所三级管理体制。洪武初，管辖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军政机构主要是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初设于河州，后设于庄浪（今永登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迁至甘州。

为巩固边防，防患北元复辟，在“固守封疆”思想主导下，从明成祖时期开始，经洪熙、宣德、景泰、天顺、成化各朝，到明孝宗弘治年间，明朝统治者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是明朝同蒙古残余势力防御作战的重要战线。在九镇之中，甘肃镇位于最西端，大约设置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年），总兵驻甘州卫（今甘肃张掖市）。其“夹以一线之路，孤悬两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程道生《九边图考·甘肃》）“近而藩垣四镇，远而纲领九边，通玉帛于天方，列毡庐于疆场，黄河、黑水、昆仑、崆峒际天极地，巍然一大镇也”（《赣州府志·艺文志》卷13，乾隆四十四年刊本）。甘肃镇由陕西行都司负责防务，下辖12个卫和3个千户所，无州、县设置。卫所的组织系统：一卫统领十个千户所，一个千户所统领十个百户所，一个百户所统领两个总旗，一总旗统领五小旗，一小旗统领十名左右士兵。据《肃州新志校注》记载：“其兵制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为一百户所。”守御千户所直属指挥使司。在卫所中，设指挥使司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在酒泉置肃州卫，所辖范围为今酒泉市肃

州区和嘉峪关市。同时，在金塔境内置威远卫、威虏卫。威远卫领威远、天仓、平朔、毛目四所，即今金塔县东部的鼎新片。威虏卫辖金塔县西部的王子庄全境。永乐三年（1405年）裁威虏卫，并入肃州卫，设置中右、中中二所管理。后又裁撤威远卫并入镇夷千户所（洪武三十年设）。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金塔寺设守备一员。据《肃州新志校注》记载："金塔寺营副将一员，明初设守备，既改游击。"明代的游击是明朝镇守边防的军官，位次于游击将军，无品级，无定员，因事增置，统兵戍守。因此，在设置威虏卫和威远卫之前，金塔寺堡有守备，后改游击来管理这一带的防务。



第二节　明代在金塔的防务

由于金塔地处明朝北部边境地区，经常受到元残余势力的侵扰，为了巩固边防，明王朝在金塔境内设置卫所的同时，采取了修筑长城和墩台、修建城堡等措施加强防务。

修建长城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北部边防的防御能力问题。如何加强对蒙古贵族的防卫能力，再次成为君臣关注的焦点。侵略哈密的兵部右侍郎张海提出“或当增筑墩墙，或当修理壕堑”的提议，后被采纳。此后，明王朝从国库中拨银，开始修筑甘肃镇的边墙。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集中修筑，甘肃镇的边墙基本告成。据《明会典》载：到万历前期，甘肃镇“现存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关隘一百四处”（《大明会典》卷130《镇戍》）。

甘肃镇长城就是为了保卫河西走廊而修建的，大部分是沿着河西走廊北侧山前地带修建，有一小部分是位于河西走廊南侧，在西宁卫的北侧和西侧。其主线东端起自黄河岸边的兰州市城关区盐场堡，由东南向西北，经安宁、皋兰、西固、永登、天祝、古浪、凉州、民勤、永昌、山丹、甘州、临泽、高台、金塔、肃州，抵嘉峪关。在嘉峪关又有封堵河西走廊的南北向长城，将整个河西走廊控制在长城以内。

金塔境内明长城的具体线路从金塔镇塔院村东南12千米处金塔夹山南麓的杨家井烽火台起，由西南向东北穿过金塔——石泉子公路，止与高台交界处的红口子一号烽火台。这段长城完工于隆庆六年（1572年）。金塔

境内明长城修建充分贯彻和实践了“因地制宜”的基本思路。从材质上，以黄土夯筑为主，个别墙体、烽火台和敌台还夹杂有沙石、红柳、芦苇等材料。从形制上，明长城墙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人工夯筑墙体，为主要类型；一类是壕堑，系平地或在山腰挖掘而成，既有与墙体共同设防，也有单独为防；一类是不便筑墙的山地或河流沿岸，充分利用自然险阻，辅以关堡和烽火台进行防御。关堡与长城墙体距离不等，有的依托墙体而建，有的则远离长城墙体。依据与长城墙体的位置关系，敌台可分为两种：依墙而建和骑墙而建。烽火台在长城墙体内外均有分布，大多坐落在高、险之处，或联合其他长城设施，或独立连成线，充分体现出防御功能。每隔5000米左右设一烽火台。

明代称长城为“边墙”，是由城墙、关、城堡、墙台、烟墩和驿传等组成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墙体一般由黄土夯筑的墙、墩、列障构成，墙基宽4米，高5米，大墙上建烽火台，底边长8~12米，高12米左右。墩的南侧与墙面标齐，北侧凸出。正面无马道，是用绳梯向上攀登。大墙上有巡道，宽一米多。筑长城时，凡经过城池或堡寨，均留城门洞，门外一侧筑瞭望台。城墙断面下大上小呈梯形，薄厚尺寸亦随形势需要而异。城墙顶面，外设垛口，内砌女墙，或叫女儿墙，主要作用是保护守城将士的人身安全，防止守卫和巡逻的将士不慎坠下墙去。卷门暗道用以供守城士卒上下。壕沟是就地掘壕，深度多在4米以上，口宽达10米，两侧培筑土垣。

据2007年长城调查结果，金塔境内现存长城墙体1段，全长1620.80米；壕堑6段，全长14165.80米；沿线有关堡1座，烽火台13座。

修葺加固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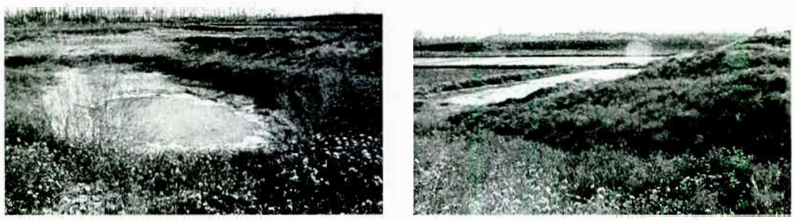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巡抚杨博、兵备副使王仪共议奏筑威虏城 、察黑包堡、白烟墩南空堡、八里墩堡、王子庄墩堡、金塔寺堡等7座城堡安插关西旧归各夷，以靖地方。

金塔寺堡，即今金塔城。据《民国创修金塔县志》收录的《重修塔院寺序》（刻写于雍正十年即1732年）记载：“如有金塔寺有塔，不知妨于何代，

然塔以筋砌始名曰金塔。迨明万历。二十年设堡，其地立官分土，因名其堡曰‘金塔寺堡’是堡因塔而名也。”说明金塔寺堡设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据《肃镇华夷志》记载：“金塔寺堡设在平川边外极冲上地，土城周围一百九十丈。东至镇夷境外桶箍湾五十里，西至下古城境外王子庄三十里，南至鸳鸯池四十里，北至天仓墩二十五里。内设守备官一员，把总官一员，军丁四百七名，马二百一十五匹。”“金塔寺堡 先年属威虏，汉人居住，有房舍、遗址、碾磨之类，后因威虏归并肃州，因以安插西番日羔剌等”。又据民国《创修金塔县志》记载：“金塔城，原名金塔堡。在平川边外建筑，周围一百九十丈。建筑人及年月无考。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巡抚杨博檄副使王仪修葺此堡。”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兵备霍鹏、参将姜河，议呈巡抚田乐，奏：“设守备兵马，展筑大堡”。次年，在金塔堡四周筑起塔院大墩，塔院腰墩、新营儿墩、黑沙窝腰墩、北阁门墩共13座。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离堡八里周围筑边墙一道，以拱卫肃州。以此推算，当时金塔堡四周的边墙总长度应为32公里。1949年，在金塔城西南，自今四坪湾林场起沿金大村、塔院村农田与石滩连接边缘向东，到边沟村何家墩湾折向北，到西沟村黑沙窝再折向西，经东星村到四清村北阁门，尚可见到一段段的边墙残垣，墙高约5米，底宽约2米，顶宽约1米，残存线路约20公里。沿边墩台相望。1958年后，随着农田基本建设，残墙断壁，被群众陆续拆除。

其他几座城堡在《肃镇华夷志》中也有记载：

威虏城　肃州东北一百三十里威虏卫是也。闻说先年本卫军戍获



威虏城遗址

功，斩虏首级，勘官御史赵春以为杀降，欲致获功官军于死地，因以致民叛乱，后招抚迁于肃州。今中右、中中所即此卫人也。余亦有从于河西各卫者，乃首叛也。后城。嘉靖二十七年重修，安插西番驻牧。今废。

察黑包堡 离城一百一十里。察黑包本西番头目之名也，今满个虎力乃其子也。先西番归附肃州时，筑此城以自居。先年筑一城，真帖木儿加驻牧，今无。

白烟墩南空堡 去城一百一十里。先西番朵尔只住牧，今无。

八里墩堡 去城一百一十里。原安插头目可洛纵，先年伊与兄革力哥什同处居住，今无。

王子庄墩堡 城北一百里。先番族头目察黑包子满个虎力耕牧，因互相攻杀，遗众顺革力哥什。

金塔寺堡 先年属威虏，汉人居住，有房舍、遗址、碾磨之类，后因威虏归并肃州，因以安插西番日羔剌等。

以上七堡俱嘉靖二十八年巡抚杨博、兵备王仪共议奏筑安插关西旧归各夷，以靖地方，先因迁移无常，后改建官兵。

增筑墩台

明代，金塔属于明王朝的“边外地”，即在“边墙”（长城）之外。为了防御元朝残余势力对这一带的侵扰，明王朝采取增筑墩台，派兵把守的措施有效应对。据《肃镇华夷志》载：“肃镇羌虏接壤，三面受敌，保障之务，惟恃烽堠，以为防御。”“金塔寺堡……境腹墩台三十四座，境外墩台一十六座，每墩军五名。”因此，在长城外增筑墩台，是明王朝在金塔境内采取的主要防御设施。对此，《肃镇华夷志》中记载较为详细。

肃镇羌虏接壤，三面受敌，保障之务，惟恃烽堠，以为防御。天仓一墩，去水稍远，潜虏扑捉军戍，自永宁墩立，而虏稍远遁。他如李见嘴，墩名新添者，泛沙泉乃地名，因藏虏，亦添墩。无非为虏迹

民命而设，时言日鬼门关，因此地遇虏杀人众多，故人号为鬼门关。今有救生台即永宁墩是也，墩军因筑此墩，幸不被虏害，众皆以为救生台而今不怕不回来先年墩军发出，坐天仓墩者，涕泣以死，间有不能回城者，今恃其有永宁墩故，以为必来也。由是观之，烽堠之设，关于地方要矣。

天仓头墩　城东北三百五十里，为诸墩之首，东哨威远地方，去八十里，北虏或由镇夷、双墩儿地方，或由平朔过天仓河向西北行者，必从此经过，见则举火，而诸墩接之以达肃城；但地邈远，虏所必由，贼常至取水之处以捉墩军，而遇此墩瞭哨者，咸被虏患焉。

永宁墩　在天仓墩东南一里，城东北三百五十里，有泉，墩军取水，北有崖头，虏常伏于其下，以待墩军，至者即捉之，人号此地为鬼门关。嘉靖三十五年正月，该兵备陈其学巡行边堠，悯念民生，五月，委指挥卢汉统兵添设此墩，虏至此地，墩即望见，至今不能潜贼，而天仓瞭哨，未有遇虏害者，人谣曰：鬼门关，今有救生台，而今不怕不回来。

夜摸墩　在天仓、永宁西南，离城三百四十里，接天仓墩烽火，国初时为一所，属威远卫辖，嘉靖三十五年，千户李相在此营按伏，适当城角墩颓，内出一纸，上计筑此墩城用钱若干文，纸因年远，见风腐烂，止得李相之言如此云。盖亦当时此处使钱亦如古迹也。今因为烽堠，先年贼常捉墩军，因至此处，设兵按伏山营，获功二次，前后斩首五六级焉。兹则北虏或由墩北盐沟，或由镇夷、毛目墩空过天仓河去处至此，天仓或不能见，而此墩见之，则烽火可以达肃城。万历二十年，参将杨溶统兵至此湾，获功七十二级，以克大捷。

岔口墩（营盘墩）　去城三百三十里，瞭夜摸墩烽火，北虏或由墩空到此，亦起火以达红沙墩。

红沙墩　去城二百二十余里，接夜摸墩烽火，北虏或不由顺墩从迤北沙窝潜至此地，则亦举火以传于李见嘴墩。

李见嘴墩　去城三百九十余里，界于红沙半截二墩之中，先年红

沙半截相去二十余里，中有沙沟一道，南有芦草大湖，林木稠密，沙窝险峻，北虏乘风夜行，或由孤红山一带潜入沙河，藏于湖内，两下墩军瞭哨不见，或人里境剽掠，或截墩军夜后，被害甚多。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内，兵备陈其学委千总指挥卢汉添筑墩台一座，至今此处不能藏贼，而哨瞭者咸免虏害矣。

沙半截墩（垒墩子） 城北二百七十里，旧瞭红沙，今瞭李见嘴，虏由镇夷东、沙夹墩等处西来，过天仓河亦透此墩而起火达城。

细腰儿墩 去城二百五十里，竟联半截烽火以传火烧墩，北虏至此者少。

火烧墩 去城二百三十里，离细腰儿墩十里，迤西墩空无人，虏由孤红山后避墩潜行者，常时忽至此墩，见则举火达城。

昌平头墩 去城二百二十里，瞭接火烧烽火，虏或由孤红山避迤西墩塘，竟入羊头泉以至牛头湾沙窝潜住，常截换班墩军哨马，今差兵护送，贼鲜至。

昌平二墩 去城一百九十里，接头墩烽火。

昌平三墩 去城一百九十里，接二墩烽火。

昌平四墩 今改名新四墩，去城一百七十里。以上四墩俱通羊头泉贼径。

威虏后墩 去城一百六十里，瞭昌平四墩烽火。

威虏城墩 城东北一百三十里，瞭后墩烽火。先年有西番居住，今无矣。

东八里墩 先年威虏卫之八里墩也，已崩颓，去肃州东北一百二十里，嘉靖二十七年巡抚杨博委参将刘勋筑威虏堡，修周围墩，北虏由石城来者，常至于此。

王子庄墩 去城一百里，瞭八里墩并镇、朔三墩烽火，但钵和寺、孤红山之虏由夜行瞭望不见。

上半截墩 去城八十余里，接王子庄烽火，止是西虏由钵和寺地方来者至此，天仓之虏不能至此。

威虏旧四墩 此下又分一路，乃极北延边之墩，去城一百七十余里，

虏由孤红山来者，咸至此焉。

永安墩　即威虏之北八里墩也。去城一百三十里。嘉靖二十七年，参将刘勋修筑威虏，仍筑此墩，虏由墩而过者至此径，北来亦至此。

镇北墩　去城一百五十里，孤红山来者亦至于此。

镇朔头墩　今废。

镇朔二墩（镇朔墩）　去城一百四十里，此处为虏交过之路，北虏往西，西虏往北，俱经道于斯。

白烟墩　城北一百三十里。冲要同前。

镇朔三墩　城东北一一百一十里。即王子庄西八里墩是也。止是西虏潜至者有乏。先年西番朵尔只等在此耕牧，有营堡，遇警传火，由王子庄以达城焉。此又一路也。

革力哥什营墩　去城一百二十里，因先年安插西番族，故名焉。瞭望镇北墩烽火，西北虏寇俱可交至于此，亦冲要之边塞也。

察黑包营墩　城东北，有革力哥什又二路也。去城一百二十里，先年有西番驻牧，故即此以名其墩焉，不接各处烽火，止是贼由天仓等处来者，此处举火而金塔寺接之，以达肃城。

双古城墩　城东北一百一十五里。

大沙窝墩　城东北一百二十里。

上石梯子墩　城东北一百九十里。

下石梯子墩　城东北一百九十里。

流沙坡墩城　东北一百一十五里。

大柳林墩　城东北一百四十五里。

陈千户古墩　城东北一百七十里，万历二十五年兵备井陉霍鹏呈议修筑。

河口腰墩　城东北一百八十里。万历三十九年兵备泽州王忠显议筑。

金塔寺墩　有营城。东北一百二十里，北虏由镇夷地方自双树儿过河，经桶箍湾、顺天仓河潜至此地。先年西番日羔剌部属适当其锋，出大口子而古城、临水等处俱有备。万历二十四年，兵备井陉霍鹏、

参将宁夏姜河议呈巡抚田乐奏设守备兵马，展筑大堡，四角添墩，惟西北角墩瞭察黑包烽火，三十五年议筑边墙，添筑流沙坡墩、陈千户古墩，近如天仓等处有警，则烽火接流沙坡，达金塔，通肃州城。

新营儿墩　城东北九十九里。

南阁门墩　城东北五十五里。

塔院大墩　城东北九十五里。

塔院腰墩　城东北一百里。

沙山大墩　城东北一百里。

沙山腰墩　城东北一百里。

黑沙窝大墩　临水东北，离城一百三十里。

黑沙窝腰墩　城东北一百五里。

北阁门墩　城东北一百五里。

察黑坝大墩　城东北一百三里。

察黑坝腰墩　城东北一百里。

西倘头墩　城东北九十七里。

干河腰墩　城东北九十五里。

北阁门腰墩　城东北一百五里。

从《肃镇华夷志》记载可知，金塔境内的墩台以最北面的天仓头墩为首墩，由北向南，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墩墩有守兵，直至肃州城，沿北面孤红山、狼心山一线，从西向东，关卡哨所，步步为营。若有贼虏侵入，则烽火相望，直传肃州。

第三节　关西诸卫部众在金塔的安置与流散

明朝政府为经营西域，从嘉峪关以西至哈密以东长达一千五百里的广阔区域内（今甘肃西北、青海北部及新疆东部）先后设立7个羁縻卫所，又称“西北七卫”和“蒙古七卫”（因七卫首领皆为蒙古贵族），先后有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七卫，后沙州卫内迁，在其故地又设罕东左卫。它们“内附甘肃，外捍达贼”，是甘肃镇的“屏藩”。明朝正德年间（1505—1516年），吐鲁番速坦（王）阿黑麻，侵扰哈密、瓜、沙等地，先后击破关外赤金、罕东、沙州、安定、阿端、曲先及哈密七卫，各卫回族、维吾尔、哈拉灰、蒙古族、密罗族相继徙入关内，安插肃州，其中在金塔境内安插了大量的部众。

在今金塔地界安置东迁部众，最早始于明正德期间。时任巡按甘肃监察御史的张雨在其所著的《边政考》一书中，专列“西羌族口”，记载了当时生活在甘州、高台守御千户所、肃州周边的各部落状况，其中就有被安置在金塔县的诸部落情况：“赤金城：头目革力哥什等，部落男妇一千五百六名口，驻牧肃州上下古城；苦峪城：头目盼卜尔加等，部落男妇七百七十八名口；王子庄：头目川哥儿等，部落男妇八十九名口；柴城儿：头目卜木尔吉等，部落男妇七十九名口；川边：头目察黑包等，男妇二百八名口。以上四族正德十一年暂安迤北境外威虏、金塔寺及临城沿边、上下古城地方住牧。沙州：头目总牙等，正德十二年暂安境外威虏、金塔寺地方驻牧，见有部落男妇一千七十名口。”此次安置，是因为正德十一年，属于东察合台汗国的吐鲁番东侵，占据沙州，进而侵犯肃州，除居住在沙州的罕东左卫土巴、帖木哥等不能支、逃到肃州外，住牧于酒泉、嘉峪关以西的赤斤卫部众也纷纷向东逃窜。

正德十一年、十二年安置于威虏等今金塔地状况，《边政考》有较为详细记载：

名称	头目名	人口	住牧地	原属卫所	迁徙时间
苦峪城			威虏、金塔寺、上下古城	赤斤卫	
王子庄			威虏、金塔寺、上下古城	赤斤卫	
柴城儿			威虏、金塔寺、上下古城	赤斤卫	
川边	察黑包	208	威虏、金塔寺、上下古城	赤斤卫	
沙州	总牙	1070	威虏、金塔寺、上下古城	原属罕东卫（右卫？），后依罕东左卫	

正德十九年，邻番野也克力来侵，大肆杀掠，赤斤遂残破。明政府将赤斤卫迁入关内，大部流移于肃州周边，后被安置于肃州临近之上下古城及威虏等地。

但此后，安置在威虏、王子庄等地的原赤斤卫部众，离开了安置地，陆续来到了肃州城周边。

此后，关西数卫大多已经残破，向东迁徙之肃州近边，除从威虏一带回迁的赤斤卫部众外，还有哈密卫、沙州、瓜州东迁之部众，前来贸易的商人，羁留在肃州城的西域供使等，环肃州而牧，有些居住在肃州城内，与肃州附近的汉民争夺牧地、农田，在肃州城内也不时发生各种冲突，至有沿途抢掠发生，给肃州的安全带来了很大压力。于是，“监生李时阳至京陈情，安插各夷。巡抚蒲坂杨博，兵备肃菴王仪议添院守，筑修威虏城以安属夷，置买农器，散给以资其食，不许散乱往返，以严夷夏之防，委为筹边要务”。（《肃镇华夷志校注》属夷内附略，族类，第283页）。“嘉靖二十八年，巡抚杨博奏修筑肃州迤北百四五十里新旧城堡七处，徙环城诸夷于彼驻牧。”（《肃镇华夷志校注》卷一“沿革·附内地驻牧番夷”，第57页。）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是明政府一次对东迁部众的集中安置。对此，《肃镇华夷志》有详细记载：

畏兀儿、哈剌灰二部，寄住肃州东关；瓜州头目总牙部、赤斤头

目革力哥什部、苦峪头目胁卜尔加部、王子庄头目川哥儿部、柴城儿部柴城儿头目卜木尔加部、骟马城头目牙兰部、大草滩头目可可留部，俱寄住肃州迤北境外；剌尔吉部，寄住卯来河山口；长结思冬部，寄住红山口；赏卜束部，寄住干坝山口；板冲部，寄住榆林坝山口；帕泥部，寄住黄草坝山口；帖木哥部，寄住高台白城山。万历中安插地方见《住处》。若罕东左卫都督日羔剌部、赤斤蒙古卫都督锁纳束部、哈密卫都督羔乩吉孛剌却已见名《种类》。以上诸夷部落，皆避吐鲁番侵扰，故内投肃州近地间，亦计口给粮。议者曰：积以岁年，种类繁滋，岂惟靡费，国储抑恐有疽食浸淫之患。筹边忧国，当为深长思也。嘉靖二十八年，巡抚都御史杨博奏修筑肃州迤北百四五十里新旧城堡七处，徙环城诸夷于彼驻牧：

瓜州族头目总牙等，部落帐房二百七十顶，男妇二千三百六十七名口，安插威虏、察黑包二城，今头目阿朵尔只、羽章吉，部落帐房四百三十顶，男妇五百名口，安插柳树二、三墩。

赤斤头目革力哥什等一枝、柴城儿头目卜木尔吉等二族，部落共帐房一百三十一顶，男妇六百五名口，安插威虏两空堡，今头目帕剌宛冲，部落帐房二百九顶，男妇三百名口，安插卯来泉山口。

革力哥什弟可洛纵一枝，部落帐房七十八顶，男妇三百九十五名口，安插旧八里墩口堡。

苦峪族，头目朵尔只等，部落帐房九十九顶，男妇四百七十一名口，安插白烟墩南空堡，今头目阿卜束，部落帐房二百五十顶，男妇三百名口，安插煖泉庄。

川边族，头目察黑包等，部落帐房二十七顶，男妇一百一十四名口，安插王子庄墩堡，今头目抢尔加奔，部落帐房一百二十顶，男妇一百六十名口，安插老鹳窝庄。

沙洲族，都督日羔剌等，部落帐房一百一顶，男妇五百三十八名口，安插金塔寺城，今都督羽章卜等，部落帐房二百七十顶，男妇三百名口，安插中渠乱古小泉庄。

这是巡抚都御史杨博于嘉靖二十八年主持的一次安插，大多安插在今金塔县境内。

被安置的东迁各部遗众，主要生活在今中东镇、西坝乡一带。据《金塔县文物志》：

革力哥什堡 位于本县中东镇政府门前，今中东卫生院和农技站居其北半部。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筑堡，安插吐鲁番头目之一革力哥什居住，故名。清初，哥力哥什率众返回新疆此处先后为把总、千总营驻地。乾隆元年（1736年）添设守备一员，骑兵60名，步兵45名。今已废，遗迹存。

东八里堡 位于本县中东镇谢家墩村。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筑，安插吐鲁番头目可洛纵（革力哥什之弟）在此居住。

白雁墩堡 位于本县西坝乡白雁墩村。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筑，安插吐鲁番朵尔只驻牧。后废。

察黑包堡 位于本县中东镇梧桐坝村（原梧上村）。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筑，安插吐鲁番头目察黑包（安插于王子庄的满个虎力是他的儿子）在此驻牧，废。

西八里堡 原名镇朔三墩，以其地处王子庄西八里，故名。明初，这里有营堡，遇警传火。嘉靖年间，曾安插吐鲁番朵尔只等在此驻牧。

被称为“沙洲族”都督日羔剌等，则被安置在金塔寺城。即今金塔县城一带。

此次安置的东迁部落共七支，帐篷706顶、4490口人。分别以他们在这之前的驻牧地“瓜州”“赤斤”“柴城儿”“苦峪”“川边”“沙州”称之。“革力哥什”一支，亦为赤斤蒙古卫都督苦术部属。现将安置各遗众部落原属卫、卫残破后驻牧地、安置地等，列表如下：

部落名	头目名	原属卫	种属	原住牧地	帐房人口	安置地	备注
瓜州总牙	总牙		达种	瓜州	270.2367	威虏、察黑包二城	
赤斤	革力哥什	赤斤		赤斤	131.605	威虏	
柴城儿	卜木尔吉	赤斤		柴城儿			
革力哥什弟	可洛纵	赤斤			78,395	旧八里墩口堡	
苦峪族	朵尔只	赤斤		苦峪城	99.471	白烟墩南空堡	
川边族	察黑包	赤斤			27.114	王子庄墩堡	
沙洲族	日羔剌	罕东左卫	达类		101.538	金塔寺城	

由上表可知，此次安置部众，主要以罕东左卫、赤斤卫为主。

赤斤卫卫所在嘉峪关西二百多里路，即今玉门赤斤堡，是关西诸卫中最东边的一卫。附近的骟马城、回回墓、柴城儿、大草滩等，均是卫所辖地。

赤斤蒙古卫的成分主要是蒙古人，也有一部分西番（撒里维吾尔族）等其他民族成分在内。

明朝统治者对金塔境内东迁各部的安置采取划地安插，置买农器，发放物资，计口给粮等，由于措施得力，安置地草场广袤，适于耕种，自然条件不错，又筑修了新旧城堡，各部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吐鲁番部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商业，东迁前已经有了农耕生产方式。安置于威虏、金塔寺一带后，农耕生产方式的比重大大增加。他们和汉族人共同开发，促进了王子庄（今金塔县）经济、文化的发展。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年），今金塔县境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堡有：金塔寺、威虏城、革力哥什、察黑包、东八里、西八里、白烟墩、毛目城等。其中，金塔寺和毛目城成为山西、包头等地客商的贸易中心。

后来，安置金塔的诸部之间发生了抢掠和互相杀戮事件。事件的起因是这些部族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但还是以畜牧为主业，随着部落繁衍发展，最初的住牧地已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当局计口给粮恐也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因威虏北边各夷安插日久，又至肃州金塔寺地方驻牧”，向抚夷官“讨要草地牧处”，其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为了争夺地盘和草场，各部之间开始了相互抢掠。当时，总牙部住威虏、察黑包二城，帐房270顶，男妇2367人，总牙父名曰总不克，因避西夷侵掠，正德间投顺肃州地方后，

故总牙为头目。狡诈多谋，嗜利无厌，恃强任恶，鼠窃狗盗，夷夏共怒。总牙首领总不克有二子，长子绰牙，不能为头目，次子胁束尔加继任头领。胁束尔加与朵尔只为婿翁关系，而朵尔只为胁束尔加族的首领。胁束尔加“年轻而心无定主，性刻而恶不能悛”。岳父朵尔只“狡诈贪残”。翁婿合计，诱杀革力哥什等夷。察黑包族与胯束尔加族为兄弟。朵尔只翁婿合谋诱杀察黑包子满个虎力等十二人，收被害诸番部众。“其被害诸夷虽归部下，心中无不仇恨朵尔只也”。因为这些部落的姻亲、兄弟关系，势力互有渗透。各部之间争地夺利，胜者将败者属众尽收帐下，部众分合变化无常。嘉靖二十九年，明军东关厢头目乩吉卜剌、国师拜言卜剌联合日羔剌等，对居牧于威虏等堡的总牙族进行了围剿，围剿的结果是将头领总牙羁押夷厂。加之由于威虏等地地处肃州城北，属于北边蒙古各部落南下之前沿，屡次受北部各蒙古部落的威胁。明政府仍沿用“设诸卫以为藩篱”的思维，企图以安置诸卫作为与北境蒙古诸部、西部信仰伊斯兰教政权的缓冲地，但诸卫人口相对少，力量薄弱，很难起到藩屏作用。“设诸卫以为藩篱”的战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以及地方统治者歧视性的民族政策，视少数民族为“犬羊”，严守“夷夏之防”，试图用隔绝交往的方式来减少相互间的冲突。但这种交往不是一纸契约能约束得了的。隔绝的结果是被安置的部众日常生活用具得不到补充，所产也得不到及时贸易，导致抢掠等行为的发生。于是，万历期间，被安置的部众重新又回到了肃州周边驻牧。此后，这些回迁到肃州周边的部众，其驻牧地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最终落脚在今明花、靠近肃州的祁连山一带，形成了清代以来裕固族诸部驻牧地的态势，对此，《肃镇华夷志》有详细记载。此后，金塔境内已经没有了东迁诸卫部众的记载。

第四节　明代时金塔的民族与人口

少数民族

1. 回族

明代，金塔一带的回族主要来源于回迁的哈密一带的部众。明正统八年至正德八年（1443—1513年），哈密城先后被准噶尔汗、吐鲁番、喀什噶尔丹攻破占领，百姓流离，生计萧条。哈密及其周围地区的数万回族、畏兀儿、哈喇灰等族人民背井离乡，流落关内，其中的一部分就被安置在金塔的王子庄一带。嘉靖五年（1526年），陈九畴在金塔寺修筑城堡，安插哈密回族。

2. 蒙古族、撒里畏兀尔与其他民族

明代，随着关西七卫部众内迁后在金塔一带的安置，大量蒙古族和撒里畏兀尔人口进入金塔。当时金塔境内安置的主要以罕东左卫、赤斤卫人口为主。赤斤蒙古卫的成分主要是蒙古人，也有一部分其他民族成分在内。“先是，苫术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蒙古女，生都指挥锁合者、革古者二人。分所部为三，凡西番人居左帐，属塔力尼，蒙古人居右帐，属锁合者，而（自）领中帐。”（《明史》卷330，第8556页。）“西番”者，是当时对属于撒里畏兀尔的称谓。他们先后于正德十一、十二年和嘉靖二十八年被安置在金塔。正德年间安置的部族是总牙族（部）、察黑包族（部）等；嘉靖二十八年安置的是瓜州总牙族（部）、赤斤革力哥什族（部）、柴城儿卜木尔吉族（部）、可洛纵族（部）、苦峪族朵尔只（部）、川边族察黑包（部）、沙洲族曰羔剌（部）等，账房715顶，人口4535人。畏兀儿族的风俗，据《肃镇华夷志》记载：“男发垂髻，女首加帽，孳牧为业，饮食颇同于华夏，

婚媾不忌乎五服，迩年渐事耕牧，将知礼法焉。”

这些内迁的蒙古人和撒里畏兀尔族人等少数民族人口，在金塔得到了较好安置。内迁对他们的居住、生活和风俗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内迁后操古突厥语的撒里畏兀尔人逐渐同操蒙古语的蒙古人相互交融，形成了自称“尧呼尔”“尧熬尔”的裕固族。在明万历年间最终落脚在今明花、靠近肃州的祁连山一带，成为后来裕固族的亚乐格家部落，这是现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区韭菜沟乡和明花区明海乡的绝大部分裕固族。

人口

明初，由于经过元末的战乱，金塔人口大幅度减少，基本上处于地旷人稀的状态。明代前期，金塔人口有了恢复性发展。中后期，由于关外人口迁入，金塔少数民族人口有所增加。

明王朝建立不久，为了巩固西北边疆，在边疆地区实行卫所制，并在河西地区实行屯战合一的大规模军屯，屯田成为明朝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朝廷在金塔境内设立威远卫和威虏卫。按照当时的卫所人口，一卫的人口在5000人左右，金塔境内仅两个卫就有旗兵1万人左右，如按7/10的军士屯田计算，则金塔境内的威虏、威远两卫应有屯兵7000人左右。此后，为进一步扩大屯田，明朝还直接从外省调军队来甘肃屯田，当然，这些军士也很有可能一小部分被分配到威虏卫和威远卫。明代的军屯士卒还可以带家属，有的甚至举家前来参与军屯，一部分军屯家属长期定居下来。据此算来，当时的金塔境内军屯士兵和家属大概在2万人。当然威远卫和威虏卫的设置时间较短，从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设置，到永乐三年（1405年）裁撤，仅仅维持了十年。但威虏卫裁撤后并入肃州卫，又设置了中右、中中二所，威远卫裁撤后并入镇夷千户所，设置了毛目、平朔二所，士兵数量虽大量减少，但按照当时一个所的人口在1200人左右算的话，四个所也有近5000人，加之士兵家属，总人口应该在1万人左右。

在大规模军屯的时候，明朝还向河西大量移民屯田。如洪武初年，明

朝将河北、山西、山东一带的数十万居民迁移到甘、凉及河西一带，屯田实边。洪武四年（1371年），又将山后居民三万五千户迁入内地，散处在各卫府。这两次移民，应有部分安置在金塔。据此推算，当时金塔境内的军屯、民屯人口加起来不下2万。据明李应魁著《肃镇华夷志》记载，肃州卫“洪武中户五千八百五十五，口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五。嘉靖中户五千六百三十二，口九千九百六十三。万历中户五千三百五十二，口七千九百八十六”。很显然，这些记载并未将屯田人口、内地移民和移居肃州的关外少数民族人口计算在内。

到了嘉靖年间，金塔一带的卫所已完全废弃，人口有所下降。据《肃镇华夷志》记载，当时的金塔寺堡“设在平川边外极冲上地，土城周围一百九十丈。东至镇夷境外桶箍湾五十里，西至下古城境外王子庄三十里，南至鸳鸯池四十里，北至天仓墩二十五里。内设守备官一员，把总官一员，军丁四百七名，马二百一十五匹。境腹墩台三十四座，境外墩台一十六座，每墩军五名”。如果据此推算的话，金塔境内的军士总数也只有600多名，较明初时已大为减少。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被安置在金塔的蒙古族、撒里畏兀尔族等关西诸卫部众人口达4535人。仅这两项有5000多人，加上镇夷所在金塔的人口和当地居民，总人口也在1万左右。较明洪武时期减少了至少一半。但据《嘉靖陕西通志》记载，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肃州卫人口为8762户10830口，户均只有1.24人；镇夷千户所为1236户1680口，户均1.36人。即当时肃州卫和镇夷千户所一共才有9998户12510口。从这些数字可判断出，这些人口中也未将关外移居人口和屯田人口计算在内。

第五节　明代金塔的经济与文化

经济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执政的封建王朝。由于实施“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经济政策，开展大规模军民屯田，金塔一带农业逐渐恢复，户口逐渐增多，大片荒芜的土地得到重新垦殖，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流通也得到了一定发展。

农业方面，一方面，由于金塔一带可开垦耕地面积较大，适宜发展灌溉农业，经济成本低，经济效益高，且草场广袤，可以提供农业生产所需的牛、马、驴、驼等畜力；另一方面，由于金塔战略地位重要，发展农业生产可就地解决军队供养，通过屯田安置流民，使边疆地区人口不断增加，有效促进边疆安宁，因此，朝廷对金塔农业的发展较为重视，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农业生产区域。明代，金塔境内的农作物品种逐渐增加，粮食作物主要有稷、小麦、大麦、青稞、莜麦、回回大麦、黍（黄米）、胡麻和大豆、小豌豆、扁豆及绿豆等；蔬菜类作物主要有茄、茄莲、芹菜、葱、蒜、韭菜、白菜、菠菜、萝卜、胡萝卜、天萝卜、苜蓿、蘑菇等；瓜类有西瓜、甜瓜、王瓜（黄瓜）、丝瓜等；林果类有梨、杏、桃、李、枣、葡萄、楸子、沙枣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金塔种植的“回回大麦”即是由中亚地区或波斯沿丝绸之路传入的原产于美洲的玉米。据《肃镇华夷志·物产》记载：“回回大麦，肃州昔无，近年西夷带种方树之，亦不多。形大而圆，白色而黄，茎穗异于它麦，又叫西天麦。”由于金塔是明代肃州的主要屯垦区，这一记载充分说明了金塔在明代中后期已经种植玉米，也是我国较早引种玉米的地区之一，它对于当地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朝建立后，在包括金塔在内的边疆地区实行耕战一体的屯田戍边政策，这种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就是让各个卫所的军士进行耕种，从军队中抽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军士中既有“田卒”，又有“守关卒”。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诏：“陕西诸卫军士留三分之一守御城池，余皆屯田以食，以省转输。”（《明太祖实录》卷123）此后，军屯便在河西大规模展开。明代的军屯事务有所在卫所负责管理，“屯”是军屯的基本单位，一屯有若干人或若干户，“屯”的基层组织是“屯田百户所”。“每百户所管旗军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七八十名。千户所管十百户，或七百户、五百户、三四百户。指挥所管五千户，或三千户、二千户”（《大明会典·屯田》）。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肃州开始设置“屯田百户所”。后来，又推行了联合几个屯所组建一个“屯堡”的办法。“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择近便地筑一大堡，环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门，周以壕堑，阔一丈或四五尺，深与阔等，聚各屯粮储于内。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粮食。有警即人畜入大堡，并力固守”（《明太祖实录》卷93）。大堡设屯长1人，屯副1人，小屯堡只设屯长一人。屯堡大的有守备、操守、防守等官，屯堡小的只设防御、掌堡官或总旗。这样，屯军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参与战斗，如果有敌人来侵袭，则可合力防御，使粮食、人畜等免遭抢掠损失，从而保证了屯田的顺利发展。到了明正统三年（1438年），肃州卫的屯田数量达到了27092.4亩（[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民屯，是由政府迁徙内地的无地农民，或是发配来服刑的罪犯到指定的地方耕种。史称“田利大兴”的，就是在嘉靖初年右都御史刘天利督办甘肃屯政期间，奏请让肃州的壮丁以及山西、陕西等省的流民在肃州周边耕牧，而且在周边其他地方大力推行，使屯田达到空前盛况。由于大量移民到河西屯田，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使当地的大量荒地得到了开发，实乃一举多得之措施。

明朝政府在河西地区兴兵屯田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兴修水利。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除了士卒外还要调用移民和当地的民夫。在长城沿线经过多年的建设，逐步形成了许多灌溉系统。大规模屯田，大力兴修水利，加之不断地推广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河西长城沿线的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迅

速的发展，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都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使得原来许多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繁荣的农牧区。这样，既减少了军需运输之劳，又减少了人民的劳役。

畜牧业方面，明政府确立了一套系统严密的畜牧业管理体制，制定了详细严格的畜牧律令规定，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明代畜牧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明代金塔畜牧业以养马、羊、牛、驼为主，其中养马为重中之重。明朝统治者以马政建设为重点，在河西地区实行官牧政策，严格官马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管理机构。养马事宜由甘肃苑马寺负责，在“水草丰处创建马场”（《明太宗实录》卷59）。明朝政府采取用茶易马、贡马、苑马寺养马等多种渠道所得之马匹，基本上保证了甘肃镇耕战之所户用马。据《明孝宗实录》载：以茶易马，“岁以万计，加之寺监所牧，足给边用”。这对甘肃镇防御能力的加强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明代初期，关外诸卫就以牧业为主，内迁后，安插在金塔的诸卫人口基本仍以畜牧业为主。养牛业、养猪业、养羊业及养禽业（鸡、鸭、鹅）在明代也获得了一定发展。畜禽品种繁多且各具特色，猪、牛、羊等家畜及家禽饲养业在民间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养殖技术也有很大提高。明代中后期，由于制度败坏、人口激增等综合因素的作用，金塔一带的畜牧业受到严重挫折并渐趋衰落。

明代是金塔手工业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手工业有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大类型。明代前期以官营手工业为主，中期以后，民间手工业规模逐渐超过了官营手工业。明代，金塔境内的手工业主要有皮毛加工、酿酒、冶金铸造、石材加工、木器制造和粮油加工等。金塔一带多民族汇聚，民族贸易发达，尤其在明代中期以后，关外诸卫的撒里畏兀尔、哈喇灰、蒙古族、回族等各部族安置在金塔一带，各族工匠将他们精湛的传统畜产品加工工艺带入金塔。各族工匠在皮毛加工生产中不断交流，制作的皮毛制品更加精细，推动了金塔一带皮毛加工技术的进步。当时，金塔市场上出售的皮革制品主要是保暖性极好的生活用品，如羊皮大衣、羊皮被褥、皮靴、皮帽，还有日常使用的皮绳、皮鞍、皮臃子等。明代的茶文化与酒文化十分发达，民间盛行饮酒之风，酒令进入成熟的阶段。各种新式茶色纷纷出现，

紫砂壶也开始流行。酒楼茶馆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闲场所。明代，金塔堡、威虏城等处都有专门的酿酒作坊。史料记载，每个烧酒作坊都有好几个用榆木或沙枣木做成的大桶，用来发酵酒糟，酿酒原料取自本地的小麦、大麦、回回大麦（玉米）等。发酵时，有的烧酒作坊还将苹果、梨加进酒糟，使酿出的酒醇香浓郁、甘冽清香。

据《肃镇华夷志·货利》中记载，关外诸卫各部非常需要“铜锅兵器之属”等器物，内迁到金塔后，把他们成熟的冶金铸造技术也随之带来，开办了许多冶金作坊，使金塔的冶金铸造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10 年，在工商局家属楼前挖出了 8 只明代坩埚，坩埚材质类似砂锅，圆口尖底，形如炮弹，高 20~23 厘米，口径大约 10 厘米。坩埚内壁上附坚硬的金属物，附近有炭灰、煤矸石等。它的发现印证了明代金塔冶金铸造技术的进步。

明代，金塔所在的肃州一带从漠北引种胡麻并用以榨油，丰富了食用油的种类。榨油前，先将胡麻放进铁锅内用温火翻炒，炒时边加温边搅动，使胡麻受热均匀。胡麻炒熟后还要经过磨、蒸等工序，然后将加工好的油料放进木制油槽，按动与之配套的巨大木质油梁挤压，油料正好处在油梁的支点，于是清油便被源源不断地挤压出来。这样的土法榨油虽然出油量较少，但榨出的清油色泽鲜亮、油性高、香味浓。

明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金塔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关外诸卫各部族迁入金塔，各民族间的商品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客观上有利于金塔商业贸易发展；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小生产者可以出卖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特别是明代后期“一条鞭法”推行后，劳动人民也必须出卖更多的农副产品以换取银两，从而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明代的“茶马互市”是与其军事防御体系相配套的一项经济措施。明朝利用“番人”食肉，喜欢饮茶的生活习惯，以茶叶为纽带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在边疆地区建立“茶马互市”。为确保足够的茶叶进行互市，明代承袭前朝旧制，对茶叶等实行专营制度，设立茶课司征收茶叶，征收来的“官茶”用来交换马匹。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

法定的重量单位。

文化

明代，金塔地处边陲，文学创作主要以反映边塞风光和军民生产生活为主。同时，一种新的民间文学样式——宝卷，开始在金塔民间广泛流传，为明代金塔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金塔宝卷，是一种流行于明清以来的民间说唱文学，是在唐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代说经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历经宋的谈经、讲史等，并受到话本、小说、诸宫调及戏剧等影响。其内容包含儒、释、道德三教合一及各种秘密宗教，并有大量非宗教的历史人物、民间神话、传说和戏曲故事。金塔宝卷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文字传播，二是口头流传。宝卷的篇幅一般都较长，最短的也有五六千字，最长的达八九万字。当地人认为抄写宝卷是积功德，有文化的人都愿意抄。抄了自己保存，也可以赠送亲朋好友。不识字的人请人抄，靠它镇妖辟邪，也有少数宝卷是木刻本、石印本。金塔宝卷流传最基本的方式是“宣卷”。宣卷人在开始前要洗手漱口，点上三炷香，向西方（或佛像）跪拜，待静心后，就开始念卷。听卷者要宁静专心，不准喧哗、不准走动。中途念卷人休息时才可以活动。听众中还有几位“接佛人”。所谓接佛人，就是等念卷人念完一段韵文或吟完一首诗后，重复吟诵最后一句的后半句，再接着念“阿弥陀佛”。金塔宝卷的结构特点是韵散结合。散说部分一般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经历、结果等发展过程。韵文部分主要重复散说部分的故事，句式以十字句最多，七言句次之，还有五言句、四言句，句子有一定的平仄韵律。韵文的比重多于散说。和变文一样，金塔宝卷在开头、过渡、结尾处都有一些固定格式。一般的开头是：“×× 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善男信女虔诚听，增福延寿得消灾。”当然，句数多少可以灵活变化，最长者可达 30 句，短者只有 4 句，类似变文中的押座文。在散说与韵文之间，常常有“正是（真是）”引起的感叹诗，在韵文过渡到散说中间，也有感叹诗。诗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句式，句数长短不限。散说和韵文的过渡中间，有时增加有明确曲调的一组唱词。如《蜜蜂宝卷》：

“却说这一段因果故事出在大宋真宗天禧年间……正是：可恼吴氏太不良，设计要害先儿郎。明枪易躲人能躲，暗箭难防祸难防。展宝卷蜜蜂计高声朗诵，诸善男和信女细听明……关住门儿坐，天上掉下祸。”就比较典型。明代金塔宝卷中，《傍妆台》《耍孩儿》《雁儿落》《画眉序》《刮地风》等曲调最为常见。金塔宝卷除保留了个别原有曲调外，大量使用当地民间曲调。现已搜集到的宝卷有20多个曲调，常见的有《哭五更》《达摩佛》《莲花落》《唱道情》《浪淘沙》等。它们和敦煌曲子中的定格联章调《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很相似。这些曲调的使用，没有严格规定和限制，念卷人可以根据情节发展灵活安排。宝卷一般用韵文结尾，或总括全篇主题，或宣扬听卷的好处，或自谦自己念卷不好。如《牧羊宝卷》结尾：“听卷若是听得真，永消灾难保安宁。老人听卷寿命长，中年听卷子孙旺。少年听了这本卷，夫妻团圆一世闲。妇女听卷有好处，一家和气家人睦。诸佛菩萨常拥护，永护听卷善男女。一句了然再不提，宝卷圆满针对针。”

金塔宝卷是一种比较古老而又有浓郁宗教色彩的通俗文艺，作为人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娱乐形式，是活着的敦煌变文。《金塔宝卷》除了具有和全国各地宝卷的共同特点外，更有其自身的不同的特点：第一，《金塔宝卷》的搜集、发掘和整理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祖国宝卷珍品的数量和内容。第二，《金塔宝卷》中保留了一些古老的版本。据考证：金塔的《韩祖成仙宝传》《七真天仙宝传》《综录》最早者为1702年，可见《金塔宝卷》源远流长，为宝卷产生的时代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第三，《金塔宝卷》是国内独存、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宝卷，是活的宝卷。明代金塔宝卷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增加了许多当地人情风俗、方言俗语等内容，有少数是金塔民间艺人自己创作的，对于研究中国俗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现存最早、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酒泉（包括金塔）历史沿革的文献，是编纂于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肃镇华夷志》，撰修者是时任前翰林院庶吉士、巡按直隶广州监察御史、钦差整饬肃州兵备副使的李应魁。

李应魁，四川内江人，进士出身。泰昌元年（1620年），在肃州任右参将，天启元年（1621年）升为按察使、凉州分守道。《肃镇华夷志》原书共四卷，首创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当时，任肃州兵备道副使的张愚首创初

稿。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张愚调离肃州，书稿编纂工作也因此停止。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李应魁任肃州兵备道副使，将此书稿重新整理，在张愚书稿基础上最终完成了这部地方史志专著。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陕甘等处兵粮分巡宁夏道、按察司副使高弥高重刊。

《肃镇华夷志》记录了酒泉地区上启春秋战国时期、下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地理、人文、风俗等方面的历史沿革，特别是对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进军河西、收复酒泉到万历后期二百多年沿革历史进行了翔实记载。

《肃镇华夷志》共分四卷，卷一图说（出舆图20幅）、沿革（疆里、郡名、番夷附）、山川（形胜附）3目；卷二水利（桥梁附）、风俗、物产、户口、城池、军制、马政、屯田、戎器、兵饷、驿传（铺舍附）、公署、学校、坛壝、祠祀（寺观附）、古迹、诗歌17目；卷三景致、堡寨、关隘、烽堠、奉使、宦籍6目；卷四人才、节孝、流寓、仙释、灾降5目。此外还有“属夷内附”，包括种属、族类、住处、风俗、货利5目。总计36目，约20万字。

《肃镇华夷志》记述的范围为当时的肃州兵备道所辖的肃州卫和镇夷守御千户所。据《肃镇华夷志》记载：肃州卫的里至范围“东至镇夷所属盐池驿一百四十里，西至嘉峪关七十里，南至雪山一百五十里，北至黑山一百八十里，东南至白城子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雪山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大钵和寺三百里，东北至天仓墩三百二十里”。据此可知，当时的肃州卫大体包括现在的肃州区、金塔县和嘉峪关市。当时金塔境内设有金塔寺堡，统辖金塔全境，是肃州卫和镇夷守御千户所所辖十八座城池中地理位置较为重要的一座。书中对金塔寺堡所辖的里至范围、防守兵力部署、修筑的墩台都有明确记述，特别是对金塔寺堡范围内的城池、古迹、堡寨、烽堠记载较为详尽。在“内地驻牧番夷”和“属夷内附”两部分中，详细记述了明代东迁诸卫在金塔境内的安置情况以及内附各部的族属、来源、人口、语言、迁徙、生产风俗习惯以及相互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珍贵史料，为研究金塔境内及周边地区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肃镇华夷志·物产》中记载的“回回大麦”即是玉米。玉米的原产地在美洲，在明代中期从海路和陆路传入我国。这

一记载中对玉米的称谓说明，在肃州地区种植的玉米是经丝绸之路由西亚传入我国。它不仅是我国较早记载玉米种植的地方志，也是证明明代中后期陆路丝绸之路继续发挥沟通东西方交流作用的有力佐证之一。

教育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天下各级府、州、县设立学校（书院）。还在不同地方先后设置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卫儒学等机构，设教授一人，训导二人，主要是教授武官的子弟学习，安定边关武将人心。明代教育系统由国子监、儒学、社学构成。这一系统以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民间社学为主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制体系。有在府、州、县和都司、行都司、卫等地方军、政机构设置举办的地方官学——书院，还有各卫、所在各自属堡自办的社学。金塔境内在明代没有设置县等行政机构，只是设置了卫所等军事机构。由于金塔境内设置的威虏卫、威远卫存在的时间较短，没有设立儒学的史料记载。威虏卫裁撤后并入肃州卫，其教育也相应由肃州卫管辖。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建立肃州儒学，成化三年（1467年），肃州都御史徐廷璋改建为“肃州学宫”（今酒泉师范校址）。金塔境内在金塔寺堡、威虏堡内也举办几所社学。但是由于家庭贫困以及名目繁多的差遣、劳役等原因，各堡军士子弟和堡民子弟无法入学就读，社学开办不久就被迫关闭。

第六节　明代金塔的宗教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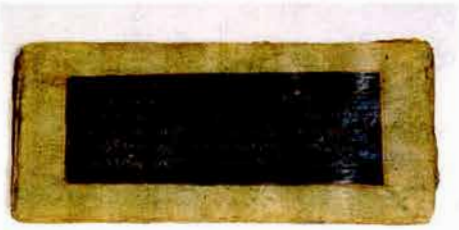
明朝尊崇佛教，并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僧官制度体系。明初，对元代毁于兵火的寺院进行修复，并对喇嘛教实行优待政策。到明代中期，佛教在金塔已很兴盛。当时，金塔境内最著名的佛教寺院当属金塔寺。据《创修金塔县志·1934年手抄本校注》收录的《重修塔院寺序》（刻写于雍正十年即1732年）记载：


塔院寺

“如我金塔寺之有塔，不知妨于何代，然塔以筋砌始名曰筋塔。迨明万历二十年设堡，其地立官分土，因名其堡曰‘金塔寺堡’，是堡因塔而名也。”《肃镇华夷志》也记载：“金塔寺堡，先年属威虏，汉人居住，有房舍、遗址、碾磨之类，后因威虏归并肃州，因以安插西番曰羔剌等。”这充分说明在明万历年间金塔寺和“金塔”已存在。“金塔”是典型的覆钵式喇嘛塔，这种塔的造型特点是在高大的方形基座上，建圆形覆钵形的塔身，上面安装塔刹。塔身下方上圆，具有浓重的原始性。喇嘛教建塔常采用这种方式。1987年维修“金塔”时，从塔顶内采集到藏文经、大乘妙法莲花经、大悲心陀罗尼经等多部明代经卷。此外，金塔寺堡内还建有关帝庙等庙宇、祠堂等。


大乘妙法莲花经

明代初期，以撒里畏兀尔为主的“关西七



藏文经



藏文写经

卫”部众大部分笃信佛教。内迁后安置到金塔境内的部众也始终保持自己的佛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他们在与当地居民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促进了佛教在当地的传播。

第七节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与金塔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首民谣在金塔和我国其他广大地区流传了600余年，祖辈相传、妇孺皆知。

洪洞大槐树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城北，曾经是明朝初年移民集散地。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有组织的大移民活动。

元末明初，由于连年战乱，全国大多数地方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但山西却出现了经济安定，社会繁荣，人丁兴旺的景象。洪武初年，山西人口达到400余万，比当时的河北、河南两省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又是人口稠密之县。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明朝初年，朝廷在洪洞广济寺设局驻员，发放凭照川资，集中移民。当时许多州府都有明确的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无土地者全家移走。移民涉及辖区内的所有家庭，可见当时移民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山西移民的集聚地除洪洞外，还有太原、平阳二府、泽州、潞州、沁州、汾州、辽州、朔州等地。

广济寺位于洪洞县城北的贾村西侧，寺院宏大。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阴遮数亩的汉槐，汾河滩上的老鹳在大槐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综合《明实录》《明史》等史料记载，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不到50年的时间就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移民的地区遍布山西51县和全国十余个省市，其中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省是移民的主要区域，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从山西迁往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

东北等省。《明太祖实录》载，移民到居住地后，每户给地 15 亩，另加菜地 3 亩，皆免 3 年租税，3 年以后每亩征收一斗官租。各州、县农民自己开荒，所开垦的土地都归垦荒人自己所有，作为永远的产业；政府每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还责成地方官员为移民散发耕牛、种子，使移民能够定居下来，并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对屯田移民的管理，则以屯为单位，一屯即一里，下分十甲。

俗话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任凭政府怎样宣传中原地方好，几年不纳粮，还给安家费、生活费、生产费，可还是谁也不愿迁到外地去。明朝统治者只好制定出具体的移民条律，强制人们服从。并规定凡移居者都必须到洪洞贾村大槐树旁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路费，然后从那里出发，按政府指派的去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各地。

老百姓在万般无奈下，背井离乡，移民他地，临行之时，凝望高大的古槐，依依惜别故乡。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鹳窝显得十分醒目，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鹳发出声声哀鸣，令即将离开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不忍离去，频频回首，最后远远地也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因此，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鹳窝就成为家乡的标志。此后多年，当年移民的后裔虽然已经不记得老家的具体地方了，但是"洪洞县、大槐树"的影子却长久地留在他们记忆深处。

根据有关文献和当地的县志、族谱、家谱记载，当时迁往甘肃的移民主要分布在兰州、甘谷、天水、民乐、景泰、会宁、武威、民勤、古浪、靖远、平凉、庄浪、临泽、高台等地，并没有直接迁移到金塔。直到清朝初年，尤其是康熙、雍正年间，金塔的毛目、王子庄等地陆续得到移民开发，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诏肃州与布隆吉尔毗连迤北西吉木、达里图、金塔寺等处，招民垦种。"朝廷在肃州所属的金塔寺（现金塔县城）安插移民 35 户。清圣祖康熙五十八年 (1719 年)，肃州守备曹锡钺在毛目分县和王子庄分州移民屯田。清世宗雍正四年 (1726 年)，总督岳钟琪令肃州通判毛凤仪雇佣民工 300 人，将夹山水峡口（今鸳鸯池水库坝址）凿深劈宽，引水过山，开挖王子庄东坝和西坝，并从镇番（今民勤）、高台等地移民开垦荒地。这时迁移过来的一部分中原移民，正是当时山西大槐树下的移民之一。此

后，随着金塔的不断开发，迁入的人口逐渐增多，当然，这些人口当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当年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他们移到新的地方若干年后，由于诸多因素造成生活所迫，不得不又一次迁徙。所以，以前金塔的许多老年人都对儿女说，自己的祖籍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谁是古槐底下人，脱履小趾验甲形。”这句民谣已经流传很广。人们在盘查祖籍时，常常脱鞋拉袜，亮出脚丫，验看脚小趾是何甲形。如果谁的小趾甲上有几道竖纹，好像是两个指甲，那谁的祖先就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民的老乡了。传说，在当初移民时，官府因为怕人们逃跑，用刀子在每个人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



第八章　清代的金塔

清朝（1636—1911年），是由满族人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的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全境的时期，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政权。清代自后金及清共12帝，历295年。

满族历史悠久，其族源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国史籍中所记载的肃慎人。肃慎人生活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东临大海。到了周武王与周成王时，史书上曾记载他们进献过“楛矢石始砮”。在中国以后的史书中，肃慎即被称为“挹娄”。到了北朝和隋唐时期，肃慎人和挹娄的后人被称为“勿吉”和“靺鞨”。

靺鞨部落中的一部分黑水部分布很广，其生活地域在今黑龙江省爱辉县以东、依兰县以北、直临大海的黑龙江下游地区。之后，黑水靺鞨向南迁移，《辽史》中契丹人称其为“女直（女真）”（《辽史》称“女真”为“女直”是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讳）。此后靺鞨这一称谓便被“女真”所取代。

北宋初年，女真部落中的完颜部逐渐强盛，统一了今吉林省以北各部女真。1114年，其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翌年，建立金国，用10年时间灭掉了辽国，两年后又征服了北宋，将都城从早期的上京（金上京在今黑龙江阿城区南）迁到中都城（今北京城西南隅），统一了河北及东北广大地区。

元末明初一部分女真人南迁，到达吉林省和辽宁省北部及东部一带定居。至此，女真人大致分为三大部分，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明朝中期，建州女真南迁，与内地接触较为广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其逐渐成为女真诸部中最强大的一支。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爱新觉罗家族的努尔哈赤被推选为建州女真的首领后，他以赫图阿拉为根据地，用了30多年的时间，统一了海西女真及东海女真的主要部分，为其称雄东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万历四十四年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后改兴京，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即汗位，建元天命，国号曰“金”，史称“后金”。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在与明军作战时身负重伤不治而亡。由八子皇太极在盛京（沈阳）继位，改国号为清。顺治二年（1645年）春，多尔衮率领清军在山海关打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夺取北京，并将都城从盛京迁到北京。



第一节　清朝统辖金塔

清朝定都北京、入主中原后，甘肃及河西一带还被李自成农民军及明朝残余势力占据。清军攻入西北后，让英清王阿济格坐镇西北，指挥清军继续追击、镇压农民军余部，并令肃清王豪格镇守西安，加强对西安的防守。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豪格率师西征秦陇地区，秦州等地归附清政府。六月，阿济格在统军追剿起义军的同时，派人招抚河西，河西诸郡望风归附。阿济格顺利地招抚了嘉峪关以东各州县，将金塔纳入了清王朝的统治范围。

清代，是金塔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清代前期和中期，由于政府实行积极的经济政策和大规模移民屯田，农业开发达到历史高峰；清代中后期，机器工业、金融业、邮电业和学校教育的兴起，引起金塔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清代末期，由于政治腐败，自然环境恶化，民族政策失误，内战频繁，导致经济衰退，人们生活艰辛。

行政建制

清朝时期，地方层级划分沿袭元制，分省、府（州）、县三级。顺治元年（1644年），置陕西总督，统辖甘肃，兼辖四川。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设甘肃巡抚，酒泉沿袭明代建置，在东部地区恢复建立肃州卫，实行军政合一的体制。顺治二年（1645年），设肃州卫，属陕西行都司。雍正二年（1724年），改肃州卫为肃州厅，隶属甘州府。雍正三年（1725年），改高台守御千户所（顺治二年设立）为高台县（含毛目，今金塔县东部）；雍正七年（1729年），升肃州厅为肃州直隶州，领高台县；并在今金塔县西部增设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分州，置王子庄州同，掌督粮捕盗、清军理事、

扶苗水利等事务，治所在王子庄墩堡（又称王子庄，今金塔县中东镇政府驻地一带），衙门地名叫噶里戈什（革里哥什）。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今金塔县鼎新镇、航天镇一带设高台县毛目县丞（又称高台分县），治毛目城（今金塔县鼎新镇友好村）。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别置甘肃总督，其巡抚衙门设于肃州。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因回民尽徙出口，王子庄墩堡荒僻，王子庄州同治所由王子庄墩堡移驻金塔寺堡。同治四年（1865年）春，马文禄在肃州（今肃州区）发起了回民反清斗争，起义军占据肃州后，肃州州治临时移驻金塔。

在军事建制上，主要分八旗和绿营两个系统。八旗兵是清军早期的主力，17世纪初，努尔哈赤在东北起兵时，组成四旗，名曰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后又增设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合称满洲八旗。征服蒙古后，将归附的蒙古人编为蒙古八旗，归附的汉人编为汉军八旗。这24旗是清王朝入主中原、平定天下的基本力量。绿营兵是由明朝降卒和地方军改编而成的汉兵，因汉兵用绿色旗，故称之为绿旗兵或绿营兵。各省绿营兵均归总督、巡抚节制，由总督直接统领的军队称为“督标”，由巡抚直接统领的军队称为“抚标”。

清初，常驻酒泉的军队有肃亲王豪格部和肃州镇总兵府。肃州镇总兵府驻肃州城（今肃州区），归甘州提督指挥。顺治二年（1645年），设肃州营，隶属于甘肃镇，由参将指挥。顺治四年，改设肃州协，由副将指挥，常驻兵3463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撤销肃州协，升置总兵府，统辖金塔协及直属各标、营军队。据《肃州新志》记载：“‘金塔寺营，原设守备等员。康熙三年（1664年）改设游击。乾隆元年（1736年）改设副将，添设中军都司一员，千总三员，把总四员’；‘威虏堡营，乾隆元年（1736年）添设守备一员，马战兵六十名，步战兵四十五名。’。”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金塔境内设置金塔协，隶属肃州镇总兵府。此后，撤销金塔协，设金塔营、镇虏营和毛目汛等三处军事机构，均隶属肃州镇总兵府统辖。其中，金塔营驻地在金塔寺堡（今金塔县城），有千总1人，把总3人，兵士539人；镇虏营驻地镇虏堡（金塔县北），有守备1人，兵士150人；毛目汛驻地毛目城（今金塔县鼎新镇友好村），有把总1人，兵士38人。雍正年间又设游

击一员。清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改金塔寺游击营为协镇营，设中军都司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协镇驻金塔寺堡，千总驻防威虏堡。光绪时，金塔驻军兵力大裁减，金塔营、镇虏营和毛目汛3处总兵力仅剩160人。

民族政策

清代的民族政策是清代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初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满族在政治、经济、军事诸多领域拥有特权，满洲贵族圈占土地，屠掠人畜，满族八旗子弟，依靠剥削其他民族为生，参加科举考试，满族子弟可以优先录用。同时，推行民族歧视政策，颁布薙发令，强迫汉人剃发留辫，习从满俗，各地派出了不少剃头匠，挑担游行于市，见蓄发者即强行剃之，稍有抵制，便杀而悬其头于扁担之上以示众。这些做法激化了汉族对满族的仇视心理，引发了波及西北的咪喇印、丁国栋领导的回民反清斗争以及后来肃州的马文禄、白彦虎等反清斗争。面对汉族民众的反抗和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清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实行以安抚怀柔为主、武装镇压为辅的做法，正视民族之间的差别和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政策，废除了一些民族压迫的政策，调整了民族关系，缓和了满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安定了民心，使社会趋于稳定。首先，实行蒙汉隔离，如金塔境内的双城，就是蒙汉城。其次，扶助生产，清朝前期，曾将一部分新疆吐鲁番归附回民安插到肃州金塔营所属之威虏堡地方，与王子庄、东坝等处招垦民户毗邻而居。雍正四年（1726年），陕甘总督岳钟琪考虑到这里旧有渠道已为招垦民户占用，而且水量较少，除汉民浇灌之外，不能满足回民用水所需，加上汉、回共用一水，易起争端，便指示肃州通判毛凤仪等从讨赖河引水，另开新渠二道，长四五十里，令当地回、汉民各管一渠，分定界址，以防混淆。既解决了农业灌溉问题也有利于回汉各民族的团结。三是蠲免粮草，据《肃州新志校注》记载："顺治九年，豁免肃州所属故绝抛荒并水淹沙压地亩额征粮草；康熙二十二年，蠲免肃州屯科粮草；康熙三十六年，蠲免肃州屯科粮草。"康熙晚期以后，社会相对稳定，统治政策也较以往更加宽松。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开始实行“地丁银”，雍正初年又推行“摊丁入亩”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河西地方官员上谕户部：“甘肃地方地丁钱粮，前已降旨蠲免，其河西四府州县及各卫所额征粮料草束，又经一体免征，念新归内地番民，向风慕义，愿附版图，其地亩额征本色粮草，与河西等处赋税相同，亦应一体蠲除。”雍正八年（1730年），又将河东之河州厅，洮州卫之归德所，河西之西宁、凉州府所属应征钱粮俱与恩蠲免。雍正九年七月，又将河东、河西各属民户、屯户及番民等本年应征各项银米草束，一概蠲免。诸如此类蠲免粮草的谕令，文献记载中为数不少。据《重修肃州新志·蠲恤》记载而统计，康熙时期蠲免屯、科粮草九次，雍正时期蠲免屯、科粮草五次。四是救济灾荒，凡遇自然灾害，清廷除蠲免税粮外，还照例对受灾民众实行救济。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团结各族、稳定边疆的作用，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历史上自唐朝“开元盛世”后，又出现了一次“康乾盛世”。

当然，清政府后期，统治者通过文字狱来抑制广大汉族民众，尤其是抑制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以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对内采取了民族分治的政策，压制汉族进步思想，对外实行海禁，闭关锁国，轻视外国先进思想和技术，导致了其统治时期内，此起彼伏的民族问题和清末的国家极度贫弱。

清代王子庄历任州同：

朱　邃：雍正七年（1729年）任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

周道光：雍正十三年（1735年）任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姚　墟：乾隆三十年（1765年）任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彭以懋：字勉之，号晓村。四川华阴人，乾隆五十年（1785年）任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谭乃熊：湖衡山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任至嘉庆六年（1801年）。

罗元翕：东川人，嘉庆七年（1802年）任至嘉庆十年（1805年）。

郭学泗：山西芮城人，嘉庆十一年（1806年）任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附贡生。

杨本峻：嘉庆十六年（1811年）七月任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刘　椿：云南昆明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任至道光三年（1823年）。

举人。

李　瑛：顺天宛平人，道光四年（1824年）任。监生。

肖国本：顺天大兴人，道光五年（1825年）任。

何绍衣：浙江仁和人，道光六年（1826年）任至道光八年（1828年）。

刘　椿：云南昆明人，道光九年（1829年）复任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举人。

冀修业：山西汾州府介休县人，道光十七年（1837年）任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龚　简：江苏常州府金匮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任。

董正谊：四川朝明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任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

刘　昭：福建汀州府上杭县人，咸丰元年（1851年）任至咸丰二年（1852年）。

杨　城：陕西榆林人，咸丰三年（1853年）任至咸丰四年（1854年）。

蓝玉章：四川嘉定府荣县人，咸丰五年（1855年）任至同治元年（1862年）。

严丰陶：江西赣州府云都县人，同治二年（1863年）任。

崔　昞：直隶庆云县人，同治三年（1864年）任。举人。大挑知县。

王家番：顺天府宛平人，同治四年（1865年）任。监生。

刘秀挹：挹州大兴人，同治五年（1866年）任。州吏目。

朱金湘：顺天大兴人，同治六年（1867年）任。州吏目。

王有贵：号玉堂，山西保德州人，同治七年（1868年）任。

李永祜：字受之，贵州人，同治八年（1869年）任。县丞。

候　桢：字菊农，同治九年（1870年）任。

房廷华：字典臣，直隶滦城人，同治十年（1871年）任。

戴长庚：字焕西，顺天大兴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任。

郝遇龙：同治十二年（1873年）任至光绪四年（1878年）。

李书恩：湖北人，光绪五年（1879年）任至光绪七年（1881年）。

秦敦义：山西人，光绪八年（1882年）任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

胡宗海：山西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任。

邱镜清：湖南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任。

詹廷镛：贵州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祝兰祥：直隶沧州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陈　琨：西安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

黄仁沃：湖南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

祝兰祥：直隶沧州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复任。

王人骐：江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

胡图礼：京兆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任。

吴通权：陕西醴泉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任。

杨泰遇：江西瑞金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

王家彦：贵州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

曾良升：湖南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任。

张秉倬：山西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

张志铭：陕西人，宣统元年（1909年）任。

陈丹书：云南人，宣统二年（1910年）任。

寇柄寅：汉中城固人，宣统三年（1911年）任至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时期为县知事，县长。

第二节　清代对金塔的移民开发

明末清初，由于天灾加人祸，金塔一带土地荒芜，户民逃散，人烟稀少。政府为开发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移民，使大片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发。顺治元年（1644年），朝廷号召各地广泛招徕逃亡民众，将其编入保甲，把无主荒地划拨给移民耕种，并由官府给予印信执照，准许长期耕种，在一定时间内免征钱粮，以此吸引无地民众来酒泉、金塔开荒种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诏肃州与布隆吉尔毗连迤北西吉木、达里图、金塔寺等处，招民垦种。”朝廷在肃州所属的金塔寺（现金塔县城）安插移民35户。清圣祖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肃州守备曹锡钺在毛目分县和王子庄分州移民屯田。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年)，总督岳钟琪令肃州通判毛凤仪雇佣民工300人，将夹山水峡口（今鸳鸯池水库坝址）凿深劈宽，引水过山，开挖王子庄东坝和西坝，并从镇番（今民勤）、高台等地移民开垦荒地。当时，金塔境内主要有毛目城屯田、双树墩屯田。

毛目城屯田　毛目城在镇夷口外160里处。雍正十一年（1733年），原任山东布政使孙兰芬负责毛目屯务，抓军政的同时，在旧屯田渠道的基础上重新开挖大、小常丰渠（民国初期合并后改称大坝渠）17里，将开垦的地段按渠系划编为天、地（天号村）、元、黄（上元村）、宇、宙（西湾村）、洪（洪号村）、昌、日、月（新西村）、盈、昃、辰（进化村）、宿、列、张（新民村）、寒、来（友好村）、暑（永胜村）、往（永联村）、秋、收（头分村）、冬、藏（东明、五分村）二十四号，每号有耕地五、六、七百亩不等，总计开垦土地18025亩。后主管官员为赵向奎（原任江苏布政使），另外还有镇夷千总田进录、刘勇等。乾隆时由高台县丞管理。雍正十二年（1734年），下种小麦、青稞、糜、粟共1403石，收获后除去籽种，官民各分得3757石。

次年及乾隆元年（1736年），下种夏粮、秋粮籽种共1671石，收获量比此前更大。

双树墩屯田　双树墩在镇夷口外80里处。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掖县丞倪长庚、州判任邦怀负责，在双树墩荒芜地界开挖双树墩渠，渠长16里，灌渠引黑河水，内分大（大茨湾）、有（腰湾山，有的谐音）、年（双树村三至十组）三号，每号耕地约520亩。开办屯田时，此地“旧渠土埂，古迹犹存”，有地1562亩。当时有县丞倪长庚管理，常去协助管理的有州判任邦怀等，后由州判李如琎接管，乾隆时由高台县丞管理。开垦当年，下种糜、粟83石多，收获后除去籽种，官民各分得592石。次年种麦、青稞、糜、粟188石，收获后除去籽种，官民各分得351石。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高台县毛目城屯田县丞设置后，毛、双二屯仍由四个屯长分管。乾隆初，屯军遣散，改屯长为乡约，并先后增开芨芨墩渠、万年渠和双城子渠。乾隆四十年（1775年），双树墩大、有、年三号设乡约1人，毛目二十四号分设乡约4人，屯田地共有乡约5人，总称“五屯”。此外，由百姓商民开发的芨芨墩渠（芨芨村）、万年渠（和平村、西岔村、东胜村、东光村）、双城子渠（双城村、茨岗村、东岔村）为科田（又叫私田）。三条渠系各设乡约1人，谓之“三科”。即所谓“平分五屯，额正三科”，简称“五屯三科”。另外，各渠设水利农官（后称大差或水利员）1人。其中大常丰渠，按清政府规定，每年从省库拨给渠工白银72两。此案一直延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终止。

此外，在清朝乾隆年间，夹墩湾一带有大量荒地，无地种的贫苦人民，带上农具前去耕种求食。肃州知府徐浩委托儒学王师勘查荒地上的耕种者。便将新开荒地处查明四至，东至黑河，西至古累墩子，南至石湾，北至明沙窝，共计抛荒地一十二顷，按户给田。按照水田升科田的规则，每亩交纳食斗正粮二升五合，本色大草一分五厘。共应纳本色仓斗正粮三十石，共应纳本色大草一百八十束。水源接引于黑河，定六年后升科纳粮当差。自庚辰年开始，试种六年，到乙酉年按照规定的数目征收税赋。在这六年中，如果有水冲、沙压、碱潮一点收入也没有的土地出现，可以说清楚，经过查验属实者予以开除。以上各种情况均记入有关文件，将土地作为老百姓

的永久产业，任其耕种或转卖。

当时的屯田政策是：第一，边地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依靠地力尽可能地实现军队口粮自给，减轻从陕西运粮的压力；第二，屯军垦田所需耕牛、农具、种子等费用均由国库承担，并大力发展养马、牛、羊和骆驼，尤其把养马作为重中之重；第三，推行依土质地力不同的低税政策，凡“膏腴”之田每亩交纳税粮三斗六升，“瘠薄”之地酌情减征，并号召商民百姓开垦荒地，三年后只征收十分之一二的低税，沙碱地任其开垦，免予征税；第四，不论官兵百姓，凡垦荒耕种者即为他的私有田产，不征税，屯军中有家属者可以随军，没有者待有家属时随即带来；第五，开渠架桥，尽力创造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从康熙起，先后开挖大小渠道多条，并在有的水渠上架设木桥。随着形势变化，兴废无常。由于“征科从减，人情乐趋”，大大激发了人们从事屯垦的积极性，“百姓吃苦耐劳，军士骁勇善战”，使黑河一线的防御能力得到加强，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规模。关于当时的屯田政策，从《创修金塔县志》中收录的《屯田条例》也可窥其一斑。

雍正年间，总督刘公与侍郎将公上议：

（一）凡开渠筑坝平地雇募民夫，每日每名给工价银六分，面一斤八两，米四合一勺五抄。若米面本色不便愿领折色者，照依各地方时价计算给银。

（二）招募屯户，既定之后，所需籽种，或州县存仓之粮或不敷，方行采买，总系在官借给，秋成后先行扣还，然后将余粮官民各半平分。

（三）凡开渠、筑坝、打墙、盖屋丈尺工程，总照依土方部颁定例。

（四）凡屯田需牛车、农具、籽种，每百石需牛二十四只，每只银十两。需车六辆，每辆银七两。又凡牛一只，需农具银一两六钱，凡有多寡依此核算。官为借给，分作五年扣还。

（五）地居口外无房屋者，每籽种一百石，酌给窝棚五间，每间给银二两四钱。牛圈六间，每间给银一两二钱，日后免其追缴。

（六）管理屯田需用委官、生监农民若地在口外照依嘉峪关西屯田事例，一官二役每日给银六钱。若在口内照口内佐杂办差之例，一官一役每日给银一钱六分。其生监无论口内外每日给银一钱八分。农民无论口内外，

每日给银一钱。

（七）地居口外委官人等未便露处，每一千石酌盖土房十间，每间给银八两或五两不等。

（八）屯田所收草束，屯户等需喂牛之用，故不分于官，全归屯田户。

（九）青黄不接之时，酌量借给口粮，当年秋收照数于屯户所分之内扣还。

（十）所下籽种，因地土厚薄每亩多寡不同。小麦则每亩一斗六，一斗四、一斗二、一斗至八九升不等。青稞豆照依小麦。糜子则每亩五、六、七、升不等，粟谷则颗粒尤细，每亩一、二升不等。

通过积极调整经济、民族政策，移民屯田，兴修水利，经济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人口也有了快速增加，特别是清康熙末期，鸳鸯峡口开凿后，当地政府官员通过开挖渠坝，大兴水利设施，从外地移民进行垦殖，使金塔境内的人口迅速增加。王子庄分州人口由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的 1000 余人，增加到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 的 40000 多人，金塔总人口增加到 62000 余人，这是封建社会金塔人口的最高峰。清代后期，由于社会财富不断向富室豪族集中，官僚地主阶级盘剥农民、手工业者和中小商贩，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加之鸦片流入和清政府民族政策失误，民族矛盾加深，社会动荡不安，人口发展出现停滞状态。同治四年（1865 年）春，回民马文禄领导回民反清斗争，占据了肃州城，控制了东至高台、甘州，西至安西、敦煌，北至金塔、毛目、天仓的大片区域。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王子庄州同有 1443 户 5810 人，毛目县 1332 户 4856 人，与清代中期相比人口下降了很多。

第四节　清代金塔的水利开发

毛凤仪开挖“王子六坝”

金塔县地处黑河两岸的狭长地带，讨赖河水由肃州进入金塔，黑河由高台进入金塔，属这两条河流的下游绿洲，水流量稀少。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始，毛凤仪任肃州通判20余年，在任期间，他发现金塔王子庄一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利于耕牧，但水源不足，讨赖河水被夹山阻隔，注蓄于夹山以南的鸳鸯池中。冬春及洪水期，水从水峡口越山而过，农历四五月，庄稼急需用水时，夹山以南，池水汪洋，碧绿一片，夹山以北，河道干涸、禾苗枯死。其境西部（今古城、中东、西坝）仅有一条水渠（广绿渠），流至威虏水量太小，大片可开垦荒地尚未开发。雍正四年（1726年），经川陕总督岳钟琪批准，年逾七旬的毛凤仪组织民工动工兴建黹山引水工程，开发金塔西部地区。为了稳定民心，他将自己的家眷定居王子庄地方（其后代至今居住在金塔县西坝乡金马村），并从镇番（今民勤）等地招募民众318户，在王子庄东坝（今中东镇）、西坝（今西坝乡）开垦荒地2537亩，组织户民耕种。由于户民初到，住无房舍，耕无牲畜、农具和种子，除官府援给补助外，他拿出家产，予以资助。并雇佣石匠300名，将讨赖河下游的夹山小口子（今鸳鸯池夹山）、水峡口凿深劈宽，使河水流入金塔境内。同时开挖王子东坝和西坝水渠，使金塔一带荒漠变为绿洲。雍正七年（1729年）兴修的金塔坝灌溉耕地1444亩，户口坝灌溉耕地1400亩，梧桐坝灌溉耕地360亩，三塘坝灌溉耕地480亩，威虏坝灌溉耕地1500亩。雍正八年（1730年），开天仓营渠灌溉耕地3800亩。雍正十一年（1733年），开大常丰渠、小常丰渠、闰常丰渠，共灌溉耕地18025亩。雍正十三年（1735年），

开垦双树墩（今双树子）附近荒地，开渠10里，共灌溉耕地1563亩。道光十七年至二十七年（1837—1847年），冀修业任王子庄州同，兴修王子六坝总渠六大分水坪口，以破山石及沙石为原料，筑拦河通水堤岸，堤厚丈余，岸高七八尺不等，导水入各坝，渠长20余里，工程竣工后，各坝按地亩多寡，分段承担维修任务。经过不断整修，金塔王子庄所辖的金塔寺东西坝、户口坝、梧桐坝、三塘坝、王子庄西坝、威虏堡回民坝水源均为讨赖河、洪水河。金塔寺东西坝沟又分东沟、石头沟、边沟、破营儿沟。梧桐坝又分上下两截。王子庄西坝又分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五道沟。王子庄东坝又分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威虏堡回民坝又分上龙口坝和下龙口坝，浇灌吐鲁番归化回民田地。另据《甘肃新通志·建制志·贡赋》记载，还在金塔双树墩、夹墩湾、毛目亦开渠引水，大兴屯垦，改修了天城渠道，灌溉王子庄分州实熟地66100亩。

修建拦河工程“皇逼水”

道光十七年（1837年），政府修筑了东西拦河水利工程，当时叫“皇逼水”。

在清王朝时期，因河堤多年失修，植被严重破坏，风沙侵袭，日久天长，东西拦河成了金塔最大的水患之源。冰河期间，沙子淤积，冰块堵塞，河水溢漫岸堤。夏秋季节，洪水暴发，水流过大，下泻困难，冲刷堤岸。因而，不论冬水或洪水期，时有倒水决堤之险。西拦河倒水，除金塔乡、大柳林、小河口外，王子六坝均受其害，无法灌溉，庄稼绝收。一旦倒水，家家派柴，户户起夫，老幼上阵堵水。群众有“水倒黄沙槽（拦河），丫头娃子都不饶”的说法。东拦河决堤倒水，不仅影响王子六坝的灌溉，还危及金塔堡（县城）的安全。

清雍正末年，一次东拦河被洪水冲了堤岸，把金塔堡西南城角冲毁了一段，西城墙冲掉了一半。直到嘉庆年间，才补修了水毁城墙。道光十七年（1837年），国库拨银3000两，“修导渠坝，兴筑逼水堤岸，长20余里，皆用破山石暨沙石条，岸厚丈余，岸高约七八尺不等。”对东西拦河、六坪及部分河道进行了全面加固维修和疏导。因动用了国库银两，群众把逼

水堤岸叫“皇逼水”。同时还封闭了东西拦河湾一带，规定市民百姓不准放牧，不得到此地拾柴捡粪。几年之后，东西拦河湾草木茂盛，夏天油绿一片，冬天野兔飞鸟成群栖身。金西坝龙口一带，草木生长更茂，行人牲畜无法通过。

水利管理

清政府不仅重视水利设施建设，也很注重水利的管理和利用，各级官吏都负有兴修和管理水利的职责。金塔境内的王子庄州同就负有管理当地扶苗水利等事务的职责。下面还有农官、渠正（长）、管水乡老（水老、水利乡老、水利老人）、水利把总等官吏，专管具体事务。作为农村基层组织行政头目的乡月、总甲、牌头等，也都负有水利管理的职责。

金塔地处黑河和讨赖河下游，缺水问题十分严重，由于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原因，酒泉各地水资源管理和灌溉中的问题仍然很突出。其中有大河上下游互不统属，以至争水的矛盾，有抢夺少数民族居住区灌水的问题，有官僚地主抢水的问题，也有水管吏员敲诈勒索的问题。矛盾纠纷不断，连年不能解决，以至截坝填河，或者聚众争斗，造成伤亡。为了解决水利纠纷，确保金塔旱涝保收，当地官员多次商议解决金（塔）酒（泉）、金（塔）高（台）两地和金塔本地用水问题，并形成了许多制度。由于黑河流域水资源分配缺乏有效的监管，每年春夏用水之际，上游在少数劣绅操纵下，拦河堵坝，浇湖灌荒。下游镇夷和毛目、双树二屯，严重缺水。金塔县农民阎如岳率众向官府申诉，请求制定水规，由于官吏被贿赂，动辄将其监禁入狱，任凭衙役百般侮辱，受尽折磨。但他仍不罢休，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起，连年申诉。据《甘州府志》和《甘肃七区纪要》记载，雍正三年（1725年），陕甘总督年羹尧赴甘、肃等州巡视，途经镇夷五堡（高台县正义堡），老百姓黑压压一片跪满街道告状，“具诉水利失平”。年羹尧入驻肃州，阎如岳又向年羹尧申诉。见此情景，年羹尧会同甘、肃府（州）、县妥善议定章程，首次制定黑河“均水制度”，并借助强大的军事压力辅助实施，以消除甘、肃内部各地间的水事矛盾。此均水制度规定：每年芒种前十日寅时起，至芒种之日卯时止，十天内高台上游镇江渠以上18渠一律封闭，

所均之水前七天浇镇夷五堡地亩，后三天浇毛（目）、双（丰）二屯堡地亩。均水期间，由鼎新（即高台县毛目分县）知事兼巡河道，严格执行。均水期间，授权下游县官到上游督察，官升一级；派出由下游各县组成的水使181名，坐守各渠口，对玩忽职守或私偷卖水者，连做处理，官员不从则罢官，百姓抗拒则杀头。均水完毕后毛目县知事仍回本县行使七品官的职责。均水的范围相当于今天的甘肃省张掖市的甘州区、高台县和酒泉市的金塔县。实行均水制度后，水事纠纷骤减，分水制度一直沿用到1949年9月。

据《创修金塔县志》收录的《分水石碑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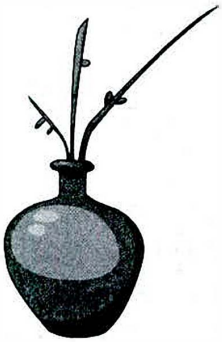
钧命花翎三品衔，分巡安肃兵备道，嘉峪关监督抚治番夷兼管屯田水利驿传事务，会关内防军营务处加三级纪录十次廷。

严定水程，勒石垂久，以资遵守事。“照得金王各坝争水一案互控三年。前经批饬肃州讯断，旋据该前州潘牧详称按三七分水，分别开堵日期，公立合同刊碑昭示”等情。因即批准在案。兹据两造复控来辕，当经本道提讯，除各供省繁不叙外，查肃州原断尚属平允，未便再事更张。但开堵之期稍远，且不准上游拦柴，以致两造翻控。自应略加变通，以顺舆情。本道秉公酌断，饬令金塔坝自谷雨日起第五日卯时开水，立夏日起第五日酉时堵水，如水势微小不足三分者，准其金塔各坝拦柴以浇足三分为度。所有王子六坝水程仍照七分浇灌不得拦柴。自贻后悔。凡开水堵水之日，两造禀请地方官亲诣照章均水。以杜争端。至于三小岔界处下游往往分水不足，以起纠葛。饬令金西，王子各坝协济分水。自堵水后起，至小满日至，永远定限总以浇遍为度，如上游勒肯浇水不足，惟金西坝是问。该两造士农等均各悦服情愿遵断，当堂具结永不反悔。其余各节仍照旧合同办理，惟前碑词不合体例，姑存于后，兹特详示镌石以垂不朽。如再有刁生劣监，无智愚民胆敢借端生事者，定行按律严惩。至金王各坝士农，以后守定水规，公溥为怀，慎勿自干咎戾以身试法。其各禀遵毋违特示。

大清宣统元年岁次己酉六月初吉署。

王子庄州同张秉倬督同镌石并书

从上文可知，当时的分水办法是：将酒泉立夏放水之期提前十日先由讨赖河坝人民灌溉，至芒种第一日起，令酒、金两县长带警监督，封闭讨赖河各坝口，将水由河道开放而下，俾金塔人民按粮分配，浇灌十日，救济夏禾。至立夏前五日起，如前法将红水河开放五日，浇灌金塔禾苗。



第五节　清代的金塔经济社会发展

清政府建立后，朝廷从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的大局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鼓励民众开垦荒地，减免赋税，缓和民族矛盾，大力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促进了金塔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朝廷积极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并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开设集市贸易，促进商贸流通。清代中期以后，金塔有了小规模的矿藏开发，主要是铅、煤、金。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平息肃州回民起事。同治十四年（1875年）四月，左宗棠自兰州来到肃州，将收复新疆的指挥部设在肃州。一方面整顿军队，筹集粮草及军饷，准备收复新疆；另一方面大力推行屯田运动，禁种罂粟，提倡种棉，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兴办书院，重视教育，主持兴建泉湖公园，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农业

在农业方面，一方面，农作物新品种不断引进。随着经济的恢复和人口的增加，首先，金塔在明朝时引进的玉米已经广泛种植，使玉米发展到与五谷并列，并跃升为“六谷”，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其次，引进棉花。金塔一带属暖温带气候，适宜棉花生长。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被这里缺衣少吃的惨境所震惊，他觉得当务之急是解决民众的吃饭穿衣问题，遂发布大量种植棉花的布告，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种植棉花。为了扩大棉花种植，左宗棠刊行《种棉十要》和《棉书》，详细介绍种植棉花的方法。至清朝后期，金塔一带棉花种植已较为普遍，民间纺织棉布、制作衣被的

较多，促进了金塔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在大量引种玉米、棉花的同时，还引进莲花白、莴笋、蘑菇、雪里蕻、大白菜、荞麦等一些农作物新品种，使金塔的农作物品种达到几十种之多。其中，粮食作物主要有大麦、小麦、莜麦、荞麦、糜、谷、青稞、高粱、玉米、蚕豆、豌豆、黄豆、脑核豆、扁豆、豇豆、绿豆、稻子、洋芋等；经济作物有棉花、胡麻、菜籽、芝麻、甜菜、大麻、烟草等；蔬菜类主要有葱、韭、蒜、白菜、莲花菜、菠菜、萝卜、茄莲、芹菜、茄子、辣椒、苜蓿、南瓜、黄瓜、番瓜、莴苣等；瓜果类有西瓜、甜瓜、醉瓜、北瓜、石榴、哈密瓜、桃、杏、苹果、梨、楸子、红枣、沙枣、葡萄、李子、樱桃、墨梨、山楂等。这些品种除一些传统品种外，大多是清代引进的新品种。在明代中后期从美洲引种的玉米、土豆、辣椒、烟草等作物，到清代中后期在金塔得到广泛推广。另一方面，大力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为了抗旱保墒，减少蒸发量、控制土壤湿度，金塔一带开始在玉米、蔬菜等农作物上推广沙压田。在农具使用方面，摆耧已普遍使用，锄头、铁锹、铁铲、镰刀、耙、连枷等农具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农具。农作物肥料主要是人畜的粪便、老墙土、老房土、老炕土、草木灰等。倒茬、轮作、休耕等普遍使用。明清时期，金塔还广泛推广使用秸秆、落叶、水草、泥炭、垃圾和人畜粪尿等堆成土堆沤制成有机绿肥，这种肥料是改良低产土壤的优质肥料。

畜牧业

畜牧业方面，金塔水草丰美的自然条件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场。居住在这里的汉族农民和少数民族，把畜牧业生产作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金塔畜牧业的发展。清代，金塔的农户，一般都饲养马、牛、驴、骡、骆驼、羊、猪、鸡等畜禽，以解决役畜、蛋奶肉食、衣物和生活补充等问题。少数民族则以畜牧业为主。金塔的威虏城一带就是蒙古族驻牧地。同时，官府在金塔境内的西番子滩设有大马场一处，在马房子设有小马场一处，屯兵牧马，以备征战需要。

采矿业

清代中后期，金塔的采矿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矿藏主要是金、煤、铅等。据《创修金塔县志》记载："金塔地处沙漠，无名山大川，矿地最少。西北去县城三百余里有金矿一处。系是磨工。清咸丰、同治年间，有采挖者甚众，多是人不抵出。以后无人采挖，现时失传。县城北一百余里有铅矿一处，名曰铅炉之沟。咸、同年间亦采挖试办，效果无考。今该地有分铅泥炉在焉。去县城北二百余里，有煤炭矿一处。先年采挖多有利益，将此地凿挖以空，储水太多，近年采挖窑内发生水患，惜无取水之良法，实为憾事。"由此可知，清代对这些矿藏的开采规模较小，成效不大。

金融

清代，随着社会经济和民间资本的发展，金塔境内出现了几处当铺、管钱局等最初的金融机构，清光绪元年，开茂盛当一处；光绪八年，开恒信当一处，后因市面萧条改当铺为货铺；光绪十二年始设百货厘金局。经营钱币汇兑、货币放款、兑换银钱等业务。

商业贸易

清代，金塔的商业贸易是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政府对商业贸易也采取了鼓励和重视的政策。金塔虽地僻北塞，人民稀少，但却是北胡草地、大库伦，以及包头、归化城等处的蒙古大商及远贩入内的必经之地，清同治以前商业贸易较为繁荣。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后，金塔街市受到重创，商贩远走他乡，商业贸易萧条。据《肃州新志》记载，清代，金塔的街市有五处：

金塔街市　自南至北曲折正街一条，小街一条。南巷一条。买卖

多聚于北门，余甚寥寥。惟住无隙地，军民七百余户。曩时北关廂街市较城内为大。正街一条，长里余，蒙古大商多贸于此。凡北胡草地、大库伦，以及包头、归化城等处远贩入内，必以此为住栈，故货殖充牣，生意畅旺，权子母、操奇赢者不下千余家。后经兵乱，城虽幸保，而关廂荡为平地，唯存颓墙数堵而已。近来有兵戈已息、极力招聚者，只有流民三四（余）家，依败堵寄寓，作小贸贩。元气大丧，一时难望兴复矣。

天仓市　先年蒙商入内落跕于此，无街道。与居民交易经商者二十余家。自逆回乱后，北道阻绝，本地商贩亦各星散。间有北商惟藉通事奔走、传译焉。

毛目市　有街道商民二十余家，北商在此落跕，乱后（指同治年间回民起义）仅七八家。

柴门市　铺户七八家，杂货小贸。蒙商亦常跕此。

野麻湾市　有小市一道，铺户十余家，系乡场，无大买卖。（野麻湾当时属金塔）

这些商家主要销售地道土产。偶尔也有新鲜洋造货，但基本上都是从酒泉商家处贩来的。染布、制粉、纺织、缝纫多是小商号经营。

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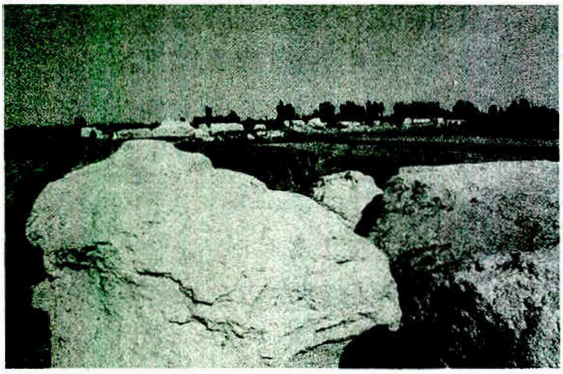
清代，通过金塔境内的驿道主要是纳怜站道和甘漠大道。纳怜站道：这条驿道是元朝为了沟通察合台以及拔都兀鲁思而开辟的，是一条军用驿道，其走向以大都（今北京）为起点，经纳怜（在内蒙古境内）由额济纳旗进入金塔县，再到肃州，东过甘州到青海；甘漠大道：由肃州过金塔沿弱水至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这条古道在金塔的路线，与纳怜站道基本吻合。

建筑

建筑方面，清代时，金塔境内最大的建筑当属金塔城（金塔寺堡）。乾隆二十七年，王子庄州同署从王子庄威虏堡移驻金塔城。其城始建于汉朝北部都尉，设在边墙（明代称长城为“边墙”）外夹山以北的平川地带，用土夯筑而成，周长二百四十丈，高一丈八尺，墙厚七尺，护城河宽一丈，深八尺，南、北、东三面有门，规模狭隘。嘉靖二十八年，巡抚杨博檄副使王仪等，修葺金塔城。乾隆五十年（1790年），州同彭以懋动用工匠增筑了城门楼堞，又于城外西南侧筑起了百丈长的堤坝，以防止水患，并立了碑志，改称金塔城。同时对城进行了一些修葺。乾隆五十五年（1795年），州同谭乃熊见衙署逼仄，大门至头门仅五丈，借养廉银三百两买了杨、张、李等五家地基扩修盖造。自前至后，共建成照壁、辕门、头门、二门、大堂、二堂、书房、内宅、班厅、衙役房、群房、寅宾馆、土地祠、马号等八十余间。修建围墙一道，开挖泉井一口，基本上达到了县署的规制。咸丰年间，山水猛发，冲塌西南隅六十余丈。同治四年（1865年）春，马文禄在肃州（今肃州区）领导了回民反清斗争，起义军占据肃州后，肃州州治临时移驻金塔。同治五年，知州李元嘉、州同刘秀挹，因肃州回民起事，恐怕城墙太薄太低，不能守御，就又培厚四尺，加高六尺，连老城共高二丈四尺，并将东、南两门封闭，仅开启北门。同治十二年秋九月，州同郝遇龙认为肃州回民起事已平息，就又将南门敞开，以方便往来。又见墙多处坍塌，门上没有城楼，就于光绪元年增修了南北城楼两座。门瓮用砖石砌筑，又在北城外修建了月城一道，与城一样高。光绪四年，署州同郝遇龙见栋柱朽败，墙壁坍塌，先将头门、仪门、照墙、甬道设法重修，并将大堂、二堂、内宅、花厅一并兴修。同治二年（1910年），王子庄州同寇炳寅谕饬赵积寿、刘怀基督修金塔城东门敌楼兼葺南北二门敌楼。

此外，清代，民居屯庄在本地大量兴起。清朝同治和光绪年间，盗贼四起，经常抢掠地方财物杀害生灵。老百姓为了防卫，建起了像城堡一样的高大庄院。墙很高也很厚，墙上建有护墙巡道。护墙上有炮眼垛口，四

角建岗楼。城门上建敌楼。屯庄内备有抬炮、抬枪、追锋马枪（一种旧式火炮）、长矛、大刀、火药等御敌器械，专库保管。墙的四周备有滚木，块石和燃柴等作战物品。贼来百姓集居屯庄，贼走各自回家务农。屯庄在当时起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作用。每座屯庄占地 30~50 亩不等。有的还建有瓮城和护城壕，给攻占者增加了难度。个别人口多的家族也有建立者，如石家屯庄、周家屯庄等。不过规模较小。综合《肃州新志校注》和《修编金塔方志》的记载内容，金塔境内共有清代修建的屯庄 52 座，居民多的达到七百余家，少的也有数十家。其中金塔坝所属 13 座：金东上杰屯庄，距金东一里，居民约二百余家；金东下杰屯庄，距金东五里，居民三百余余家；金石边沟屯庄，距金东五里，居民三百余家；金东黑沙窝屯庄，距金东六里，居民一百余家；金西中杰屯庄，距城一里；金西下杰屯庄，距城三里，居民四百余家；金双中杰屯庄，距城北三十里，居民二百余家；金西破营子屯庄，距城十里；鸳鸯池苗家屯庄，距城南三十里，居民四十余家；小叉屯庄，距金东北五十里，居民一百余家；大柳林屯庄，距城北三十里，清同治三年建；新地屯庄，距城北三十八里，清同治四年建；金东小河口屯庄，距城北四十五里，居民二百余家，清同治三年建。王子东坝所属 4 座：周家屯庄，距金西三十五里，居民三百余家；板地屯庄，一名半截屯庄，距金西北四十五里，居民五百余家，清同治八年建；石家屯庄，距金西五十五里，居民四百余家；旧寺墩屯庄，距金西六十里，居民四百余家。王子西坝所属 4 座：西红屯庄，距金西北七十里，居民七百余家，清同治六年建；西头屯庄，距金西北六十里，居民五百余家，清同治六年建；西四屯庄，距金西北三十里，居民四百余家，清同治六年建；西三屯庄，距金西四十里，居民二百余家。梧桐坝所属 7 座：梧厨屯庄，距金北四十里，居民二百余家；小梧桐坝屯庄，距金北二十里，居民百数十家；梧桐大坝屯庄，距城北五十里，居民二百余家；大庄子屯庄，距城北六十里，居民二百余家；上八分屯庄，距城北六十里，居民一百余家；梧桐二截屯庄，距城北七十里，居民一百余家；大厨房屯庄，距城北三十里。威虏坝所属 7 座：威上头号屯庄，距金西北三十里，居民二百余家，清道光初年建；四号屯庄，距金西北四十五里，居民二百余家，清道光二十年建；七号屯庄，距



旧寺墩屯庄遗址

金西北五十里，居民三百余家，清同治六年建；磨河湾屯庄，距金西北四十里，居民百余家，清同治初年建；磨河湾四分屯庄，距金西北五十里，清同治四年建；磨河湾磨四屯庄，俗名灰圪答屯庄，距金西北五十里，居民三百余家，同治六年建；黑树窝屯庄，距金西二十里，光绪十五年建。三塘坝所属7座：岔河坝屯庄（《肃州新志校注》为“岔河坝村庄”），距城西十五里，居民一百余家，清同治六年建；六沟屯庄，距城北三十里，清光绪八年建；三上屯庄，距城北三十里，居民三百余家，清光绪八年建；三下屯庄，距城北六十里，清光绪八年建；柴门子屯庄（《肃州新志校注》为“柴门村庄”），距城北四十里，居民四百余家，同治八年建；下黑树窝屯庄，距城北六十里，清光绪二十年建；东三沟屯庄，距城北五十里，清光绪十六年建。户口坝所属3座：官坝屯庄，距县城北三十里，居民三百余家，清同治六年建；天生场屯庄，距县城北三十里，居民三百余家，清同治九年建；下新坝屯庄，距县城北四十里，居民三百余家，清同治八年建；新城子两山口（即野麻湾）所属2座：新城村屯庄，在西八圪楞，距城八十里，光绪二十一年建；两山口屯庄，在东八圪楞，距城八十里，光绪二十一年建。天仓坝所属5座：上夹墩湾屯庄，距金东北一百六十里，居民三百余家，清同治五年建；下夹墩湾屯庄，清同治五年建；营盘屯庄，距金东北一百八十里，居民二百余家，光绪二十一年建；天仓头分屯庄，距金东北二百一十里，居民三百余家，清咸丰年间建；二分屯庄，距金东北二百二十里，居民三百余家。

文化教育

在文化教育方面，以散文、戏曲、宝卷及其他民间文学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在金塔逐步兴起。以义学、社学为主的学校教育成为金塔教育的一大亮点。

文学方面，主要是散文和金石碑铭。散文以历任王子庄州同的观风文和序记为主。最典型的是同治十二年金塔王子庄州同郝遇隆所做的《金塔王子庄州同郝遇龙观风文》：

为观风事，照得为政以得人为重，教民以课士为先。土气伸斯风俗必厚，人才奋斯教化必隆。查金邑界分玉塞，地近酒泉。南接天山积雪，标文风之秀壮，环黎水清流，挹翰墨之波睹。菁弼之采毓，知文物之光昌。粤自天锡传徒祭酒，不离经史。廷章建学名儒克振愚顽摩元。王健之碣碑文章未泯，考刘忠宣之流寓风烈堪钦。虽云关塞之邦，久属人文之薮。以故阳关古道，辋川则进酒劝君，都获青骢。杜老则深情送客。他如“戍楼晓角”“群鸟亲人”“柬涧遗菴”“天桃爱我”，凡此胜景，足适吟怀。本分州技陋虫雕学渐蠡测，五游鄂渚，虽分月殿之香，三上燕台，难摘琼林之艳。忆昔读书楚北未展平生，即今游宦河西，敢忘宿志。惟风尘之未息，值民社之初膺，亲法律而弃诗书，文土依然，俗吏拙摧科而勤，抚字宰官犹是。儒生困恩，单父鸣琴端资师友，武城学道实启弦歌，纵虏障烽烟敌忾或多旷学而匡虏。耆宿剔离尚抱遗经。盖斯时之兵气将销，即此地之文风可转。是以上台来星使矩绳相引梓楠已尽，拔其尤卡邑厂风檐月旦同操甲乙更乐观。其拔定于五月十一日，扃门出题，试课诗文各一。该生童各抒文机，自备卷幅，夫一椽偃室何防蹑翘而来，百本管城行且與薇而诵。至于文理则来其顺，不必过高，字画则取其端，最宜脱俗。毋徒抽黄洒白拾牙慧以贻讥。果系嗄玉敲金见胸襟之各别，但称佳唱，必许借观。敢云识遇青萍向薛门而长价，抑愿歌传白雪从郢里以求贤。

此外还有《金塔王子庄州同詹廷镛观风文》，光绪十八年作。《金塔

王子庄州同杨秦遇观风文》，光绪三十一年作。《肃州直隶州王学伊课金塔士子文》等。

序记，有高凌汉撰书的《魁星阁序》《公老先生行述序》《蔡公含一七秩寿辰及荣膺大乘传师序》《正道明先生荣膺大乘教传师暨豆孺人灵次序》、萧裕本撰书的《王文第七秩大庆并道行序》、马得芳撰书的《胡沛然先生德行俚言》、郭多鼎撰写的《杜百川先生七秩寿序》、张应麟撰写的《李孺人谢氏八秩寿辰序》等。《魁星阁序》全文如下：

盖文闻神明无私，灵先通宇弱水。文明应象，休征广被于边陲。则知下民之修造，无非答神恩之永佑也，为我毛目城上之东南隅之魁星阁，建于光绪五年，迄今二十余载，风雨调残，莫视文明之盛。神像未俱难伸俎豆之城。余世居斯土，身列儒林，荷先圣之教，学神明之默施，跪拜之下心中歉然。原与禀生蔡啟甲募化四境，雇工远方，革故鼎新。补前工之未及，光前裕后，壮一邑之大观。不幸蔡生半途去世，余集众力独行维持，始告成功也。此后则见，神灵赫濯，得展白苹之荐；栋宇灿然，可先斯文之盛。神欣人诚定有朱衣暗佑，祥征瑞应庆律风调。余荒鄙野士，孤陋寡闻，兹当功成告竣之日，即为俚言以序。

光绪岁次壬寅冬月中浣邑庠生云峰高凌汉撰书

土民张家瑞、李斌、胡王清，仲联芳、卢含芬、高云汉等董其事

蔡潼、蔡廷秀塑绘神像、彩画栋宇

金塔遗留的清代金石碑铭较多，有雍正十年（1732年）吏部候选训导杨景震熏沐撰《重修塔院寺序》《重修金塔寺塔院寺》、乾隆二十七年撰写的《夹墩湾开垦田亩碑序》、乾隆五十七年王子庄州同谭乃熊撰写的《创修金塔厅衙门碑记》、灵文润撰书的《仙姑庙灵共记碑文》《建修庆祝宫碑文》、毛目县知事姚家琳撰的《创修文庙碑记》、马中麟撰的《魏公植望太先生墓志》，还有郝遇龙撰的《重修总圣宫序》《创修金泉书院碑序》《重修西社学魁星楼序》《建修圣母庙序》等。

清代早中期，戏曲也开始在金塔兴起。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陕西乾县秦腔、眉户清唱艺人茹吉祥，外号叫茹七胡胡者流落鼎新，他自拉自唱，能唱多处秦腔折子戏。并且生、旦、净、丑等各角色均由他一人承担，多有人请其唱堂会，最后定居于万年渠（现航天镇西岔村）。其定居后又笼络来多名陕西老乡组成了自乐班，叫“茹七散班子”。因无戏剧服装，仍以清唱为主，也能演唱一些秦腔本戏。到后来，金塔地方群众组织的草台班能随时召集登台表演的有西红戏班、大口子戏班、双桥班、尕保子戏班，高台县艺人冯大净的戏班也常被邀请来演出。演出剧目多以秦腔《铡美案》《烙碗计》《天门阵》等传统戏为主，并配合部分眉户剧相间演出。

教育方面，清代，金塔境内的教育形式多样，大体可分为官办和民办两大类。官办教育主要是书院和社学，民办教育主要是义学。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金塔王子庄州同彭以懋（四川华阳人）在金塔堡城南文昌宫创建柳堤书院。旧址在今金塔南关小学。同治五年（1866年），马文禄攻陷肃州城，白彦虎谋取金塔堡未逞，焚毁城外书院而去。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金塔王子庄州同郝遇龙，同本地岁贡陈豫纳在县城东北隅创建金泉书院。并建起文庙、文昌阁各3间，有郝遇龙《创修金泉书院碑序》留世。金塔清代著名的贤哲胡文炳就曾主讲柳堤书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金泉书院改为王子庄官立高等小学堂，共延续33年。光绪中期，金塔境内已办起社学、义学40多所，成绩突出、品学兼优者多入金泉书院深造学习。社学，实际上是县级以下的官学。清代末期，金塔境内有社学24所。石文山房社学，在金东坝仙姑庙旁；全石书屋社学，在金石坝上截；兴贤斋社学，在金石坝中截龙王庙；魁文书馆社学，在金石坝下截沙窝（囤）（屯）庄；蒙养书屋社学，在金西坝小河口屯庄；启文斋社学，在金西坝下截三圣宫庙内；敬修堂社学，在金西坝中截庙内；会源斋社学，在金西坝破营子屯庄；逊志书舍社学，在梧桐坝大厨房屯庄；典学书屋社学，在梧桐大坝屯庄；启化馆社学，在梧桐坝上八分屯庄；储才学舍社学，在梧桐坝二截屯庄；明德斋社学，在岔河坝庙侧；映奎小阁社学，在下三塘坝柴门子屯庄；联元书楼社学，在下三塘坝六沟屯庄；崇本堂社学，在天仓头分屯庄；养正堂义学，在天仓五分屯庄；进德斋社学，在天仓二截屯庄；崇正馆社学，

在东坝格楞屯庄；修道斋社学，在威虏总圣宫庙内；崇文斋社学，在王子东坝五分屯庄；勉学馆社学，在王子东坝大屯庄；敬业堂社学，在王子西坝四分屯庄；懋修堂社学，在王子西坝头分屯庄。

义学，也叫义塾、学舍，属于民间私塾教育。义学多由当地官吏倡导，社会捐助，大众出力，联合集资而设立，以弥补府、州、县学及书院的不足，倡议“救济”贫寒家庭儿童上学。乾隆二十八年至光绪十年（1763—1884年），金塔县乡民捐资兴办义学共26所，成为本地义学亮点。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向应明创建蒙养义学，校址在三塘坝三上（今东坝乡三上村）；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拔贡王起芝创建培英义学，校址在东坝五分（今中东镇屯庄村）；乾隆四十年（1775年），武进士孙兆彩创建发英义学，校址在户口坝天生村（今三合乡天生场村）；嘉庆十年（1805年），贡生王志昌创建明伦义学，校址在东坝五分（今中东镇屯庄村）；嘉庆十年（1805年），王起丰创建养德义学，校址在威虏上号（今古城乡头号村），该义学同治年间被回民军焚毁，光绪十年（1884年），王士含重建；嘉庆十年（1805年），王殿卿创建育贤义学，校址在西坝三上（今中东镇三湾沟村）；嘉庆十二年（1807年），王克勤创建萃英义学，校址在三塘坝（今东坝乡下黑树窝村）。同治年间被焚毁，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春年重建；道光三年（1823年），王作斌创建修德义学，校址在西坝蔚仙（今西坝乡金马村）；道光三十年（1850年），谢生明创建启迪义学，校址在东五小坪（今中东镇谢家墩村）；咸丰三年（1853年），丁汝华创建养才义学，校址在天夹营五分（今天仓乡上五分村）；咸丰四年（1854年），魏天惠创建养善义学，校址在天夹营头分（今天仓乡常丰村）；光绪元年（1875年），介宾赵全创建养蒙义学，校址在东坝四分（今中东镇中五村）；咸丰五年（1855年），蔺秀才创建养蒙义学，校址在营盘中杰（今天仓乡营盘村）；同治十年（1871年），王毓麟创建崇正义学，校址在东坝上三分（今中东镇上三分村）；光绪四年（1878年），武生罗宗武创建进德义学，校址在东坝二分（今西坝乡二分村）。清代毛目县义学共16处。义学设备十分简陋，房舍多以古庙宇代之。义学多有学田地，俗称义学地。各义学多寡不一。义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今日学校之课堂教学迥异，无特定的课程设置，

也无年级分别。入学蒙童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言杂字》《五言杂字》，进而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学习方法以自学背诵为主，多为师哥教师弟，师傅只给必要地辅导解释和检查督促。遇有大比开科之年，参加考试以求功名。

清代，科举考试主要分为三级，即院试、乡试、会试（加殿试），习惯上叫作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清时，金塔为王子庄分州，直隶于肃州，仅有书院一处。每逢考试之年，金塔士子齐赴肃州贡院，会同贡生、监生、廪生各种生员一场会考。金塔与肃州系在一榜混合，录取可以吃国家皇粮的生员二十名，增加录取生员二十名，三年内考取两次。岁考，取文生二十名，武生十五名。科考取文生十二名，再至酉年逢拔贡场，肃州与金塔合出拔贡生一名。金塔县柳堤书院秀才陈豫讷，就是清朝同治年间当地有名的岁贡生。每逢三年乡试与肃州同，不分地域。有清一朝，金塔共考取文庠（文秀才）148 人，武庠（武秀才）95 人，贡生 36 人：梁文斌，乾隆二十年岁贡；李枝春，乾隆癸酉科拔贡；王起芝，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拔贡，任直隶州州判；张傅纶，嘉庆乙亥科贡生；刘文蔚，嘉庆乙亥科贡生；梁肇魁，道光二十年岁贡，主讲柳堤书院，山长；王志昌，咸丰元年岁贡；何候，同治癸酉科岁贡；殷希仁，同治癸酉科岁贡；曹兴孝，同治癸酉科岁贡；顾廷选，同治十二年岁贡，主讲柳堤书院；陈豫讷，光绪元年乙亥科岁贡，任平远县学正，见《甘肃通志》有传；闫发章，光绪科岁贡；赵克昌，光绪九年癸未科岁贡；王国定，光绪十六年庚寅科岁贡；段凤鸣，光绪十二年附贡；闫镛堂，光绪十八年壬辰科岁贡，充酒泉书院掌院；陈怀祖，光绪科附贡；梁希鸿，光绪二十年甲午科岁贡，充文昌宫斋长；马昭瑞，光绪科附贡；郝鸣谦，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科岁贡，任平凉府学正；曹绳函，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科岁贡。任甘州府张掖县学正；盛翰章，光绪科附贡；梁如鸿，光绪科附贡，充文昌宫斋长；任文炳，光绪科附贡；宋鸿入，光绪科附贡；任翰章，光绪科附贡；殷中伦，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岁贡，任平凉府县学训导；张肇铭，光绪二十八年壬寅科岁贡；王蓥廷，光绪二十八年壬寅科岁贡，充酒泉书院掌院；白文蔚，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科岁贡；段荣先，光绪三十一年乙巳科岁贡；顾伯恺，光绪三十一年乙巳科岁贡；崔怀宗，宣统元年乙酉科恩贡；刘怀基，宣统元年乙酉科恩贡；李含德，宣统元年乙酉科恩贡。举人8人：李世祥，乾隆十二年丁卯科举人，大挑一等任锦屏县知县；苗生机，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科举人，任周至县教谕，见《甘肃通志》有传；田生惠，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举人，候铨知县；王储英，乾隆五十九年甲寅科举人，大挑二等，历任合水、巩昌、武威、洮州、安定、定西等县学正，见《甘肃通志》有传；胡文炳，道光二十七年己酉科举人，任湖南汇同县知县，见《甘肃通志》有传；王曰卿，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大挑一等知县；白玉官，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举人，大挑二等知县；顾维熙，光绪十四年戊子科举人，主讲金泉书院。进士2人：孙兆彩，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武进士，选授殿前二等侍卫；王有德，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科文进士，任山西榆次县知县。

清代后期，近代教育开始在金塔兴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书院、义学、社学为学堂。各府州县设立学堂，省城为大学堂，府地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此后，废科举、兴学校，新式学堂遍及城乡各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金塔县金泉书院改名为王子庄官立高等小学堂，设正副教习2员，招收学生20名，修业3年。另有初等小学堂7所，各有教习一员，学生多寡不定。宣统二年（1910年），金塔设置劝学所，设所长一人，以代理斋长之职。主要是对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和初等小学堂的教育进行管理。建立图书馆、通俗演讲所等机构，实施社会教育，组织民众识字、补习文化。在学制与课程设置方面，也按照近代教育的要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将小学教育分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两级，其中初等小学堂学习5年，高等小学堂学习4年。

第六节　清代金塔的宗教

清代，金塔的宗教主要是佛教、道教。在信仰上儒、释、道不刻意区分，寺院布局上儒、释、道相邻而居，有的甚至将佛祖、老子、孔子供于一殿。

佛教

清代中后期，清朝统治者为安抚民心，逐渐放宽民族宗教政策，金塔的佛教达到了又一个鼎盛时期。金塔境内以塔院寺、青山寺为代表，佛教坛庙祠堂基本遍布城乡各处。仅在金塔城内和周边的就有三官庙，清乾隆年间创修；三圣庙，清乾隆年间创修；娘娘庙，在城教育街，清乾隆年间创修；金西乡娘娘庙，在金西坝上杰，清同治十年建；神祇坛，在城隍庙内，每年清明日拜祷祈福者络绎不绝；先农坛，在金塔寺东，承恩门外二里许；昭忠祠，在县城内城隍庙东，河西旧城隍庙左，亦有昭忠祠；孔庙，在县城东北隅，每年春秋加祭二次，清时州同官主祭之，协台中营共助之，礼乐器数粗备，至民国纪元县长主祭之，管狱员警佐助之；城隍庙，在城南畔，清雍正十年建筑，大殿三楹，寝宫三楹，规模湫隘，左右廊房十四间，绘画十帝闫君暨役、隶、吏、胥等像。东西更有二小间，东一间妥土神，西一间妥龙神，山门三间随代上建看戏楼，同治五年肃回来攻金塔城，是夜大雨官民稍懈，贼由东城门而上，延至南门望见城隍庙内官兵蜂拥而出，不明多寡，贼心畏惧坠城而逃，咸云城隍显圣，肃城平静之后，州同郝遇龙禀明左宫保宗棠奏其神异，蒙清光绪皇帝敕封“灵应侯”并赐御书“镇慰黎元”匾额；药王庙，在城隍庙东；无量庙，在药王庙昭忠祠之右，大殿三楹，不知创之何时；娘娘庙，在无量庙之东，东座西向，每年三月十八日妇女

拈香者终日不止；三官庙、官帝庙、灯山楼在无量庙西侧，不知建于何时；马王庙，在县城之北关，光绪二十五年赵国栋、陈才、万先业建筑；东岳庙，在城外之西南，光绪三十年邓义等建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演戏酬神；文昌庙，清同治十二年，州同郝遇龙绅士陈豫讷，顾廷选，郝映荣，曹兴孝，建置柳堤书院之左，培补文风，县城西南十王殿，在东岳庙内两庑，清光绪三十年建；县城西南曹官殿，在东岳庙前，清光绪三十年建；县城南释迦佛殿，名曰潮音寺，建筑已古，寺内有韦驮殿、观音殿、罗汉宫；城东南角魁星楼，清光绪初年建；县政府东侧土地祠，清乾隆二十七年建。

在乡村一带规模最大、香火最旺盛的当属塔院寺和青山寺。塔院寺，据民国《创修金塔县志》记载：明朝末期，塔已倾颓，其基尚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金塔营游击甘州（今张掖）人孙一贵，重建土质铜顶塔，塔围七丈，高五丈，塔顶高五尺，围约一丈二尺。塔前大殿三楹，左右廊房、山门、乐台具备，四十二年告竣。延至雍正十年（1732年），性贵弟子可法，募化资财，将前后殿宇及舞殿覆瓦，谋久固之，并增筑钟楼和鼓楼。清同治四年（1865年），战乱中庙宇被焚，唯塔未受损失。光绪四年（1878年），贡生陈豫讷督修，化十方布施，仍建大殿三楹，上供释迦佛。寺庙恢复原貌，景观更加宏伟。宝塔上锐下圆，如古铜胆瓶状，土质塔身，高五丈、围七丈，外表用纸筋、白灰等物粉饰。铜铸塔顶，高五尺，围约一丈二尺，塔上供奉金面铜佛一尊。其后又有商民芦德，贡生刘怀基曾先后两次修葺之。经过多次扩建维修后，寺庙规模不断扩大，寺内殿宇层叠，殿宇、厢房、钟楼、鼓楼、山门、戏台错落有致，塔顶内供奉有大乘妙法莲花经、藏文经、彩佛像画等。气势宏伟，规模之大，令人惊叹。松柏参天，暮鼓晨钟，香火日盛，吸引了各方的信徒。众多僧人仰慕而至，广开戒筵，说法演教，金塔寺便成为河西一处著名的佛事活动胜地。青山寺，位于县城西南12公里处，居鸳鸯池水库东侧的山顶幽谷之间，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经不断增修，前山建有王母宫，在中间山谷高低错落的峰顶，起伏不平的山峦之中，建有全圣宫、圣母宫、三教殿、三皇宫、菩萨殿、地母宫、地藏殿、王母宫、玉皇阁等风姿古朴，造型各异，气象雄伟，光彩夺目的佛、道庙宇及殿堂多处。相传最早修建的菩萨殿，是清光绪三十年间，金塔仙姑庙（今

金塔镇东星村）乡民俞生德（清茶会教徒）信佛发愿，募化布施，亲自督修建造的，众人习惯称之为“老庙”。进了庙门，院内两边是斋房，中间有前后二殿，前殿为菩萨殿，后殿是罗祖殿，在殿堂上方正中间塑罗祖像，两边塑八大金刚像。从老庙往东是全圣宫，山门内前殿两侧塑四大天王像。院内有廊坊、大殿，殿内上方正中塑太上老君像、原始天尊像和通天教主像，一字排列，分坐左右，威武雄壮。幽谷西端，奇峰突兀，巍峨险峻，沿着崎岖陡峭的石阶羊肠小道穿过山腰南天门，登上峭壁峰顶，便是风格别致，最为壮观的玉皇阁。站在此处，俯瞰青山寺全貌，另是一番风景。极目四望，好像置身世界之巅。北面，古老县城的城楼、魁星楼和塔院寺古塔都隐约可见。东面，群山巍峨，层峦叠嶂。南面，诸山之后，祁连雪山如同白玉嵌在天边。西面山水相依，讨赖河宛如一条银色蛟龙顺山峡逶迤延伸。还有坐落在峰峦的三皇宫，宫内天皇、地皇、人皇彩塑和墙上惟妙惟肖的壁画，形象质朴，栩栩如生，从那三皇炯炯的目光中，使人似乎看到了翻滚的远古历史风云。另外，王母宫内的王母娘娘塑像，地藏殿内的地藏、十殿阎君，各个奇特传神，塑工精妙。这些精湛技术，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艺术中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

此外还有旧城隍庙，在东五五福村之东，清乾隆年间创修，光绪十二年重修；雷坛，在县城北六十里许，旧寺墩地址建筑；东坝三分官井庙，清雍十二年创建，光绪十五年重修；东坝头分仙姑庙，创建无考，相传夷人所建；维新村雷坛庙，在二分，清同治年间被焚，光绪三十一年重修；维新村无量庙，在下东沟，创建时间无考；人和村山陕庙，清同治六年被焚，光绪中叶重修；金东下截三官庙，清乾隆年间建；太和村关帝庙，清同治六年建；太和村马王庙，清光绪二十六年建；户西谭家湾八蜡庙，清光绪二十一年建；户口坝二墩全圣宫，清乾隆二十八年建；户口坝三墩龙王宫，清光绪三十四年建；户口坝通顺渠灵佑宫，民国十年建；古墩子龙王宫，清光绪十九年建；上新坝五圣宫，清光绪三十三年建；小河口全圣宫，清光绪十九年重修；三上岔河坝三圣宫，清光绪十七年重修；六沟龙圣宫，清光绪元年建；三上西岔五圣宫，清乾隆五年重建；三上东岔九圣宫，清乾隆十七年创建；三下柴门子灵佑宫，清乾隆五年建，光绪三十三年重修；

三下黑树窝三圣宫，清嘉庆元年建。光绪二十四年重修；三下燕麦湾五圣宫，清嘉庆八年建；三下东三沟雷祖宫，清嘉庆二十五年创建，同治六年被毁，光绪二十八年重修；太和村圣母宫，清光绪二十年建；太和村西北九圣宫，清光绪初年建；太和村圣母宫，清光绪初年建；青山寺全圣宫，清光绪三十年建。在城西南三十里，包括圣母宫、三教殿、三皇宫、菩萨殿、地母宫、地藏殿、王母宫、老母宫、玉皇阁，以上诸宫殿均相连；三下新寺墩仙姑殿，清道光三年建，光绪二十八年重建；三下新寺墩菩萨殿，清道光二十年创建，光绪元年重修；三下东岔娘娘殿，清乾隆二十八年建；三下圣母殿，清道光十二年创建，光绪二十七年重修；金塔县天佛殿，在城东南五里许之塔院寺内，另有接迎殿，天王殿俱在寺内；四维乡西移牛王殿、山神殿、龙王殿，距县城西北六十里；太和村眼光殿、五圣宫、药王庙，地点在西红屯庄；三下鲁班楼、药王楼、魁星楼、雷祖宫，均清光绪十八年建；三下新寺墩玉皇楼，清道光五年建，同治四年肃州回匪蹂躏焚烧，光绪二十七年重修；永和村九莲寺，清雍正初年建；三多乡孔雀寺，清雍正十二年创建，光绪十二年重修；三下上四沟普济寺，清嘉庆二十五年建，光绪二十八年重修；磨头分牛王庙、磨五分药王庙、磨四分庙、二号孔庙；天仓石佛寺，距县城东北二百里，清乾隆三十六年重修；太和村内土地祠，清同治六年建；东坝城隍庙侧虫王庙，清乾隆时建；小梧桐坝庙；梧厨庙、梧桐大坝庙；上八分庙；新八分庙；大庄子屯庄龙王庙；二杰庙；牛头湾庙；头墩庙。

六坝六坪下各有龙王庙，名曰石庙子，用以治水。

道教

清代时，道教复兴，金塔道教盛行，信教群众增多。金塔境内当属小叉庙道事活动最盛。小叉庙，位于本县古城乡上东沟村西 1 公里处的沙漠中，有庙宇一座，戏台一座。西南角上有土坯覆钵式喇嘛塔一座，当地人叫“陈牙机塔”，据传为一位得道高人陈牙机（实为陈来祝）为安其遗躯所建。塔高约有 10 米，外抹白灰，5 米以上呈珠形塔式，上顶有水潭覆盖，高 1.8 米，四面各辟一龛，高 0.25 米、宽 0.15 米、深 0.51 米。顶端挂有四个风铃。

底部为圆形，直径 6 米。

小叉庙塔是清代早中期全真龙门派在肃州即今酒泉地区传播的一处重要遗迹。这从塔体上发现的两块题记砖或塔主牌位砖所刻的文字可考证，砖为两块，磨光拼接，砖上文字均为楷体阴文，共 3 行 42 字，其文为：

仙翁派来全字通真号来祝
皇清羽恩师陈真人之仙游
陕西省同州府学门徒王连城复城，姓名赵复明立

首行 11 字揭示塔主的身份方面的四点信息：一是他属道教“仙翁派”，二是名为“来全”，三是字为“通真”，四是号为“来祝”。中行 11 字稍大，表明塔主亡故，同时也揭示三点重要信息：一是清代人，二是姓陈，三是他是一位高道故称“真人”。由这两行可知塔主为清代仙翁派道士，姓名为陈来全，字通真，号为来祝。当地人所说的“陈牙机”实为陈来祝的误读。第三行 18 字略小，表明与这位道士有关系的两个人：一是门徒王连城（法名复城），二是赵复明，均为其徒。据此推断小叉庙塔塔主为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三代传人陈来全，小叉庙塔产生和陈真人羽化时间大约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之间。龙门派是全真道最主要，也是最兴盛的一个支派。该派创于道教衰落的明清时期，尊全真七子之一的邱处机为祖师，尊邱处机弟子赵道坚为创派宗师，承袭了全真教法。关于“龙门派”立名，现主要有两说：一是因尊奉的开派祖师邱处机曾隐修陇州龙门山，故取名“龙门”；一是因丘处机的徒孙姜善信在黄河龙门创建龙门建极宫而得名。其教义秉承全真道教祖王重阳的思想，



陈牙机塔

以清心寡欲为修道之本。自清初王常月先后在北京白云观，以及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等地传戒收徒以后，龙门派发展迅猛，门徒遍及全国许多省区，尤以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为最盛。其间支派繁衍，不少支系流传至近现代，其盛况与佛教禅宗五家中的临济宗相类似，故世有“临济、龙门半天下”之说。道教龙门派传人使用佛教塔葬方式，意在表明他们兼修佛教，也是道教不断吸收佛教的某些思想的结果。

此外，在金塔城内及周边和乡村还遍布有许多道教场所。关帝庙，旧名山陕会馆，在城之当中，清雍正九年建筑。大殿三楹，有转廊一层琉璃瓦覆之。飞檐绮阁丹获晃烂俨然为一方巨瞻，名曰山陕会馆。有咸丰元年钦赐御书“万世人极”匾额。左右廊房八间，右中间妥张桓侯。前有过厅，东西建钟鼓二楼。光绪十一年王仲荣、陈豫讷续建乐台三间。关帝庙台，在城西北隅，高有五丈，围有二十丈。上建土庙前后六楹，规模湫隘。供奉关帝圣君。此台相传为缠回瞭望台，又云王爷台，不知孰是，庙乃明时建筑之，有崇祯十年匾额可考。龙王庙，在城之西南东岳庙之东。光绪十年要加德等建筑；东坝龙王庙，地点在东坝五分，乾隆年间创修，圣母宫、三清宫附之。东坝上三分龙王庙，清康熙五十七年创建，光绪十八年重修，有钟一口，系康熙年间造。维新村关帝庙，在西岔，乾隆三十一年创建。东坝头分龙王庙，又曰沙滩庙，清嘉庆五年重修。人和村龙王庙，清雍正十年创建，光绪三十三年重修。金塔坝太清宫，在城西南附近之地，清乾隆初年创建，光绪十年重修。金西下截三圣宫，清同治六年建。东坝四分九圣宫，清乾隆时创建，光绪六年重修，三十一年又重修。东坝二分全圣宫，清乾隆时建，光绪十六年重修，民国七年又重修。东坝三分龙圣宫，清乾隆年间建，光绪二十七年重修；维新村五圣宫，清光绪七年建；维新村圣母宫，在五圣宫右，清光绪二十七年建；维新村下东沟九圣宫，清光绪三十三年建；维新村上东沟五圣宫，清光绪初年建；人和村总圣宫，清光绪二十六年重修；蔚仙村北极宫，清同治年间建；威下七号神圣宫，清光绪二十二年重建；威上黑树窝总圣宫，清光绪三十三年建；威虏大庙（关帝庙）、磨头分牛王宫、磨四分龙王庙、磨五分药王庙，均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威虏关帝庙等。

第九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金塔

从 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38 年，是中华民国时期。其中北洋政府统治金塔 15 年，国民政府统治金塔 23 年。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内忧外患，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艰难。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金塔

民国初期，金塔先后被北洋军阀和国民军统治。

北洋军阀时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中国历史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到1925年国民军掌管甘肃军政大权，北洋军阀在金塔的统治分为三个阶段，从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为袁世凯统治时期；从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到1920年直皖战争，为皖系军阀统治时期；从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到1924年直奉战争结束，为直系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北洋军阀窃取民国政权后，榨取民财，涸泽而渔。北洋军阀政府虽推行阳历纪年，男子剪去发辫，禁止妇女缠足，严禁种植罂粟、颁布种树章程，推广新式教育等积极的政策，但由于金塔、毛目县一带兵乱频繁，收效甚微，官僚机构和军费的增加，更使财政显得入不敷出，政府对人民的盘剥有甚于前。1914年起下令开征田产、房产税、验契税、印花税、屠宰税、烟酒公卖税、农具税、鸦片通过税，并提高旧税率。同时，于1914年、1915年、1916年、1919年4次发行“短期公债”或“有奖公债”，向民众摊派，但本金、利息或奖金均未还付。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地方割据势力和军阀大肆扩充军队，为解决财政困难，大开烟禁，长期准令民间种大烟以征收重税，残害人民。1922年，时任甘肃督军兼省长的陆洪涛，在“寓禁于征”的口号下大开烟禁，勒令各县征收“烟亩罚款”，广种鸦片。农

民为了应付沉重的苛捐杂税，不得不大面积种植鸦片。当时金塔县的烟亩罚款 40000 元，这是当时农民负担最重的款项。1923 年，进一步加重烟土税，每亩收烟土款达 40 两。金塔县鸦片种植面积达到了 2000 亩，产量 60000 两，致使粮棉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总产量下降 60% 以上。由于鸦片种植泛滥，吸食者增多，加之粮食产量总体上不能满足人民所需，饥馑遍地，死亡流离，络绎于途，给农村经济以沉重打击，农村一派萧条景象。

国民军统治时期

从 1925 年国民军掌管甘肃军政大权，到 1930 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中原大战爆发这一时期，称为国民军统治时期。1924 年 11 月，中华民国执政府成立，段祺瑞任执政。1925 年 1 月，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当时人们习惯上仍把冯军叫国民军，又称西北军。1925 年 8 月，段祺瑞任命冯玉祥兼甘肃督办。9 月任命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驻甘总指挥，代行督办职务。为了逐鹿中原，问鼎天下，冯玉祥在甘肃大力扩兵备战。军队数量大增，而养兵之资极度匮乏。对于民穷财尽的甘肃来说，利润最高，赚钱最快、最便捷的当数鸦片。国民军瞅准了此点，迫使农民种烟，征收烟亩罚款。按理说，征收烟亩罚款只是针对种烟农民，然而对不种烟者，他们也征收罚款，美其名曰“懒捐”。这样一来，不管种或不种，都要交纳罚款。《新西北》杂志曾登载了一篇《冯军在甘肃之苛税杂捐略计》的文章，统计苛杂名目达 86 种之多。冯军在甘肃几乎无物不税、无物不捐，税上加捐，捐上又加附捐。如此繁重的负担，人民叫苦连天，农村经济废弛，土匪迭出。在统治者沉重的苛杂压迫下，农民不得不大量种植鸦片，缴纳罚款。到 1930 年全县（指旧金塔县）种烟户约占总农户的 30%，这些农户约用三分之一的好地种烟。大面积种植鸦片，造成严重缺粮。由于灾荒助虐，民力不支。1924 年、1926 年、1928 年、1929 年，金塔、毛目两县大旱成灾，禾苗枯萎无收。1927—1933 年，金塔共发生地震 5 次，震级都在 5 级以上。加之繁重的剥削使劳动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贫苦农民饿死于道旁者不可胜计。民国十六年（1927 年），金塔县、毛目县曾设

赊饭场两处，每天乞食饥民达数百人。1929 年 3 月，甘肃督办刘郁芬给南京政府的电报可谓对当时灾情的写照："甘肃各地近年天灾兵祸，田庐漂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也已啖罄。"金塔县、毛目县的年景与此大同小异，可称百年不遇。

"金王军"起义

清末民初，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金塔人民从来没有停止对封建势力压迫的反抗和斗争。1909 年，同盟会成员甘肃河州人祁得隆，以酒泉闻家圈作为起义据点，在酒泉、金塔等地发展和联络哥老会以及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农民群众五六千人。金塔中东五分屯庄农民赵福，最先接受了祁德隆的革命宣传，并成为闻家圈革命军在金塔的革命首领。赵福走村串户，以中东五分屯庄、西坝西红屯庄为据点，在丁怀、王彦会等人配合下，积极联络活跃于两地的哥老会，招募士兵，组建了两百多人的起义军，取名为"金王军"。义军决定于 1912 年 2 月 17 日利用除夕爆竹为掩护起义但由于混进起义军队伍的土豪告密，官府派人秘密稽查，并逮捕数人。鉴于时局所迫，起义军决定提前三天举行起义，并派人通知"金王军"于 2 月 14 日前赶到闻家圈参加起义。2 月 14 日清晨，赵福带领两百多名"金王军"翻过夹山，就在快要赶到闻家圈时，前方传来起义失败、祁德隆阵亡的消息。紧追而来的清兵，包围了"金王军"，经过殊死搏斗，"金王军"惨遭失败。起义失败后，赵福持剑，单隐夜循，来到荒无人烟的北山一个叫盆蹄坑的地方，在山石坡挖洞穴而藏身，挖锁阳而解渴，捕野兔而充饥。数月后，赵福出山在附近的村子里出售狐皮，换取一些能够赖以生存的食物，不料被人发现告密。随后，官兵追来将赵福擒获，并将其残忍杀害。闻家圈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起到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开化民风、提高人民觉悟的积极作用，也支持了当时如火如荼的甘肃辛亥革命。金塔人民的这种敢于斗争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世代流传，从此，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第二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1930 年 4 月国民军离甘后，甘肃出现权力真空，各派军阀相互攻伐，政局混乱。1932 年 4 月，邵子力同邓宝珊一同到甘肃任职，邵子力任甘肃省主席，邓宝珊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开始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

马家军统治时期

1930—1941 年，为马仲英、马步芳军驻兵酒泉时期。这是马家军队为非作歹、搜刮敛财的 12 年，也是金塔、毛目两县人民群众灾难深重的 12 年。1930 年，马仲英相继占领张掖、酒泉等地。1931 年马步芳率青海军突袭马仲英，马仲英溃败后进入新疆。马步芳所属新九师全部分驻河西各县。

1931 年冬，马仲英在新疆军事失利，率残部二次入踞酒泉。国民党中央任命马仲英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并划酒泉、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六县为其防地，但他一心想谋取新疆，则积极招兵买马整顿军备。马仲英为扩充实力，抓兵无休止，征派捐款更是无法应付，民众叫苦连天，农商各界疲于供应徭役。以金塔县的大坝乡为例，1933 年该乡的负担数目中，军费负担项目有三十六师借款、雇兵费、军用车价、烟亩罚款、保存烟土摊款、欢迎九师师长费及粮价，共 4252.82 元，占总支出的 65%，又有军粮负担 58.52 担，其余各项摊款共 2244.78 元。可见，军费和军粮支出是该乡的沉重负担，1933 年春，马仲英标榜“为解除新疆人民的痛苦”，统率所部二次入疆。之后不久，马步芳军就来到酒泉，仍由马步康属部驻守。马家军驻扎酒泉期间，可谓坏事做尽。马家军对被俘红军，不分男女老幼，尽予残害。枪杀、刀砍、活埋、火烧、吊打等无所不用其极，其惨状令人

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运输苏联志愿军和援华物资，国民党政府决定修通酒泉至额济纳旗的大道，由马步青负责修筑。当时国民政府拨了筑路经费，但马步青将它全部装入私囊，并以修路、养路为名，大肆对金塔人民进行敲诈勒索。为修桥涵，任意砍伐树木，拉运木材损坏农民车辆，挣死牛、驼、马不计其数，对征用的民工，不仅不发工资，而且三五月不准替换。老百姓深受其害。

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发动了对中国守军的进攻，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金塔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大唱抗日救国歌曲和张贴大幅标语，各中小学师生组织起来，上街向行人进行演讲宣传。同时，金塔民众还积极募捐衣物，救济难民。随着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蓬勃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组织纷纷建立。全县各乡镇广泛开展宣传、劝募、慰劳、供给、救济等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国民党金塔县党部会同县政府创办《金塔通讯》，宣传抗日，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宣传、鼓动军民拿起刀枪，投身抗日，拯救中华，保卫家乡。1943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进入决胜的关键时期。为弥补兵员不足，改善兵员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青年学生参军参战。1944年分配酒泉征兵125名。在国立酒泉师范、国立肃州师范和国立河西中学三校学习的金塔籍有志青年踊跃报名，有21名青年学生应征入伍，为国效力。抗战时期，金塔人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掀起“献金救国”运动。政府为动员各界民众踊跃献金，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制定响应献金政策和宣传办法，指导各界民众的献金活动。献金种类有出钱劳军、节约献金、义卖献金、七七献金等；献金方式有自由献金、劝募献金等。

第三节　国民党在金塔的统治措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适应发动内战的需要，对在甘肃境内的党政军机构进行改组，将设在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朱绍良任主任。1946 年 3 月任命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宋希濂为参谋长。9 月，西北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西北行营和行辕是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统辖甘宁青新四省的代表机构。通过这样的机构设置，把四省完全置于军事统治之下。

成立参议会，选举国大代表

国民党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极力伪装民主。设立议会，最初的目的是作为代表民意，赞助县政。民国二年（1913 年）宪法颁布，金塔县立县议会一处，推举王蓓廷为会长、李凤翥为副会长，以协助县政府工作不到位的地方，并监督税捐的合理征收和使用。前两届省议会，因金塔、鼎新两县选民不足，没有人当选。至民国八年（1919 年）第三届始将选民补足其额。选举日本明治大学法部法学士赵世英为省会议员。民国十年（1921 年），复选赵世英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民国十五年（1926 年），举行全国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县绅赵积寿为国民代表。

1945 年八九月，甘肃省政府按照南京政府的要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匆匆走完了“民选”代表、议员的过程，建立了各县市参议会和乡镇民选代表大会。同年九月，金塔、鼎新两县参议会相继成立。1947 年 8 月，金塔、鼎新两县成立选举事务所，专门办理国大代表选举事宜。选举工作于 11 月 21—23 日进行。选举结束后，各县（局）将本县（局）选举国大代表

投票结果上报专署。最后，第七区选举酒泉教育界名流崔崇桂为国大代表。1948 年 3 月，崔崇桂赴南京参加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

整顿保甲组织

国民党为进一步强化对民众的控制，将整顿保甲、清查户口作为 1947 年的中心工作。此次整顿保甲，金塔、鼎新两县按照全省统一的先订户、后立甲、再编保的程序逐步推进。各县保甲编组仍以十户编甲、十甲编保的原则进行。经调整后，金塔县 23 保、340 甲；鼎新县 12 保、90 甲。

加强户籍管理

为了强化对人民的控制，展开了大规模的户口调查。调查结果：金塔县共有 6238 户 34715 口，鼎新县共有 1949 户 13433 口。此外，对于流动人口，一律登入《流动人口登记簿》。户籍登记事项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等。在完成初次户籍登记后即制发国民身份证。18 岁以上的公民在举行公民宣誓后，发给国民身份证。截至 1947 年 10 月底，金塔、鼎新两县共填发国民身份证 25000 多张，实领身份证人数约占两县总人口的 52%。1948 年，金塔、鼎新两县按照省政府要求，采取措施，对两县本地民众漏户漏口及未领取国民身份证的情况进行了检查。

组建自卫队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于 1947 年指令各县市组建民众自卫队，并颁布了《各县市民众自卫队组训规程》。一般每保编 1 个中队，每乡（镇）编 1 个大队，每县（市）编一个总队。总队长由县长兼任，大队长由乡（镇）长兼任，中队长由保长兼任。1947 年初，金塔、鼎新两县组建民众自卫组织。县有常备自卫队，乡镇有自卫大队，保有自卫中队。进行地方盘查和军事训练，禁止共产党活动。在城内，以清查户口为名清查共产党员；对各书店、

报社、邮电局轮流检查，遇有进步刊物、信件及共产党宣传品，立即查究，没收焚毁。

强化特务机构

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撤销特务制度，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反对任意捕人和秘密处决政治犯。但国民党却强化特务机构，并将特务机构延伸到了地方。1947 年 7 月，军统在酒泉正式设立河西工作站，领导河西地区的军统特务组织。其中在鼎新与额济纳旗交接的额济纳旗建国营设立二里子河组，负责这一带的特务工作。

加强警察机构

1945 年，金塔、鼎新两县都已建立警察机构。警察还接受了国防部拨下的各种比较新式的武器，成为国民党在两县的一支重要的武装统治力量。如鼎新县警察队于 1946 年与地方自卫队合并，改建为警察局，人员增至 30 余人，步枪 44 支，子弹 2728 发，手榴弹 67 枚；金塔县行政警察队于 1947 年 10 月扩建为金塔县警察局，设局长、局员、督察员、巡官、办事员、城关户籍警察各 1 名，警长 5 名，长警 45 名，马 5 匹，土炮 3 门，步枪 651 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金塔、鼎新两县根据国民党中央“为构成全境警察网，按人口 500 至 1000 人设警察 1 人”的规定，警察数额又有增加。

第四节　民国时期金塔的行政建制与党团组织

行政建制

民国元年（1912年），废除了清代的府、州、厅制，实行省、道、县三级制。甘肃共设7道，下辖77县。酒泉设安肃道。1913年改安肃道为边关道，道设观察使，肃州改为酒泉县，王子庄分州改为金塔县，高台分县（又称毛目城屯田县丞）改为毛目县。边关道驻酒泉，辖酒泉、高台、金塔、毛目、玉门、安西、敦煌七县。同时，改知县为知事。县知事下设“三班六房”，“三班”即皂班，司行刑，唱道；屯班，司催粮，要款；快班，司捕盗。“六房”即兵、刑、吏、礼、工、户。各县成立警备队，司令由县知事兼任，总司令由道尹兼任。

民国十五年（1926年），将县属六房，改组合并，设立科、局，农村照旧实行坊隅制。

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道为行政区，甘肃设六个行政区，改安肃道为安肃行政区，领酒泉、高台、金塔、毛目、玉门、安西、敦煌7县。改道尹为行政长，改县知事为县长。1929年，改毛目县为鼎新县。同时废除乡约制，推行区、村、闾制。

民国二十年（1931年），撤销坊隅，设立区、乡制，乡下设闾，闾下设邻。各设区、乡、闾、邻长一人，分管所辖区的民事、赋税、差役等事务。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中国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会成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改安肃区为行政督察区，裁撤乡、闾、编保、甲。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保上设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甘肃省正式划分为7个行政督察区。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任该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和驻地县县长。酒泉

为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同年6月1日，酒泉专员公署正式成立，领酒泉、高台、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七县。同年，取消联保，实行乡镇保甲制。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中国国民党酒泉监察委员会”成立。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九月，酒泉参议会正式成立，会址在三官楼街（今民意街）。

民国时期，金塔县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划和政权组织迭经变更，初期沿袭清制，中期有时划区设村，有时改村为乡，后期设置保甲。

乡官制

乡官制即指地方行政管理人员称农官、乡约而言。民国元年至十二年（1912年至1924年），原金塔县以10个使水坝和2个边缘地划分畛域，全县划分为金东坝、金西坝、户口坝、梧桐坝、三塘坝、威虏坝、王子东坝、王子西坝和新两野（新城子、两山口、野麻湾）、天夹营（天仓、夹墩湾、营盘）两个地方。每坝为一个行政单位，设杂职农官、督修农官各1人，民众选出，报县府委任。

杂职农官，管辖全坝行政事项，受县府领导。以下设乡约若干人（由该坝备岔民选），再下设伙夫帮助工作至户（后改伙夫为什长）。

督修农官，专管全坝水渠修理，监视坪口分水闭水和浇水，检查维护大小渠道等。下设渠长若干人（按岔推选），协助督修农官工作，管理各岔水渠（一般是支渠）。支渠以下设小甲或闸头若干人至户。

原鼎新县（民国二年改高台分县为毛目县，民国十八年改毛目县为鼎新县），沿袭清制，原有屯田地，双树墩大、有、年3号，设乡约1人。毛目“天、地、元、黄、宇、宙、洪、昌（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24号，分设乡约4人，总称“五屯”。新增科田地茂茂墩渠、万年渠、双城子渠各设乡约1人，谓之“三科”。即所谓“平分五屯，额正三科”，简称“五屯三科”，由8个乡约分理民政和赋税。另外，各渠设渠长（即水利农官，后称大差或水利员）1人。

民国十二年（1924年）后，金塔裁汰杂职农官。督修农官改称水利农

官或水利员。

区村闾制

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废除乡官制，改乡约为征收员，推行区、村、闾体制。县设自治筹备委员会、县农会。原金塔县共划分为4个自治区：金东、金西、新两野为一区；户口、梧桐为二区；三塘、威虏、天夹营为三区；王子东坝、王子西坝为四区。每区设区董1人，受县府领导并受县自治委员会指导。区下设村，村下设闾。全县划23个村，每村设村长1人，村副1人。以农会兼办军粮粮秣，各村又增设兵站员1人，协同征收员办理抓兵派款诸事。

民国十九年（1930年）秋，合区并村。原金塔县一区、二区合并为第一区，三区、四区合并为第二区，全县共2个区，10个村。以金东、金石、金双为一村曰金东村，金西系金东村之联合村，天生村、官坝村合并曰户口村，梧桐坝仍为一村曰梧桐村，三塘坝两村合并曰三塘村，天夹营仍为一村曰夹营村，新两野两村合并一村曰新山村，此合并之七村直属第一区管辖；威虏村与磨河村合并曰大有村，王子东坝三村合并曰三多村，王子西坝四村合并曰四维村，此合并之三村直属第二区管辖。是为金塔规定区村之定制。原鼎新县，改“五屯三科”为2个区8个村。第一区辖东风、中兴、万年、双城4个村；第二区辖双树、芨芨、上西、下西4个村。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村易名为乡。

保甲制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裁撤乡、闾，编制保、甲。区下为保，保下为甲。原金塔县，划3个区，54个保，220多个甲。每区设区长1人，助理员2至3人，保设保长、保副，甲设甲长。一般5个或6个保设一联保，置联保主任1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合并为东区和西区2个区，辖26个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改区为乡，乡公所内设民政、财

政、巡警、户籍、文教等股，各设股长。全县调整为 2 个乡，22 个保。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又调整为 2 个乡 24 个保。其中东区乡辖 14 个保，西区乡辖 10 个保。民国三十四年 (1945 年)，再次调整为 2 个乡，25 个保，340 个甲。东区乡辖金城、建国（在县城）、金大、金石、金双、金西、户西、户东、大坝、大新、三上、三下、夹营、天仓等 14 保；西区乡辖旧寺墩、五福、三多、西四、西红、西头、西三、威磨、威虏、新城、新山等 11 保。

原鼎新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改 2 个区 8 个乡为 2 个区 8 个保。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改区为乡，仍辖 8 个保。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调整为 2 个乡 10 个保。民国三十六年 (1947 年)，再次调整为中兴、上西 2 个乡 12 个保。中兴乡辖东明、四维、毡利、永宁、东异、西静、双城等 7 保；上西乡辖新西、宇宙、上元、涔急、双树等 5 保。

国民党组织

民国十六年（1927 年）6 月，国民党甘肃省临时省党部委派翟玉航、尹尚谦为西路指导委员。指示各县成立临时县党部。二人又介绍贺多善、宋执中为金塔县临时县党部筹备委员，并与酒泉县党部青年部长李上林、党员金从寿筹备一切事务。七月三日，借会馆的房子照章成立金塔县临时县党部。但不久就奉上面的命令停止了工作。

民国十七年（1928 年）元月，金塔选送第一次在省党务训练班毕业的万俊业，由省党部委派为金塔党务筹备委员，并委派李上林、宋执中、金从寿为委员，帮助工作。于 2 月 4 日成立金塔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至 3 月又奉省党部通令停止工作。

民国十七年（1928 年）2 月，中央第四次会议议决，举行全国总登记。甘肃省指导委员会又委派省政治训练班毕业的周登赢、张生录为金塔县党务指导委员，成立登记处。登记结束后，因为甘肃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将开幕，即由登记处成立独立区分部，开会议决，在省城就近选周立孝为金塔县代表，参加大会，并将酒金分水各议案告知周代表，提交大会，力争办理。

登记后，由省党部核准党员五十二人，依次成立九区分部三区党部。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2日，召开金塔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区党部代表李经年、王克明、王哲武，第二区党部代表王安世、李上林、公兆麟，第三区党部代表赵积寿、黄文中、何培基。因开会之日讨论事项较多，选举了执、监各委员，最后决定讨论事项。于5月1日正式成立国民党金塔县党部。

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金塔县选送第二次在省党务训练所毕业的金从寿、梁学诗、何维汉等人返回金塔，由省党部委任梁学诗、何维汉为鼎新党务工作员，委任金从寿为金塔县党务工作员暂理党务。8月，省党部召集各县市代表召开联席会议，选举李上林为代表出席省联席会议。会议结束后，李上林被委任为金塔县整理委员，不久就停止了党务活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由省党部划分金塔县党部为酒泉附属，并由酒泉县党部委任董祥国为金塔整理委员。于2月22日借县政府中山堂成立办事处，征收预备党员，最终审查确定合格党员11名。至9月22日成立直属第一区分部，推举金从寿为常务委员，照常开展工作。

1945年，金塔县设区党部3个，区分部26个。

三青团组织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同年7月组成中央团部，由蒋介石自任团长。1939年初，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之后，为了扩大势力，三青团甘肃支团部筹备处指派酒泉师范校长王鼎极，以酒泉师范为重点建立省直属区队，以个别吸收的办法，在该校教职员工和高年级学生中发展团员。1940年夏，由王鼎极负责成立了“三青团酒泉分团部筹备处”，将发展对象扩大到教育界和当时的三个中等学校（国立肃师、河西中学、酒泉师范）。从此三青团在酒泉的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1942年秋，正式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酒泉县分团部”。同年，金塔、鼎新县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在各区院校和政界青年中发展团员。金塔县团部建立基层区队3个、分队15个。

1947 年 10 月，为了解决历来党团（三青团）内部互相摩擦、争权夺利的问题，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金塔、鼎新两县成立了“党团合并委员会”，将原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凡担任了区队长以上职务的一律转为国民党员。1948 年 2 月党团合并工作结束。至此国民党在金塔、鼎新两县的组织机构更为庞大，活动也更加频繁。

民国时期金塔历任县知事、县长：

寇柄寅：汉中城固人，宣统三年（1911 年）任至民国元年（1912 年），民国时期为县知事，县长。

邓学典：兰州人，民国二年（1913 年）任。

吴永霓：陕西紫阳人，民国三年（1914 年）任。拔贡。

吕继宗：江苏人，民国四年（1915 年）任。

戴光华：四川人，民国五年（1916 年）任。

徐家瑞：江苏人，民国六年（1917 年）任。

李士璋：四川遂宁人，民国七年（1918 年）任。拔贡。

宁济廷：汉中城固人，民国八年（1919 年）任。

马象乾：陕西长安人，民国九年（1920 年）任至民国十年（1921 年）。

李士璋：四川遂宁人，民国十一年（1922 年）复任。

永　格：北京人，民国十二年（1923 年）任至民国十三年（1924 年）。

黄凤梧：江苏人，民国十四年（1925 年）任。

齐　溥：陕西富平人，民国十五年（1926 年）任。

仇　准：直隶人，民国十六年（1927 年）任。

黄文中：甘肃临洮人，民国十七年（1928 年）任。

郑乃谦：直隶武清县人，民国十八年（1929 年）任。

张懋东：甘肃礼县人，民国十九年（1930 年）任。

李濂学：甘肃武威人，民国二十年（1931 年）任。

陕祝南：甘肃河州人，民国二十年（1931 年）任。

杨体侃：甘肃会宁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任。

蒋绍汾：江苏宜兴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任。

周志拯：浙江永嘉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任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

崔崇桂：甘肃酒泉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任。

许　谔：甘肃临夏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任。

赵宗晋：甘肃天水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任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戴云凌：江苏江山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任。

张德熙：江西铅山人，民国三十年（1941年）任。

闫重义：甘肃通渭人，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任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喻大镛：江苏淮安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四月任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七月。

马元鹗：甘肃陇西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七月任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九月。



第五节　警政与民众武装

民国绿营裁撤后，金塔再无驻边防军队，只有警政和保卫团等民众武装维护治安。

警政

金塔县于民国三年（1914年），始设警备队，以维持地方治安。当时，警察一切事务由县知事兼办。民国六年（1917年），因治安事情太多，专门设警察办理，改名警察所。民国十七年（1928年），警察所改为公安局，改警佐为局长，警生为局丁。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九月，蒋绍纷县长将地方保卫团撤销，留团丁十名，拨充到公安局。十月十五日，奉省政府命令将公安局裁撤。

鼎新县于民国三年（1914年），编织警备，招募队兵十三名，负责地方治安。

民团组织

金塔县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一日，黄文中县长奉令设立保卫团。委任县绅刘怀基为正团总，县商吴永昌为副团总。招募团丁60名，书记一员。团总均为义务职，书记每月支薪洋二元五角，团丁每日支口粮白面一斤半，黄米一碗，不支薪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八月初一，刘怀基辞职，郑乃谦县长委任吴永昌为正团总，县绅李经年为副团总。团丁裁减为30名。民国十九年（1930年），吴永昌辞职，张懋东县长委任李经年为正团总，

县商杜万荣为副团总。团丁裁减为18名。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李经年辞职，委任梁占金为正团总，杜万荣仍旧为副团总。同年秋九月，陕祝南县长将团丁裁减为10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三月，委任雷声昌为团总，十月委任贺多善为副团总。稍后，三十六师令一名刘姓副官来到金塔督查保卫团建设情况，要求金塔招募人数达到100名。陕祝南县长在城内北店插旗招募，采取招征并进的办法，费时两个月才完成招募任务。而刘副官将招征之人及马十匹枪二支完全代领运到了肃州，加入师部。金塔保卫团仍有团丁10名，由雷团总管理，贺副团总辞职。民国21年（1932年）十月，蒋县长将县公安局改为县团，并自任正团长，委任雷声昌为副团长。将前次撤销地方保卫团所有枪、刀、器、械、制服、火药等物，都归县团使用。十一月初八，第九师韩营长来金塔征兵98名，挑拔团丁16名。十二月周县长到任，雷声昌辞职，委任许嘉毅为副团长。

鼎新县，民国六年（1917年）各乡组织保卫团，设团总一人，团丁由人民编组而成，人数多寡不等，昼夜巡哨防备。在公共场所设岗防御稽查盗匪，每年冬末春初由县政府检阅一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成立军训干部训练队，训练干部人员。各村保成立壮丁队，分期或集中轮流训练。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经济

民国初期，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大开烟禁，粮棉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总产量大幅下降。捐税日益严重，地方政府和各派军阀摊派榨取，抓丁拉夫，苛捐杂税繁重，农村经济衰落。民国中后期，马家军和国民政府为了维持战争所需，加重税收，摊派劳役捐税，加大对民众的搜刮和盘剥，农业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工业衰退萧条，经济制度混乱，濒临崩溃。

农业

农业方面，民国时期，金塔的经济仍然是以个体劳动为特征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分散经营小农经济为主。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将土地或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收地租，或雇佣长、短工直接经营，或放青账和高利贷盘剥农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多次大开烟禁。鸦片的大量种植挤占了耕地，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1924—1929 年，金塔六年持续大旱，大部分耕地颗粒无收，农业空前大减产；30 年代初期（1931 年、1933 年）的粮食产量有所回升，这是金塔在大灾之后的农业生产恢复时期；1934 年至 1936 年间，年产量接近民国初期，这是金塔在民国时期谷物生产的高峰时期之一。

民国时期，通过政府的大力试验推广，农作物品种大大增加，成功引种了花椰菜、西红柿、甜瓜、草莓、石刁柏等瓜菜品种。这一时期，主要的农作物是糜谷、高粱、小麦、青稞、胡麻、玉米、大豆、小豆、黄豆、绿豆、扁豆、桃豆、白薯、洋芋。常种的小麦品种有红大头、白大头、红长芒、白长芒、红小麦、山西红等；糜子有红、黄、黑 3 个品种，青稞属小日月庄稼，

先于小麦之前早熟可以接济饥荒，因此家家都有少量种植。胡麻属主要的食油作物，每年家家都种植。此外，红花、向日葵、油菜、麻子等，虽属小宗，家家都种。主要瓜菜作物：白菜有小白菜、天津大白菜等；萝卜有末萝卜、红天鹅蛋、白长尾、青皮萝卜、冬萝卜等；十字花科的甘蓝、菜花、苴莲、芥菜、蔓菁等；葫芦科的黄瓜、番瓜、南瓜、菜葫芦；茄科的西红柿、茄子、辣椒；百合科的葱（红葱、白葱、野生沙葱）、薤（洋葱），蒜（两个品种），韭菜（两种）；豆科的刀豆、豇豆、菜豆；伞形科的芹菜、芫荽、胡萝卜、大小茴香；藜科的甜菜、菠菜；菊科的莴笋、洋姜等；瓜类主要有西瓜、鞑瓜（籽瓜）、甜瓜、梨瓜等。基本涵盖了现在种植的绝大多数品种。

民国时期，金塔农民使用的工具较为落后，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千百年传下来的铁木手工工具，非常简陋，工作效率低。在农业生产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耕畜主要被地主、富农占有，贫苦农民无耕畜，只能租借或以人力代替畜力，生产力水平低下。由于贫穷，致使新式农业技术无力推广使用。加之军阀混战，赋税徭役繁重，加速了农民的贫穷和农村的破产。1936 年，金塔共 2 区 10 乡，3438 户，21681 人，平均每户 6 人，原有耕地 62000 亩。因风沙肆虐，现仅有 58700 亩。1946 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农业赋税繁重，农民丧失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许多农村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特别是 1945 年的旱灾，对农业生产影响甚大。当年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是 1932 年以来的最低点。

畜牧业

畜牧业方面，民国时期，金塔的畜牧业以养殖农家自用的牛、羊为主，仅有大马场、三道岭、白水泉等几处草场。

水利

水利方面，一是兴修水利工程。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国民政府经济部拟定《水利建设纲领》，大力倡导地方兴修水利。甘肃水利林木公

司制订了《甘肃河西水利十二年计划》，目标是在十二年内，政府出资整理旧灌区370万亩，开发新灌区500万亩。抗战时期，中国农民银行在甘肃举办小型农田水利，金塔、鼎新两县均参与了这项工作。通过农田水利建设，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发展。金塔的水利工程主要是防洪蓄水工程和渠道建设。鸳鸯池蓄水库：酒泉与金塔两县人民同用北大河之水，自1913年分县后，用水纠纷年年出现。1922年，安肃道尹王世相令酒泉县知事同金塔县知事李士璋双方磋商议定，每年立夏后五日，酒泉、金塔在茹公渠金上坪立案分水，两县各得水五分，分水时两县各派员监分。后来，金塔县民公推赵积寿赴省府请愿，省府朱绍良遂派员来酒泉视察。但酒泉位居上游，垦殖面积大，需水量多，河水日渐减少，境内浇灌已属不足，再无余水可分供金塔农田引灌。于是甘肃省政府在1936年派建设厅技正（技术员）王仰先往该地勘测后，初步决定在金塔供水口及鸳鸯池左侧修库蓄水，拦储夏秋山洪暴发时的过量之水，以供旱时急需。后来派工程师王力仁、杨廷玉亲临其地做调查，并选定坝址，提出建设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开工。1942年9月省政府又一次派遣工程人员，在鸳鸯池勘查测绘修建蓄水库。经呈准中央拨补库款，修建民工由两县征雇，并责成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主持进行。1943年6月开工，在酒泉设立肃丰渠工程处，主任工程师原素欣负责该项工程。1946年秋季，举行了水库放水典礼，工程历时四年。完工后的鸳鸯池水库为肃丰渠的主要工程，坝址在金塔县夹山水峡，坝体为石结构，坝高26.8米，长180米，蓄水量为1200万立方米，受益面积7万亩，这是河西地区也是整个甘肃，在民国时期所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工程。渠系：金塔水源，由酒泉西南、东南百余里之洮赖、红水二河发源。经过酒泉西北、下古城与临水河汇归北流，入金塔夹山口。分一支为金塔坝，由东分流。河水直通下流为王子六坝。金塔坝又分两岔，一曰金东坝，一曰金西坝。金东坝分坪三，一曰金石坝，一曰金大坝，一曰金双坝。金西坝分坪二，一曰金西坝，一曰三小岔。王子六坝总分坪六，由东渐西，一曰户口坝，二曰梧桐坝，三曰三塘坝，四曰威虏坝，五曰王子东坝，六曰王子西坝。

二是建立了分水制度。清朝后期，随着气候变化和植被的破坏，祁连

山积雪减少，众河道水量下降。加之附近各县一部分农民迁往酒泉定居，上游人口增加，耕地扩大，水的供需矛盾日益加剧。讨赖河，每年农历三四月间，来水量甚小。因此，上游各坝在大河中堵坝引水，放任自流。年复一年，原有水规自行破坏，堵河断流，成了常例。由于土地的大量集中，上游一些地主恶霸把持了水权，他们为了明浇夜退，灌湖泡荒，煽动农民群众，为其独霸水利而效力，激化了上下游之间的水利纠纷，特别是民国二年（1913 年）析置金塔县，分了县也分了心，地方官各私其民，助长了地方势力，酒泉乡绅竟说“金塔所灌系山洪暴发之水”，将河水霸而不舍。每年夏秋季节，若不是洪水将上游各坝的拦河坝冲垮，下游农田滴水不见。民国十五、十六年（1926 年、1927 年），金塔连旱，饥荒成灾，“人民死无算”。民国十七年（1928 年），黄文中（甘肃临洮人，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任金塔县县长，目睹民众饥饿不堪的凄惨情景和酒泉独霸水资源的极端不公，组织以赵积寿为首的水利委员会，专司均水之责。从此，金塔的“均水”成了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每年出动近千人到酒泉均水，双方械斗，致伤甚至死亡事件发生多起。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周济（字志拯，浙江永嘉县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任金塔县长，为政三年，每年除组织农民到酒泉均水外，还向省政府呈文，要求解决酒金两县的水利纠纷。卸任以后还以个人名义多次向水利部和甘肃省政府写报告，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伸张正义，为金塔争水鸣冤。这时，水利纠纷已达高潮，省政府才有所重视。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甘肃省政府“特定分水办法，将酒泉设立夏放水之期提前十日，先由讨赖河坝人民灌溉，至芒种第一日起，令酒、金两县长带警监督，封闭讨赖河各坝口，将水由河道开放而下，俾金塔人民按粮分配，浇灌十日，救济夏禾。至大暑前五日起，如前法将红水河开放五日，藉润秋禾”。此水案由两县县长有时甚至由酒泉专员亲率一个营或团的军警监督执行。

酒泉有大河三：曰北大河，曰清水河，曰临水河。其三河为金塔全县之水源。但北，清二水流至下古城与临水河合而为一，经茹公渠来金百有余里。卷查老案，清乾隆二十七年，经金塔士庶等具呈陈明，

前分州张会同前肃州徐判令：金塔坝得水七分，茹公渠得水三分，立案为例，各资灌溉。后茹公渠因河低水高，往往堵河塞水，以致两造纷争不已。至民国十一年，蒙酒泉县长沈、奉安肃道尹王谕令，会同金塔县长李斟酌情形秉公判令。两造在临水大河内各得水五分。复令于河口镶坪均分，刊立石碑遵为成例。并断令于屡年立夏后五日分水。同请酒金两处县长会同来渠监视以照慎重永免争端。两造遵服具结立案，兹将列宪为民之苦心及分水之成数谨列于碑，以期永垂不朽云尔。

酒泉初等国民小学校教员兰谷茹生蕙丹书

河南南阳府王盛义镌石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赵宗晋（甘肃天水县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金塔县长。他实地察看，周密思考后和酒泉县长凌子惟联名向省政府递呈“用科学方法，蓄置水量，节制使用，以利耕耘”的报告。认为兴修鸳鸯池水库，蓄积冬春余水是解决金塔干旱和两县水利纠纷的良策。该工程自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六月开工，至三十六年（1947年）五月竣工，蓄水量1200万立方，可供7万亩农田灌一次水。施工期间，酒泉和金塔每天各出民工两千名，累积工日86万个，国家投资法币16亿元。这座水库就是酒、金两县人民团结用水的象征。

工业

民国时期，金塔的工业以手工业为主，主要有木器、铁器、纺织、缝纫、制鞋、皮革、印染、粮油加工、食品、酿酒、采煤等，分散于城乡各地。最普遍的是生产工具的加工和制作，以及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器物、用品的生产。冶铁业和铁器业方面主要是制造和修理简单农具的铁匠铺，分布于全县各乡镇。农产品加工作坊遍及各乡镇，主要是榨油业和粮食加工业。小麦、玉米、糜、谷的加工由农户各自进行。手工棉纺织是全县农户的主要副业之一。土布生产以自给为主，除供本地使用外，还有部分输往邻县。以羊毛为主要原料的毛纺编织，也是金塔农村的重要副业。造纸作坊多用

芨芨草、马莲草、烂棉花等为原料，所造纸都为土纸，不能供印刷用。铁工，多为私营专业铁器店铺，无论城乡、集镇、屯堡，都有固定的铁匠铺，主要生产农具、日用家具、钉马掌及建筑用具，有时也制造一些刀矛之类的兵器，以维持生计。铸工，主要在城镇开办生铁炉院，以铸造农耕器具，犁铧、耧铧、车瓦车钏、炉条、火盆、熨斗、灯盏、锅、盆、钟、键等杂品。铜、锡、焊匠，多为小本经营，或有挑炉灶走乡串户，钉锅、制锁、铸造日用杂件。银匠，主要在城市设银楼、匠铺，主造首饰、镯、戒指、儿童饰品等。印染业，主要以土布加工染色为主。煤炭开采主要是私人经营，窑主聘请技师，选好矿点，雇用民工开凿，以人力背运出窑，年产量仅能维持县城和农村人民的生活用煤。制砖业，农村各地在修建学校庙宇等公共建筑时，根据需要才造窑烧砖，一般很少作为常年生意。

民国十五年（1926年），金塔县开始有了公办工业，开始成立“民生工厂”，生产少量民用毛毡，兼作缝纫业。民国十七年（1928年），金塔县创建民众工厂一处，生产棉、毛织品和铜铁锅、盆等12种产品。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金塔县兴建手工织布厂，生产宽面布；兴建毡坊，生产毛毡、毛衣、毛套、毛袜、围巾、栽毛毯等；兴建制鞋铺，生产布鞋、毛鞋、皮鞋等；兴建制帽作坊，生产瓜皮帽（俗名小帽）、毡帽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金塔县设手工毛纺厂。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金塔县把木、石、泥、席、铜、铁、银、皮、缝、染、纸、裱等作坊和工匠进行登记，组织成12个坊业。金塔县还有淘金、挖煤等矿产开采者。

民国时，由于工业不发达，县境内没有官办矿业，只有民间为生活自用而采挖的少数零星矿点。据民国时期《创修金塔县志》记载，早年民间采挖的矿产有：塞水石（石膏），产于天泉寺，用于绘塑及入药；土粉（俗名白土），产于白水泉，用于粉墙；石灰，产于夹山青山寺，用于粉墙；红土，产于天仓北山，用于粉墙；煤炭，产于老君庙（梧桐沟），用于燃料；金矿，产于铅炉子沟；铅矿，产于铅炉子沟。

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较为活跃。民国时期，金塔县城有贸易市场两处，大小商铺多家，多集中于北关内。较著名的商号有灵德堂、永兴和、元新成、三积有、恒信号、集瑞源等。它们分别经营中药、日杂、土产、餐饮、染坊、旅店、干鲜果等。城内及北关各设米粮市一处，东栅子门外设集市，群众多集中于上午进城交易。板地屯庄，也是民国时金塔较大的一处商贸市场，是金塔境内颇有名气的手工业品与农副产品交换集散地。后来许多行商逐步变成坐商，开办商号铺面。中药铺有西安人屈怀德的天兴德，王建生的永泰堂，公天明的义兴明，杨宗正的正和公；三货铺有李贵迁的万顺贵，雷全的任盛和，李贵喜的贵成泰，邹德运的德兴福，高台人陈进堂的进义和，酒泉某人的灵盛西以及金塔人王天存的天德堂。此外，还有油坊、染坊、铁木匠铺等作坊，特别是收甘草和种大烟年份的收获季节，行商小贩走乡串户，络绎不绝，附近条件较好的农户家中都住上了买卖人。鼎新县只有县城贸易市场一处，商贩三十多家，较大的商号有“义兴隆”“福兴厚”“鼎兴源”三家；中药铺仅“恒德堂”一家；染作坊一家；餐饮、杂货铺面八家。金塔、鼎新两县的商铺主要经营百货、土产、日杂、五金、中药、粮、棉、油、肉、果品、蔬菜等。其中甘草、皮毛、棉花、土布为对外销售的主要产品。

金融业

民国时期，金塔的金融业不发达。民国九年（1920年）金塔境内始用银圆。民国十九年（1930年）流通纸币，每张抵铜圆20枚或50枚、100枚不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时任金塔县县长周志拯，为了限制高利贷剥削，减轻农民负担，成立金塔县农民低利借贷所，赵积寿为第一任主任，以后继任的有王安世、雷声昌等人。曾发行地方货币“金塔县借贷所券”，面额一吊，抵铜圆100枚，群众称“油布贴子”，不久自行退出流通领域。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流通法定通货（简称“法币”）。民国三十一

年（1942年），流通关金券（全称“海洋金单位兑换券”）。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流通金圆券。1949年前夕，流通银圆券。但由于货币贬值，市场交易多以小麦为等价物，同时再度流通银圆和铜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中国农民银行甘肃省银行在金塔设办事处，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在鼎新县设金库和汇兑所，以实物发放农贷。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8月，成立中国农民银行金塔县支行，办理存贷、吸收股金、发放农工商贷款。

税收

民国时期，金塔的税收以田赋为主。田赋以地丁征收，一般按所征粮、草折银两征收。征收实物称本色，按市价折征银两，称折色。民国前期，酒泉各县田粮一般为本七折三。草束，大草每束18斤，小草每束7斤。1916年起，一律按7斤计算，折收银圆。但是，酒泉田赋征收实物比重仍较大。在征收田赋过程中，还有几种附加税，即耗羡、百五经费、盈余等。解放战争时期，苛捐杂税进一步增加。全省统计，正税26种，新增税捐23种。各地方自行临时摊派尚不计算在内。据《创修金塔县志》记载，金塔县“原额正粮，除梧桐坝沙压粮二十石四斗外，实征粮一千三百零三石七斗二升八合，原额应征七斤。芦草二万九千六百七十五束七分一厘，折合大草一万一千五百五十六束二分二厘，内除十五年呈报梧桐坝沙压地共七斤草五百二十三束八分七厘，折合大草一百〇四束外，实征大草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三束二分二厘”。商业交易税则按行业设置机构征收，据《创修金塔县志》记载，金塔县的税捐征收机构“百货厘金局：光绪十二年始设，征税最轻值百两之货祇征一两。后至民国愈形增加，照依担头按百分之五征收。牲畜分局：设于清光绪十六年，照商价按三分税率收。至民国十五年按八分征收，又加义务捐一分，印花税一分。印花分局：设于民国五年，由本县商会代办，其印花照地方商民情形分配。烟酒分卡：设于民国七年，酒每百斤征大洋四元五角，烟视优劣定税多寡。皮毛分局：设于民国八年，其征收方法，照依货之粗细，价格之大小征收。禁烟善后局：征收等项办法，凭照一张净重五百两为准。每两收税洋一角五分。每凭照一张收税洋八角。

毛重十两除皮一两。印花每两收票费洋六厘”。差徭，自清代“摊丁入亩”后，在汉族地区已经很少。民国时期，甘肃临时省议会倡议“裁革支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除在兴修水利、修桥、筑路等公益事业方面征发民力外，其他方面很少动用民力。民国初年是扰民最少的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军阀割据，开始滥用民力。国民军征兵、征畜（车）和征派粮秣频繁，是民国扰民最严重的时期。

道路交通

金塔、鼎新两县公路交通在民国以前和民国初期都十分落后。“金塔交通梗塞，而其往来附近之地，南通酒泉，北通蒙古，东通高台，由双井而入大道。西通玉门，由花海子而入其境。东北通鼎新，由营盘过黑河而至其地。”（《创修金塔县志》）道路闭塞不畅，崎岖难行。交通运输主要依靠畜力、畜力车、驮运为主的民间运输方式。民间运输十分萧条。直到抗日战争期间，金塔公路建设才有了进展，交通运输业也有了一定发展。民国十六年（1927 年），整修酒泉通往金塔的道路，使之能通行铁、木轮大车和胶轮大车。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修建酒建（酒泉至建国营）公路酒泉至金塔段，当年完成 53 千米。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8 月，修建金塔以北路段，当年完成 155 千米。同年 12 月 1 日成立酒建支线工程处，次年 4 月开工至 12 月 31 日全部竣工。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6 月 11 日，酒泉至额济纳旗公路全线通车，全长 397 千米。1948 年，再次整修酒建公路（由酒泉经金塔、过天仓、越青山头，抵达建国营）。酒金线，是民国时期修建的河西三条支线之一。北起金塔县疙瘩井，向南经白山堂铜矿、营盘、金塔县城到酒泉，是一条连接酒泉至内蒙古额济纳旗的省际干线公路。1945 年至 1946 年因为准备内战的需要，采用征工制，抽调当地驻军兵工，调派酒泉、金塔、鼎新民工，按丙等公路标准修建。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鼎新县动员民力令各保分段整修镇夷石峡到沙井子的道路，全长八十公里。民国时，金塔县境内建有东官坝桥、户口坝桥和西官坝桥三座较大的桥梁。鼎新县境内建有营田桥、大坝桥、秋号桥和殷家大桥四座。

邮政业

民国以前，金塔、鼎新是通过驿铺来传递邮件的，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两县相继设立邮寄代办所来传递邮件。民国元年（1912年），在金塔城内商号设立邮寄代办所一处，经理一人，邮差二人。开通酒泉到金塔、金塔至鼎新两条邮路，传送肃州、金塔、鼎新一带往来之信件报纸。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金塔邮寄代办所改为邮政局。邮运仍为步班和骡马班，从酒泉经金塔而达鼎新，由2名邮差交替，3日为一班，大庄子头墩为金、鼎邮件交接点。农村有乡邮员2人，分别担负城西片（今中东片）和城北片（今东坝片）的投递工作。鼎新县，自民国元年（1912年）冬，设立邮寄代办所一处，负责由酒泉经金塔而达鼎新的邮件传递，三天一班。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匪患频繁，来往公文增多，加之，国军驻防额济纳旗，该旗增设邮局，邮件传送往返需要两个星期。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设鼎新邮政代办所，但由于经费无法落实，由国民党党部社会服务处暂时代理邮政事务。民国三十五年（1936年）夏，邮政业务由附设银行办理。鼎新邮局每年春冰消融及冬令冻河之时，不能行走，转由高台处送往邮件，需要二十多天，因邮政延迟关系，又在河西营增置电话一处，每有消息的时候，由负责人员传送县政府，大大方便了邮件的传送。1949年，金塔、鼎新两县的邮政局代办的函件种类有信函、明信片、新闻纸、书籍印刷物、贸易契、商务传单、货样、平快、代收货价、挂号信函、存证信函、存局候领邮件、保值函件、保价信函等。各类函件都可按挂号交寄。信函、明信片、新闻纸、书籍印刷物、贸易契、商务传单、货样等都可按航空交寄。除保值、保价和代收货价邮件外，均可按快递挂号交寄。

电信

民国前，金塔没有电信机构和设备，依靠烽燧传递信号。金塔、鼎新两县电信最早始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是年10月，金塔至营盘通电话，

有电话单机2部。电路架至天仓营盘收报后，再有专人传递鼎新县政府。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鼎新县城内设无线电台1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鼎新县政府开始设立收音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因经费缺乏而停办。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鼎新县政府设立电台一处，用于收集情报。在城东门外关岳庙又设防空电台，专用于接收防空情报。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又在营盘设立电话站，以接听金塔电话而后再传到鼎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4月，金塔县城内设无线电台1处，多为军用服务，每日可与兰州、酒泉联系。



第七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教育

民国时期，政府重视教育，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所以，民国时期的教育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立时期。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民众教育等初步形成了现代教育体系框架。

中小学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教育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学堂名称一律改为学校，初等小学校允许男女同校，废止小学读经。高等学堂更名为高级小学校。同年9月，民国政府颁布“壬子学制”，规定小学修业期限为初级四年，高级三年。1916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施行细则》，其中明确规定小学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并要求各县改初等小学校为国民小学校。1923年，实施“壬戌学制”，甘肃省教育厅制定《甘肃实施新学制标准》，将高等小学校更名为高级小学校，把国民小学校更名为初级小学校，学制六年，实行“四·二”分段，即初小四年，高小两年。改高小“格致课”为“博物课”。同年，省教育厅饬令各县小学，把国语作为鉴定小学教员的主要科目，并在国语课中推行了注音符号，以正方言。学生作文提倡摒弃“八股文”模式，推广白话语体文。1925年，金塔、鼎新两县正式实行小学“四·二制”，当年小学“修身”课改为“公民”课，“博物”课改为“自然”课。1926年《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规程》颁布，将初级小学四年定为义务教育阶段。

在课程设置上，1912年，初等小学开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七门课程，高级小学增设历史、地理、理科等科目，另

规定男子加授农业，女子加授缝纫，条件允许者可增加英语。城镇各小学按规定进行教学，农村小学多带私塾性质，仍以“读经讲经”为基本课程。小学实行“训育”制度，由校长、训育主任、级任教员组成训育系统。1927年，国民党推行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党化教育”，在小学教学中加授“党义”课，开展“党化教育”，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1930年，把“三民主义”作为训育方针，以“日常生活习惯”“社会公德”和“处世之道”为基本内容，对学生进行“品德”训练。1933年，颁行《小学公民训练标准》，倡导以“发扬民族固有道德”为目标，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中心内容的“公民训练”。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全国小学“将党义教材渗入各科教学中，而不独设一科”，要在统一意志原则下，统一学生的信仰，实行所谓“党化教育”“政治训练”“道德规化”。在此原则指导下，强化“党团组训”“军事训练”“训育管教”，渗透“反共防共”和封建专制等内容。确定“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为共同校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青年学生信仰的准则，并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其时小学课程为公民训练、卫生、体育、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劳作、美术、音乐等十科。1936年和1943年，对小学课程进行修订，规定的课程是初级小学设国语、算术、常识、劳作、音乐、体育、美术共七科；高级小学增设公民知识，改常识为历史、地理、自然三科，共十科。

清末民初，金塔县将社学和义学全部改为国民小学堂，民国三年（1914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又改学堂为初级小学校，金塔共改建初级小学校24所。民国元年（1912年），将金塔柳堤书院改名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名县立高级小学校，高初学生并收。民国十七年（1928年）奉令改为第一高等小学校。民国六年（1917年）以前为正副教习制，民国六年（1917年）以后始设校长制。历任校长民国七年（1918年）为袁风翔，民国九年（1920年）为段生彩，民国十年（1921年）为李经年，民国十二年（1923年）为宋执中，民国十七年（1928年）为李上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为公兆麟。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教育局划分全县为二个学区，共有53所初级小学校，其中一区33所，二区20所，呈报在案。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县长蒋绍汾分别在一区梧桐乡大坝庙创建第一区完全小学校，二区三多乡中社学创建第二区完全小学校。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经县政府批准，在原东坝五分（今中东镇屯庄村）成立了西区乡中心国民小学（即第三完全小学）。第三完校的前身是原东坝五分屯庄初级小学，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拔贡王起芝创立培英义学，民国三年（1914年）庠生王登科改办为初级小学校。

民国十八年（1929年），县长郑乃谦在教育街创办县立妇女求知学校，民国十九年（1930年）停办。民国二十年（1931年），县长陕祝南在城内隍庙街创建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校。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金塔县提拨救济院及同善社经费500元，在城南潮音寺设孩儿所1处，入学幼儿17人。一年后停办。这是本县幼教事业的开端。

鼎新县（原毛目县）于民国元年（1912年），始成立高等小学堂，校长由驻防都队营官周炳南兼任。民国二年（1913年），省政府委任王懋德为校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鼎新城乡所设学校有十余所。

教职员的待遇，民国前中期，高级小学校及初级小学校均有学地，学地仍按亩收租，将地租作为学校办公费及教职员之薪金。据《创修金塔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金塔县各学校的学地分别是："县城高级小学一百三十亩；新山乡初级小学三十亩；金东金西乡初级小学八十五亩；梧桐乡初级小学三十亩；户口乡初级小学五十亩；三塘乡初级小学五十亩；夹营乡初级小学五十二亩；大有乡初级小学五十亩；三多乡初级小学一百五十亩；四维乡初级小学九十五亩。两区共计学田七百二十二亩。"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职员待遇实施办法》，规定地方国民学校的教职员薪粮由地方筹集，标准是校长每年10石小麦，级任教师每年8石小麦，科任教师每年7石小麦。学校办公费用由三科拨发现金。

民众教育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主要是为了弥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对

失学民众进行文化补课教育，使社会一般民众及失学青年，都有学习知识的途径。1924年，甘肃省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要求各地组织平民教育促进会，试办平民教育学校。1926年，甘肃省政府通令各县，凡机关、商会、会馆均要附设平民学校。利用原有房屋，由本部职员担任教员，招收对象为平民或无力求学者，教材为《贫民千字课》。平民学校男女分班，年龄不限，免收学费，每天学习1~2小时。

1933年，甘肃省教育厅制定《甘肃省各县民众学校办法大纲施行细则》，确定民众学校以“根据三民主义授予年长失学者以简易知识、技能，使之适应社会生活为宗旨”。设置识字、“三民主义”、珠算、乐歌等课程。同时要求各级教育机关、学校都要附设民众学校，由教职员和高年级学生担任教员。

民国时期，金塔的民众教育机构有：1.民众讲演所，在北关中山街。民国十四年（1925年）县长齐溥设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教育局长李上林呈请整顿，搬迁到北门外，改名通俗讲演所，委任代用讲演员蒋彦棠一人。2.民众阅报室，在教育街。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长黄文中创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教育局长李上林改设为民众阅报所，移设到瓮城内。并拟定规则轮流派管理人员，并附设民众问字代笔处。3.图书馆，在儒学街。用前文昌宫的房子，民国十六年（1927年）教育局长何培基设立。4.中山俱乐部，在隍庙前楼上。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长黄文中同教育局长何培基创设。5.公共体育场，在县政府西辕门外。民国二十年（1931年）县长陕祝南创设。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县长蒋绍汾会同教育局长李上林改设于旧库房门前，加以扩充，占地有六七亩。6.教育馆，在隍庙内。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长黄文中创设。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教育局长李上林呈准县府，改设于库房内，奉令改名为“民众教育馆”。7.平民学校，在县政府案牍庙内。民国十四年（1925年）县长齐溥创设。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长黄文中改名为县政府民众学校。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因经费短缺而停办。

第八节　民国时期金塔的文化

文学

民国时期，金塔境内的文学主要以诗歌为主。民国时期，是金塔诗歌创作的萌芽期，也是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以描写金塔自然风光、乡土风俗、生产生活为主。代表人物是民国七年（1918）和民国十一年（1922）两次担任金塔县知事的李士璋。李士璋在任金塔县知事期间，勤勉敬业，体察民情，几乎走遍了金塔的乡村。他的诗歌既有描写金塔自然风光的，如《丁巳年四月初抵金塔口占》：

沙岗环抱路迂回，忽睹天然画景开。烟树平川将郭绕，旌旗小队出林来。道旁有寺浮孤塔，郊外何年筑将台。此日下车须记取，桃花满县要新栽。

又有描写古迹名胜的，如《游青山寺》：

游青山寺

大漠平沙莽万重，是谁鞭石涌奇峰。
居然鹫岑盘空峙，借少螺鬟点翠浓。
复道跨虹新结构，危楼招鹤古仙踪。
青山变作童山象，一炬摧残胜祖龙。
怪石嵯峨一径开，谁知中有好亭台。
笙歌沸水迎风起，士女如云逐队来。

隐约虹桥孤寺掩，高低螺髻乱峰堆。
年年盛会逢初夏，我是登临第一回。

既有反映农事活动的，如《勘水》：

勘水

洪水横流弱水西，栏河未固溃金堤。
下民应有其鱼叹，中泽微闻哀雁啼。
鸦背寒翻红锦绮，马蹄踏碎白玻璃。
荒凉景象谁曾见，人在高房似鸟栖。

《凿冰修渠》：

伏秋汛涨寻常事，谁信冬来灌百川。
一片汪洋成泽国，数家村落变江田。
凿冰难透波心月，压草终浮水底天。
筑堰未成堤又溃，焚香祷告意悽然。

也有反映风俗民情的，如《得子》：

得子

筵开汤饼客盈门，怕听谀辞心自扪，
保赤深惭民父母，居官几见好儿孙，
赢金贻子知非计，经训传家是至音，
春笋惊雷芽甫茁，还需培植获深根。

《为母祝寿》：

云敖雅奏响钧天，酒进麻姑列绮筵。
竹报添孙称再庆，桃蟠结子祝千年。
与迎养援嫌家远，花县讴歌颂母贤。

安得慈颜亲见此，瑶池盛宴醉群仙。

当时最著名的诗歌当属李士璋所做的《金塔八景》：

金塔凌云

塔势巍然若建瓴，晴云一抹接遥青。
夕阳映作擎天柱，碧落高撑注月瓶。
几度题名来雁字，何人写罢换鹅经。
萧间古寺行踪少，细听松风响铎铃。

玉山积雪

晶莹山色接遥天，不是云浮玉垒巅。
太古千年留积雪，边城一带拥祁连。
晴开远岫明如练，月照高峰白似莲。
胜过终南阴岭秀，霸桥回望耸吟肩。

古城幻景

唱罢鸡声曙色开，遥空隐隐显楼台。
蓬瀛海市原虚幻，城郭人民自往来。
一霎昙花成世界，千年废址没蒿莱。
沧桑已变形犹在，古意沧茫化劫灰。

高庙清钟

巍巍庙貌跨城墉，树色苍茫起暮钟。
几点寒鸦翻夕照，一行征雁写秋容。
鲸鉴响彻三更月，鹤梦惊回万壑松。
安得痴人齐唤醒，清声破晓睡方浓。

北海晴烟

一片清漪断复连，北邻瀚海浩无边。
班超出塞三千里，苏武看羊十九年。
水草萃成游牧地，烟波远映蔚蓝天。
寻源何必探星宿，自有汪洋万斛泉。

西城古柳

苍然古木晚烟昏，可是当年细柳屯。
营已无存怀亚父，树犹如此泣桓温。
枯枝映月悲羌笛，老干拿云尚壁门。
故垒萧萧余荫在，夕阳红透暮鸦翻。

青山垒嶂

怪石嵯峨一径通，山巅飞阁望玲珑。
何来峻岭蹲灵鹫，高架危桥跨彩虹。
绝壁俯窥青涧水，栖霞中有翠微宫。
苍茫四顾空依傍，万里平沙夕照红。

黑水环流

西渡流沙任所之，黑水应不到三危。
谁言水道经梁域，曾过山丹读禹碑。
讨赖名川劳考证，通天别派更支离。
题於八景增惆怅，始信重来为补诗。

史学

民国时期，由于近代文化教育的兴起，人们对史学的研究与整理也日渐重视，一些官员、文人着手撰写反映金塔历史的著述。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金塔县成立县志局，由时任县长周志拯自兼总编，赵积寿、刘怀基、王安世等三人担任编纂事宜，编纂了《创修金塔县志》，内容分为舆地、人文风俗、建设、民政、财赋、教育、职官、选举、人物、金石碑铭、诗文等十一卷。重点记述了清代以来金塔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民族、风俗、物产、教育等。对于研究金塔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鼎新县聘前参议员蔡廷孝为总编辑，编纂了《新编鼎新县志》，分建设、教育、军政、交通、职官、序记、金石、艺文、风俗、史记等十卷，详细叙述了当时鼎新县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等方面的情况。

戏剧

民国时期，金塔地方群众组织的草台班能随时召集登台表演的有西红戏班、大口子戏班、双桥班、尕保子戏班，高台县艺人冯大净的戏班也常被邀请来演出。演出剧目多以秦腔《铡美案》《烙碗计》《天门阵》等传统戏为主，并配合部分眉户剧相间演出。

居延汉简的首次考古发掘

1927年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恰值此时，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提出到我国西北部继续他从前数次所做的考察，来与协会商议合作办法，经过十余次协商，于4月26日订立合作办法，协会接受郝定博士的补助，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参加人员，中方有北大教授、哲学历史学家徐炳昶，清华兼北大教授、地质学家袁复礼，北大助教、地质学家丁道衡，水利工程师、地图学家詹蕃勋，历史博物馆摄影师龚元忠，北大学生李宪之、刘衍淮、马叶谦、崔鹤峰，以及后来加入的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植物学家郝景盛、刘慎谔，气象助理胡振铎和徐近之等人。瑞典5人，即兰理训、郝默尔、那林等3名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贝格曼，以及地理学家斯文郝定。丹麦哈士纶1人。德国11人。由徐旭升和斯文郝定任团长。这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次以中国为主，与外国平等合作的大型科考团，先后共有团员 38 人，其中科学家 30 余名，中外各半。

考察团成立后，于 1927 年 5 月 9 日从北京出发。6 月中旬，科学考察团齐聚包头，组成了有 60 多人、近 300 匹骆驼的庞大队伍，向中国西北部继续进发。此后几年间，考察团在中国西北部约 460 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实地考察持续至 1933 年。

1927 年 9 月 28 日到达额济纳旗，此后兵分两路，一路考察额济纳河下游及索果淖尔附近；一路考察额济纳河上游，直到金塔鼎新。10 月，黄文弼在土堡处发现了五枚汉简，这是居延汉简出土之始。这次考察完成了地形及古遗址分布图的测绘，此图被称为居延考古史上的第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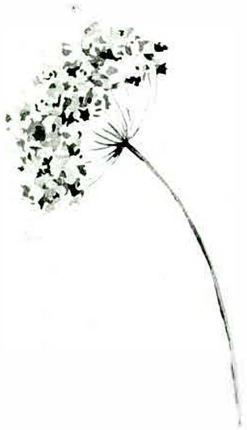
1929 年，贝格曼重返额济纳河地区进行发掘。1930 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沿弱水两岸，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今甘肃省金塔县鼎新），以及在布肯托尼与博罗松治之间，发现有汉代的塞墙和障堡亭燧，其间共有 3 段塞墙、39 个烽台、2 个城和 4 个障，在 463 个灰坑中采获了一万多枚汉简。其中在金塔县内的肩水金关故址共出简 850 多枚，简中的年限集中于公元前 82 年—4 年，同时出土的还有木、竹、角、陶、铁、芦苇、葫芦等器以及皮革、货币、织物。大湾城故址城区及其边沿共出汉简 1500 枚，简中的年限集中于公元前 86 年—2 年，最晚的是公元 11 年，属昭帝至王莽时期。据邮程记录：大湾城是肩水都尉府。大湾城出土有很多“卒马田官”的记载、田卒名籍、牛籍以及衣物簿等，附近有古代田渠遗迹，据考证这里曾是一屯田区。

居延汉简的年代，上起西汉征和三年（前 90 年），下至东汉阳嘉二年（133 年），内容非常丰富。有书籍，如《尚书》《仓颉篇》《牛子》残篇，有诏书、律令、檄书、牒记、品约、劾状、爰书、簿牍等；字体有小篆、隶书和章草；形式有方策、简、檄、标签、函检、觚、竿木等。居延汉简中蕴涵着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补正文献记载，如烽和燧的应用、亭燧与障塞的区别、侯官的组织、戍卒的来源及分工、戍卒及家属的生活、屯田制、农民起义的新材料以及河西经济生活等。居延汉简是 20 世纪上半叶在酒泉发现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简牍，被誉为 20 世纪初中国“四大考古发现”之一。居延汉简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研究，从而将简牍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

一步。

居延汉简的发掘，由于方法得当，不但发掘数量多，而且比较完整，成册的较多，这为简牍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极高的准确性。

作为出土的一种历史资料，居延汉简虽属历史文献学的范畴，但是它内容丰富、繁杂，涉及范围广，自身又具有独立的文化内涵。这些文物及长城、烽火台、关隘要塞遗址，对人们重新认识居延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显得尤为重要。金塔有令世界瞩目，被中外学者称为汉代档案库的肩水金关遗址及肩水金关汉简，轰动海内外。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西北边塞的守御器备、烽火制度、管制文书、亭障遗址等方面进行研究，大大充实了金塔历史，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的难题。目前，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第九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人口

民国时期，由于共和政体的确立和民主科学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给人口的发展带来福音。同时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逐渐兴起，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等，都有利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但由于民国时期，金塔、鼎新自然灾害不断，疾病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率高，加之战乱和国民党抓兵要差，人口发展缓慢，基本处于“高出生、高死亡”的状态。据统计，民国元年（1912年），王子庄州有1443户，5810人；毛目县丞1404户，4941人。人口总数比清嘉庆年间少很多，但与清宣统元年（1909年）相比，又有较大回升。民国时期的各主要阶段，金塔、鼎新两县的人口情况如下：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两县4634户30044人，户均6.48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增加为56000人，其中金塔县36000人，鼎新县20000人。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人口有所增长，达到5388户41503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为4134户，40492人，其中金塔县3838户30382人，户均10.17人；鼎新县1296户10110人，户均7.08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人口减少为38187人，其中金塔25755人，鼎新12432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两县人口增至43592人，其中金塔31230人，鼎新12362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有6991户451966人，其中金塔县5035户31968人，鼎新县1956户13228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5573人，其中金塔31992人，鼎新13581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金塔县6238户34715人，户均5.57人；鼎新县1949户13433人，户均6.89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金塔县人口达到6358户42991人，户均6.76人；鼎新县人口达到1935户13835人，户均7.15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6月，全县人口为6352户44586人，户均7.02人。鼎新县有1930户13902人，户均7.20人。

1945年金塔县、鼎新县人口年龄结构表（%）

年龄组（岁）	0	1—5	6—11	12—17	18—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5	46—54	55
金塔县	2.85	16.58	12.43	7.01	3.11	6.30	6.75	7.75	8.53	10.47	8.81	9.42
鼎新县	4.62	16.53	13.67	9.96	3.02	7.58	6.62	6.32	6.98	13.57	5.07	5.07

1945年金塔县、鼎新县人口婚姻构成表（%）

婚姻状况	15岁以上的人口数	未婚	已婚	无配偶	离婚	不明
金塔县	19371（人）	11.84	80.62	5.21	——	2.32
鼎新县	7137（人）	11.71	81.71	5.58	——	0.94

1945年金塔县、鼎新县人口职业结构表（%）

区县	总人口数为100		适龄人口总数为100		就业人口总数为100								
	职业适龄人口%	未达职业年龄人口%	失业无业人口%	就业人口总数%	农业%	矿业%	工业%	商业%	交通运输业%	公务%	自由职业%	人事服务%	其他%
金塔县	66.50	33.50	44.81	55.19	65.25	0.09	19.24	4.12	0.12	8.02	0.46	0.61	2.09
鼎新县	65.47	34.53	9.35	90.65	95.99	0.10	0.44	0.68	0.88	2.32	0.14	0.19	0.08

1945年金塔县、鼎新县人口文化结构表（%）

区县	未达教育年龄人口	应受教育年龄人口	大学毕业	大学肄业	高中毕业	高中肄业	初中毕业	初中肄业	高小毕业	高小肄业	初小毕业	初小肄业	私塾	不识字
金塔县	19.56	80.44	0.05	0.06	0.28	0.01	0.16	0.40	1.24	0.45	0.30	5.15	9.76	62.57
鼎新县	21.15	78.85	0.02	——	0.01	0.03	0.42	0.33	0.54	0.45	0.27	12.97	1.82	61.99

第十节　民国时期的金塔宗教

民国时期，佛教、道教等在金塔、鼎新两县大肆传播，信教人数众多。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也有传播，但信徒较少。

佛教

民国时期，金塔、鼎新两县佛教较为兴盛。当时金塔境内保存的佛寺有塔院寺、青山寺、天泉寺等，佛教庙宇达到近百座，遍布县城和乡村各地。

由于长期的战乱，人们为了祈福保平安，每逢朔望、神佛圣诞节日，便到寺庙，烧香许愿、祈福消灾。塔院寺、青山寺都有佛教盛会，届时戏剧杂耍、商贾贸易云集，形成一定规模的贸易市场和传统的文娱集会，成为金塔的宗教活动中心。

坐落在县城东南 2.5 公里处的塔院寺，经清代和民国时期多次修葺后，到民国后期，有大殿三楹，中殿三楹，前殿三楹，左右廊房、山门、乐台具备。山门前，有两个石狮子，进了山门，步入前殿，两侧供四大天王，有手拿宝伞的多闻天王、怀抱琵琶的持国天王、手持宝剑的军长天王和手掌宝塔的托塔天王。四位神像脚下都踩小妖魔。出了前殿，东侧为东狱天齐殿，内塑地藏菩萨、东狱天子两位神像，左右两侧墙上画有穷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卞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转轮王，通称十大阎罗王，并画有十八层地狱壁画；两侧为三霄娘娘殿，塑有云霄、碧霄、琼霄三位神像。中殿上顶有紫牙楼，殿内正面上方塑有弥勒佛、韦陀菩萨神像，左右两边塑有十八罗汉。走出中殿，两旁有约两米多高的大理石石碑，前后都满刻着碑文。跨过院内、花园就是大殿，大殿为塔院寺的主殿。

大殿二梁上，悬挂着清朝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的八块大匾。墙壁两旁最上面画有风神、雨神、雷公、电母神像。大殿内塑有释迦牟尼像，头顶大鹏，陪站两善两恶四位菩萨。右面塑有骑像的普仙菩萨，左面塑有骑狮子的文殊菩萨，最后一个神像是观音菩萨，面向金塔倒坐着。虽然寺院从人物雕塑、壁画艺术、碑文、匾文记叙看，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它反映了历史，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有很高的文物研究价值。

“金塔”坐落在塔院寺大殿后院中间，是塔院寺的主建筑，顺着麻子石（花岗石）石条台阶上去，是用方砖和麻子石条镶成的塔座，四周有一人多高的围墙。塔的造型优美，工艺精细，套转图案设计巧妙，并有独特风格。塔顶有木质的8个角，每个角上吊着一个风铃，一刮大风，塔角风铃声和寺院庙角风铃声汇合在一起，声音清脆悦耳，仿佛是一首节奏匀称、美妙动听的乐曲。

塔院寺内，有生长百年的榆树、杨树，还有数棵挺拔翠绿的松柏和两架水葡萄。木栏花池里栽有红、黄玫瑰，芍药，兰草等花草，特别是玫瑰花开季节，香味扑鼻，使人觉得格外愉悦。巍巍宝塔在花、树、草的映衬下，四季各有不同的神采。



塔院寺“金塔”

塔后有农田和花果园，每到春夏，这里景色迷人，五彩缤纷，使塔院寺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塔院寺中，还有分别吊在娘娘殿和上殿钟架上铸有正、草、隶、篆四种字体的两口大钟，钟的两耳各有不同的音响，钟声清脆悦耳，后音长，只要僧人敲钟，方圆一公里的庄户人家均可听到。

1944年，当时的县长阎重义，为了让众人保护古迹，在寺院山门正中，署名悬了“金塔寺”红堂金字大匾一块。山门前百米远还有一个戏台，在清朝和民国初年，每年农历三月十八、四月八过庙会，唱大戏，这里热闹非凡。

后来，由于金塔干旱缺水，庄稼连年缺水，老百姓盼水心切，又增修了龙王庙、文昌庙，期望龙王多行水，请来文昌振兴教育。

道教

民国时期，金塔的道教通过小叉庙塔塔主，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三代传人陈来全在清朝中后期的大力传播，道观已遍布城乡各地，信教群众达到了一定规模。



第十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金塔的早期活动

顾元勋奔赴延安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经过长征在会宁会师，完成了中国革命大本营向西北的战略转移。11月，红四方面军一部21000万余人奉中央的指示组成四路军，进入河西地区，开始了开辟河西根据地、打通远方（国际支援通路）的艰难历程。西路军与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展开鏖战，红军将士英勇拼搏的精神和气概威震四方。当红军进入临泽、高台时，国民党金塔县政府要员、地方劣绅及军警惊恐万状，县长周之拯逃往额济纳旗，县城空虚，县政府停止办公近两个月。金塔各界群众因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一时间人心惶惶，而一些对共产党和红军有所了解的人则备受鼓舞。年底，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红军西征失利，国民党金塔县政府恢复办公，地方秩序又逐渐恢复平静。

1936年11月至翌年4月，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转战半年多时间，与马家军展开浴血奋战，最后绝大部分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红军西征失利后，十余名失散的红军战士经历艰难曲折，先后流落到金塔、鼎新境内，其中有少数是共产党员，如原红十三军二六七团卫生队队长金仿贤，原红军保卫局某营三连连长王中元等，这些失散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在特殊险恶的环境下不失革命气节，他们虽然没有开展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但在谋生的同时，隐蔽地采取各种方式向当地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革命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949年后他们才公开身份，参加工作，受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照顾。

1938年5月，金塔籍青年顾元勋，因在甘肃省立酒泉师范读书期间，受该校进步教师夏耕（字荫轩，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北京“一·二九”学生

运动参与者，1937年离校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影响，思想进步。为寻求光明，带着夏栩写给他的信，离开家乡到兰州，经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介绍，辗转赴延安参加八路军，投身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同年6月，顾元勋在瓦窑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金塔人中最早在外地参加革命并加入党组织者。

由于受中国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金塔籍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据记载，有37名金塔籍烈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张元昌、吕丰柱、陶永儒、阚长国、焦存、王维礼、伊佩人、芦学会、卜正英、焦云、殷大忠、潘登喜、郭正芳、张德和、卢月广、张保贤、边玉寿、帅治国、王永贵、席上周、王世昌、李正保、魏兴亮、马生海、何洪玉、裴登熬、肖宗贤、杨源基、李洪珍、侯世英、陈玉贞、刘典申、张世杰、达兴山、李生财、肖国英、柴武亮。这些烈士，有的在刀光剑影、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有的在反动派黑暗的牢房里、血腥的刑场上，面对敌人的酷刑、枪口、屠刀，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全人类的解放，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人民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丰功伟绩将与世长存、永垂不朽。

王华开在鼎新的革命活动

王华开，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洲湖镇潭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8月，年仅14岁的王华开在家乡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王华开随红一军团开始长征，1935年底，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红军大学”（即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初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底调中共中央敌区工作部。1940年1月，被组织选派到西安、兰州等地，协助共产国际的苏联同志进行秘密工作。离开延安前，中央有关领导交给他一封信，指示他去西安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找一个化名孙平的苏联同志，肯接受孙平的领导，进行地下工作。奉孙平的指示，王华开与兰州地下党员周福生接上了关系，按照组织安排，王华开与周福生、张永祥三个组成特别小组，

由苏联方面提供经费和活动器材，在兰州城内以百货生意为掩护，建立电台，进行秘密工作，具体任务由苏联莫斯科安全检查委员会安排。从此，王华开与中共中断了联系，成为特殊环境下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1942 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王华开和战友在兰州工作环境恶化，共产国际指示他们停止工作疏散待命。之后王华开随周福生的朋友、鼎新卫生院院长王蕴璞，来到偏远的鼎新，以护士职业为掩护，等候组织指示。1944 年下半年，王华开与周福生联系中断，得不到组织的指示和消息，于 1945 年冬天乘国民党政府在鼎新县征召青年军的机会，报名应征，冒险随新兵去兰州寻找组织。找到周福生后，向他汇报了在鼎新工作的情况，此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周福生仍为苏联方面工作，苏方让周福生转告王华开等候安排。不久，王华开仍回鼎新，临行前接替孙平的谢列克（苏联人）与王华开会面，指示他回鼎新后不要远离卫生院，找个女人安个家，以便于今后开展工作，并指示王华开设法到中蒙边境的额济纳旗，了解那里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和蒙民情况，以后由苏联方面和他单独联系。回鼎新后，王华开按照苏联方面的指示做了一些工作。1946 年和 1947 年王华开两次找机会到二里子河，详细地了解了那里驻军的布防情况和当地蒙民的情况，并将情况向苏联方面派来鼎新找他的同志做了汇报，苏联方面指示他不要开展活动，继续隐蔽待命，从此苏联方面再没派人来与他联系。在远离党组织的艰难环境中，王华开犹如离群的孤雁，度过了艰难困苦的七年岁月，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除了做好组织上布置的事务外，还利用职务之便向当地同事和群众宣传过进步思想，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有人曾向酒泉专员分署写信，告他有“赤化”思想，是个“赤化分子”，幸有鼎新卫生院的院长和同事遮掩才免于劫难。1949 年 9 月，酒泉解放前夕，国民党鼎新县县长陈世光，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了解，慌忙携带家眷外逃，代理县长王世恭举棋不定，鼎新县人心惶惶之际，王华开通过朋友跟一些鼎新县上层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代理县长王世恭终于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王华开参加了迎接和平解放的准备工作，他积极联络老师和青年学生，张贴标语，发动群众，迎来了鼎新的和平解放。

酒泉和平解放后，王华开参加了工作，先后任玉门石油管理局服务处副处长、处长等职，1960 年 10 月，调到国家安全部工作。

第十二节　金塔、鼎新两县和平解放

金塔县和平解放

1949年8月26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9月初，第一野战军所属第一、二军团迅速挥师西进，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率残部向西溃逃。散兵游勇到处可见，匪兵抢劫不断发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国民党金塔县县长马元鹗派人四面打探消息，深感形势十分不妙，便秘密制作驼轿，购买汽车，准备逃往额济纳旗躲避。与此同时，国民党天水骑校、兰州警校以及河西总部警卫团残部退至金塔驻守，马元鹗忧心忡忡，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便与自卫队队长向国华等人秘密商讨出路问题。认为逃跑是死路一条，只有维持好地方治安，保护文档和物资财产，减少人民损失，向解放军起义投诚，才是唯一出路。9月23日至24日，马元鹗连续四次召集县政府、参议会、自卫队、警察局以及补给站、骑校、警卫团等单位负责人参加治安会议，商讨金塔治安问题。要求各机关职工继续坚守工作岗位，有工商会通知各饭馆及大小商铺照常营业，不得擅自停歇，并责令自卫队、警察局联合组成巡查队，轮流训究可疑分子。同时，派人保护粮仓，防止坏人趁混乱之际开仓抢粮，并指示水利专员吴永昌、水管所所长李明扬等人，一定要保护好水库，继续搞好水库溢洪道维修施工，严防散兵和地方反动分子破坏，并给水管所人员配发了枪支。之后，派警察局长张明鉴将亲笔信送往河西警备总部政工处，联系起义投诚事宜。而此时，国民党金塔县参议会副会长吴国鼎、国大代表李尚林等人向国民党散兵游勇送吃送喝，互相勾结，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为了防止吴国鼎等人破坏投诚计划，马元鹗一边派人监视吴国鼎等人的行为，收容散兵，组织看押，一边联系骑校、

警校、自卫队配合把守城门，严格盘查，严防扰乱分子进城。9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西警备司令陶峙岳及国民党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领衔通电起义，河西重镇酒泉宣告和平解放。同日，金塔县县长马元鹗顺应历史潮流，做出抉择，在黎明前领衔起义，实现了金塔和平解放。

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司令王震、二兵团司令许光达亲临酒泉，国民党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西北军长官公署参谋长彭铭鼎，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河西总部参谋长，九十一军参谋长，一二〇军参谋长，各师师长、团长、宪兵团长等，率所部38000万余人通电起义，彭德怀司令通电嘉奖。是日，国民党金塔县县长马元鹗向驻守酒泉的人民解放军发出通电，电文如下：

代电：民国卅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钧鉴：抗战八年，全民饱受疾苦。胜利以还，同胞渴望解放。元鹗谨率全县人民及本府职工，以及本县期待解放同胞，共同维持地方治安。荣祈派员莅县，指示一切。以便有所遵循为祷。代理金塔县县长马元鹗，表示渴望和平迎接解放的意愿。

9月26日，马元鹗率国民党金塔县党部副书记吴崇德、县参议长李经年、水利专员吴永昌、县中学校长顾子才联名发出起义电。电文如下：

代电：民国卅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酒泉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钧鉴：抗战八年，人民深感痛苦。内战日久，全国渴望解放。谨派员会同本县人民代表吴崇德、李经年前来晋謁崇阶，并祈派员来本县绥靖地方，救民水火为祷。马元鹗、吴崇德、李经年、吴永昌、顾子才叩申。

9月27日，金塔县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复电马元鹗，电称：

金塔马代县长：

你们和全县人民拥护和平，拥护人民解放军，望你和各机关各界人士，负责保护城市及一切财物，维持地方秩序，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

马元鹗接到复电后，即派县参议长李经年、县府财政科科长何如圭等为代表，前往酒泉，向人民解放军陈述地方情况，并安排单位和动员群众张贴标语，准备慰劳品，迎接解放军接管。同月28日，马元鹗派代表李经年、何如圭等人，到酒泉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第三政治部，陈述了金塔县的地方治安状况。三军军长黄新亭、政治委员朱耀照复电嘉勉，电称：

金塔县马县长鉴：

你府何科长及李代表已于二十八日抵达本部，已将你县各种情况面谈。此种为人民负责的精神，颇感欣慰。尚望各按原来职务继续工作，本军委派陈桂林同志率部队前往维持社会治安，以防散兵溃匪扰害人民。请予以接洽，并共同为金塔人民安全而努力。

黄新亭　朱辉照

同日，人民解放军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三营九连指战员奉命抵达金塔执行接管任务。县政府机关职员、地方绅士、市民和学生在县城南门外候迎，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即日下午，解放军九连三排驻金塔县城，第一、二排向鼎新县进发。9月30日，酒泉军管会委派马能元、时思明等24名工作人员来接管金塔。



金塔旧城南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金塔县召开了由职员、市民、解放军驻军、各界人士共300余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大会通过了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电文如下：

代电：三十八年十月一日

酒泉人民解放军军管会转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钧鉴：内战日久，人民极感困苦。西北解放，万民共表欢腾。本会同仁

瑾以热烈情绪，向钧座及各位同志致敬，并望早日解放全国，成立富强康乐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金塔县各界欢迎解放胜利军大会叩申。

1949年10月4日，金塔县新政府召开了交接座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时思明、马能元、黄镇、何珍、张进学、王学义，旧政府科以上人员马元鹗、陈甲三、何如圭、席鸿业、贺彰善、殷柏山、姜昌宏、何俊彩、向国华、柴如高、贺凤彩、何多仁、孙齐国、杨滨等。马元鹗汇报了金塔县情况，时思明、马能元分别代表新政府和党组织讲了话。会议主要阐明了我党的政策与旧政府人员安置及交接的有关问题，要求各科室人员在未确定新工作之前，仍在原机关照常工作。会议宣布了上级的任命通知：马能元任中共金塔县委书记，高文斗任副书记，时思明任金塔县人民政府县长，马元鹗任副县长。同时宣布对旧政府人员，要根据情况大部分留用，对他们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根据上述精神，至10月13日，交接工作全部结束。全县接收约44000人，辖2乡25保，耕地17万亩左右。接收县自卫队人员141人，马33匹、武器步枪97支、轻机枪1挺、司登式步枪1支、连枪1支、发射桶2具、子弹1440发、手榴弹450枚。警察队48人、步枪17支、子弹1213发、手榴弹100枚。电话机6部、电台1部。接管粮食（军屯粮、田赋粮、公教粮）计6721124市石，银圆1836.95块、纸币656275元。接收两个乡公所土布196.33丈。接收的机关有国民党县党部、县参议会、农工会、卫生院、司法处、地政处、金塔补给站。登记国民党员31人，三青团员23人，特务2人，散兵游勇33人。

在旧人员的安置处理上，采取自愿的原则，一部分留用，一部分送学校，一部分允其归家。建设科长、教育科长、卫生院长、自卫队长仍留原职。警察局长、秘书遣返回家。

1949年10月16日，中共金塔县委召开了第一次武装会议，决定扩大地方武装力量，金塔县自卫队原有80人，新增130人，扩至210人。警卫队原有40人，新增20人，扩至60人。新的武装组织的充实和壮大，对于打击土匪散兵骚扰破坏，推翻保甲制，组织农会，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反压迫，反剥削，保卫巩固新政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此，金塔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鼎新县和平解放

鼎新是一个偏僻的农业小县，人口不足两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地痞恶霸横行乡里，土匪骚扰抢劫，人民饱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给这里的劳动人民带来了希望。解放大军挥师西进，解放了河西张掖以东地区的时候，鼎新县县长陈世光（甘肃山丹人），看到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惧怕解放军来了会被杀头，就购买了12峰骆驼，准备携眷外逃。1949年9月20日，传闻解放军就要挺进酒泉和金塔，陈世光匆忙雇用农民宋吉能当驼户兼向导，驮上家私和家眷，带上同乡亲随陈立志、陈立民、王元善等人，离开鼎新，欲绕道额济纳旗逃回山丹老家去。陈世光临走前，找来县政府秘书王世恭等人，安排他走后由王世恭代理县长职务，张建中任秘书，应付处理县府事务，维持秩序。陈世光走后，王世恭感到压力很大，他明白败局已定，解放军很快就要来了。他对解放军的政策已有耳闻，但又有疑虑和惧怕心理，怕解放军来后对旧政府的人员不能宽容，受到惩治。当时，鼎新卫生院护士张鸿春（真名王开华，共产党员，1942年前在兰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3年初工作环境恶化，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指示，由兰州到鼎新疏散隐蔽待命，1945年后与组织失去联系。1949年后调到北京国家安全部工作）、

货郎殷仿贤（红军流落战士，共产党员，1949年后任鼎新县一区副区长等职）等人，看到当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而出现的人心慌乱现象，看到代理县长王世恭举棋不定、不知所措的局面，便秘密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让群众知道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王世恭经过深思和权衡，决定在解放军到来之前维持好局面，守好摊子，把城市和资产完整地交给解放军，争取立功赎罪，并采取了几项紧急措施：(1) 责令县政府各科室人员坚守岗位，照常工作，保管好所有档案资产。(2) 联络自卫队队长、警察队警佐，维持好城内秩序，防止坏人滋事和溃匪散兵骚扰。(3) 立即派人前去追赶县长陈世光，并向其陈述厉害，无论如何要劝其火速返回。同时派人打探消息，准备一旦解放军来到鼎新，立即组织群众迎接。

1949年9月28日，金塔和平解放和解放军即将来到鼎新的消息传来，王世恭立即召集秘书张建中、补给站干事芦学信等人，安排他们书写和张贴标语，打扫房舍，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准备工作。下午5时左右，王世恭带领县政府职员及市民20余人，到县城东门外候迎。解放军某部三营九连张连长率领两个排的骑兵战士抵达时，王世恭等人热情招呼，端茶递水，连声问好。部队进城后，被安排在鼎新完校大院内吃饭休息。王世恭向驻军介绍了当地社会和治安状况，张连长作了简短讲话，对王世恭等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主动配合解放军的表现给予肯定和赞扬。解放军到达鼎新县的当晚，陈世光及其随从人员返回鼎新，连家眷都没来得及安置，就赶紧去向解放军认罪，请求宽大处理。晚上11时左右，有群众反映双树堡有一股流窜的国民党散兵到金塔五区天仓乡（现航天镇）头分村抢劫后，夜宿在一区西岔乡三队（现航天镇）李自本家。当夜另有四五个匪徒，骑马持枪到双城乡双城村四队，打死群众李自英后，沿黑河向南逃窜，当晚流窜到鼎新县二区芨芨乡（现金塔县鼎新镇芨芨村），村民龚汉喜将带短枪的敌军打晕在地，夺枪向山上跑去。敌军醒来后纠集同伙，找到龚汉喜家，将其弟绑到木柱上，用子弹头刺身，活活折磨而死，并放火烧了龚汉喜家的房屋。这伙匪徒在芨芨乡烧杀抢劫一夜，于次日上午继续南逃，夜宿鼎新县二区双树乡（现金塔县鼎新镇双树村）大户张吉荣和刘浩贤家。

接到报告后，解放军战士不顾疲劳，出动两个排和县自卫队，连夜赶往双树堡，又追到五区天仓乡头分村，得知敌军已过黑河，便立即蹚水过河，追到鼎新西岔乡，当地群众说敌军大肆抢劫后，折转向南逃去。这时，解放军已徒步行军百公里，为了消灭土匪，又连夜行军，9月30日下午追到茨茨村，稍事休息吃饭后，继续向南追剿。10月1日黎明4时部队赶到双树村，向群众了解敌情和周围地形。郭副连长立即集中队伍，部署作战方案，进行战前动员。黎明6时，战斗打响了，敌军从睡梦中惊醒，凭借土围高墙，慌忙还击，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解放军喊话劝降，并用六〇炮射击庄内。敌军立即组织向南山突围，后又向东南方向突围，结果多次被埋伏在山头的解放军击败。此时敌军深感四面被包围，已无法逃出天罗地网，才打出白旗投降。在缴械中，一敌军举枪反抗，被解放军战士当场毙命，其余的只好缴械投降。追剿战斗于上午9时胜利结束，当地群众拍手称快："解放军一心为民，不畏疲劳，英勇善战，个个都是好样的。"这次追剿战，打死打伤敌军多名，俘虏敌军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山炮十多门，手枪、冲锋枪、步枪百余支，战马一百多匹以及敌军沿途抢劫的大量金银财宝。

这次战斗，是解放金塔、鼎新最具影响的一次激烈战斗，使人民群众受到了很大教育。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信任度进一步提高，认识到了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也为金塔、鼎新两县和平解放后的交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10月4日，中共酒泉地委、酒泉军管会任命段子敬为中共鼎新县委书记，高锦光为鼎新县人民政府县长。同日，高锦光带领工作人员18人接管鼎新县，王世恭、陈世光、韩金元、张鸿春等人及部分群众到南城门外黑河边迎接，接管人员抵达时，鞭炮齐鸣，气氛十分热烈。10月5日，在县城龙王庙的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书记段子敬、县长高锦光及县委宣传部长温阜常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劳动人民起来同地主恶霸及其旧势力做斗争，当家做新社会的主人。陈世光也在会上发了言，对共产党不计前嫌的宽大政策感激涕零，表示"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一定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会场上，群情激昂，气氛热烈。会后群众扭起了秧歌，进行了游行，唱起

了大戏，街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欢乐场面。

之后，鼎新县立即进行了有秩序的接管工作，并举行了隆重的交接大会。新政府参加接管的人员有高锦光、张万元、王吉元、王德伟等。移交的旧政府人员有王世恭（县政府秘书兼建设科长）、秦希珍（财政科长兼税务主任）、韩金元（民政科长）、薛培元（会计室主任）、柏孝权（仓库主任）、刘茂林（银行会计）等。交接中，所有资产、档案登记造册，手续清楚。鼎新县人民政府在两个月后的工作总结中称："接管工作顺利，所有档案保存妥善，手续交接清楚。"鼎新县共接管粮食640多吨，银圆3万多元。接受国民党县党部和区工作人员90人，警察局20人，自卫队48人，大部分录用，并将自卫队扩大为145人，警卫队扩大为20人。三三九分站由27支队接收，公路段、邮政局由直属系统接交，省银行办事处停止工作。

随后进行了旧政府人员的审查遣返工作，留用的人员有王世恭、薛培元、韩金元、秦希珍、包文科、刘茂林、张鸿春、芦学信等20余人。张质、白云安等十余人被遣返原籍或回农村。对县警察队和自卫队40余人，除少数有劣迹的遣返外，大部分收编、改编成了地方人民武装。

10月4日，鼎新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相继建立了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中共鼎新县委的工作部门有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下设两个区工委，李崇业任组织部长，温阜常任宣传部长，闫清行任一区工委书记，蔚贵忠任二区工委书记。县人民政府设一室四科，下辖两个区，王吉元任秘书室秘书，张万元任民政科科长，王德伟任财政科科长，张鸿春任教育科科长，刘茂林任建设科科长，闫清行任一区区长，李成茂任二区区长。从此，鼎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金塔历史大事记

（西汉—1949 年）

西　汉

元狩二年（前 121 年）

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率兵征讨匈奴，大败浑邪王、休屠王部，收复河西地区。金塔正式纳入西汉王朝版图。

元鼎六年（前 111 年）

西汉王朝设立酒泉郡。

是年，金塔境内设立会水县，属酒泉郡。

元封四年（前 107 年）

西汉王朝修筑酒泉到玉门关（敦煌境内）长城（包括金塔境内的北部塞，即东接黑河，西至玉门花海，沿金塔北山南麓东西向分布的长城）。

太初元年（前 104 年）

西汉王朝修筑酒泉至居延泽（额济纳旗境内）的长城（包括金塔境内的东部塞、西部塞，即沿黑河东、西两岸南北向分布的长城），并发戍甲卒，置居延屯田，以卫酒泉。

天汉二年（前 99 年）

李陵率步卒五千从酒泉经金塔出居延塞（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击匈奴，大败后，投降匈奴。

王莽新朝（9—23 年）

公元 9 年，王莽篡汉称帝，改国号“新”。改酒泉郡为辅平郡，改会水县为萧武县。

复汉二年（24 年）

2 月，窦融请求经营河西，被刘玄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金塔被窦融统辖。

东 汉

建武元年（25 年）

河西五郡太守梁统（武威）、厍均（金城）、史苞（张掖）、竺曾（酒泉）、辛肜（敦煌）等人推举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建立起河西割据政权。

建武五年（29 年）

窦融遣使洛阳，归属东汉王朝。东汉王朝授窦融为凉州牧。

建武十年（34 年）

窦融与东汉联兵东西夹击隗纯，隗纯投降。光武帝封窦融为安丰侯，管理河西。

光武十二年（36 年）

光武帝诏窦融入朝，先拜为冀州牧，后又升为大司空，位列三公，参与朝政，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功臣之一。

永平四年（61 年）

酒泉、金塔等地发生蝗灾，庄稼受损严重。

建康元年（144 年）

酒泉发生地震，金塔震感强烈。

光和元年（178 年）

12 月，鲜卑攻酒泉，金塔也受其侵扰。

光和三年（180 年）

秋至次年春，酒泉表氏（今高台）西北地震 80 余次，地下水涌出，城中官府民房皆塌（震中在高台西，北纬 39° 4′，东经 99° 5′；烈度为 10 度，

里氏 7.5 级）。金塔震感强烈，有民房、畜圈倒塌，发生人员伤亡。

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

5 月，酒泉黄华割据酒泉郡地，自称将军。

曹　魏

魏文帝黄初元年（220 年）

在金塔境内设会水县，隶酒泉郡。

魏明帝太和二年（228 年）

张邈任凉州刺史，在河西广开水田，发展灌溉农业。

西　晋

泰始元年（265 年）

在金塔县东部设会水县，将金塔县西部划归禄福县。

元康五年（295 年）

改禄福县为福禄县。

永宁元年（301 年）

张轨被西晋王朝任命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统辖河西。

东　晋

永和五年（349 年）

凉州官吏推张重华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凉州张氏割据政权正式建立，史称“前凉”，金塔纳入前凉统治范围。

太元元年（376年）

前秦苻坚发兵进攻前凉，凉王张天锡投降，前凉灭亡。金塔纳入前秦统治范围。

太元十年（385年）

9月，前秦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吕光杀凉州刺史梁熙、梁胤父子，自领凉州刺史，辖金塔。

太元十一年（386年）

12月，吕光自称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凉州牧、酒泉公，辖金塔。

太元十四年（389年）

吕光自称三河王，正式建立河西割据政权，辖金塔。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

吕光自称大凉天王，建国号大凉，史称“后凉”，金塔纳入后凉统治范围。

隆安元年（397年）

后凉建康太守段业与沮渠男成一同起事，攻取酒泉。段业被推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建立北凉政权，金塔纳入北凉统治范围。

隆安四年（400年）

李暠自称凉公，建西凉国，定都敦煌。

隆安五年（401年）

5月，段业被沮渠蒙逊所杀。6月，沮渠蒙逊执掌北凉政权，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

是年，李暠攻取酒泉郡，金塔纳入西凉统治范围。

义熙元年（405年）

西凉国迁都酒泉。

元熙二年（420年）

7月，西凉国主李歆与北凉沮渠蒙逊决战于蓼泉（今甘肃省临泽县蓼泉镇），李歆全军覆没，沮渠蒙逊占领酒泉。

是年，沮渠蒙逊击败西凉，夺得酒泉后，王子沮渠牧犍（茂虔）任酒泉太守，在会水县境内（今金塔县中东镇）修筑牧庄，以供滋牧，“王子庄”名称由此得来。

南北朝

延和二年（433 年）

北凉沮渠蒙逊死，其子沮渠牧犍继位，继续统辖金塔。

太平真君三年（442 年）

北魏占领酒泉，金塔纳入北魏统治范围。

孝昌二年（526 年）

废会水县，按水系将西部（王子庄）并入酒泉，东部（毛目县）并入张掖。

西魏时期（535—556 年）

金塔属西魏。

北周保定四年（64 年）

北周实行合郡并县。金塔仍分属酒泉、张掖郡。

隋

开皇三年（583 年）

置酒泉镇，辖今金塔县。

仁寿二年（602 年）

改酒泉镇为肃州，辖今金塔县。

大业三年（607 年）

内侍郎裴矩到张掖、敦煌主持西域政务和西方各国外交、贸易事宜。他主政期间，著《西域图记》一书，成为一部有丹青绘像、有地图、有记述的相当完整的地理学著作，并详细总结记录了当时从敦煌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

大业十三年（617 年）

7 月，武威司马李轨起兵反隋，攻占凉州，自称凉王。改元安乐，占领河西五郡地。

是年，改福禄县为酒泉县。

唐

武德元年（618年）

11月，李轨称“大凉皇帝”，金塔属李轨统治。翌年，李轨被擒，斩于长安。

武德二年（619年）

改郡为州，复置肃州，领酒泉、福禄、玉门三县，金塔县西部王子庄一带属酒泉县、东部毛目县一带属福禄县。

开元十四年（726年）

金塔遭旱、霜、水灾，损失严重。

至德元年（756年）

11月，河西地震，震中位于今高台县附近。

大历元年（766年）

吐蕃攻陷甘州、肃州，金塔被吐蕃占领。

大中四年（850年）

张议潮收复肃州，金塔被张议潮占据。

大中五年（851年）

11月，唐置归义军于沙州，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

咸通八年（867年）

张议潮入朝，官拜河西十一州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使大夫，河西万户侯、右神武统军，南阳郡开国公。

大顺元年（890年）

甘州回鹘占据金塔。

天祐二年（905年）

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遭到甘州回鹘进攻。张承奉军队与甘州回鹘军大战于金河东岸（酒泉北大河以东），大败回鹘兵。

五　代

后梁开平五年（911 年）

甘州回鹘可汗狄银率大军进攻沙州，张承奉被击败，与甘州回鹘订立“城下之盟”，结为“父子之国”，被迫认回鹘可汗为父，成为甘州回鹘政权的附庸，并割让甘州、肃州（包括金塔）给回鹘。此后不久，“西汉金山国”被逼降为“敦煌国”。

宋（西夏）

天圣六年（1028 年）

李元昊攻陷甘州（辖今金塔县鼎新片）。

景祐二年（1035 年）

改甘州为镇夷郡（辖今金塔县鼎新片）。

景祐三年（1036 年）

西夏李元昊攻占肃州（辖今金塔县金塔片），改肃州为蕃和郡。

大观四年（1110 年）

金塔大旱。

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

金塔大旱。

淳熙二年（1175 年）

河西诸州旱，蝗虫大起，庄稼殆尽，民饥。

元（蒙古）

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 年）

5 月，蒙古西路军攻占蕃和郡（辖今金塔县金塔片），结束西夏政权对

金塔长达 190 年的统治。

6 月，蒙古西路军攻占镇夷郡（辖今金塔县鼎新片）。

中统三年（1262 年）

9 月，金塔大旱。

至元元年（1264 年）

置甘州路总管府（辖今金塔县鼎新片），驻甘州。

11 月，忽必烈诏命甘州、肃州（包括今金塔县）等州修渠开田。归来之民，授给田土、种子、农具。

至元七年（1270 年）

置肃州路总管府（辖今金塔县金塔片），驻肃州。

至元十八年（1281 年）

肃州（辖今金塔县金塔片）置立屯田，凿渠灌田，开种者得粟。

至元三十年（1293 年）

甘州、肃州大旱。

至治二年（1322 年）

3 月，在金塔境内东大湾城置八剌哈孙驿，即纳怜站道白城站。

至正十五年（1355 年）

筑毛目城。

明

洪武五年（1372 年）

6 月，明将冯胜攻克甘州（辖今金塔县鼎新片）。

6 月，明将冯胜攻克肃州（辖今金塔县金塔片）。

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

设立威远卫（辖今金塔县东部），驻威远城，领威远、天仓、平朔、毛目四所；威虏卫（辖今金塔县西部王子庄全境），驻威虏城。

永乐三年（1405 年）

裁威虏卫归并于肃州，裁威远卫归并于甘州镇夷千户所。

正统元年（1436 年）

5 月，鞑靼六千余骑犯肃州，伤官兵，掳人口，掠畜 14000 余，金塔深受其害。

成化十三年（1477 年）

4 月，甘肃地震，地裂有声，地生白毛，冰厚五尺，间以杂沙，有青、红、黄、黑四色。

成化二十年（1484 年）

金塔大旱，麦无收，民大饥。

弘治十一年（1498 年）

鞑靼小王子犯肃州。

弘治十六年（1503 年）

4 月，甘肃昏雾障天，咫尺不辨人物。

正德十一年（1516 年）

在金塔境内威虏城、金塔寺安置赤金卫东迁部众。

正德十六年（1521 年）

12 月，河西遭遇重大风灾，民房、数木毁坏严重。

嘉靖二年（1523 年）

4 月，河西地震。

嘉靖五年（1526 年）

甘肃巡抚陈九畴在金塔寺修筑城堡，安置哈密回回。

嘉靖十九年（1540 年）

4 月，甘州、肃州等地地震。

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

7 月，河西风霾昼晦，色赤复黄。

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

巡抚杨博副使王仪等修葺威虏城和金塔寺古城，添设白雁墩、察黑包、王子庄墩堡、八里墩堡等城堡共 7 座，墩台 12 个，安置番帐 700 余座，人口 4000 余人。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

肃州蝗起，民大饥。

隆庆六年（1572 年）

肃州境内自下古城东大墩至高台镇夷（包括金塔境内）130 里长城修筑完工。

万历十八年（1590 年）

6 月，河西地震，坏城郭庐舍，压死人畜无数。

万历二十年（1592 年）

设立金塔寺堡，立官分土。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

金塔寺设守备一员。

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

音　在金塔堡四周筑起塔院大墩，塔院腰墩、新营儿墩、黑沙窝腰墩、北门门墩共 13 座。

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

离金塔堡八里周围筑边墙一道，以拱卫肃州。

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

6 月 12 日，子时河西地震，金塔震感强烈。

清

顺治六年（1649 年）

1 月，丁国栋率回族反清军由甘州撤往肃州，在肃州拥立土伦泰为王，汇集肃州及哈密等地援军驻守肃州。

11 月，清军攻破肃州城，土伦泰被清军射死，丁国栋等被俘，甘肃的回族反清斗争失败。

康熙三年（1664 年）

金塔寺营改设游击。

康熙三十年（1691 年）

在金塔境内设置金塔协，隶属肃州镇总兵府。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

金塔营游击甘州（今张掖）人孙一贵，重建金塔。塔身为土质铜顶，围七丈，高五丈，顶高五尺，围约一丈二尺。塔前大殿三楹、左右廊房、山门、乐台俱备，四十二年告竣。

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

朝廷诏令肃州在金塔寺等地招民垦种，在金塔寺安插移民 35 户。

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

肃州守备曹锡钺在毛目分县和王子庄分州移民屯田。

雍正三年（1725 年）

改高台守御千户所（顺治二年设立）为高台县（含毛目，今金塔县东部）

陕甘总督年羹尧赴甘、肃等州巡视，会同甘、肃府（州）、县妥善议定章程，首次制定黑河“均水制度”。

雍正四年（1726 年）

肃州通判毛凤仪雇佣民工 300 人，将夹山水峡口凿深劈宽，引水过山，开垦王子庄东、西两坝，并从镇番（今民勤）、高台等地移民开垦荒地。

雍正七年（1729 年）

高台县归属肃州。并在今金塔县西部增设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分州，置王子庄州同，掌督粮捕盗、清军理事、扶苗水利等事务，治所在王子庄墩堡（又称王子庄，今金塔县中东镇政府驻地一带），衙门地名叫噶里戈什（革力哥什）。

雍正十一年（1733 年）

原任山东布政使孙兰芬负责毛目屯务，抓军政的同时，在旧屯田渠道的基础上重新开挖大、小常丰渠 17 里，将开垦的地段按渠系划编为天、地（天号村）、元、黄（上元村）、宇、宙（西湾村）、洪（洪号村）、昌、日、月（新西村）、盈、昃、辰（进化村）、宿、列、张（新民村）、寒、来（友好村）、暑（永胜村）、往（永联村）、秋、收（头分村）、冬、藏（东明、五分村）二十四号，每号有耕地五百到七百亩不等，总计开垦土地 18025 亩。

号毛目城屯田。

是年，张掖县丞倪长庚、州判任邦怀负责，在双树墩荒芜地界开挖双树墩渠，渠长16里，灌渠引黑河水，内分大（大茨湾）、有（腰湾山，有的谐音）、年（双树村三至十组）三号，每号各约耕地520亩。号双树墩屯田。

雍正十三年（1735年）

在今金塔县鼎新镇、航天镇一带设高台县毛目县丞（又称高台分县），治毛目城（今金塔县鼎新镇友好村），隶安肃道。

乾隆元年（1736年）

金塔寺营改设副将，添设中军都司一员，千总三员，把总四员。

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

改金塔寺游击营为协镇营，设中军都司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协镇驻金塔寺堡，千总驻防威虏堡。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王子庄州同治所由王子庄墩堡移驻金塔寺堡。

是年，王子庄户口坝人孙兆彩，高中壬午科武进仕，选授殿前二等侍卫。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

向应明创建金塔第一所义学——蒙养义学，校址在三塘坝三上（今东坝乡三上村）。

乾隆五十年（1785年）

王子庄州同彭以懋扩充金塔寺堡，改称金塔城，并在金塔堡城南文昌宫创建柳堤书院。旧址在今金塔南关小学。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州同谭乃熊扩充金塔城。借养廉银三百两买了杨、张、李等五家地基扩修盖造。自前至后，共建成照壁、辕门、头门、二门、大堂、二堂、书房、内宅、班厅、衙役房、群房、寅宾馆、土地祠、马号等八十余间。修建围墙一道，开挖泉井一口，基本上达到了县署的规制。

道光十七年（1837年）

时任王子庄州同冀修业从国库拨银3000两，修筑了东西拦河水利工程，长二十余里，当时叫“皇逼水”。

同治四年（1865 年）

春，马文禄在肃州（今肃州区）领导了回族反清斗争，起义军占据肃州，肃州州治临时移驻金塔城。

同治六年（1867 年）

毛目县丞李彭开工修建营尔城，到清同治八年（1869 年）告竣，后改为鼎新城。

光绪元年（1875 年）

4 月，左宗棠禁种鸦片，烟苗已出土者令军队强行铲除。

是年，金塔城开茂盛当一处。

光绪四年（1878 年）

贡生陈豫讷督修战乱中被毁的金塔寺。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

金泉书院改为王子庄官立高等小学堂，设正副教习 2 员，招收学生 20 名，修业 3 年。

宣统二年（1910 年）

王子庄州同寇炳寅谕饬赵积寿、刘怀基督修金塔城东门敌楼兼葺南北二门敌楼。

是年，金塔设置劝学所，设所长一人，以代理斋长之职。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 年）

2 月，由金塔王子庄义军“金王军”参加的革命党人祁德隆组织的文家圈农民起义被清军镇压。

是年，“金王军”首领赵福被杀。

民国二年（1913 年）

2 月，王子庄分州更名为金塔县，邓学典任县知事。高台分县更名为毛目县，周化南任县知事。

是年，金塔县议会成立。

民国三年（1914 年）

金塔、毛目两县始设警备队，以维持地方治安。

是年，金塔、鼎新改初等小学堂为国民初级小学。

是年，斯坦因第三次到中亚考察。他沿着 1906—1908 年在敦煌境内发现边塞（汉代长城）的线路，在对敦煌市北部的汉塞遗迹和汉代烽燧遗迹进行了补充调查和发掘的基础上，随后又沿疏勒河流域，从西向东，经今瓜州县、玉门市、金塔县，然后沿黑河向北至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对汉塞和汉代烽燧遗址进行了调查、编号和发掘。

民国四年（1915 年）

4 月 1 日，金塔县成立商务会。

12 月，酒泉（包括金塔、毛目）开征验契、印花、屠宰、农具、茶捐、鸦片等税。

民国五年（1916 年）

4 月，金塔县城隍庙焚毁。

是年，英国博士哈佛游历来金塔，将金塔寺塔顶铜佛窃去，县长永格报请省长，令镇守使在哈佛途经酒泉时被迫还。

民国六年（1917 年）

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生金塔籍人赵世英提出在酒泉设立师范学校，获得省府批准。

民国七年（1918 年）

2 月 1 日，金塔县成立农会。

是年，金塔、毛目两县改国民初级小学为第一、二、三……国民学校。

是年，金塔、毛目两县成立天足会，从事妇女放足工作。

民国八年（1919 年）

日本明治大学法部法学士赵世英（金塔籍）被选举为省会议员。

民国九年（1920 年）

金塔、毛目两县始用银圆。

12 月 17 日，毛目（今金塔县鼎新）发生地震。

民国十年（1921 年）

复选赵世英为国会众议院议员。

民国十一年（1922 年）

安肃道尹王 × × 令酒泉县县长沈 × ×，金塔县县长李士璋酌情判令茹公渠和金塔坝在临水河内各得水五分，于河口镶坪均分，每年立夏五日分水。立石碑遵为成例。

民国十二年（1923 年）

大开鸦片烟禁。金塔乡村又是罂花遍地，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20% ~ 30%。

是年 开始征收烟亩税。

民国十三年（1924 年）

金塔、毛目两县改主管水利事业的督修农官为水利员。

民国十四年（1925 年）

金塔、毛目两县改劝学所为教育局，改县视学为督学。

民国十五年（1926 年）

举行全国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县绅赵积寿为国民代表。

是年 金塔县在县城北郊成立农事试验场，面积 10 亩。

民国十六年（1927 年）

4 月 23 日 5 时 20 分，威武、古浪一带发生 8 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为 11 度。金塔、毛目有不同程度损失。

是年，金塔、毛目两县大旱成灾，禾苗枯萎无收。金塔县、毛目县设赊饭场两处，每天乞食饥民达数百人。

5 月，金塔、毛目县衙改为县政府，县知事改为县长。

7 月 3 日，成立国民党金塔县临时县党部。

是年，废除乡约制，推行区、村、闾制。

民国十七年（1928 年）

金塔、毛目春夏大旱，冰雹、洪水、虫害、暴风接连成灾。

是年，警察所改为公安局，改警佐为局长，警生为局丁。

6 月 1 日，黄文中县长奉令设立保卫团。

是年，金塔县创建民众工厂一处，生产棉、毛织品和铜铁锅、盆等 12 种产品。

民国十八年（1929 年）

1 月 1 日，改毛目县为鼎新县。

3 月 2 日，召开国民党金塔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春，废除乡官制，改乡约为征收员，推行区、村、闾体制。

5 月 1 日，中国国民党金塔县党部成立。

是年，设自治筹备委员会、县农会。

是年，金塔、鼎新两县遭特大旱灾，田禾无收，树皮草根人相争食，贫苦农民饿死于道旁沟壑者不可胜计。

民国十九年（1930 年）

7 月，中国和瑞典地质学家等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沿弱水两岸，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今甘肃省金塔县鼎新）约 250 公里之间，以及在布肯托尼与博罗松治约 60 公里之间，发现有汉代的塞墙和障堡亭燧，其间共有 3 段塞墙、39 个烽台、2 个城和 4 个障，在 463 个灰坑中采获了一万多枚汉简。

秋，合区并村。原金塔县一区、二区合并为第一区，三区、四区合并为第二区，全县共 2 个区，10 个村。

民国二十年（1931 年）

撤销坊隅，设立区、乡制，乡下设闾，闾下设邻。各设区、乡、闾、邻长一人，分管所辖区的民事、赋税、差役等事务。

9 月 9 日，马仲英为新疆省盛世才部击败，率部退回甘肃酒泉，与马步芳达成协议，以安西、敦煌、玉门、酒泉、高台、鼎新、临泽 7 县为驻防区。

是年，金塔县在城内创设第一女子小学校。

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

7 月 12 日下午，三塘、梧桐村遭受冰雹袭击，受灾面积南北长 40 余里，东西宽 10 余里，灾民 439 户，被雹打伤禾地 1046 亩。

10 月 25 日晨 7 时，金塔地震约 5 分钟，县城城墙倒塌 40 丈，城垛倒五六个，压死 2 人。

12 月 25 日晨 8 时，鼎新县地震，四乡民房倒塌甚多，压死牲畜不计其数。

是年秋，金塔寺塔顶铜佛又被盗贼窃去无踪。

是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马仲英为新编 36 师师长，鼎新县为其驻地

之一。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

春，金塔因遭冰雹，粮价飞涨，饥云遍野，男女老幼之难民充斥街巷，地方绅士发启劝捐粮米，在龙王庙设贫儿院，每日散粥二次，两月余。

夏，村易名为乡。

11 月 16 日，金塔设县志局（后改文献委员会），县长蒋绍汾任总纂。翌年底，《金塔县志》修竣。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

金塔县县长周志拯商承地方绅士，用地方存款，办理农民低利借贷所一处。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

裁撤乡、闾，编制保甲。区下为保，保下为甲。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保上设区。金塔县，划3 个区，54 个保，220 多个甲。鼎新县，2 个区 8 个保。

是年，开始查禁鸦片烟，金塔、鼎新两县分别成立禁烟委员会，下设戒烟所办理戒烟事宜。至民国二十六年 (1937 年) 禁绝。

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

春，金塔县司法处成立，8 月鼎新县司法处成立。设检察官（县长兼任），审判官、书记官、录事各 1 人。

是年，甘肃省政府委派林培霖和杨世森前来酒金办理均水事宜，规定每年芒种日起，封闭酒泉讨赖河各渠口，由金塔浇灌 10 日。大暑前 5 天起，封闭临水河、讨赖河酒泉境内各渠口，由金塔浇灌 5 日。

是年，甘肃省政府奉中央明电转饬各县赶修碉堡，以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金塔县筑碉堡 17 座，鼎新县筑碉堡 12 座。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

10 月 10 日，金塔县成立抗日后援会，负责宣传抗战情形，劝募捐款慰劳出征将士。

是年，金塔、鼎新两县奉令实行征兵制，废除历代以来的募兵制。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

中国国民党鼎新县党部成立。

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

改区为乡，乡公所内设民政、财政、巡警、户籍、文教等股，各设股长。

7 月 21 日，鼎新县降冰雹，大者如蛋，秋禾打伤殆尽。

是年，金塔县党部会同县府创办《金塔通讯》，激发人民抗战情绪。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

5 月，根据甘肃省新县制法，在县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科，县以下行政设置为乡、保、甲制。

7 月，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委放映三队来金塔、鼎新放映抗日战争纪录片，为本县放映电影之始。

民国三十年（1941 年）

10 月，金塔、鼎新两县田赋粮管理处成立，管理地亩测量及粮赋配额、督征等事宜。

是月，金塔、鼎新两县始通电话。

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

9 月，甘肃省水利林木公司在酒泉设肃丰渠工程处，主任为原素欣。主要任务是修建金塔鸳鸯池水库。

12 月，三民主义青年团金塔、鼎新两县分团成立。

是年，甘肃省政府开始在全省各县将田赋改征实物，并将各项临时摊派编为正额，一律征实。同时，按照田赋正额开始征购军粮。金塔县应征田赋军粮 9222 石，实征 8754 石。鼎新县应征田赋军粮 5444 石，实征 3740 石。

是年，甘肃省政府开始在河西清丈土地，金塔原有耕地 9 万自然亩，清丈后为 17 万标准亩。鼎新原有耕地 2.84 万自然亩，清丈后为 8 万标准亩。

是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巡河西后，提请中央批准将安西、敦煌、玉门三县及鼎新县全年应征兵额折交马匹，并规定一马抵二丁。

是年，全省各县开始征收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和公荒牧租。金塔、鼎新亦在征收之例，

是年，金塔县制定清寒学生奖励办法，学业成绩在 80 分以上者，高中每名年支 200 元津贴，初中每名年支 120 元津贴。

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

6 月，金塔鸳鸯池水库工程正式开工。

7月，甘肃省政府厘定金塔县为五等县。

是年，酒泉—金塔始通汽车。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4月，著名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夏鼐在甘肃省敦煌、金塔、民勤、武威、临洮、兰州各地对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代至唐代的遗址和墓葬进行调查发掘。途经金塔，对金塔的部分烽火台进行了调查，并写有随笔《金塔县的古代烽台》。

10月，金塔、鼎新两县临时参议会成立。

11月，金塔县知识青年从军21名，鼎新县19名。

是年，金塔县成立邮政局，邮差于酒泉每月1、4、7日来，2、5、8日返。

是年，酒泉—鼎新始通汽车。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8月28日，陨星坠落额济纳旗，鼎新县夜空白光如昼，响声如雷。

10月10日，金塔、鼎新两县参议会正式成立。

18日，奉中央令拨款修筑酒泉至额济纳旗建国营公路，长330公里。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8月，金塔县筹设县银行，内计公股257.60万元，民股509.47万元，商股200万元，用于补助农工商户发展生产。

是年，金塔、鼎新粮价飞涨，元月小麦市石1.5万元（法币），12月为2.5758万元。元月面粉市斤170元，12月为315元。元月糜米市石1.57万元，12月为3.474万元。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5月，历时4年余，鸳鸯池水库竣工，此工程费用法币16亿元，人工86万个。主体工程：土坝长221米，顶宽5米，底宽189.3米，高30.26米；溢洪道宽100米，长182.54米；输水涵洞长164米，宽3米，高2.5米；蓄水量为1200万立方米，可灌农田7万亩。

12月，鼎新、高台两县合修马尾湖水库，翌年完工。有效库容352万立方米，耗用国币16万元。

是年，金塔县发动民工修建县城至西区乡公路，长22公里，路面宽6.5米，共用民工8844个。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

9 月 1 日，甘肃省金塔初级中学筹建告竣，首届招收学生 1 班，50 名，顾子材任校长。

9 月，国民党西北行辕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治中来金塔视察。

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

9 月 25 日，国民党金塔县县长马元鹗，给西进至酒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通电，领衔率部起义，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复电嘉奖。

26 日，金塔县和平解放（1986 年 9 月 15 日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为起义县）。

2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九连开抵金塔，县长马元鹗组织县府机关职员、驻军、学生和市民 300 多人，在县城南门外举行欢迎仪式。

同日，鼎新县和平解放。

参考文献

| 清 | 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酒泉市博物馆翻印本，1987 年。

吴生贵、王世雄等：《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6 年。

| 明 | 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校点：《肃镇华夷志》，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清 |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 64》，中华书局，1977 年。

| 清 | 张秉倬：《王子庄州同地理调查表》，1909 年。

| 清 | 萧德元：《甘肃肃州属高台县毛目县丞地理调查表》，1909 年。

| 民国 | 赵仁卿等纂：《金塔县志》，金塔县人民委员会翻印，1957 年。

| 民国 | 金塔县政府：《金塔县采访录》，1941 年。

| 民国 | 张应騄修、蔡敬亭编纂：《鼎新县志草编》，金塔县人民委员会翻印，1957 年。

罗哲文：《长城》，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

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长城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年。

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 年。

高荣主编：《河西通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

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 年。

方步和：《张掖史略》，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年。

马建华、张力华：《长城》，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年。

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年。

孙占鳌：《酒泉通史》，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 年。

高启安、邰惠莉：《明代东迁关西诸卫部众在金塔的安置与流散——以肃镇华夷志为主》，河西学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

桂发荣：《金塔县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0 年。

陈钰业：《文明的开拓与融合——公元七世纪以前的酒泉》，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

俞兴海、王世雄、桂发荣:《修编金塔方志》,金塔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2006年。

李国民：《金塔文化遗产研究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

陶玉乐：《金塔长城》，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年。

陶玉乐：《金塔胜迹》，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

后 记

《金塔简史》是“金塔历史文化丛书”之一。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金塔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县委书记方学贵，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国文为该套丛书撰写了序言。中共金塔县委办公室、金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县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县档案局、县政协文史委、县文物局（博物馆）、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等部门和单位为本书的编纂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精心配合。兰州财经大学教授、甘肃省敦煌学会副会长、敦煌学博士高启安在百忙之中抽时间阅读了书稿，提出了许多指导意见，并为该套丛书撰写了序言。兰亭书画院院长、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张首文为该书题写了书名。甘肃省社科院酒泉分院院长、酒泉市史志办主任孙占鳌，金塔县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局长孙志宝，金塔县博物馆馆长、文物局局长李国民审阅了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 者

2018 年 4 月

责任编辑：房金蓉

封面设计：苗青青

封面题字：张首文





ISBN 978-7-5490-1588-7



定价：48.00元